中國革命簡史

唐德剛 著 ｜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 編 ｜ 古蒼林 翻譯 ｜ 夏沛然 審校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國革命簡史

唐德剛 著｜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 編｜古蒼林 翻譯｜夏沛然 審校



中國革命簡史

唐德剛 著 |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 編 | 古蒼林 翻譯 | 夏沛然 審校



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

作者：唐德刚

编者：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

翻译：古苍林

审校：夏沛然

主编：游奇惠

编辑：陈穗铮

发行人：王荣文

出版者：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0臺北市南昌路二段81号6楼

电话：2392-6899

传真：2392-6658

电子邮件：ylib@ylib.com

远流博识网：http://www.ylib.com

电子书设计制作

制作单位：远流制作中心

企划：廖士锋、张瑞麟、张淑萍

数位版制作：简玉欣、曾宪华

电子书制作日期：2014年7月

（本书系根据2014年1月1日 初版一刷之纸本书制作）

档案格式：ePub

法律顾问：董安丹律师

着作权顾问：萧雄淋律师

有着作权·侵害必究

【作者简介】

唐德刚（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县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歷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歷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歷史的发展贡献良多。着有《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版）、《顾维钧回忆录》（英文原着，纽约时报系发行，大陆有中译本）、《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版）、《胡适杂忆》（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张学良口述歷史》、《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五十年代底尘埃》、《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中国之惑新编》、《战争与爱情》（远流）等书，另以中英文分别出版包括歷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国旧金山，享寿八十九岁。

【译者简介】

古苍林

美国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 Connecticut）数学博士，前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CUNY）数学教授，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员。

夏沛然

联合国中文处笔译，一九九九年退休。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员。

健笔写卓识（代序）／于仁秋

唐德刚教授这本《中国革命简史》，是他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写就、以英文读者为对象的通史着作。我们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古苍林、夏沛然两位先生，花费大量时间心血，将唐教授这部着作不失原貌地翻译为中文，献给中文读者。译稿完成即将付梓之际，古、夏两先生及我们学会的会长禤福煇先生命我写一序言。我读了译稿，有些体会想法，斗胆写在下面，权作小序，求教于方家。

唐教授这部写于五十多年前的书稿，我们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同仁今天仍郑重向中文读者推荐，主要是觉得这部书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在扼要叙述基本歷史事实的同时，力图超越党派私见和学派偏见，呈现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歷史的综合性、批评性的理解和阐释。很可惜，这部具有唐教授独特风格的史书，在他生前未能出版。

这部着作的一个特点，是在要言不烦的歷史叙述（narrative）中呈现出精緻的歷史分析。唐教授的这一写作风格，既显示了他对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也体现出他受过西方现代史学的扎实训练。唐教授在他的中文歷史论着中常常提到，学习歷史要有概念化的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而概念化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歷史事实、史料的深切把握之上。唐教授在少年时代读过《资治通鉴》、《史记》等中国史学名着，受过中国传统史学的熏陶；在大学时代得到顾颉刚、郭廷以等名师指点，领会了现代歷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一九四○年代末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歷史系读博士，受到当时正蓬勃发展的现代西方史学的全面训练，对社会科学在现代史学发展的作用、宏观史学、比较史学都有研究和领悟，同时他还成为中国近代口述史这一新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专业的歷史学家，唐教授在一九六○年代写作《中国革命简史》时正值壮年，他的传统学识、现代史学训练为他写作此书作了充足的准备，而他个人的秉赋和才气，让他在写作这部着作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出在简明扼要的叙述文字中呈现概念化理解的独特风格。

本书各章，短的七千多字，长的一万三千来字，都在有限的篇幅中叙述了主要的歷史事实、描绘了歷史过程，同时呈现了对歷史事实有「概念化理解」的消化之后的歷史分析。我们试读第八章「新舞台：经济转型，文化真空」，便可看到唐教授将经纬万端的歷史变化有条不紊地综合叙述的文字功力，和他将自己的概念化理解、歷史分析举重若轻地通过既简明又紧凑的歷史叙述来表达的高超技巧。在这一章中，唐教

授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变化──金融业（银行以及相关行业）、工业（纺织业、烟草工业等）的发展、劳工阶级的形成发展、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都作了扼要叙述，并在这些扼要叙述中，自然带入为什么新兴的金融业银行家、工业资本家、城市劳工、新一代知识分子都反军阀、反外国帝国主义的歷史分析。

唐教授的这种写法，是他一生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过的「将社会科学应用于歷史」的具体实践，以求获得对歷史的全面理解。现代歷史学家将社会科学引入歷史研究，纠正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的倾向，同时注重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努力获取对人类歷史活动的全面、总体的认识理解。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从现代眼光看，是一大缺陷，但并不是说政治史不重要。唐教授这部《中国革命简史》，仍然主要是一部政治史，但这是一部具有现代眼光、主动接受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有益影响的政治史。政治史其实非常重要，那些博採现代社会科学之长的好的政治史，对读者学习歷史常有事半功倍之助。与传统的歷史只集中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不同，唐教授这部《中国革命简史》在描述一八四○年代到一九四○年代百年间中国政治变迁的同时，也勾勒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力图理解各种政治力量形成发展的经济、文化背景，国内、国外因素，并探讨影响不同阶段政治人物的政治、军事行为的歷史、文化因素，以求获得对近代中国百年史的整体性认识。

唐教授的这部有现代眼光的政治史，得益于却并不受限于社会科学。唐教授将社会科学应用于歷史研究，并不是用社会科学取代歷史。他虽然强调现代歷史学家应该而且必须学习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以求获得现代眼光，他的歷史写作依然深植于史学的优良人文传统，重视对人和社会的复杂性的全面分析、对长时段中歷史曲折变化的融会贯通的理解，和以简洁、有个性的语言表达歷史学家自己独特见解的文字技巧。与社会科学家不同，唐教授并不要建立什么「模式」（model，比如说「革命模式」），他在他的着作中，尽可能通过描绘具体的人和事，把他对歷史发展脉络的理解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样的歷史写作中，他充分吸收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营养，同时继承发扬了歷史学的优良人文传统。

唐教授以现代眼光来写中国近代政治史，最留意的是制度变迁。略微读过他的歷史着作（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毛泽东专政始末》）的海内外中文读者，都知道他老人家讨论近代中国的「转型」，讨论了几十年。唐教授指出，中

国近百年的歷史，是一部「转型」的歷史，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其中的关键，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型到现代的「民主政治」。由于「帝王专制」是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宗法制度、官僚体制、政治伦理之上，有两千多年的深远传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废除，而现代「民主政治」是在西方先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数百年摸索形成的「生活方式」，亦不可能很快为中国人接受实践，因而中国的政治转型便艰险异常，痛苦万端。唐教授数十年反反覆覆讨论中国的转型，政治制度的转型，因为这是中国近代歷史的关键问题，反覆出现的基本问题，无数志士仁人为它困扰，为追求解决此一问题的答案而作过多种探索努力。唐教授的讨论，便是对近代中国人在此次转型时期的种种探索努力的思考和检讨。他的歷史着作，力图对中国人的实际歷史经验作出总体概括，因此他的叙述视野恢宏。

唐教授对近代中国史—尤其是制度变迁史—的基本观察和分析，已大部分在这部书中扼要地呈现；他晚年退休之后的中文论着，仍然讨论这些基本问题，只是增加了更多的引申和阐释。

本书第二部「民主革命的失败」共有三章：第五章「议会政府的尝试与失败，以及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第六章「权宜专制还是世袭独裁？」，第七章「从帝制到军阀割据」，将从辛亥革命到军阀割据这十几年间的主要事件有条不紊地综合叙述，着重分析那场建立共和制度、议会政府的「民主革命的失败」的种种原因和后果。我们若将本书和唐教授晚年的中文歷史着作对照着看，便会看出他对这段歷史的基本分析、主要观点已在本书中呈现。唐教授的基本观点是，虽然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制度，但中国社会尚缺乏现代民主制度运作的各种条件，因而这场民主革命很快失败了。唐教授的这个基本观点，是冷静的歷史分析，既不将欲恢復帝制的袁世凯脸谱化（如通俗史话中的「窃国大盗」），也不讳言在国民党官史中被神化的「国父」孙中山在失望之余曾毫不动摇地要搞「权宜专政」。唐教授只是根据客观事实冷静地分析，得出的结论超出党派私见。唐教授在他晚年着作《袁氏当国》中，对美国教授古德诺（Frank J. Goodnow）受袁世凯所请分析共和、君主立宪何者更适合中国的那套理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篇大文章，都有详细的讨论，而他的主要观点，早已在《中国革命简史》中扼要阐述。由壮及老，唐教授对中国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之转型」，确确实实是关注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曲不离口」地讲了一辈子。

唐教授这本《中国革命简史》是一部以普通美国读者为对象的通俗

歷史书，所以他选择用生动的歷史叙述来表述概念化的理解和歷史分析。很多时候，唐教授会不露斧痕地用讲述具体生动的故事的方法来呈现「概念化理解」。举例来说，唐教授在描述共和制度逐渐被袁世凯恢復帝制所取代的歷史过程的叙述中，呈现了辛亥革命时中国尚未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这一「概念化理解」，同时他简要地记述了两个故事，藉以说明在强大的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仍然主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歷史环境中，新的共和制度难以运行。第一个故事是袁世凯干涉唐绍仪总理职权，唐绍仪为维护宪法尊严与之抗争，当时舆论却大多循传统政治伦理支持袁世凯而指责唐绍仪。读者稍一回味，便会理解，在那样的舆论场中，受过美国教育、对现代共和宪政有正确理解并敢于坚持原则的唐绍仪，除了愤而辞职之外，别无选择。第二个故事讲的是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当皇帝，只是经过一系列的事变和长时间的犹豫挣扎，他才终于决定废除共和恢復帝制，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家族迷信，认为他登上皇帝宝座便可避免袁氏家族中数代男性活不过六十岁的传统厄运。唐教授晚年在他的中文着作对此故事有更详细的讨论──唐教授很认真地指出，袁世凯本是旧时代过来的旧人物，他头脑中有旧观念、迷信思想一点都不奇怪，而这类旧观念、迷信思想在某种关键时刻会对这类人物判断形势、拍板决策起决定性的作用。

唐教授在英文的《中国革命简史》中记述了这两个故事，使他的恢宏的「概念化理解」得到鲜活具体的歷史细节的支撑。我写这篇读书心得写到此处，受好奇心驱使，查了几本英文的中国近代史着作，发现他们在叙述这段歷史时，大同小异，但都未收入这两个故事（註1）。我便问：为什么唐教授会在极有限的篇幅里，讲述了这两个其他歷史学家都忽略的具体故事呢？我只能说，唐教授这样选材，自有他独特的歷史、文化敏感。晚年为迷信所误的袁世凯死了差不多一百年了，我们今天读时下的新闻报导，得悉中国政府的许多高官仍然拜佛求卦、烧香修墓，两相对照，想想这些人的脑瓜和袁世凯的脑瓜到底有哪些不同，就不得不佩服唐教授的歷史、文化敏感。后世史家写中国廿世纪末、廿一世纪初这段歷史，若只描述经济高速发展的歷史过程，完全不提高官迷信的现象，则不免有所欠缺。

当然，任何一部歷史着作都难免有所欠缺。唐教授这部《中国革命简史》，是在一九六○年代写成的，唐教授生前未能出版，也未能加以修订。因此，这部《中国革命简史》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唐教授在写作本书时，不可能看到七十年代以后才有可能看到的公、私史料。本书的两位翻译者古苍林、夏沛然先生曾在翻译过程中多次讨论过怎样处理这一问题；我和禤福煇先生也参与了讨论。我们曾经考虑过，是否以提

供「译者注」的办法，将唐教授当年未及见而现在已在互联网上公佈流通的新史料提供给读者。后来觉得，如果这些新史料在互联网上一索即得，有兴趣的读者自然自己会做，我们就不必代劳了。因此，除了注明少数很明显的由于「未及见」而造成的错讹、遗漏，本书翻译者尽量不加註释，只保留了原稿原注。

《中国革命简史》「未及见」书稿完成后数十年间涌现的新史料，固然是一欠缺，却也是歷史写作本身先天的限制。中国、西方的不朽歷史名着《史记》、《罗马帝国衰亡史》，都有对后来才出现的史料「未及见」的欠缺，却无损它们是公认的伟大的歷史着作。有「未及见」欠缺的伟大歷史着作依然伟大，是因为这些名着见识卓越、文体优秀。如果只着眼于「未及见」，不知欣赏卓越的见识和优美的文体，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明朝张岱编辞书《夜航船》，本意是提醒着作者不要犯技术性、常识性的错误，不然会被那些死记人名、官爵、年号的「两脚书橱」挑刺、「掩口笑之」；而张岱在四百年前对那些「两脚书橱」的观察剖析，在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形态（包括阅读习惯）的今天，仍极富启示。张岱在该书序言中说，那些略读过些书，记得一些基本常识的人，自以为「博学」，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何为见识，何为「文理」，因此这些「两脚书橱」若见某人某书有一技术性常识性错误，便认为「可耻孰甚」，加以嘲笑攻击。张岱对「两脚书橱」的深刻剖析，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因为这类两脚书橱不懂「文理」，没有见识，所以他们炫耀博学的种种议论，「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张岱，〈夜航船序〉）今天的网络时代，给愿意见贤思齐的两脚书橱提供了开阔眼界、提升见识的条件，却也让那些依然故步自封的两脚书橱有了寻觅、嘲笑技术性常识性错误的巨大空间。人生苦短，与两脚书橱纠缠无益，不如将时间花在细读有见识、有文采的书上。

然而，严肃认真的读者自然仍会问，撇开两脚书橱不说，「未及见」这一缺失是否影响到唐教授这本《中国革命简史》的「见识」？我通读《中国革命简史》后的印象是，对某些具体史料「未及见」这一客观歷史局限，并未影响到唐教授在这本书中所呈现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而且他在一九六○年代写作此书时，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史料的掌握达到了那一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如前所述，参与本书翻译、整理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同仁都认为，本书虽有「未及见」，毕竟有所见，所以值得翻译出版贡献给读者。

中国近现代歷史丰富复杂，中、外歷史学家所写的有关这段歷史的书籍成百上千种，读不胜读。唐教授这本简明扼要的《中国革命简

史》，通过具体生动的「人的故事」，表达阐述对近代中国歷史发展的整体性、批判性的理解，是一个有深湛功力的专业歷史学家特意为普通读者所写的通俗史书，值得一读。唐教授在本书所呈献的歷史分析，每每有独特的见解和表达，值得细细品味。如前所述，若将唐教授这本简史和他晚年的中文歷史着作对照着读，便可见到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甚至是中国周秦以来的歷史）中长时段中反覆出现的大问题—尤其是制度变迁方面的大问题，认真地讨论了一辈子。而唐教授的史识和文采，早年得到史学名家的赏识，晚年则广受读者的欢迎和认同。早年，唐教授还在读大学时写的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便着眼于「郡县起源」这样的制度变迁的大问题，认为「郡县制度是数百年间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中逐渐形成的」；这篇论文受到顾颉刚教授的赏识，称赞它「有眼光、有裁断」，「文笔亦能达出」。（《晚清七十年》，【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远流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页二七八。亦见吴章铨口述访问未刊稿。）晚年，唐教授根据他数十年的观察思索，将中国近代转型必须走过的复杂而曲折的歷史过程，比喻为扬帆穿越充满惊涛骇浪的「歷史三峡」，用最生动形象、最具有中国韵味的文字来表达他抽象的「概念化理解」。如今，凝结了唐教授的卓越史识和他将卓识化为常识的非凡文采的「歷史三峡」一词，频繁出现于学术着作、媒体评论之中，成为广被使用的当代汉语辞汇之一，这种读者的自觉认同，显示唐教授已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他的痕迹。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註释

註1：我查阅的英文中国史着作有下面这几本：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3rd edition, 2013.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ition, 2000.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th edition, 1983.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per & Row, 1987.

R. Keith Schoppa, *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earson Prentice Hall, 3rd edition, 2012.

唐德刚教授写歷史、评论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每有人不能及的独特敏感、锐利眼光和精确表述。近年来，研究林彪「九一三」出逃事件的着作越来越多，不少学者多方考证，下笔万言；我想起唐教授在《毛泽东专政始末》一书中对此有所评论，于是找出来又读一遍：

林彪的逃跑，非正常的逃跑也，而是一种变相的「越狱」。（《毛泽东专政始末》〔远流出版公司，二○○五年〕，页二二一。）

我再读这段唐教授写于一九九九年的评论，不禁叹道，「变相的越狱」简朗五个字，不仅写活了林彪的绝境，更写活了毛泽东的绝情，传神地描绘了帝王专制回光返照下的那场恶斗，不知胜过多少人的千言万语！

译者的话 / 古苍林·夏沛然

一九六○年代初，唐德刚先生和美国的出版商Crowell Collier（英、美大出版商MacMillan Publishing的前身）签约，写一本叫《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Sun Yat-sen to Mao Tse-tung*）的英文民国史。这是一本有三卷的大书，卷一、卷二是正文，分为六部二十四章（参看本书目录）；卷三是资料和书目（Source Book）。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书始终没有出版。

后来唐先生和师母移居加州，委託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他的书籍稿件。我们只找到本书的第一、二两卷，第三卷则不知去向。全部共有单页、双行英文打字原稿约七百余页，而且第二卷的最后四章，仅余下一些改得很厉害的残稿。已经写完的共有二十章，到一九四四年的史迪威事件为止。

写一本有特色的民国通史，是唐先生作为歷史学家一生都没有忘怀的事。他在一九八○年代还建议创立「北美中华民国史学会」（Historical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Republican China in North America）。根据汪荣祖先生的记忆：

> （德刚）原意要大家合写一部民国史，搞一个民国史研究的第三势力。他有鉴于当时大陆与台湾研究民国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扰，所以认为我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汪荣祖，〈「弃民身世两心知」：怀念唐德刚教授〉，《传记文学》第九十五卷第六期〔二○○九年十二月〕，页五五。）

这个学会在一九八三年八月成立，定名「北美二十世纪民国史学会」，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任首届会长。后来因「通史性质的民国史研究很难获得青眼」（汪荣祖，同上，页五六），学会又改名为「北美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也不再以民国通史为研究重点了。

但唐先生写中国近、现代通史的宿愿未泯，退休后就定下写作计划，要写一部包括晚清政府篇、北京政府篇、民国军阀篇、人民政府篇和国民政府在台北篇等五篇的巨册。《晚清七十年》（晚清政府篇）、《袁氏当国》（北京政府篇）和《毛泽东专政始末》（人民政府篇）先后出版，一时传诵华文世界，成为最畅销的歷史读本之一。此后，唐先生着手研究近代军阀，写了一系列有关段祺瑞的文章，但民国军阀篇还未成书，唐先生遽然长逝。

唐先生的遗稿委託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全权处理。在二○一二年一

月，学会和台北的远流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唐先生原来「中国近、现代通史」计划中余下的国民政府在台北篇，却因为他的仙逝而永远无法完成。学会有见及此，在二○一○年就有了把《中国革命简史》翻译为中文的构想。虽然这书着述于一九六○年代，而且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但唐先生对中国从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五年这段歷史的解释和看法已经成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简史》也许可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唐德刚作品集「民国通史」系列略作补充。

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原来计划将本书完整的二十章，由数人合译，每人译若干章，然后合成一册。后来考虑到每人行文的风格不同，合成时会发生文字无法统一的问题。最后决定由古苍林负责翻译，夏沛然负责审校，二○一一年夏天开始翻译，二○一三年六月完成了全书。

翻译唐先生英文的《中国革命简史》，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书中人、地、机构、组织、军队、职位、事件等等的名称和直接的引文都必须还原为中文。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处于资讯时代，大部分的东西可以上网查核。没有这些网上搜索机器的帮助，翻译的工作将困难百倍。还有许多歷史事件发生的年、月、日，登场的人物和发生事情的时序，也要一一查核。这些方面的错漏，都是译者工作做得不够细緻、严谨所致。希望读者随时留心指出，以便再版时更正。

其次，任何好的翻译都是在理解原文的意思之后，用通畅明白的中文把意思表达出来，不能逐字逐句地硬译。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付诸实践却往往知易行难，写出来的文字常常难以摆脱原文的束缚。我们虽然努力想避免翻译腔，但难免有时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辞汇，或是句子的安排不合中文习惯，出现词不达意、诘屈聱牙的现象。为此，全书译毕，我们还请了几位朋友细心校读修改。

唐先生的中文写得文采飞扬、挥洒自如，这是大家熟知的。这本书如果由他老人家亲自译写，自然又是另一本经典「唐派歷史」（杨天石教授语）。我们力有不逮，无法学步，只能尽量做到通顺、清楚而已。不过，书中有些章节或内容在唐先生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也曾提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尽量引用，希望能够再现唐先生的原貌。英文书中还有一些直接引用的句子，我们多方搜寻后如果找不到出处，就只能自译。

中国从晚清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数十年，是歷史大转型的关键时刻，一转百转，错综复杂。随便描绘一事件或一歷史人物，都是

千头万绪，令人无所适从。唐先生的《中国革命简史》，大笔一挥，把这数十年间的荦荦大事，勾画得轮廓分明，脉络清晰。如果用花卉来比喻歴史，那么《中国革命简史》就像一本齐白石的画册，每幅都是寥寥数笔而形态神韵俱全。这是我们译毕全书后的感受。

英文书籍一般称孙中山为Dr. Sun Yat-sen，本书亦如此。但唐先生以为「中山」一名，是来自孙一度用过的日本化名之一的「中山樵」。但孙本人从未自称中山，他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为此，唐先生在他的《晚清七十年》还写了一段「为孙文正名」。（【伍】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远流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页一二九～一三一。）唐先生的结论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所以本书译Dr. Sun Yat-sen为「孙文」，而不是一般通用的「孙中山」。特此说明。

第一部　滿清的崩潰

【第1章】

满洲帝国的衰亡

1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日拂晓，北京紫禁城天气严寒。太和殿内外，数百名身穿红、黄朝服的官员，朝着金碧辉煌的九龙宝座跪拜。这里正在举行两千多年不变的庄严肃穆的新帝登基大典。

九龙宝座上坐着三岁（註1）的溥仪，他是满清的皇帝，四万万生灵和四百万平方英里江山的新统治者。小皇帝烦躁难安，焦急地啼哭不止。人实在太多了，而且个个那样肃静。在旁的摄政王载沣俯身向小皇帝耳语：「别哭，陛下，别哭。就快完了，就快完了。」在这个本应是大喜的时刻，这些话使大殿内许多迷信的官员感到不祥。「就快完了」预示着什么阴暗凶险的未来？

答案不久后即见分晓。不到三年，爆发起义，标志着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开端。对这个两千年的帝制和中国的末代皇帝小溥仪的统治来说，这的确是「完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开始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和它的人民带来许多变化。两千年帝制结束，并创立了远东歷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代表奴役枷锁的传统记号，例如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布，都一扫而空。但是一个革命，不光是扫除了一些落伍的恶习就算完成了。它在除旧后还得立新。如何使中国转变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社会？在半个世纪之后（註2），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革命志士，都仍然认为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对他们来说，辛亥革命不是一桩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巨大歷史进程的开端，只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第一步。一九一一年（岁次辛亥）标志着这个革命进程的诞生，但早在上一世纪中国最后的帝制—满清王朝—慢慢腐朽时，革命的种子就播下了。

2

一般来说，辛亥革命与满清统治的崩溃互为因果。首先，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的满清王朝，如果以人的寿命来比拟，已是风烛残年。即使没有现代的革命，也必然按传统的规律寿终正寝。回顾中国悠久的帝制歷史，我们会发现，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第一个王朝—秦—建立以来，大多数强盛王朝的政治成长，都很像常人的生命歷程：少年意气风发，中年建功立业，老年百病缠身而终于死亡。一个王朝崩溃后，另一个政治结

构依旧的新王朝，就在前朝的废墟上生长；周而復始，循环不息。没有一个王朝存活到三百岁。更有趣的是，像唐（六一八～九○七）、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等几个朝代，政制与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大同小异，差不多以同样的岁数老死。唐有社稷二百八十九年，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

这并不只是巧合。王朝总免不了衰亡，传统的解释是：末代的帝王、官僚，只图安享先人遗留的昌盛繁荣，逐渐背离祖训，造成王朝政府日益腐败，缺乏效率，积弱不振。于是百姓造反，一个有效率的新朝代便可能应运而生。

现代社会学家又对惯常认为的王朝必然衰亡的根本原因加以仔细分析。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可能是，具有特殊性质的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来一直维持着它的基本特色不变，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建立在一个特殊类型的农业社会上，由官僚体制统治。没有根据私有动产和不动产划分的次一级的重要社会阶层。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控制国家机器而非经营私人产业，更能取得最高的权力、声望和财富。官僚政府因而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包括帝国各级政府和军队的官僚体制，在绝对统治数百年后，逐渐走向全面腐败。这种腐败，正是大权在握而不受节制的必然结果；而且无一例外，腐败总是从统治者糜烂的生活开始的。

清朝在干隆年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就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干隆皇帝二十四岁登基，直到八十七岁仍然日理万机。他统治中国六十余年，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和中国歷史上伟大的统治者一样，干隆热中于开疆闢土和奢靡的宫廷生活。他成就「十全武功」，征讨叛乱的汉人及边疆部落，虽然把帝国疆界拓展到中亚，也耗尽了国力。此外，接二连三用兵，引致政府的权力，从内阁大学士手中转移到一般称为军机处的军事会议，由君主亲自掌握。

干隆除了南征北讨以外，为贪图一己的逸乐，从北京循大运河六下江南。皇上出巡，穷奢极侈，沿途百姓不堪其苦，又从国库挪用超过二亿两白银以供挥霍。因此，不必要的征战与奢侈的南巡突显出皇帝滥用权柄，肆无忌惮，也助长了王朝政府内部的腐败。军机大臣和珅揽权二十年，侵吞公帑白银八亿两，数目相当于国库十一年半的总收入，也是一九○一年拳乱后中国赔偿八国联军款额的两倍。

同样的，贪污腐化瘫痪了国家的交通系统以及水利、运河、驿传、仓廪等公共设施。以治水为例，自古以来，黄河既孕育生命也是灾难的

源头。为了治理黄河，王朝政府特设河道总督一职，并从每年的预算拨出巨款修筑堤坝。自干隆以降，河道总督却成了王朝官僚系统内最大的肥缺。任职者绝无例外，必是当朝权臣之亲信。而这些河道总督的穷奢极侈，有时尤甚于皇室。据说某河道总督一次杀猪五十头，只为在每头猪身上割一两精肉，来制作一碟烤肉奉客。晚清时期，河道总督不仅荒废职守，偶尔还故意决堤，以报销从国库侵吞的大笔经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满清末年，德行沦丧瘫痪了文官体制，尤其是科举制度。原来通过科考才能取得的功名，现在连同官场肥缺公开鬻卖，贪赃枉法之徒又利用买到的肥缺上下其手。文官系统的崩溃造成法纪废弛。例如，一八三○年代官府无力禁止鸦片买卖，实际上是鼓励毒品走私，导致了中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

最后，腐败使清廷的军事力量瓦解。满洲八旗军在十七世纪中叶入主中原时，所向披靡；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和八旗军交战，有如虎入羊群，随意宰割。最终平定太平天国的，还是汉人的湘军和淮军，而不是满洲的八旗军了。不过，这并不能证明由汉人来管理专制政府，要比满洲主子更有效率，汉人的新军后来也像八旗军一样腐败。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时，北洋舰队的外籍砲手发现，威力强大的中国新军舰，弹药库贮存的一包包火药全是沙包，让刚从英国受训回国的年轻指挥官不知所措。

简言之，经过完全没有权力制衡的两个世纪后，满清政权的官僚机器已腐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是整个体制的衰败，纵有明君贤臣也回天乏术了。

3

与上层官僚的腐朽同时发生的，是下层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清朝保持了二百余年国泰民安，使得中国在一八五○年的人口增至三倍，达四亿三千万人。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和耕地的面积却保持不变。人口剧增，即使是风调雨顺，农民也只能勉强餬口。两个世纪以来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到了十九世纪又开始下降了。

官僚地主制度是政府官僚体制腐化的一个必然副产品，它使得人口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土地几乎是农业社会唯一的投资管道，来自贪官污吏的大量资金，助长土地价格自动上涨，逐步摧毁农村自然产生的小

户自耕农体系，引致土地所有权集中，形成佃农和脱产的地主阶层。

随着官僚统治的持续恶化，大地主的数目与日俱增。土地日趋集中，自然扩大了农村社会的阶级差距。自耕农逐渐丧失他们的经济独立性，置身于一个半农奴制度中，世世代代和地主的土地绑在一起。

洋货充斥和国内都市工业的兴起，更增加了农民的苦难，这两股力量压迫着贫农赖以为生的农村手工业。国内到处都是无业游民，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触发农民起义，远非腐败、无能的政府所能控制。政府既无力如开明专制政权那样赈灾扶贫，也不能像现代极权主义的国家那样把过剩的人口杀光。

即使四海清平，无业游民也会啸聚为匪，扰乱农村民生。满清末年，有些地方的匪帮人数还多于良民。据说广西省多数地区，大部分本地人都加入了匪帮。当本地已抢无可抢时，就季节性地跑到邻省去打家劫舍。在很多北方省分，如河南与山东，情况亦类似。

盗匪横行促使乡团和武装的祕密会社出现，如大刀会、红枪会和着名的捻军等等。这些最初为保卫家园而组织的乡团，因政府无力庇护而形成。但这些乡团往往指挥乏人，导致为害乡里与削弱生产力。它们的头领日后变成了地方军阀，会根据自身利益，在政府镇压群众自行组织的或现代革命党人领导的地方叛乱时，或协助或阻挠。反正，这些地方势力只是乱上添乱，最终把腐朽的王朝推翻。

这就是一再终结歷代王朝的几股力量，晚清时期自不可少。但和以前的朝代不同，有两个决定性的新因素，使得满清的崩溃更为复杂。其一是民族主义（汉满相争，后来是汉满联合抗拒外国帝国主义）；其二是来自西方的多方面挑战。

4

从传统的汉人观点来看，清朝是外来的、甚至是蛮夷的政权。满人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中国，统治了近三个世纪。虽然满人在入关之始就採用了汉人的政制，但强迫汉人易满服，男人还要薙髮留辫，使得清初的所有爱国志士都引以为耻。

此外禁止满汉通婚，不准汉人在正规的八旗军服役，除非已被征服者「同化」。八旗军驻扎在全国的战略城镇，作为守备部队。八旗兵丁及其家人住在隔离的营地，和当地的汉族居民不相往来。满族男女都隶

属八旗，领取军饷，不必工作。满族男子的唯一责任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监视汉人，使其不能造反。因此，有清一代，满汉两族的生存态势迥异，一为刀俎，一为鱼肉，阶级分明。

虽然有远见的满族统治者，一早就在文官制度中力求种族平衡，但是重要的职位通常还是由满人担任。根据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治国平天下本是学而优的汉人士子的天职，现在却操于满夷手中，朝野上下的汉人莫不嗟嘆。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蛮夷」在中国出现后，原来针对满人的「夷夏之防」（Chinese culture nationalism）观念也不得不改变。这有好几个理由。首先，经过两个世纪的太平盛世，汉人已逐渐习惯了满人的统治，它甚至比原来汉人的明朝更为仁厚。其次，汉人和西方人的判然不同，使得汉、满差异变得微不足道。满人也忘了蛮夷身分，和汉人一起斥骂欧美洋人为犬豕。汉人固然热中于捍卫传统文化，满人也衷心谴责西人不尊重祖宗家法，无视君父之道。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反满的元素，继续煽动一连串具有强烈的恢復汉室情绪的叛乱。另一方面，爱国的汉人，站在中国抗拒新来的西洋蛮夷的立场，与满人联合，支持满清政府。事实上，这两个方向，都有效地运作着。

晚清时期的改良和革命运动，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刻有这三种因素的标记。总而言之，那些发源于中国社会上层的运动，通常都着力于温和稳健的改良，像一八六○年代开始的同治中兴和一八九八年的维新运动，其结果是让奄奄一息的清朝多拖了二、三十年。那些从社会下层兴起的运动往往是暴力的，例如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八六四）、义和团事变（一九○○～一九○一）和孙文在一八九四年开始领导的国民革命。当所有稳健的改良运动都失败了，一般人都把失败归咎于满洲贵族的愚昧无知、顽固抗拒。在温和的汉人士大夫和下层的革命派联手之前，大清王朝还真的能够苟延残喘于一时。只有一切改革力量都联合起来，才推翻了满清的统治。

5

清末由上述三种因素决定的第一个群众运动是太平天国，它基本上是传统的、普遍发生在每个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和东汉时期、公元一八四年左右爆发的黄巾之乱尤其相似。黄巾以一个道教支派「太平道」为名，举兵造反，和衰落的东汉朝廷抗衡。

然而清代的太平天国，要比黄巾之乱更为复杂。它除了具有传统的改朝换代色彩外，还带着一些西洋的影响，宣扬种族革命，反抗「异族」政府，但对于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和西化，都没有充分加以利用。

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创始者，自我施洗的基督徒，反满民族运动的绝对英雄──实际上只是一个中国老式的造反者。他仅在科场多次落第，功名无望之后，才藉外国宗教之名来反抗满清的政府和社会。

鸦片战争前，洪秀全到广州参加会试，结识了一些当地的基督徒。此后不久，他开始在广西宣传基督教和教书。他是个组织能手，将信徒编组成一个巨大的团体，称为「拜上帝会」，自任会首。拜上帝会的种种活动都很成功，令人侧目。其时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er J. Roberts），雇用了四、五个汉人助理，在广州贫民区建立教堂，于一八四六年邀请洪秀全参加。洪秀全已经拥有一大队信徒，邀洪入伙引起助理们的妒忌，他们说服罗孝全把洪弄走。洪秀全因此失去了接受基督教正规教育和洗礼的唯一机会。

和西洋传教士没有合作成功，洪秀全失望之余，回到广西重拾旧业，继续传播他自己诠释的福音。这时他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从两广地区的下层社会吸引了无数追随者，特别是他强悍的客家本族人。由于清朝政治腐败，加以当地的敌对族群械斗成风，一八五○年春，洪领着拜上帝会在广西起义。满清政府的军队无力镇压，造反者乘势北上，企图建立一个新王朝。

洪秀全不久就自立为天王，建立他的太平天国王朝。他大封亲信为王，由他们统率军队。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军在长江流域大捷，夺取南京，命名为天京，一直统治到一八六四年夏天。一八六四年，清军在洋人的协助下即将剿灭太平天国前，洪秀全自尽身亡。

太平天国政权本质上是个混合体。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头领们全面套用传统的官僚制度。例如，天王完全无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南京美仑美奂的皇宫内设妃嫔六十八人，另有宫娥三百人侍奉。管理中央政府的诸王生活奢靡，较最贪腐的满洲大员尤有过之。一八五八年太平天国诸王内讧，纷纷捲入旧式的权力斗争，这是中国歷代王朝建立之初经常发生的。结果太平天国最有能力的领袖，或被杀戮，或被放逐。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领袖，大都来自社会下层，因而只是略识之无，他们难以按照传统方式使官僚政府有效地运作。对外来宗教盲从，使得他们鲁莽地捣毁儒道释三教和回教的圣地。禁止阅读中国经籍，更

使他们和士人疏远，而传统王朝治天下所需的人才都来自这个阶层。由于太平天国同时谴责孔子和「清妖」，它的反满活动因而对汉人也失去了吸引力。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西化运动也同样流于肤浅。他们宣称信奉基督教，但任何西方基督教会都不会接受「耶稣基督之弟」的传道。他们又主张汉人要比「蛮夷」优越，令人难以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更由于充满狂热、无知和傲慢，自以为比洋人基督徒更得到圣灵眷顾，使他们失去西方基督教国家任何可能的支持。

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自命以英国模式为蓝本，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帝国；但是它无法消灭旧的官僚传统，甚至无法大幅度加以改良，这对太平天国造成的危害尤甚于对满清的危害。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的理论家可能受当时在欧美流行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影响，为他们未来的社会描绘了一幅完全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蓝图。在新的制度下，土地全归国有，只允许耕者从劳动生产所得里保留仅足餬口的粮食，余粮尽入国库。成年国民按照军事制度来组织，战时可以立刻动员。这个制度和一九六○年代中共的公社相似，流于空想，不是太平天国半文盲的领袖们能够有效实施的。事实上，太平天国的社会制度正在反其道而行。太平天国政府在前后十四年中，忽视了有系统地把农村组织起来，只注意大型的城、镇。这样就给予满清可乘之机，致力控制农村，并集中向城市逐一反攻，直到一八六四年南京失守，结束了太平天国政权。

洪仁玕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长期和西洋传教士往来。太平天国末期，他总摄朝政，颇有推行现代化运动的气象。他网罗到了得力助手容闳和罗孝全。罗在一八五九年四月抵达南京。容闳是中国第一个而且是当时唯一的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他就太平天国的现代化提出几项建议，诸如创建现代的陆军和海军，设立银行和现代教育系统等。可惜为时已晚，新帝国在爆发血腥的宫廷权力斗争后，日趋衰败，到了无可挽救的田地。洪仁玕无法将容闳的计划付诸实施，部分原因是当时环境的不利，部分由于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训练，并不理解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更不幸的是，罗孝全并不适合在太平天国中担当大任。他是个天生的教条主义者，而总理朝政的洪仁玕却必须折衷妥协。罗孝全和太平天国的友谊为时短暂，一八六二年他就到了非离开南京不可的地步。这样，落后的太平天国和西方同情者之间的关系就断了。到了最后，寻求现代化和外国援助的尝试都完全失败。西洋各国转过来支持满清政府，消灭了南京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实际上陷于那个时代无法解决的难局之中。他们对西化一

知半解，对利用中国的歷史传承又一窍不通，使有可能成为朋友的洋人和汉族士人变成了敌人。从中外双方各取其短，败亡是必定的了。

6

太平天国推行西方路线时未能实现有效的改革，满清政府却很快就汲取了英法联军之役（一八五八～一八六○）的失败经验，知道现代化是势在必行的。一八六○年北京沦陷，清朝第二次为西方强权击败，英、法侵略者一炬，壮丽堂皇的圆明园化为灰烬。年轻的咸丰皇帝逃亡热河，有生之年再没有回到北京。一八六一年咸丰驾崩，大权掌握在其遗孀慈禧太后和皇弟恭亲王奕訢手里。奕訢主持中国新成立的第一个处理洋务的机关—总理衙门。咸丰的幼子继位，成为同治皇帝，由慈禧和奕訢一起摄政。

中枢有恭亲王，行省方面有开明的政治家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他们的领导下，满清政府设立了一系列西化教育和工业机构，以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中国已领教过的船坚砲利的西洋科技来富国强兵，现在正是时候。

这次科技改革，史称同治中兴，从同治皇帝一八六二年登基开始，延及光绪年间（一八七五～一九○八），直到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爆发为止。在此期间，有少数的上层人士预见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需要依照西方路线来大事整顿。这样就进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阶段。这是具有现代思想的思想家冯桂芬在一八六○年提出的概念，后来由另一位思想家兼政治家张之洞在一八九八年为文重申。一八六四年镇压太平天国成功，强而有力地证明这个概念的正确性。剿灭太平军这场准基督教革命的，不正是由儒家士大夫率领、辅以西洋科技的湘军和淮军吗？

因此，从一八六二年起，清廷在各港口和内陆城市建设现代的兵工厂、造船厂、机械厂、电报线、煤矿、铁路、轮船公司和纱厂。最初，这些工厂企业全由政府经营管理，其后大多数都交由商人接办，政府从旁监督。这样的一个制度，称为官督商办，是中国工业化起始阶段的特色，一直维持到一八九五年。

推行这些工业计划的同时，清廷又开办学习西洋科技的学校和有助于学习科技的西洋语言学校。有些学校是独立的机构，例如北京的京师同文馆；有些是工业机构的一部分，例如福州的船政学堂。

一八七二年出洋肄业局成立，派幼童去美国读书，以求扩大接受西

方教育的经验。三年内遣送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让他们完成由小学到大学的美式教育。接踵而来的还有数十名从各种西式学堂毕业的学生，也送到欧洲和美洲，继续他们科技和语言的训练。

然而真正不幸的是，官督商办制度实行三十多年后，竟没有一个工厂企业能说是成功的。不管是新式学堂还是出洋肆业局，都没有达到提倡者预期的结果。派往海外的学生，尚未学成就被召回国，然后如雨点落海那样融入中国的腐败官场中。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今天查阅他们纪录的歷史学家，只能在学校名册上找到这些人的名字。

造成同治中兴失败的一个明显因素，是政府坚持把监管下的企业都办成衙门。既为衙门，就成了这老旧腐败的官僚系统之一环，难逃与清廷一起衰亡的命运。官僚体制是大海，所有落进那里的水都得变咸。如果同治朝的官僚体制能达到两百年前的康熙年间（一六六二～一七二二）的效率，结果也许会很不一样。

清末工业化失败的另一个主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异性质。日本在明治时期有基础良好而且流动性高的中产阶级，印度在英国的统治下稳步吸纳西法。相形之下，中国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对西方经济渗透的反应就显得缓慢而笨拙。孙文称十九世纪的天朝为次殖民地，因为中国受到列强的支配，却没有被一个强权完全控制，其软弱无能招致门户洞开，任人进出。列强谋求商业机会均等，保存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却也免除了列强承担帮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责任。例如英国在印度拥有唯一的治权，就负有这种责任。这种情况，使官督商办工业化运动毫无成功的希望。

中国十九世纪末的工业化失败，不幸正好遇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商业和海外殖民的迅速发展与扩张。中国的衰弱，鼓励了外国利用固定关税税率来实行经济侵蚀；反之亦然，因为经济侵蚀又使中国更为衰弱。虽然在一八九五年后，官督商办制度结束，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企业得以出现。同年中国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给予外国投资者与中国人同样的在中国设立工厂的权利，使缺乏经验和资本的中国工业处于不利地位。它不仅要和无限量的进口商品竞争，还要和在华经营的更有经验和资本更大的外国工业竞争。这种新情况，使中国在一八四○年代五口通商后崛起的城市资产阶级不满，全归咎于满清政府。

在工业化失败令人忧虑不安之际，中国还要忍受战败的耻辱和不平等条约强加的割地损失。边疆割地数以千百里计，列强在中华大地划分势力范围，并且在中国领土内大打国际战争，中国却束手无策。

外国经济扩张导致外贸失衡，造成中国更深重的苦难。一八七六年以降，中国的进口总是超过出口。一九○五年，多股革命的力量在东京结盟，当时进口货物总值为白银四亿四千七百一十万七百九十一两，是出口货物总值二亿二千七百八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七两的双倍。这显然是特别不景气的一年，但相似的走势一直维持了三十多年。按照这等速度，仅是外贸一项，就可从财政上毁灭中国。与此同时，使肉体与道德沦丧的鸦片又大量入口。例如，一九○五年，有五万一千八百九十石（约三千一百吨）外国鸦片进入中国。在晚清时期，鸦片买卖达到顶峰的那年（一八八八），进口达到八万二千六百一十二石（约五千吨）。在所有衰败的标志中，以中国成为烟鬼之国最为悲惨。

推行西式工业运动无助于解脱国家的困境，尤其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全军覆没后，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国不从基础上全面重整政治和社会秩序，就不可能轻易采取西方的生产方式。由于这种觉悟，导致了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即政治维新运动。

7

康有为原籍广东，和他的两个着名的同乡——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和现代革命党领袖孙文——一样，也在沿海的广东直接或间接与洋人接触，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同的是，洪、孙二人只受过初级的中国经籍教育，康却是精通经学的当代大儒。他巧妙地假託孔子之言来阐述西方观念，这是向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宣传现代知识的唯一办法。

康写的《大同书》当时还没有出版，书中所述的政治哲学虽然内容极端空想和不切实际，但是他仿效日本模式的政治改良建议却是可行、适时和有说服力的。早在一八八五年，二十七岁的康有为就首次上书朝廷，建议彻底改革满清体制。但是他的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不像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学说更令人信服。人们视康为疯子，奏章没有上达天听。

然而十年后，彻底西化的日本一举击败中国，潮流转为对康有利。康和他着名的弟子梁启超同往北京；梁启超才二十出头，是个年轻的学者和有煽动力的作家。他们在北京得到各省进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多名士子连署，上书朝廷，奏请立刻进行政治改革，彻底整顿满清体制。这个着名的《公车上书》，为康、梁赢得全国称誉，也正式触发了变法。

两年后康有为再次上书，敦促年轻的光绪皇帝借鉴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推动他所建议的政治改革。光绪深受感动，委

康、梁以重任，并延揽了五、六个年轻的改革派学者协办政务。立志改革的光绪甚至打算像彼得大帝那样，亲自到西方去研习现代制度。

一八九八年六月，在年轻的改革派辅佐下，光绪正式发起了维新运动，数日之内，连颁诏令，试图彻底整饬老旧的官僚制度。教育和任用都将以兼顾中西才能和知识为基础。要整顿官僚职守，使其为现代的需要服务；要建立公立学校系统和新闻机构。此外，还要在各地设立会同地方人士议政的民政局，为老百姓最终参与未来的议会政府作好准备。在经济领域将设立多个局，负责促进商业、工业、现代银行、矿业和农业。光绪还打算重整和加强军备。（註3）

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结构已腐朽不堪，无法在一纸空文的基础上重建。以光绪养母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对派过于强大，维新党人既无实权，又缺乏经验，还天真地推动野心勃勃的改革方案。变法运动因此仅仅维持了一百天，便以慈禧下令处斩戊戌六君子于北京街头告终。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康、梁被迫逃亡日本。

8

变法失败使满清政府的声望陷于新的低谷。更糟的是，宫廷里的保守分子在一九○○年发动了有名的义和团事变。义和拳是道教一个狂热的支派，吹嘘刀枪不入，不怕洋人的火器。他们的灭洋挑衅，引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二次沦陷，为洋人佔领。清廷的保守派领袖慈禧，带着被幽禁的年轻皇帝，离京逃亡。一九○一年签订和约时，破产的清廷和不胜负荷的老百姓，要为战争赔款白银四亿关平两（註4），即全中国的男女老幼每人一两。战败之辱，加上无法洗雪的国耻与巨大的经济压力，自然促使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从温和的维新阵营走到革命的一边。当时的思想家很少有人认识到，朝代衰亡只是一个周而復始的歷史模式的一部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志士，把一切都归咎于满人，认为他们是所有祸害的根源。

反满情绪更是受到现代民族主义这种外来的意识形态煽动。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着重文化优越性；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则强调种族的特徵。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满汉之间的鸿沟。

不幸的是由于上述影响，满族部落主义也开始在无能但有野心的满洲贵族中发酵，宣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宁愿把政权奉送洋人，也不愿交还汉人。因此在满清统治中国的最后几年，满人对中央政府职位绝对垄断的程度，尤过于前两个世纪。这种满族部落主义，甚至

驱使清廷中与满人同样腐败、同样反动的汉人官僚，也支持反满的种族革命。

因此，在二十世纪之初，各种革命的反满因素合而为一。大多数饱受苛政的农民只盼望早出明君或改朝换代，而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则嚮往现代政府和自由企业。盲目的爱国者试图力挽狂澜，以免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心胸狭小的种族主义者逢满必反。新儒家力求建立行仁政的汉家天下，取代满人江山。投机取巧的官僚和自大傲慢的武夫忙着为一己的权位利禄浑水摸鱼。政治维新派鼓吹君主立宪或议会制共和政府。受英、美影响的民主派选择两党制，而一撮社会主义理想家，受到欧洲社会主义或美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主张早日施行平均地权。虽然满清政权崩溃不可能满足各种不同的期待，但是清廷崩溃的前景却可以使大家的部分情绪得到宣泄。这样，「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就成了共同目标，团结了反抗满洲贵族的各党各派。万事俱备，只是等待一个领袖出现，他的人格、声望和政治理论必须是大多数革命派闻风景从的。斯人其为孙文乎！

註释

註1：译者按：本书述及的人物，均以实岁计龄。

註2：译者按：本书成于一九六○年代末期，离辛亥革命约为半世纪。

註3：译者按：一八九八年一月，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应诏统筹全局摺》，要求尽快变法。这个摺子除了论述当时中国内外的形势外，还建议改革清王朝的统治体制，设立制度局，总揽变法之事。设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歷、社会、武备等十二局来施行新政，分任其事。此外，变官为差，每道设一新政局，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摺奏事；每县设一民政局，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以釐金与之。（奕劻《遵旨妥议摺》引康氏原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页七。）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佈《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告推行变法新政。接着在短期内依照康有为的建议，先后发下有关革新的上谕百余条到总理衙门议行，希望能够「藉众议以行之」。七月二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人联名上奏，驳回康有为请设制度局、十二局、新政局和民政局的建议。光绪见到奕劻等的奏章后，于七月五日又命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臣復议。几天之后，还是给奕劻等人再次驳回。设立制度局、十二局、新政局和民政局的构想，始终未能实现。

註4：译者按：「关平两」是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帐货币单位。中国海关收进出口税时，为了统一标准，取对外贸易惯用的砝码一两作为标准单位，称为「关平两」。按规定，一关平两的白银，重量为三七·七四九五公克，含纯银九三·五三七四%。一九○一年，一关平两银可兑换美金○·七二元。

【第2章】

孙文与兴中会的兴起

1

自英国军舰在一八四○年代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以来，西化的种子就扎根于中国沿海，向内陆蔓延。虽然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把西方人视为蛮夷，一些和洋人有直接接触而感觉敏锐的年轻人，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化也可以是文明的，甚至比中国文化更优越。在西方社会可以观察到的繁荣、安宁、秩序、科学和人道主义，与旧中国的贫穷、混乱、腐败、迷信和各种野蛮的现象，形成强烈对比。这些仰慕西方事物的年轻人，逐渐背弃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

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社会的最下层。这阶层的人较易和洋人接近，但其短处是受到的中国经籍教育不足，因此对旧秩序的捨弃，感性重于理性。这些人对西方的仰慕，也因为所知不多而流于肤浅，并不是基于深刻的信念。一方面，除了外表的繁荣和秩序以外，他们无法真正领会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不能摆脱自己的、反映旧秩序落后一面的生活背景，那是连旧社会的中国士绅也会捨弃的。由于缺乏明确的思想基础，第一批西化的支持者不够成熟，因而正如上章所述，在起始阶段产生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人和洋人的接触日益频繁，在沿海地区渐渐产生了比较成熟的第二代仰慕西方者。这些人从小在西式学堂受良好教育，曾到欧美游歷，掌握了西方的语言，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一切都给予他们难得的机会，深入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一八九五年前，这类的年轻人极少属于士绅阶级，也极少受过初级以上的经籍教育，在他们身上几乎找不到儒家读书人传统优越感的痕迹。再者，学到的新知识，又加强了他们对旧秩序邪恶的憎恨，使他们更加仰慕西方。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爱国热忱使他们成为西化运动中不容轻视的先驱。有些人甚至为憎恨旧秩序而殉难。因为来自社会低层，大多数都和素有异志的祕密会党关系深厚。后来证明，这些祕密会党很容易就被塑造成一股现代的革命力量。这样就为中国西化的第二阶段，为孙文和他的革命同志的崛起，以及为他漫长的革命生涯的前十年（一八九四～一九○五），做好了准备。

2

孙文出生于广东省南部香山县一户贫农家庭，从那里步行一天可到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他半文盲的父亲是个贫穷的佃农，和两个已婚的兄弟一起，向当地的地主租了不到两亩地耕种。交租和缴税之后，孙氏三兄弟几乎连自己也养不活，更不要说照顾一个大家庭了。由于生活穷困，两个弟弟「卖猪仔」到国外去。这是贫农一般的脱贫办法，当时的西方观察家认为，情况要比非洲贩卖黑奴更恶劣。常常整船的「猪仔」还未抵达目的地就死去一半，余下的许多在抵达后也死掉。只有一小撮幸运儿活了下来，能够带点东西还乡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这就是孙文两个叔叔悽惨的命运：一个还在太平洋上就已死去，另一个到达了中国人称为金山的加里福尼亚，金块还未掘到就埋骨他乡。他们的遗孀和子女全靠留在家乡的大哥照顾。

一八七一年，孙文年仅十八岁的长兄孙眉，也航向令他叔叔们丧生的茫茫旅途。他比叔叔们幸运，安全抵达檀香山，还在人家里当上了佣人。在那些日子里，夏威夷群岛刚刚开始现代的发展，当地土豪喜欢雇用廉价的中国劳工。年轻的孙眉帮佣若干时日后，向政府申请了一小块位于茂宜岛（Maui Island）的土地。歷经辛劳，他从最低层的苦力变为拥有牛群过千头的牧场主人，被人称为「茂宜王（King of Maui）」。

一八七七年，在香山县的孙家突然收到一封夏威夷的来信和一大笔汇款。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全家喜极而泣。孙父从来没有收到过爱子的任何音讯，还以为他也和两个叔叔一样，已遭不测。孙眉的汇款为十二岁的弟弟孙文（那时叫孙帝象）买了第一双鞋子。

孙文生于一八六六年，比移民海外的哥哥小十五岁。能行走后就赤着脚到田里帮忙父母干活，但农忙过后，父亲就送他到村里的私塾学习儒家经典，像那时乡村大多数的小孩一样。

年幼的孙文聪明而叛逆，在故乡目睹满清的贪官污吏欺压当地居民，就开始憎恨腐败的清廷。据说，一八七六年一位太平军的老兵给他说故事，激发了他对造反英雄的崇拜。

一八七九年，十四岁的孙文衣履整齐，和母亲乘船往檀香山探望富有的大哥，坐的是英国轮船「格兰诺克」号（The S. S. Grannock），这艘排水量二千吨的汽轮，在他眼里显得雄伟、神奇。越洋旅行也让孙文认识到世界之大，中国并不是如长辈所说的是宇宙中心，儒家经典也不是学问唯一的来源。年轻的孙文现在踏上了仰慕西方的第一步。

抵达夏威夷后，他在大哥的米店里管帐。大哥看到他喜爱学习，让他到檀香山的主教书院（Bishop College），即后来的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College）註册入学。这是一间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寄宿男校，只收夏威夷人，孙文是校里唯一从中国来的男孩。他还不会说英语，他的辫子更是同学们取笑的对象。

然而不久，孙文的英语已足够让他研读歷史和学习地理、数学等课程了。在短短三年内，十六岁的孙文，就在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从夏威夷王（King David Kala-kaua）手里领到毕业班英语文法的第二奖。

孙文毕业后，升学到美国传教士在檀香山开办的奥阿厚书院（Oahu College）。他还打算到美国本土的大学念书。

在求学期间，孙文观察白人治理下的夏威夷社会和政治体制。它们的效率、繁荣、秩序，与十九世纪中国旧社会的混乱形成强烈对比，令他深感敬佩。他也在这些年月里体验到种族歧视。美国同学们视他为有色人种，只因种族不同就毫无理由地瞧不起他。他永远忘不了的一件事是，在乡村小路上遇到一个洋人，用「该死的中国佬（damn Chinaman）」和其他的脏话骂他。这种早期海外中国革命分子都有过的经验，加上接受彻底的西方教育，使得孙文既是坚决的民族主义者，又是对西化运动锲而不捨的领袖。虽然拥抱民族主义让他够资格成为所有革命分子的领导者，但他的西化在开始时却是一种障碍。在夏威夷，孙文从他大哥的身上遇到了来自旧中国的强大阻力。孙眉对他小弟的进步思想感到震惊，特别是孙文打算成为基督徒。因此，只有十七岁的孙文被迫从奥阿厚书院退学，并在一八八三年夏天被送回中国。

回到故乡，孙文发现一切仍然落后，一切一如往昔。只有他家的房子，从茅舍换成了西式洋房，这得感谢他大哥的匯款。一天，西方思想激发了他叛逆的性格，竟把村里道观的神像砸掉。此后他就只好离家出走了。

孙文去了香港，一八八三年底在圣公会拔萃书院（Church of England Diocesan School）註册入学。与此同时，结识了住在同一栋屋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Rev. Charles R. Hager）。他和喜嘉理很快成了朋友，数月后他和友人陆皓东等接受喜嘉理的洗礼，陆后来是为孙的民族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一八八四年五月，孙文回乡成亲，返香港后进入中央书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读书，中央书院后来改称皇仁书院

（Queen's College）。孙眉获知弟弟成了基督徒后非常愤怒，召他回夏威夷，两人为此大吵一场。孙眉不仅停止对他的经济支持，甚至拒绝给他回中国的旅费。孙文只有在一位美国基督教友人的协助下才能返回香港。

一八八六年底，孙文得到喜嘉理和其他人的帮助，到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办的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医学堂习医一年，后来又转读英国人开设的香港华人西医书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香港大学的前身）。一八九二年六月，以第一届第一名毕业。时年二十六岁，是第一个在英国殖民地从香港政府拿到西医执照的中国人。他以孙逸仙（Sun Yat-sen）的姓名行医。

3

当孙文在不同学校读书的时候，中国正在与西方列强的一连串战争中惨败，爱国志士都恐惧国将不国。一直以来，孙文常和有同样社会与教育背景的朋友讨论救国良策。因此，在他行医时期，年轻的孙医生也是关心国疾多于人疾。不过，在这一阶段，他似乎选择和平改良而非暴力革命。

一八九四年，孙文医生和陆皓东前往天津，经友人推介，向领导洋务运动凡三十年、望重一时的李鸿章上书。信中除简介自己所受的教育和西方学术的训练外，还提了四点颇为天真的改革建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在结论里，孙甚至建议政府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和进口的烟土竞争，平衡外贸的入超。

年迈的李鸿章正忙着准备快要来临的中日战争，上书没有获得他的重视，但孙组织一个会社来促进农业生产的计划，却因上书而得到他的支持。孙失望南归，但这个新会社至少为他提供了重返夏威夷筹集所需款项的通行证和理由。

孙文在夏威夷时，西化不久的帝国主义强权日本，在一连串的战役中重创中国。数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日本不如自己的国家，现在清廷甚至连日本也打不过，于是全国譁然。上层社会的稳健知识分子加紧推动政治改良运动，下层社会的激进分子也致力组织革命行动。孙文亦改变主意，从鼓吹和平改良转为赞同暴力的革命行动。他开始煽动夏威夷的华侨组织革命团体，虽然没有引起那里大多数中国移民的注意，还是有二十来个工人和商人响应。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们成立兴

中会。会中的领导人物多为受过西方教育的华裔基督徒。除孙文外，次要人物有商人程蔚南和在夏威夷政府当翻译的李昌，两人与孙是香港皇仁书院的同学。在兴中会的成立仪式上，每个会员都高举右手，左手放在《圣经》上，庄严宣誓入会。孙文第一个宣誓，李昌为他捧着《圣经》。

兴中会成立后发表章程。它首先痛陈国家近年来饱受耻辱，认为腐败的满清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接着宣称会员的目标是救国卫民，振兴中华，跻中国于世界强国之林。孙和他的朋友们直到这个时候似乎仍然偏向君主政体多于共和制度。

一八九五年初，孙文和一群同志返回香港，此行据说是由于宋耀如（Charles Jones Soong）的催促。宋是着名的宋氏三姊妹的父亲，一个受美国训练的中国牧师，那时在上海卫理公会传教。孙在香港时和另一群青年基督徒见面。这群人在杨衢云的领导下，已在香港组织了革命团体辅仁文社，比孙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还要早两年。和孙文一样，杨亦在香港的英国学校毕业，能说流利英语，曾在李鸿章建立的中国第一间现代轮船公司招商局任职。杨创立的辅仁文社活动频繁，已引起香港警察的注意。

孙、杨两伙人相遇，同意合併。新组织虽然以孙的兴中会为名，却选杨衢云为首任会长。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八日，兴中会发表宣言，以「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号召。

他们的热情与苦干，不久就获得香港一些英文报刊的英国编辑和受过英式教育的华人社会贤达协助，承诺支持在中国大陆的革命活动。在三月十六日的一个会议上，他们决定採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正式会旗。

兴中会的第一批人数众多的追随者来自势力强大的三合会。三合会原是十七世纪中叶由中国南方地下反满分子组成的，经过两世纪的演化，已变成一个苦力甚至劫匪的祕密会党，如今为现代革命党人招募，重拾他们反满的使命。孙文及其他革命党人早就和很多三合会的领袖有悠久的关系，着名的如郑士良等人，因此渗入三合会的内部组织和领导会众并不困难。郑士良是孙文在广州博济医院的同学，是个基督徒，也受过一定程度的西化教育。通过郑与其他三合会领袖的关系，革命党人计划武装三千三合会的会众，一八九五年重阳节（阳历十二月十六日）

在广州起义。他们选举杨衢云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以便主持起义后要成立的政府。杨留在香港准备一切，孙文和其他的头目则以组织农会为掩护，前往广州。不幸的是，他们的秘密活动为广州捕快探悉。十月二十七日，捕快突袭革命党人的地下总部，两日内拘捕了陆皓东和重要革命党员四十人，却放走了孙文，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广州的名医会是嗜血的地下会党头目。

陆皓东被捕后，用古文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供词，坦承对满人的愤恨和「驱逐鞑虏」、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的救国企图。他说：「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註1）那时，美国驻广州领事喜默（Charles Seymour）试图挽救陆的性命，向广州当局保证，陆是他的翻译员而非乱党。但看到陆的供状后，美国领事也无话可说了。陆在广州街头处斩，时年二十六岁。

事后，清廷要求香港英国殖民政府驱逐所有乱党。为此，杨衢云离港赴南洋，再往南非；孙文和郑士良、陈少白结伴到了日本横滨。陈也是基督徒，和孙在香港是同学。虽然他们为日本的华人社会忽视，孙文却得到少数广东商人的资助，并藉此抛去中式长袍、剪掉辫子、穿上洋服。其后，他离日赴夏威夷，他的家人已因为他在广州惹出麻烦而逃难到了那里。

尽管那时夏威夷约有华侨四万人，却没有几人和孙文结交。他与家人也未能和睦相处，遂于一八九六年夏天前往美国本土，寻求新世界的华侨支持。虽然他能言善辩，学问渊博，也有社会关系，却在美国华侨中毫无进展。几个月后，他乘船前往伦敦。

孙文游歷期间，遭大西洋两岸由中国公使馆雇用的英、美侦探祕密跟踪。十月上旬，孙在伦敦探访前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医生（Dr. James Cantlie）。康德黎刚从香港假道美国返英，数月前他在夏威夷游览时遇到孙文，并邀请孙到伦敦时去看他。

这时，伦敦司赖特侦探社（Slaters Detective Association）的探员，向在中国公使馆担任参贊的雇主马格里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汇报孙抵达。他们计划在伦敦街上绑架孙。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孙陷入罗网，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使馆大员以电报禀奏北京的清廷，请求特别拨款七千英镑，包船押送革命党人孙文归国。在此千钧一髮之际，孙的基督教信仰救了他的性命。他向使馆一个英籍僕人诉说基督徒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感动了僕人通知康德黎医生。不久，伦敦所有的报纸都刊登这条耸人听闻的新闻，英国外交部也要求中国公使

龚照瑗释放孙文。十月十七日下午，孙重获自由，立刻成为各地的头条新闻。孙本来是个藉藉无名、在西方鲜为人知的中国乱党，伦敦蒙难为他打响了国际知名度。

孙文住在伦敦直到一八九七年七月。和马克思一样，他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在博物馆的阅读，加上在伦敦见到的进步和贫穷状况，扩大了他的视野和经验。年轻的孙文意识到，即使如十九世纪英国那样兴盛的国家，还是难免有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他看到种族革命或联邦政府都不能使中国摆脱严重的困境。这种新的觉悟，把孙引向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后来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合称为三民主义。

4

一八九七年八月中旬，孙文离开英国，经加拿大返回日本。他新近的国际知名度，使他颇受日本政治和社会头面人物的欢迎，其中着名的有立宪国民党（Constitutional National Party）（註2）的领袖犬养毅。犬养毅派好友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到横滨迎接中国革命党领袖孙文。通过他们，孙认识了其他日本名流如头山满、山田良政、平冈浩太郎。平冈浩太郎是一位成功的工业家，他提供孙在日本和中国活动急需的经费。宫崎寅藏和山田良政甚至加入了中国革命的行列，成为孙在日本的追随者。

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孙文试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合作，康、梁的运动在中国方兴未艾。最初谈判颇为成功，双方合力在横滨创办以康尚未出版的《大同书》为名的教育机构—大同学校，经费多由孙筹措，教员多由康、梁委派。

不幸的是，康有为带有儒家学者由来已久的高傲性格，使他无法与孙文合作下去。一八九八年康、梁维新运动失败，不但没有改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合作，反而构成妨碍。此外，光绪皇帝在一八九八年惨遭幽禁，更激发了康、梁老式的忠君之忱，使他们在道德上也不能继续和革命派合作。

另一方面，维新运动的失败，驱使大多数维新派领袖逃亡海外，他们在各地同革命派争夺华侨和外国政府的支持。竞争第一回合，孙文输了大同学校给维新派，连那房子也再不能进入了。此外，孙和康、梁同为广东人，饱读诗书的康、梁要比接受西方教育的孙更得到华侨的尊敬，这样就威胁到孙获得华侨的财务支持。两派的竞争，包括在海外华人报刊上打笔仗，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由于康、梁是当时舞文弄墨的

绝顶高手，孙在宣传上无法与之抗衡，因而在中国内外建立的人脉，几乎被维新派连根拔起。

甚至在中国大陆的反满起义，向来为革命党和秘密会党包办，维新派也参与争夺领导权。一九○○年八月，唐才常和秦力山领导在长江流域中游发动了两次着名的起义，全国景仰。起义者不仅按照革命传统提出要推翻蛮夷政权，而且要求释放被禁锢的年轻皇帝。这个目标显然最具吸引力。

然而，维新派对革命地盘的侵蚀只是暂时性的，时间对革命党人有利。维新派其实已陷入不可救药的两难之局，无法自拔。他们支持幽禁中绝望的满清皇帝，反抗专权残暴的慈禧太后，这个计划对一般汉人来说并无号召力。此外，清廷持续腐化，朝中颟顸的满洲贵族和保守的汉族同僚盲目支持义和团排外，进一步驱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维新派投向革命党人的怀抱。此后，维新派就失去任何领导武装勤王的机会。

5

孙文既不能和傲慢的维新派领袖合作，就继续原来联合秘密会党和争取国际支持的工作。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他的人马和两个强大的秘密会党—华南的三合会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会谈成功，同意三方合组一个以孙文为首的组织。

与此同时，义和团与洋人在华北的战争日趋严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Arthur Blake）尝试帮助孙文，去说服两广总督李鸿章宣佈独立，与孙合作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孙藉机投书李鸿章，建议和李组织各省自治的联邦，体制一如美国。不幸适值清廷召李回京，率领代表团与列强议和，因此孙的试探行动毫无结果。

尽管遭遇挫折，孙文却得到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允诺，给预谋在广东省东南的惠州起义供应枪械、弹药。同时，孙又和他一直支持的、搞菲律宾独立的革命党人接触，后者也答应给予孙一些物资。

一九○○年九月下旬，孙文前往台湾。与此同时，他指派郑士良招募三合会众在惠州武装起义。郑调动会众三千如期在十月中旬发难。最初和清军的交战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台湾和菲律宾承诺的弹药没有如约抵达，革命军两週后溃败，郑士良逃往香港，代表孙和郑联繫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被清军俘虏处死，是外国人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人。

中国革命烈士的名单越来越长。孙文的同志史坚如，年仅二十二岁，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基督徒。他在广州谋刺满人的两广总督德寿，炸弹失效，事败被擒处死。数月后，被选为兴中会第一任伯理玺天德的杨衢云，亦为革命殉难。杨数月前由南非回香港，将兴中会的领导权移交孙文，以便参加惠州起义的实际行动。他在香港设立一所学校，以教英语为生。一九○一年一月十日，杨在课堂上被广州满清当局派遣的密探刺杀。一九○一年八月，郑士良亦神秘死亡。孙文短期内丧失志同道合的挚友多人，悲恸莫名，革命事业也因此受阻。虽然如此，孙亦取得一些前所未有的鼓励和补偿。

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孙文备受各方的谴责和攻击，视之为嗜血的匪首。但一九○○年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他不仅没有受到社会的谴责，还感受到来自各方的温暖与同情。过去远离孙文党人的知识界，现在伸出了友谊之手。一九○一年初，一群在日本的广东学生组织社团，鼓吹广东脱离北京的清廷。孙受邀参与且成为团体的重要领袖，也在其中招募了一些兴中会的会员。这也是孙第一次获得知识分子团体的接纳。

在此期间，孙文往来华南沿海各地，企图组织在本土的又一次起义。由于看到这时并非起义的时机，便在一九○三年底乘船往夏威夷，打算在西半球各地侨界再次募捐。同年十二月，他在夏威夷加入了势力强大的致公堂。十七世纪中叶满人佔领中国大陆后，这个组织由流亡的汉人建立。虽然原来是个革命团体，经过近三百年的演变，已失去了革命本质，但在侨界仍然势力庞大。

孙试图从三藩市进入美国，因无护照被扣，为致公堂以美金五千元保释。一九○四年初，孙获准入境。起初，孙试图改组致公堂，恢復它的反满精神。其时致公堂的会员多忙于社交事务，无人过问致公堂的章程。孙遂重订堂章，在其中注入他的革命思想，以「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奋斗宗旨。

在孙文把这四个宗旨写进致公堂章程的时候，他似乎没有想到，一个新的革命联盟—同盟会—将以此为宗旨，最后实现了他「驱除鞑虏」的梦想。与基本上是基督徒组成的兴中会不同，我们很快会看到，同盟会是一个为各界知识分子所拥护、由孙文统一领导的团体。

註释

註1：译者按：引文取自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四年），第一册，页二○。

註2：译者按：立宪国民党到一九一〇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立宪改进党，一八九七年前后称为进步党。

【第3章】

知识分子的反叛

1

义和团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孙文正漫无目的地游歷四方，而中国的知识界却展现出惊人的觉醒，大批中国学生负笈日本，寻求「新学」。这次学生东渡，在中国悠久的歷史中，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学生数目，从一九○○年约一百人增加到一九○一年末的一千人。一九○二年可能超过一万人，一九○三年两万人，一九○六年是一九○三年的双倍。九成的留学生，聚居于东京西北部一个半径一英里半的地区。在那里，中国知识分子反叛的火炬正式点燃起来。

这个不寻常的留日现象，实际上是半由中央政府、半由地方政府的开明政治家—特别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推动的。义和团事变后，清廷自行下诏变法，全盘改革，以两年前被政府废弃的维新派政纲为模式；学生留日，主要的动力即由此而来。

新的措施称为新政，包括建立现代的文科与武备学堂以及「新军」三十六镇。为了给这些新机构配备教师、军官和行政人员，政府鼓励学生出洋受训。由于多种原因，日本成为吸引中国学生的最热门国家。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大约有一半获得各省的奖学金。张之洞从湖南、湖北首先遣送大批学生，形成中国同一地区留日生的最大群体。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的学生也随着到来，内陆省分一般送出的学生较少，一九○五年前，甘肃省一个留学生都没有。

学生的年龄相差悬殊，从黄口小儿到垂暮老翁都有。还有少数的女生获得与男生一样受教育的机会，这是自太平天国崩溃以来的第一次。

日本的学校，光是容纳本国人已有人满之患，而中国学生没有几人在抵达前就懂日语，所以通常是就读日人特为他们设立的学校。这些学校只有各学科的初级「速成科」，用华语或日语经翻译授课。特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军事学校有振武学校和它的前身成城学校，数以百计的中国学生在那里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在振武就读的学员中有蒋志清者，就是后来着名的蒋介石委员长。

通过这些文科或军事训练的速成基本课程后，优等生可到日本的公立学府，像东京帝国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接受高级训练。其余的人可

入私立大学、书院或只要付钱就可拿文凭的学店。

还有一些找不到学校或不愿入一般学校的人，他们组织学会，雇用日籍讲师。也有许多知识分子流浪汉，拿了官费或家人的匯款，享受悠闲的旅游生活，而家人毫不知情。「留日」一词，成了一个物有所值的身分标志。自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打开日本门户之后，世界各地游客纷纷到日本旅游，这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流浪汉就成了二十世纪头十年抵达日本的第一批旅客。

这一时期留日的中国学生，是最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它的成员林林总总，从顽固的官僚到保皇党，甚至官府密探，还有温和的改良派和反满的激进分子，无不具备。从他们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价值以及认真程度看，则从天才、学者到知识分子流浪汉和花花公子，也所在多有。

他们通过「新学」吸收了各种政治信念，包括德国的绝对君主主义和军国主义（absolute monarchism and militarism）、英国的议会立宪君主主义（parliamentary constitutional monarchism）、美国的联邦共和主义（federal republicanism）、马克思社会主义（Marxist socialism）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Bakuninian anarchism）。根据当时的观察，英国的政治制度赢得最多的信徒，但共和主义也吸引许多激进的青年，只有一小撮乌托邦空想者信仰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不管受的是什么训练，从日本回国的学生都是享有特权的一群，为各式各样的现代机构所聘雇，有时数以百计。留日生参加特殊的考试，轻易便可获得本来无法得到的官衔。也有人被选入新成立的各级谘议局，成为人民的喉舌。文科学生是第一批现代的政客，加入各类公共团体，拥护或反对清廷。清廷倒台后，他们的势力组成了许多参与共和政府的政党。事实上，第一届国会他们就佔了三分之一的席位。

回国的武科学生甚至比文科的兄弟影响更大。不管军阶和成绩如何，他们抵达国门时都穿戴上时髦的呢绒军服、刷得雪亮的皮靴和那不可或缺闪闪发亮的佩剑。在申请新军或现代军事学堂的职位时，说着最新的行话，示范着最新的军事操练，给雇用他们但不熟悉洋务的大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就这样被委任为少校、上校，有背景的还可当上将军，指挥新军，或在各省的现代军事学堂任教和管理。这些都是政府主办的改革新政中最重要的部门。革命的核心，就是后来在这些机构里形成的。

从一九○○年起，中国留日生开始组织独立的小团体，并出版期刊。第一个中国学生组织是励志社，最早期的刊物是一九○○年由小团体组织发行的《开智录》和《译书汇编》。最初，这些团体的成员并不限于中国哪一地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和学术而不是政治。

义和团事变后，学生像洪水般每月好几百人流向日本，传统的同乡会就开始形成。许多同乡会出版颇有可观的月报，有些一期超过两百页。一九○一年至一九○五年间，东京就出现了十余种这样的杂志，着名的有《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新广东》、《汉声》、《醒狮》、《直言》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等。

虽然所有这些刊物都在日本编印，上海却是它们向国内发行的共同基地。由于同乡会的地域性，订户大多数来自本省，「新学」也因此从日本扩散到中国的每一角落。尽管这些地域性刊物的知名度和学术水平比不上梁启超从一九○一年起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却比众所周知的维新派机关报更能深入本省。

当各式各样的同乡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有人试图组织一个克服地域障碍、全面代表中国留日生的学生会。由数百学生发起并得到所有同乡会和东京的中国公使馆贊助的中国学生会在一九○二年成立了。它的总部设在东京神田区一所大洋房，向数以千计的会员徵收会费和募捐款项，中国公使馆也每年补助若干日圆（约一千二百美元）。各省的同乡会附属于中国学生会，有自己的会所，也经常聚会，选举派往学生会委员会的代表。

学生会用它相当可观的收入在总部设立图书馆、阅览室、餐厅和接待室，雇用祕书和职员来管理。学生会也刊印四份杂志，在会员中散播改革思想。总部大厦经常有公开的集会，就重要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通过东京的中国学生会场所，华北的知识分子得以认识比较生疏的华南兄弟。在这里，广东人和福建人学讲「中国官话」。经过不断的交流，在日本的中国学生打成一片，一旦要介入国事，就可以立刻採取全国性行动。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团体都一样，虽然大多数人是稳健派，总有少数的年轻激进分子譁众取宠，抢出锋头。

2

义和团事变后，中国和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不久，国内有谣言说，中国就要被列强瓜分，在日本的中国学生间引起一片喧腾。一小

群广东学生致力使本省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其他激进分子，则考虑全盘推翻满清政权来拯救中国。

一九○一年夏，一小群以秦力山为首的激进分子在东京出版《国民报》，公开吆吁反满革命。主编秦力山，原是维新派，此前曾领导在安徽大通的起义，失败后再到日本，脱离维新派而成了革命派，但和孙文的团体却极少来往。

这个发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内的革命诉求，前所未有。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激进分子开始在各种留日学生期刊上刊登反满文章。没有组织的激进分子也开始在公共集会发表反满演说，甚至举办反满大会。

留学生鼓吹反满的行动在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达到了高潮，这天是满人入关灭掉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的二百四十二周年。在备受尊敬的浙江学者章炳麟的领导下，数百名中国留日生策划举办公开大会来纪念这个日子。虽然不清楚是否有人邀请其时幽居横滨的孙文，但他的确曾争取参加这场纪念会。

纪念会的详尽准备工作，无可避免地惊动了中国驻东京的公使，他请求日本警察干预并制止大会进行。当章炳麟和一群学生领袖给带到警察总部问话时，这群愤怒的青年公开宣称他们不再是满洲皇帝的顺民。虽然纪念会最终被禁止，数百热情的追随者被驱散，但革命的火炬这天却在东京的中国学生聚居地、在数千中国学生的喝采声中正式点燃。

面对这个新发展，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开始策划如何应对。首先，他上奏清廷，请求停止不必要的留日潮。其次，他试图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阻止肆无忌惮的学生活动，拒绝签名保送中国自费生进入日本军事学校。

蔡拒绝签名，挑起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由拥有举人功名的江苏大儒吴稚晖带领。一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学生大闹中国公使馆。当公使召警将吴拘捕并驱逐出境时，这位倔强的领袖投河自尽，却被眼明手快的日本警察及时从水里拉起。吴恢復呼吸以后身体安然无恙，事实上这个着名的革命先驱又再活了五十年，一九五三年才在台湾寿终正寝，享年九十。

这起事件给东京的反满情绪火上浇油，清廷派遣贝勒载振前往调查，实地了解情况。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农历新年，在一场欢迎载振的宴会上，湖北学生刘成禺带领了几个热情的年轻人，藉机在皇族

亲贵前发表革命演说。日本政府迅速将他们驱逐出境，新事件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麻烦。

此后中国公使馆採取两面手法来控制东京的留学生。一方面以强硬措施对付任何胆敢採取反政府行动的人；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对死硬的激进分子抚慰有加，宽大处理。例如，刘成禺从日本被逐出境，在武昌的家产惨遭湖北省政府查抄，但公使馆却给了他一大笔钱，送他到美国进修。

数月后，学生们又捲入另一个示威。这次示威的对象是俄国，它没有遵照一九○一年和中国签订的条约，把佔领军从东北撤走。还有谣言说，清廷被迫和俄国签订了密约。东京处处都是抗议的集会。在钮永建和其他士官生的带领下，三百个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他们在东京积极操练，并宣称要作为中国正规军的前锋在东北抗俄。随后钮和数人携带爱国的请愿书前往北京，他们不仅不受欢迎，还引起清廷的警惕，命令驻东京的公使促请日本当局管理目无法纪的中国学生活动。因为日、俄正在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剑拔弩张，日人试图在日俄战争的前夕安抚清廷。因此，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解散，但它的队员马上又重组另一社团—军国民教育会。这实在是一个革命的组织。原来的义勇队现在把对准俄人的刺刀转向满人。

反政府的学生抗议与日俱增，革命社团也在东京酝酿。在这些团体的影响下，学生杂志愈来愈对满清「鞑虏」深怀敌意，归国的学生都受到鼓动，返回原籍组织人马来推翻腐败愚昧的清廷。

每年数以百计的学生，在日本短期就读后，把造反的火种从日本带回中国。正当大大小小的团体策划着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些个别革命分子，就拿着枪、手榴弹、炸药、甚至刀子等武器，自行与可憎的满洲贵族作战。这些贵族曾公开宣称，「宁赠友邦（洋人），不予家奴（汉人）。」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反抗就这样正式发动起来，东京也成了他们当然的总部。

3

一九○五年前，在东京诸多的华人革命社团中，以根据省分成立的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和广东等省的社团最为活跃。显然这些社团并非存心按省分甚至地区来成立，但各自的传统和招募的多数社员主要是来自一个地方，给这些社团深深地染上地域的色彩。这时华北在干练的袁世凯牢牢控制之下，革命分子无隙可乘；而内陆的省分缺乏革

命热忱，来自这些地方的革命党人，一般就选择加入别的地区团体。

江浙团体由章炳麟、吴稚晖、蔡元培、秋瑾和许多其他人领导。章、吴、蔡是学有所成、全国知名的学者。蔡还点了翰林，那是读书人在科举中可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他被选为中国教育会会长，该会总部设在上海。其余的人也出自显赫的士绅家族，在中国和日本受过良好教育。刚刚二十出头的女子秋瑾，是那时代一个不凡的领袖。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这群人在上海成立一个鼓吹革命的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部分会员合作，以《苏报》为喉舌，宣传革命。

这个时候，十七岁血气方刚的四川青年邹容，因在中国公使馆强行剪去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高贵髮辫，被日本驱逐回上海。邹容加入上海爱国学社，并在一九○三年四月出版热血沸腾的反满小册子《革命军》。

《革命军》一开始就赞扬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政治哲学，提出「天演之公例」，就是每一个文明的进步都需要革命。

在热情地啕吁同胞参与反满革命的长篇大论之后，邹建议革命成功后应即建立共和，中央政府和自治省政府的宪法、规章，除少数可以更改以符合特殊的中国国情外，「悉准美国办理」。

邹容才十七岁，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即使以最基本的水平来衡量，也不算是有天分的政治思想家。然而他的赤子之心和热情啕吁，打动了那时代中国懵懂民众的心灵。章炳麟为邹作序，还在《苏报》写了书评。这个小册子比中国任何书籍都更畅销，成千上万地被偷运到中国内陆，处处点起了革命的火把。

这时，章炳麟也在《苏报》展开对维新派的攻击；在此之前维新派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民意。在一篇气愤填膺的文章中，章炳麟称光绪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清廷因此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和《苏报》，章遭租界警察拘捕。吴稚晖、蔡元培和其他的要犯纷纷逃难。邹容却自称是章的共犯投案，和章一起关在牢里。虽然章、邹败诉，被判入狱三年，但是令中国百姓感到震惊的，却是二千年来第一次，在一个诉讼案中原告竟是满清皇帝，而被告却是个平民。这段歷史插曲大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展开更多反满行动。

随后，《苏报》被封，爱国学社遭到查禁，更进一步激怒了中国的

知识分子阶层；邹容在狱中无故死亡，引起全国的追悼。

尽管受到挫折，江浙团体开始和安徽及东南数省的革命分子合作，加强地下革命活动。一九○四年秋，他们在上海组织另一个革命社团——光復会，其后成为中国东南的主要革命力量，在一九一一年前，独自多次进行起义和暗杀。虽然光復会从来没有加入后来成立的同盟会，甚至在一九一一年后仍是同盟会一个独立的主要竞争者，但是光復会许多在日本的重要会员，因为急于和其他的革命团体合作，后来都加入了同盟会。

4

来自长江流域中部的两湖团体，最初由两湖书院的学生组成。两湖书院是一所现代学院，为开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八九一年在武昌创立，招收湖南、湖北学生各一百人，由政府给予奖学金。此外，书院还大量招收外省的自费生。所有学生都要寄宿。因为武昌这时是中国的「新学」重镇，而两湖又是大多数维新派烈士的故乡，书院的学生遂浸淫于现代思潮中。他们甚至在出国深造前，就积极採取行动反对落后的满清政府。

据说在选择合格的学生到国外深造时，张之洞会派遣最勇于发言的捣乱分子去欧洲，让他们难以参与任何在中国的反叛活动。比较不活跃的才被送到日本。后来在辛亥革命最活跃、地位仅次于孙文的领袖黄兴，因为在两湖书院以沉默寡言见称，一九○二年夏天被送到日本攻读师范教育。

虽然两湖的学生回国后仍然紧密合作，但他们各自组织团体，出版地区性的定期刊物。湖北团体和别省的不同，他们选择不与长江流域强大的祕密会党哥老会联繫，集中全力渗透武昌的新军——第八镇和一个独立旅。因为新军实施中国军队史无前例的规定，要求所有官兵都要有文化，所以新军就成为年轻的学生军，革命党人认为这些人正好从事反满活动。

为了从内部渗透新军，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取得学位的学生也入伍当兵，慢慢祕密地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一九○四年夏，一个革命社团——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正式组织起来，二十二岁的湖南人宋教仁任文书。他们用研究科学作掩护，暗地里策划推翻清廷的暴力叛变。

这时，在武昌享有特权的美国教会中，有一些嚮往革命的华人牧师与革命党人合作，将为教友办的文化组织——日知会——转化为革命党的避

难所。（註1）日知会的长沙分会也成了黄兴领导的湖南党人的庇护地，黄也利用教会的设施，和湖北的兄弟互通声气。

东京的湖南团体也在酝酿发酵，出版了好几份湖南学生杂志。成员陈天华出版了一本反满小册子《勐回头》，它受欢迎的程度，可以和邹容的《革命军》相比。在湖南的正式团体华兴会，却要到一九○三年黄兴回到湖南省会长沙的中学教书才建立起来。经过数月的准备，华兴会以兴办矿业为名，在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正式成立，不久会员就达到四百多人，多数来自湖南的知识分子阶层。

为了争取下层社会的支持，黄组织另一个同仇会，和强大的哥老会合作，黄自任为「大将」。

黄兴是湖南长沙人，一八七四年出生于一个士绅家庭。年幼时受良好的传统教育。一八九二年，通过激烈的竞争，中了秀才。六年后娶妻，有子女二人。黄获官费就读两湖书院。一九○二年夏，被遣往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在那里遇到许多中国留学生，包括后来在中国政坛赫赫有名的杨度和胡汉民。

黄在东京的短暂期间，参与编辑学生杂志和青年会的活动。青年会是中国留日生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之一。一九○三年六月黄兴回湖南组织华兴会和同仇会前，也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

黄兴为人光明磊落，敢作敢为，是个天生的领袖，不久就赢得来自社会各阶层数以千计的追随者。经过精心的准备，他和同志们决定在一九○四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旬寿诞那天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不幸事机为长沙当局察觉，出动该省官军和民团，要把叛党一网打尽。黄兴出于无奈，只能取消行动，在一个担任圣公会牧师的同志帮助下，假扮为拥有特权的「洋鬼子」，避开沿途的拦截得以逃生，然后前往日本，但他在湖南的许多亲密战友都被官府捕杀。清廷对叛乱者的惩罚通常罪及家族，由于参与黄兴密谋的人多达数千，因此引起全国瞩目。作为庞大造反集团的总头领，黄成了清廷在长江流域的头号通缉犯。

黄兴很想尽快从日本返回中国，但他项上人头的悬赏太高，全国的捕快虎视眈眈，只好放弃再次回国的打算。在日本陷于绝境，加上对满清政权的同仇敌忾，使得黄兴和同志们一有机会就与其他的中国革命分子合作。

一九○四年，大多数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作为政治难民重返日本后，寻求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合作。他们发现，从中国最重要的南方省分广东来的知识分子，心存革命，但涣散而无组织。在日本，广东知识分子群体的领导人物中，着名的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和他的妻子何香凝）与冯自由。他们后来不仅在辛亥革命、甚至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扮演主角。但除了只有十来岁的华侨冯自由外，这些着名的革命人士都没有加入孙文的兴中会，也没有组成像光復会或华兴会那样的独立的革命组织。

之所以如此缺乏行动有两个因素。其一，广东学生大批抵达日本是颇为后期的事；其二，来自广东的知识分子都受到维新派极大的影响，因为维新派领袖是广东同乡中最受尊重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维新派失望，却对追随孙文的团体有所保留，认为这是一群出身低下的会党分子。这样，在日本具有革命思想的华南知识分子，茫茫然没有方向，直到一九○五年夏天，孙文第一次环游世界回来。由于他们在日本的人数增加，革命热情高涨，因此也和华北的兄弟一样，渴望着一个统领一切的革命组织。

人的想法随年龄而改变，中国在日本和别处的知识界革命分子也逐渐改变对孙文的看法。孙现在不再只是个地下会党的头领，而是一个联合各方志士，在中国领导革命的象徵。

註释

註1：译者按：日知会是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办的「文华书院」附设的一处阅览室，一九○五年二月由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曹亚伯等人发起，次年二月正式成立。因刘与圣公会牧师胡兰亭熟识，应聘为文华书院国文教员，遂利用校园内的阅览室陈列各种报刊及新书，任人阅览，每週日开演讲会，以宣扬革命思想。

【第4章】

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1

在东京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志士，避难异国，期望大家能团结一致。从一九○四年起他们就意识到，孙文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却总是比他们先行一步。两年前孙还在横滨时，极少中国学生愿意去见他，因为大家都把他看作吴稚晖所说的「绿眉赤眼」的黑社会魔头。

时间不仅改变了中国留日生领袖们的想法，也改变了孙文的想法。此前，孙文对知识分子毫无敬意，认为他们既靠不住，也没有能力来进行革命运动。他曾被盛极一时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挫败甚至欺骗。他十年来为革命团体招募会员的经验，令他相信出身低下的祕密会党人马要比知识分子更同情革命。不过，孙文在一九○四年抵达纽约市后，似乎改变了他的想法。

纽约市是个富有的大都会，华人众多，但孙文却可怜得连自己的一点旅费也筹不到。没有钱什么也不能干。

第一个认识到孙文的重要性的中国学生是刘成禺，他被驱离日本后往美国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读书。（註1）经过一些广东朋友的推荐，刘在三藩市一家中文报任编辑。由于他受到现代美式教育，加上和孙文的一些朋友交往，很快就使他放弃了以前对孙文一伙人的偏见，并开始鼓励他在欧洲的朋友和孙合作。刘的朋友直接邀请孙到欧洲去，这群在西欧的学生发现孙难以成行，便筹措了八千法郎，寄给孙作旅费，使得穷途潦倒的革命领袖再次展开活动。

孙文在一九○四年十二月离开纽约前往欧洲。虽然他在伦敦遭遇中国学生的冷落，却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受到热烈欢迎。这三个城市有中国学生约一百人，大多数是由张之洞用官费送去的湖北学生。孙文和他们在一起数星期，畅谈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他自然提到了在美国致公堂章程写下的四项宗旨（即「驱除韃虏，恢復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学生们对前三项毫无异议，但许多人反对有关平均地权的最后一项。

在讨论如何组织中国的革命军时，湖北学生根据他们的经验，建议打入新军。孙文坚持利用祕密会党的老办法。经过耐心和友好的辩论之后，才妥协为既和地下会党合作也打入新军。

一个革命团体随即组织起来，约有三十人参加宣誓，全是从湖北来的学生，誓词是孙文按四项宗旨撰写的。这个时候学生们才知道，孙也是个能读能写古文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孙也认识到学生们对他以前的团体抱有偏见，从而绝口不提兴中会；因此他在欧洲组织的这个革命团体一直没有名称。

一天，孙正要离开巴黎，他对这群知识分子新追随者的信心，受到极度的考验。有几个人对自己新近的头脑发热感到反悔，熘进孙的旅馆房间，把他的所有证件，包括一封法国政府介绍孙医生给安南的法国总督的官函，全部偷走，并交给巴黎的中国公使。孙的直觉反应是回到他以前的想法，认为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靠不住。后来他知道叛徒只是少数几个人，大多数人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捐出更多的款项使他能回到日本，才渐渐打消了这些想法。

2

一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孙文重返横滨，成了最受欢迎的英雄。在迎接他的中国学生团体中，以黄兴和华兴会的同志最热情。此外还有缺乏组织，和他是同乡的广东学生，由汪精卫、廖仲恺（和他的妻子何香凝）、胡毅生和堂兄胡汉民、冯自由等带领。虽然除了冯自由之外，从来没有广东学生参加兴中会，但他们现在都热烈支持孙文开展一个新的运动。

孙主张立刻成立一个包含所有革命团体和个别革命分子的统一组织，并且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回应。在与团体及个人协商辩论后，一个革命的「联盟」于七月三十日在东京的赤坂区组成，正式称为中国同盟会。有人建议在「同盟」前面加上「革命」、「排满」等形容词，都没有获得通过。

七十位创始会员用孙文撰写的誓词宣誓，其中包含「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个着名的句子。就像革命运动以前发生过的情况那样，第四句引发了争论，但七十人最终为孙文的雄辩说服，一致依誓词宣誓。后来国民党的歷史学家把这次聚会称为同盟会的筹备会议，而以同盟会为国民党的前身。

八月十三日，东京一千多名中国学生给孙文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欢迎会，孙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鼓吹共和政体。一星期后，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国会议员坂本金弥宅中举行。这样，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就成了同盟会的正式创建的日子。有三百名学生当场签名入会。

同盟会总章草案有三十条，由黄兴宣读，大会几乎没有改动就予以通过。根据总章，同盟会总部设总理一人和执行、议事、司法三个部门，模仿美国的制衡原则。

总理由同盟会全体大会选出，执行部由总理直接管理，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各科长由总理委任，而以庶务科长为六科之首，总理缺席时，职务由庶务科长代理。

其余议事和司法两部的成员，由全体大会选出，但由该部成员自选部长。黄兴提议孙文任总理，由大会以鼓掌方式通过。孙接着任命黄兴为庶务科长。其后，汪精卫和来自广西的学生邓家彦分别被选为议事部长和司法部长。在同盟会总部的指示下，来自各省的会员组织了在东京的各省分会，每个分会由分会会长领导将来在各自省分的工作。

此后不久，孙文起草了他的追随者誓言支持的《革命方略》，将革命后中国的政治重建工作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他又建议中华民国的宪法纳入制衡原则，具体表现于「五权」中，即在现代一般民主宪法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外，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就行之有效的「考试权」和「监察权」。

3

同盟会的组成使中国的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且举一事为例：它是现代中国第一个以全国为基础的革命团体，创始会员涵盖十八行省中的十七省，只缺直到一九○五年才遣送学生往日本的甘肃。

再者，同盟会是一个包含所有阶级的组织。虽然由知识分子带头，宣称的目标却足以吸引各阶级的支持，特别是祕密会党中人。总理孙文的社会地位和大多数古代王朝的开国者相若，能作为传统的各阶级合作的象徵，这种合作一向决定着中国歷史的进程。单凭这一点来说，同盟会就有能力开展一个改朝换代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孙文长时期与西方人物及其政治和社会思想接触，他的政治哲学已成熟到足以指导中国所需要的现代化。他对实施现代理念的坚持，他宣扬这些理念时的高谈雄辩，他的西方训练，加上他的个性和大好机运，都使他成为现代政治家和革命领袖。

但卓越的天赋还需要具有权力，方能使几乎是独自一人加盟的孙文主导同盟会这部机器。同盟会的主力来自黄兴领导的两湖团体，其成员对黄的信赖远过于孙。这个情况即使在一九一一年以后，当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时候，仍然如此。

黄派之后，是在章炳麟领导下的前光復会会员，他们形成了同盟会中的第二个派系。虽然光復会只有两个会员签名成为同盟会的创始会员，许多人却在后来加入。光復会在民国成立后仍保持独立，这个派系的成员自认既是同盟会、也是光復会会员。一些人后来甚至企图把孙文拉下总理的位子。

随着同盟会不断成长，过了一段时间，孙渐渐赢得多数人的拥护，他们大部分以前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以这新组织为荣，全心全意效忠，对孙的领导也衷心支持。在这个大多数中，孙的广东同乡，在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更牢固的集团。中国人的省籍观念一般很重，尤以广东的知识分子为甚，因为广东的方言特殊，别省的人都听不懂。每当孙和他的广东同志在一起时，总是说粤语而不说中国官话。这个习惯，虽然常令来自别地的同志不快，却使他们成为特殊的一群，更加团结。因为汪、胡及其广东兄弟们在同盟会之前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乐于以兴中会作为自己的传统，以后更宣称，兴中会、同盟会及其后的国民党是一脉相承的唯一正统。

4

同盟会，名副其实是一个包含所有革命人士的联盟，从最保守的清廷官吏到最激进的乌托邦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都有。把所有会员结合在一起的是「驱除鞑虏，恢復中华」这个目标。虽然会员的大多数也相信「创立民国」的宗旨，但很少人了解什么是民国。对大多数人来说，民国只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

最少人相信的宗旨是「平均地权」。许多追随孙一生的亲信，像吴稚晖和胡汉民，曾经竭力反对。其余的人虽然不表示反对，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同盟会的那些不是孙文亲自组织的各地分会，几乎就干脆把地权一项去掉。

值得一提的是，在革命运动中，从彻底的改朝换代者到种族革命者，从类似民主运动的各家各派到隐藏未露的社会革命，他们之间的信念歧异并没有削弱驱逐满清的共同目标。但在完成此一共同目标后，这样各持己见就给同盟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同盟会组成后，极力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一九○五年八月下旬，黄兴把华兴会的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转移到新组织，不到一星期，就因为刊登中日关系的文章惹怒了日人，遭日本警察关闭。同盟会代之以一新杂志《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新杂志小心避免反日的言论，集中注意于推翻满清政府。通晓日语的张继被选为第一任发行人兼挂名编辑，唯一的目的是与日本当局打交道，而实际的编辑任务由孙文的祕书长胡汉民担任。胡编了最初的六期，就把编务移交给刚从中国出狱到日本的章炳麟。

《民报》的第三期，刊登了所谓「六大主义」，即：（一）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其中只有（一）、（二）、（四）三项才是同盟会机关报确认的基本宗旨，其余的都是用来安抚日本政府，避免更多的干扰。

《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中，胡汉民和汪精卫后来成了孙文的左右手。胡汉民原籍广州，本名胡衍鸿，一八七九年出生于一个士绅家庭。幼年时家境贫困，却受到良好的经学教育，年仅十五就做了塾师，然后任维新派在广州一份报纸的记者。一九○○年，他中了举人，这个功名加上他从事新闻的经验，使他有资格去做富家子弟的考场枪手。两份这样的工作为他赚来六千银元，使他能在一九○二年往日本攻读教育学。在东京弘文学院，他认识了黄兴和其他未来的革命领袖。

胡在日本的第一次学生生活只有几个月就中断了，因为他带领中国学生向日本政府抗议，被迫归国。一九○四年，他和汪精卫（那时叫汪兆铭）等数十名学生被选送留日，捲土重来。胡、汪二人同在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一九○五年暑假，胡回广州携妻、妹赴日，在同盟会成立后十日抵达。有人马上把他推荐给孙文，他随即加入了同盟会。他用孙文的名义写了《民报》的发刊词，此后用汉民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精采的反满文章，由此成名。

胡的朋友汪精卫亦在《民报》大有文名。汪生于一八八三年，也是广州人，家庭和教育背景也和胡相若。为了奉养母亲，汪年纪不大就坐教席，一边读书一边课徒自给。一九○二年，他参加广州府的乡试，在三千竞争者中名列第一，取得秀才资格，当时还不满十八岁。一九○四年，他拿官费前往日本，期满后仍留日，以替中国出版商翻译日文书籍

为生。张君劢（原名张嘉森，英文名Carson Chang）在日本与汪相识，说汪起初倾向于温和的维新派路线，对梁启超十分仰慕。汪第一次拜会这位维新派领袖时，梁正全神贯注于雀局而无暇交谈。汪以为这是梁对他个人的侮辱，从而转向革命并在其后加入同盟会。

胡、汪两人都是文章高手和才气纵横的诗人。他们在《民报》同维新派诸君辩论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向手执中国舆论牛耳的维新派第一次提出严重的挑战。着名的中国现代史学家李剑农教授曾经评论这场论战说：「梁启超的笔端固然『常带感情』，对方汪精卫的笔端也常为感情所充满」。（註2）数以百计的《民报》给偷运到中国大陆。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个名字，受知识分子读者崇拜的程度，可以比拟他们之前的梁启超。为此满清政府悬巨赏以求二人的首级，却招来更多《民报》的订户，又使汪、胡的名气大增。

虽然孙文用《民报》来传播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但总的来说，《民报》并没有提出成熟的政治思想，只是反映西方各种不同学派的基本理念。没有一个作者称得上是具有独创性的政治思想家。

从歷史上说，《民报》正好接续上了维新派致力于阐述西方君主立宪政治思想的《新民丛报》。君主立宪一度被认为是激进思想，现在则为革命理论家所主张的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取代，因此引起和维新派的尖锐冲突，并使中国社会转变时期的知识青年日益深受影响。

总之，时间对革命党人有利。维新派完成了为歷史作准备的使命，现在正与腐朽的王朝一同消逝。

6

除了推动宣传工作，同盟会还在各省组织武装起义。全国各地自发的起义风起云涌，形势对他们很有利。从革命团体精心策划的叛乱，到祕密会党领导或者没有人组织的、在飢荒地区的传统农民起义，应有尽有。许多起义，参加的人数以千计，也有些人数很少，甚至有一个人的单独行动，例如刺杀皇族权贵。

尽管许多革命人士和同盟会毫无关连，清廷和不知情的民众却统统称他们为革命党，通常这是孙文一伙人单独享有和自称的名号。许多自发的起义虽然和孙文没有干系，也用他的名义来扩大影响或威吓地方的

警察。

再者，也有些强大的革命团体，例如光復会，虽然公开否认和同盟会有任何瓜葛，却不能阻止同盟会来分享为革命牺牲的荣耀。总之，同盟会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力量，孙文成了中国反满、反帝制革命的领袖，即使不是实际的，也是精神上的领袖。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一宗前所未有的暗杀事件就在清廷发起立宪运动时在北京发生。五位朝廷大员奉旨出洋考察立宪政体。（註3）刺客吴樾生于安徽一个体面的士绅家庭，是塾师和报纸的编辑。吴坚信共和，认为当时的立宪运动在矇骗中国人民。他决心刺杀五大臣，乔装僕人携带自制的炸弹，潜入五人搭乘的专车。在吴有机会接近那些高官前，炸弹爆发，吴死于非命。

北京警察查探多日，才在举国震动中查明刺客的身分。虽然吴樾和任何革命团体没有关连，《民报》却取得他寄给在日本一位朋友的「绝命书」，在第三期刊登。刊出的信唤起全国同情，使吴成了革命烈士。这事令新建立的革命党（註4）声名大振，也使吴在信中谴责的维新派蒙羞。吴的炸弹和绝命书使革命派的激烈分子大为振奋，又使皇室的保守派和满清高官惊恐，认为革命党是一帮可怕的、不成功便成仁的炸弹刺客。

一九○六年底，在吴樾炸弹的硝烟散失后不久，一个大规模的农民自发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几个月内，叛乱扩大，吸引了不满现状的农民数千人。起义的领袖龚春臺，宣称奉「中华民国政府」的命令，组织「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并自任都督。义军的目的是：「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犹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註5）龚春臺的目的明显与同盟会的宣传相吻应。

在太平天国及其后一八六○年代的捻军给消灭后，这次叛乱是最严重的一次。叛乱的范围极大，清廷调动五万湖南和江西地方军队，才在一九○七年春天平定叛乱。

同盟会的会员为这次叛乱激动不已，刘道一、胡瑛和孙毓筠等带领一些人员企图潜回策应，但遭清廷逮捕下狱，刘道一因此殉难。尽管如

此，受到这些英勇事件的鼓舞，同盟会也积极採取行动。鉴于在长江流域没有多大成功的机会，同盟会把目标转向华南，认为在沿海地区组织武装起义比在其他地方容易，一旦在沿海建立了据点，内陆地区将闻风响应，满清政权便可一击而溃。

一九○六年底，孙文和黄兴离日，往来于香港、河内、曼谷和新加坡间，进行筹款与策划在大陆发动武装起义。从一九○七年到一九○八年，他们发动一连串在沿海省分的起义，四次在广东，两次在云南。（註6）

孙文和黄兴数次亲自参与，他们的行动充满激情，但缺乏实效。没有一次的起义计划周详，引人注目的是个人的英勇行为而不是集体行动。如果说这些起义有任何结果，那就是让孙文和黄兴在全国成为传奇人物。清廷把所有的血腥叛乱都归咎于二人，各地的革命派则对他们赞誉有加。二人成了全国叛乱分子寻求领导、指引和帮助的偶像。

一九○七年夏，同盟会正在华南活动频繁的当儿，光復会的徐锡麟试图在长江北岸的安徽省会安庆起义。徐是从日本归国的学生，他曾拒绝参加同盟会，却是光復会的创始会员，密谋武装起义有年。靠着在日本所受的训练，徐在清廷的官场中逐步高升，数年内就爬到安徽省巡警学堂会办的位子，并指挥安庆市的警察。他表面上好像与满清官吏同流合污，引起同志怀疑他背叛了革命。由于革命党内部的猜疑，加上他担心行迹败露，迫使徐不待时机成熟，就在一九○七年七月六日起事。虽然他刺杀了满人的安徽巡抚恩铭，自己也不幸牺牲。

徐的失败导致了秋瑾女士被捕和处死。秋瑾策划在徐锡麟行动成功之后，同时在江苏响应。徐、秋二人的牺牲给予光復会致命的打击。在这次挫折后，光復会的革命活动虽然继续，但从此没有再发动任何起义。

7

有人以为同盟会和光復会遇挫后，应该有助于巩固内部的团结和彼此之间的合作，但事实却适得其反。在同盟会东京总部内的派系之争——孙文先是和华兴会的会员、后来和光復会的会员斗争——几乎毁灭了革命。

第一次危机起因于一九○六年底关于选择未来中华民国国旗的争执。当时有多种建议：黄兴喜欢的是「井字旗」，认为可以象徵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井田制」。也有人建议十八星旗，每一星代表中国

一个行省。孙文却坚持使用他的故友陆皓东为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起义设计的青天白日旗。虽然会内没有几个人支持他，孙仍固执己见，直到后来国旗的辩论变质，演变成孙、黄的性格较量。黄兴最后向顽固的孙文让步，但引起会内拥黄人士对孙的敌意，在一九○七年底另组共进会，只因为时机不利，才没有完全从同盟会脱离。

孙文和光復会的冲突发生在一九○七年夏天。日本政府受到满清的压力要驱逐孙，为了促使他早日离境，日本政府给了孙五千日圆，一个同情孙的日本股票经纪人又加了一万日圆。孙没有和同盟会总部的人员商量就接受了这笔钱，离开日本时，只留给《民报》两千日圆，也让同盟会在东京的大多数会员和干事感到愤怒。

在章炳麟带领下，一大批华北的会员，会同一批有影响力的同情革命的日本人，要撤换孙的总理职位，而以黄兴代之。争执异常激烈，甚至连孙的最忠诚追随者胡汉民和冯自由也觉得孙应该向所有会员公开道歉，但孙文顽强地拒绝退让。最后由于黄兴斡旋才度过难关，没有让同盟会分裂。但章炳麟带领的反孙分子对孙的敌意如故，他们向所有会员分发公开信，攻击孙挪用公款，背弃革命事业。章和他的朋友陶成章控制《民报》，出版了二十四期后在一九○八年底被日本警察封闭。汪精卫设法在一九一○年初又祕密出版了两期，但被章指责为《伪民报》。

孙文在所到的东亚各港口，都不受当地政府欢迎，使同盟会的处境变得更坏。孙找不到适合的落脚处，只好抱着寻求西方各国援助和向美国华侨筹款的一线希望，在一九○九年夏天离开新加坡前往欧洲。

孙离去后，留下黄兴来面对同盟会的严重分裂。一个多半由光復会会员组成的派系脱离同盟会，到南洋各地成立分会，取得当地富有的华侨社区协助，垄断了筹款活动，同盟会无法与其竞争。

这时共进会也由孙武、居正、焦达峰等人领导，正式组织起来。虽然这些领袖没有宣称脱离同盟会，但他们自己起草了不同的会章，以无关痛痒的「平均人权」取代「平均地权」。更严重的是，他们用十八星旗替换了青天白日旗。

据说黄兴为分裂之事感到困扰。虽然新组织的成员多半是他个人的追随者，他却无法阻止分裂。共进会在东京设立总部，其成员往长江流域进行独立活动，试图动员祕密会党并打入湖北新军，却与当地的革命组织产生矛盾。

一九一○年初，同盟会的活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会员脱离，派

系分裂，在广州两次起义都宣告失败。忠心的会员极度沮丧，许多人开始以个人的行动取代周密策划的暴动。

一九○九年底，汪精卫在南洋各地的筹款活动一无所得，竟与同志黄復生乔装前往北京，不顾许多友人的劝告，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后，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计划不慎洩露，汪、黄被捕。清廷从不赦免革命党人，他们二人却像奇迹般保住了性命。

在华南，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人为各种挫折痛心疾首，决意集中全力，向清廷作孤注一掷。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即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他们在广州发动又一次起义，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最壮烈和流血最多的一次。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几乎全部动员，和清军进行巷战。虽然大多数人过去从未亲歷战斗，对街头徒手肉搏更是一无所知，但他们英勇顽强，与佔优势的清军殊死战斗，最终再次失败。

战斗结束后，陈尸街头者数十人，被生擒者四十余人。清廷彻底调查时发现，起义者无分存殁，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来自最体面的士绅家庭。他们从容就义，并洋洋洒洒以文言书写供词，迅速成为全国的传奇；他们的牺牲引起举国哀悼。

再者，一些人起义前夕写给亲人的「诀别书」，被革命党人公开发表，为数百万男女老幼的同胞传诵。读者们不能遏止的热泪迅速化作对满人及与其合作的汉人的仇恨。烈士虽逝，典范长存，数以百万计的志士将踏着他们的足迹奋起。

8

尽管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起义使本来就已分崩离析的同盟会消耗殆尽，但也使腐败的满清政权来日无多。小皇帝溥仪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登基，朝廷被一群野心极大却比先辈更加无能的满人亲贵把持。列强力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鲸吞蚕食，日益严重。满清政府除与洋人谈判借款外，一事无成。这种情况不但鼓励洋人在中国扩张，也给予中国官僚更多营私舞弊的门路。虽然全国反对向外借款，但满清只有靠外债才能苟延残喘。

满人愚蠢地妄想建立一个清一色的满人朝廷，给大清王朝造成不可挽救的致命伤。这使得最忠心的汉族顺民和官僚也起了反感。朝廷中最能干的军机大臣和实际指挥现代化北洋军的袁世凯，在摄政王载沣掌权后不久被罢黜，满清却不能真的动手收回袁的兵权。华北着名的北洋军将领，都由袁一手训练，他们「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

此外，北京的清廷对一些传统上半自治的省分无法控制。朝廷能指挥的军队为数不超过四镇，而各省却控制着众多的旧军和新军。汉人督抚一般在政治上投机取巧，而满人督抚则颟顸无能。虽然旧军仍然效忠朝廷，但已经腐朽到不堪一战。新军一般训练有素、配备精良，但大多为各地的革命团体渗透。因此省内一有紧急情况，就得由汉人督抚或新军应付，他们一旦作出决定，清廷也无法逆转。

新设立的谘议局在省级政治扮演重要角色。从一八九八年的维新运动起，各省成立了许多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有些是独立的，有些则附属于同盟会或政闻社。政闻社是维新派的全国性组织，主导多省的谘议局，人们常称之为立宪派。

长期以来，立宪派对朝廷的满人亲贵失望，认为他们在日俄战争后的立宪新政只是虚应故事。一九○八年光绪驾崩，终结了在满清皇族主持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最后希望。这样一来，立宪党人也和革命党人一样，衷心期盼着满清政权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王朝像一栋处处塞满炸药的大厦，星星之火便会引发爆炸，而这星火最终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点燃。

在科学补习所和附属的日知会被封闭后，武昌的革命活动由两类组织继续推动。一类是前述两组织的直接产物，由新军内的年轻士兵自发组成。最初是在一九○七年组织的群治学社，一九一○年改名振武学社，一九一一年一月又改为文学社。这个团体主要由士兵和连以下的军官组成。一九○九年十月张之洞逝世后，湖广总督的职位改由满人担任，青年士兵活动频繁，计划在武昌武装起义，攻击总督府。一九一一年春，文学社有社员三千人，二十六岁的士兵湖南人蒋翊武被选为社长。

共进会和同盟会是在武昌地区大力推动革命活动的第二类组织。它们的总部设在东京，从那里派人到武昌策划起义。一九○八年末，共进会派遣焦达峰、孙武和居正到湖南、湖北一带。共进会在新军内的活动，开始时和文学社及其前身发生严重的冲突。直到一九一一年秋天，双方才迫于形势结合在一起。

同盟会修改了策略，一九一一年夏天把活动的重心从华南转移到长江流域。为此，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然而它在两湖地区的活动，只限于支持共进会，共进会则仍然承认同盟会为总会。

一九一一年夏末，一个涵盖两湖地区革命组织的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准备采取行动，而触发行动的导火线是保路运动。

9

由于邮传部大臣和铁路建设主要提倡者盛宣怀的建议，清廷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下令，将正在修筑中的私营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註7）因为朝廷缺乏筑路的经费，就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这事引起商人、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激烈抗议，参加抗议的还有铁路的股东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人士。

由于其他省分的人也来参与，保路运动就像野火般蔓延开来。烧得最厉害的是四川，那里的流血事件使得惊惶失措的总督赵尔丰上禀北京求助。清廷派遣武汉的新军数团到四川平乱。

这次调动引起了文学社的警惕，担心他们的组织因此分离拆散，就计划在十月十六日传统的中秋节武装起义。

九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袖第一次召开联合会议，商讨在武昌起义的详细步骤。但由于选举总指挥的争执，整个计划几乎流产。经过双方领袖艰苦的谈判，协议决定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

祕密制订了详细策略，组织了敢死队，还派人到各祕密组织去协调行动。在香港的黄兴也得到通知。不幸的是，一如过往，计划为武昌的军队指挥官察觉，他们下令戒严，拘捕和处决了数名预谋起义的头目。

就在十月起义看来不得不延期的时候，一宗意想不到的事件实际上使起义加快来临。一个革命党人的地下火药库因有人吸烟而不慎爆炸。救火队和警察赶到现场，带走了所有人员和文件，其中有文学社的社员名册。文学社的年轻士兵害怕被清廷发现后遭到镇压，匆匆准备就决定迅速採取行动。这样，新军就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八时叛变。

叛变者激战一夜，在凌晨佔领了总督府。总督瑞澂弃城而逃，藏身泊在长江的砲舰上，武昌一带清军的总指挥统制张彪也逃跑了。到了十月十一日，不论敌友都没有想到，武昌就这样落入叛变者手里。

10

十月的武昌起义佔领了一个省的省会，是歷次起义的头一遭，也是唯一的一次。然而在武昌得手后，起义士兵却无所适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首先是乏人指挥，因为火药库爆炸后，蒋翊武为清廷的警察逮捕。虽然他越狱逃脱，但不能及时赶来指挥。参谋长孙武在爆炸后被严重烧伤。刘公被推派为未来军政府总理，但起义时却困处汉口。种种原因使得起义成功后，没有人出面来主持大局。

战斗的硝烟散去一段时间后，年轻的叛变者从自己的队伍中找不出一个人来担任指挥，才找到原来清军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他那时藏身在武昌，是个素有人望的指挥官，因此被认为最有资格担任总指挥。当时传言黎在隐匿处躲避，被人从床下拖出来。黎元洪是个谨小慎微又忠于清廷的人，并不愿冒着生命危险来担任叛变者的领袖，迫于无奈才不得不接受使命。但大好的形势很快就说服勉为其难的黎统领和革命同进退。

首先，逃跑的满人留下一个有黄金、白银、铜钱、证券和银票的宝库，价值超过四千万银元。在汉阳还有一座中国最好的兵工厂。汉阳和汉口很快也落到叛变者手中，汉阳兵工厂有张之洞购买和贮存的日本和德国的武器与弹药，足以打一场大战。

其次，看不到任何清廷立刻反击的迹象。革命党人有足够的时间巩固对武汉三镇的控制，静待其他城市和省分的响应。

与此同时，他们邀请邻近所有汉人的政治领袖和社会贤达参加，甚至包括以前的府州县官员。革命就这样很快转变为仅是反满的革命，鼓励着所有汉人、以前的大小官僚甚至流氓都参加进来。

十月十一日，军政府正式成立，黎元洪就任都督。新政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以一九一一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新政府的大楼上升起十八星旗。

在新政府中，黎元洪主持军务，前立宪派要人、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主持政务。

新政府迅速展开工作。新成立的革命军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士兵。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出通电，号召各省脱离北京独立，立即响应。最重要的是，革命当局公开宣称，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条约权益。这项措施赢得汉口所有外国领事的支持，他们在激烈辩论是否要干涉后，承认革命政府为一交战方。外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促进和鼓舞了革命运

动。

这时，革命当局也电请黄兴从香港到武昌主持一切。黄迅即回覆，并于十月二十八日抵达武昌，立即就任武汉地区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何其不幸！抵达时适逢袁世凯重掌大权，武汉的战事势头逆转。

在起义四日后，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他精锐的北洋军，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立即沿京汉铁路开往武汉。甫一接触，革命军即难与清军匹敌，十一月一日汉口失守。袁暂时按兵不动，一面派遣专人祕密往武昌谈和，一面向朝廷的满人亲贵施压。袁再次推进，十一月二十七日重佔汉阳。革命军英勇抵抗，但伤亡惨重。战事失败后，革命军指挥官之间就未来战略发生争执，导致黄兴辞去所有职务，离开武昌前往上海。

革命阵营再度人心惶惶。袁世凯是个精明的政客，又与满人亲贵势不两立，第二次对武汉地区按兵不动。革命党人在武昌的总部因此得以保存。

各省纷纷自发响应，宣佈脱离北京的清廷，加上袁世凯的暗中支持，革命形势迅速改善。事实上，许多省分、城市也相继迅速投向革命。

首先易帜的是湖南省会长沙。十月二十二日，焦达峰带领新军一小队同志赶走巡抚余诚格，但他却随后被叛兵杀害。长沙的领袖于是推举立宪派官僚谭延闿任湖南革命军政府都督。

十月二十二日，新军在陕西省会西安起义，陕西脱离北京独立。次日，在长江中游，江西省重镇九江的城墙上也升起了象徵革命的白旗。

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省的新军杀了巡抚陆钟琦，推举曾在日本受训的新军标统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于是山西也加入了革命阵营。三日后，江西省会南昌城头树起白旗，全省景从。同日，云南新军起义，不久推举曾在日本受训的协统蔡锷为军政府都督。

十一月三日，新组成的革命军在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学生陈其美领导下，夺取上海，陈任上海军政府都督。次日，浙江、贵州两省易帜。

十一月五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会苏州宣佈他效忠新政府。两日后，广西也同样宣佈脱离北京，由本是绿林好汉的广西提督陆荣廷任军政府都督（註8）。

沪宁铁路上的重要城市镇江和安徽省会安庆在十一月八日「光復」。柏文蔚被推举为安徽军政府都督。（註9）十一月九日，福建省会福州的新军起义，福建也加入了革命阵营。同日，广州的士绅向两广总督张鸣岐请愿，要求与北京脱离。张惊恐逃往香港，广州的各革命组织邀请在香港的胡汉民回原籍担任军政府都督。胡十一月十九日返广州，各公共建筑物高悬青天白日旗。

十一月十一日，长江的水师舰队降下大清的龙旗，升起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大团结，随即为中国东南所有革命队伍採用。

在五色旗下，上海和杭州派遣联军攻打南京，十二月二日克南京。十二月上旬，曾在日本受训的四川新军将领尹昌衡佔领四川省会成都，自任军政府都督。这样，四川全省纳入了革命的版图。

整个长江流域随着四川相继加入革命的行列。在两个月内，整个华南和东北地区的两省都归革命政府管辖。十一月二十六日，东北的奉天当局的权力由满清政府和平移交给曾在日本受训的新军混成协协统蓝天蔚。

这样，一九一一年年终前，中国分为南、北两半。北方仍在一个强人牢固控制下；南方为了继续内战，试图成立中央政府和统一号令。南方政权由于组织散漫和领导分歧，显然严重损害了与北方抗衡的能力。

註释

註1：译者按：参看第三章第二节。

註2：译者按：引文取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上册，页二四六。

註3：译者按：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清政府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九月二十四日，五大臣在正阳门车站起程时遇刺，出洋之事被迫延期。后因绍英受伤、徐世昌已获任巡警部尚书，均不能成行，十月二十六日，清廷另任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

註4：革命党在当时是对同盟会和个别革命人士的通称。直到一九一三年中华革命党成立，「革命党」一词不是任何政治团体的正式名字。一九一一年前，差不多所有中国人都知道革命党，极少人能

指出同盟会。

註5：译者按：引文取自龚春臺，〈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亦称〈萍浏醴起义檄文〉）。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册，页二四九。

註6：在广东四次起义：一九○七年四月在黄岗、六月在惠州、九月在钦州和一九○八年二月再在钦州。云南两次起义：一九○七年十二月在镇南关和一九○八年三月在河口。

註7：译者按：是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欲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

註8：译者按：武昌起义后，广西巡抚沈秉堃响应革命，宣佈该省独立，成立广西军政府。当时沈秉堃出任军政府都督，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及提督陆荣廷任副都督。不久，陆荣廷鼓吹「桂人治桂」，沈、王二人受排挤，遂以带兵北上援鄂为名相继离开桂林，陆氏独掌广西实权。

註9：译者按：武昌起义后，安徽屡经变乱，到一九一二年三月由南京临时政府派驻浦口的革命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到安徽任都督，才告一段落。

第二部　民主革命的失敗

【第5章】

议会政府的尝试与失败，以及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

1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十余省在一九一一年底脱离北京独立。这不是单独由一群人指挥，而是在各处自发地展开，事前甚少联繫与计划。各省的响应可以分为文的和武的两类。文的响应通常由各省谘议局或当地公共团体的和平行动开始。首先有人在省谘议局召开紧急会议，并邀请愿意参加的汉人社会贤达参加，随后通过关于独立的决议。跟着他们要求总督或巡抚加入，宣佈该省脱离北京独立。尽管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各异，现在也联手推动，贊同脱离清廷的运动。江苏、广西、广东、贵州和奉天就是这样宣佈独立的。

第二类是武的响应，一般的方式是由渗入新军的革命党人引发兵变，或由一小撮革命党人冒险发动武装起义。一旦他们取得了初步成功，就召集当地有名望的汉人开会，然后组织独立的军政府，并推举一位着名的公众人物为都督。湖南、陕西、山西、云南和福建都是用武的方式取得独立。许多省会以外的重要城市，例如上海、镇江、重庆、九江和厦门，也是这样落入革命党人的控制中。

江西、浙江、安徽三省的所谓光復，则文武并用。开始时向当地的官府和平请愿，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还是通过武装起义达到目的。在所有的重要城市中，只有南京是在革命军与清军冲突后光復的。

在十多个省分脱离北京后，前江苏巡抚、现任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和原属立宪派、现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于十一月十二日联名致电同盟会的沪军都督陈其美，建议仿照美国革命时在费城的大陆会议（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in Philadelphia），在上海召开各省会议，组织临时政府来统一内外政策，指挥各省的革命军。因此，独立的各省十一月十五日到上海开会，但不久就由于黎元洪的邀请，会议移往汉口。十一月二十四日，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了将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根据大纲，新的临时政府设参议院以及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各一人。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下设九个部，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註1）

参议院是立法机构，参议员由各省政府自行派遣，每省三席。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大纲也规定，临时大总统就职后六个月内，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并成立有两院的国会。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再迁南京，想要选出一个总指挥，作为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步。拥黄（兴）与拥黎（元洪）的派系之争再度爆发。仍然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原来选出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在南京时，由于武汉代表的抗议，各省代表改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孙文适时从海外归国才结束了这场争执。

孙文在赴美国东岸途中，停留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Denver, Colorado），从报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他立刻前往纽约，然后到伦敦和英国政府谈判，成功地阻止了一笔给满清政府的贷款。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抵达上海。四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举行会议，以十六比一票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随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

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在南京就职。新政权以阳历取代传统的阴历；为了照顾对国旗的不同意见，选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和青天白日旗分别为陆军和海军的军旗。

总统下设陆军、海军、内务、外交、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九部。这样组织的新政府是按照孙文的要求成立，是不设总理的总统制，行政权属于总统。

孙谨慎选择各部的部长，产生一个包括在革命运动中作出贡献的所有派别的联合政府。在九个总长中，黄兴（陆军）、伍廷芳（外交）、蔡元培（教育）属同盟会，张謇（实业）和汤寿潜（交通）是立宪派的领导人物，程德全（内务）、陈锦涛（财政）和黄钟瑛（海军）是前清政府的官员，王宠惠（司法）是受美国教育的归国学生。总统府祕书长胡汉民和各部的次长则大多数来自同盟会。一月二十八日组成临时参议院，同盟会会员林森当选为议长。（註2）

新的民国政府首先颁佈一系列关于重大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总统令。所有男子必须剪辮，女子必须放足。彻底废除落后风俗和官僚陋习。数百年来为害民族的奴隶、鸦片、娼妓及其他社会罪恶，以严刑峻法禁止。中国所有民族的权利平等。阶级差异根据法律废止。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要实施同盟会会章载明的平均地权，但孙大总统对政府内的无政府

主义者承诺，让他们在崇明岛实验无政府社会制度。

新政府急于展开重建国家的工作，人民也同样地热切期待。中国歷史在南京的新共和国领导下似乎真的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不幸的是，希望随即破灭，因为总统的职位由孙文让给了袁世凯。中国的传统官僚体制在革命后倖存下来，而袁世凯正是这个体制的龙头。

2

革命党人忙着在南京组织新政府，在北京的旧政权也正经歷着激烈的改变，但绝对没有垮掉。首先是满人亲贵倒台，接着是袁世凯崛起。

袁最终成为中华民国的独裁者，全凭对下列三个问题或目标的巧妙操纵和运用。第一，他设法接管了满洲贵族所有的军政大权，使自己成为满清朝廷背后真正的主宰。经过数星期狡猾的纵横捭阖，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袁从湖广总督晋升为内阁总理大臣，位尊权重，总揽了清廷的政治和军事实权。

第二，他致力于巩固对华北的控制。一方面他牢牢掌握着朝廷的满洲贵族和小皇帝溥仪，成为他玩弄于股掌的傀儡。另一方面，他清洗政府和军队内的所有革命党人及其同情者，扫除了内部的个人权力障碍。十一月七日，精锐的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杀。吴是着名的革命党人，在驻北京附近的清军中担当要职，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包围首都。袁是吴突然遇刺的疑凶，因为这样就消除了对他权力的威胁。吴被刺后一星期，已脱离北京的山东省在袁的影响下撤销独立。十一月下旬，在直隶省北面滦州的革命起义失败。所有这些事件有助于巩固袁个人对华北的控制。

第三，袁巧妙地利用民间的反满情绪，以绝对优势与南方革命党人讨价还价，扩张他个人在华南的影响。没有人比袁本人更清楚，领导分歧、组织散漫的革命军无法和他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抗衡。革命党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不接受袁含蓄但坚决的要求，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袁任总理大臣后不久，就和汉口的革命当局接洽，一面暗示无所爱于满清，一面加强收復汉口和汉阳的军事行动，引致两地在十一月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失守。袁随即按兵不动，停止进攻武昌。这明显是留下一着棋，以便与北京的满人亲贵讨价还价时取得更多让步。

因此，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举行正式会议，于十二月二日通过决议：如若袁反正到革命阵营，即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这个决议，也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的另一会议再获认可，并向袁传达。

其时袁已派遣个人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谈判停战。上述的决议，有助于唐的活动。十二月十八日，唐奉命到上海，和革命当局的代表伍廷芳谈判和平与统一。

孙文抵达上海，其后又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耽搁了和袁的谈判。而袁总理大臣如果得不到总统宝座，则对革命党人决不让步。

孙文起初也同样执着，坚持建国三阶段的原定程序，即军政、训政和宪政。他不能忍受把总统的职位交给一个官僚军阀。但不久他就发现自己无法不向现实低头。高层同志大多数选择和平而非战争，同盟会在胜利后也四分五裂。武汉已独自和袁谈和，南京的革命武力又完全无用。欠饷的士兵也可能发生譁变。新政府的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警告说，如上海的和谈不能达成协议，他就要自杀以谢国人。参议院取消向俄国或日本借款的谈判，南京的政府失去了获得财政援助的唯一希望。

这个时候，连胡汉民和汪精卫也不惜代价谋求和平。汪刚在北京出狱，备受初上任的袁总理大臣优待，甚至命儿子和汪结拜。此后汪即成为孙文和袁世凯间的重要桥梁，他的意见和判断为双方所尊重。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也竭力说服顽固的临时大总统，劝他把建国三阶段忘掉。

孙最终让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正式宣佈，倘若袁协助废黜清帝，并誓言支持共和，他将提名袁为继任者。一待袁通过驻华外国使团照会孙文，说明清帝已经退位，孙即提出辞职。

四日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四十七位将领，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因此，小皇帝溥仪在二月十二日下退位诏，终结了中国三千余年的帝制。民国政府承诺，提供皇室岁用四百万银元，并允许废帝留居故宫，不受干扰，享受外国君主的待遇。

次日，清朝总理大臣就上述事项正式通知孙大总统。孙即时辞职，并向参议院提名袁世凯为继任人。参议院随即一致选举袁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3

虽然参议院投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党人控制的立法机构，却不情愿赋予袁世凯与孙文同样的行政权。它想要限制新任临时大总统的权力。第一步是定都南京，派代表前往北京请总统当选人移驾南下，但遭袁拒绝。一连串北洋军譁变，洗劫数以千计的北京无辜民居及北方其他城镇，更加强了袁的决心。最后参议院退让，允许袁在北京宣誓就职。

这时参议院投票废弃旧有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採用新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在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通过，由即将离职的总统孙文于三月十一日签署生效。（註3）採用新法的唯一目的，显然是为了限制即将到任总统的行政权。旧大纲和新约法引人注目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美国模式为蓝本的总统制，而后者是法国模式的责任内阁制，由内阁总理而非总统使用行政权。

在《临时约法》下，中央政府分为行政（总统及其内阁）、立法（参议院）和独立的司法等三部门。新法又规定，在《临时约法》生效后十个月内，临时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及组织国会。

其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新约法下的首任内阁总理，由参议院通过。唐是南北和谈时袁派遣的代表，在被提名为总理时加入同盟会。他的内阁也是各派系的大联盟。

孙文在四月一日离职。四月五日，参议院议决把政府移往北京，中国再度统一。帝王一去不復返了，但议会政府的新体制还有待考验。

4

中国的政治人物一开始接触到议会政府，就学习如何组织政党。南京的民国政府建立后不久，一群群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甚至前清政府的官员，开始分化为有如现代民主国家政党的政治社团。政府迁往北京后，大多数原来是前清官僚的北方政客也来参加这个游戏。

最初的政党都是从同盟会重组和分解产生的。武昌起义后不久，同盟会就把总部从东京移到上海，再到南京，最后到北京。它从祕密的革命团体转化为政党，有效地控制着在南京和北京的参议院。

长期以来，同盟会就是一个包含各路革命分子的联盟，为排满的共同目标结合在一起。满清垮台后，团结同盟会的力量和目的也随之消逝。不同政治观点和派系的会员现在分裂为许多个小集团。

孙文就职后不久，章炳麟领导的光復会和孙武、刘成禺及其他湖北名流领导的共进会从母会分裂出来，组成两个独立的团体。二者开始和立宪派的着名领袖汤化龙、林长民、张謇等人合作。程德全等许多前清的汉人官员也加入。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这两个团体更合而为一，重组成一个强大的新党—共和党，并推举黎元洪为首任理事长。在参议院内，这个新党与多数党同盟会对立。它甚至与总统袁世凯一起，谴责同盟会及其声名显赫的领袖孙文、黄兴和宋教仁。

共和党成立后没多久，一小群不满的成员随即脱离，另组统一党。

在其他兄弟党派发展的同时，同盟会也正经歷急剧的内在变化。孙文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在渴望掌握权力的会员中不受欢迎，而黄兴的性格又不是个政客，同盟会的领导权就落到宋教仁的身上。宋建议同盟会按照现代政党的路线重组，赢取席位，在未来的国会中成为多数党。

宋教仁原籍湖南，一九一二年才三十一岁，却是个有学养和能力的政治家，精明而具大材，是中央政府责任内阁制的主要支持者。甚至在孙文归国前，他就支持黄兴作总统，并自荐为总理。由于宋的推动，同盟会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成功改组为国民党。虽然孙文被推举为理事长，但代理事长宋教仁才是国民党真正的领袖。

这个新党乍看只是同盟会的延续，然而从成员来看，新、旧两党截然不同。新「政」党的领导层全由老「革命」党知名的稳健派组成。他们深信议会政府，喜爱政党政治，支持袁世凯而非孙文为大总统。从前由孙文领导，仍然理想上冀望实施同盟会之革命纲领的激进派，现在成了不起作用的少数。

宋教仁领导有方，国民党迅速扩展。许多由立宪派甚至旧官僚组织的小政党或团体亦为国民党吸收。这种新的招募方法，最初遭到同盟会元老竭力反对，但国民党不久在宋的影响下欣欣向荣，赢得了中国的第一届国会选举。

除了上述三个从同盟会发展出来的政党，第四个党—民主党—由梁启超领导的前维新派组成。梁于一九一二年十月从日本归国，及时组织了一个政党，参与一九一二年底的第一届国会选举。

一般来说，四个政党的宗旨并没有多大差异。例如，国民党的政纲包括下列五点：（一）促成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实行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这些也是其他各党的共同目标。事实上，在十二月中旬的选举，印发的政纲和竞选的演说都无关大局，而扎根于各省和地区谘议局的政党机器的活动才至关重要。因为不是普选，候选人都是在每个选区由一小撮地方政客提名选出的，是一个很容易就给有效率的政党机器把持的制度。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的选举，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是最有效率的机器，在众议院的五百九十六席中赢得二百六十九席，在参议院的二百七十四席中赢得一百二十三席，成了第一届国会的多数党。因此，这个新党在即将依《临时约法》规定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估绝对优势。

选举的结果引起没有自己的政党的临时大总统警惕，而国民党人则欢欣鼓舞。国民党正在兴高采烈地准备组织内阁，袁也立即寻求对策。总的来说，他的策略分为两类：一方面开始安排国会的三个少数党合併成一个大党，在席位上超过国民党；另一方面，又策划使用政治压力、个人威胁、收买、甚至暗杀等手段来分化国民党。

应该指出，除了少数的革命元老，国会的国民党党员多数只是投机政客，他们入党的主要目的是在国会中估一席位。一旦选上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党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量。另一方面，正着眼于未来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是国民党当时唯一有力量而能团结全党的领袖。如果没有他，国民党就四分五裂。也许是这个原因，促使袁世凯採取最卑鄙的政治手段，来剷除政府内的敌人。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的火车站被刺杀。其实宋在激进的国民党中，是大多数稳健和拥袁人士的领导人。

宋教仁去世后，一如袁所期望的，国会的国民党党员立即分裂为几个团体。许多以前曾在同盟会担任主要职位的党员，如刘揆一、孙毓筠、刘公，现在纷纷离开国民党。造成分裂的部分原因是领导人之间的争执及意识形态各异，部分是由于袁的离间操弄。据说袁作出承诺，对拥护他并离开国民党的团体给予大笔津贴，光是孙毓筠领导的六十个政客组成的小团体就拿到五十万元。许多在国会的国民党人因此倒向总统的一边，另一些人则愤怒地离开北京，前往华南作为抗议，但他们的离开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在国会的投票力量。

此时袁为确保胜过国民党，将三个小党合併成一个对抗国民党的大党，称为进步党，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副总统

黎元洪当选为这个新党的理事长，许多改良派、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例如梁启超、张謇、汤化龙、孙武等，都担任理事。虽然新党的组织欠佳，却有足够的力量在国会为总统取得压倒国民党的票数，在两党的国会中成为多数党。政党实力在国会的消长，使临时大总统能採取更有效的步骤来瓦解孙文领导的国民党对手。

6

孙文在一九一二年四月辞卸临时大总统后，宣佈要在以后的十年致力于修筑十万英里铁路的计划。新任临时大总统邀请他到北京，委以全国铁路总监一职。孙在中国各地视察数月，于一九一三年二月中旬到了日本。宋教仁被刺后不久，他赶回上海，重掌国民党的领导权。

在孙文的带领下，国民党人在上海召开一连串冗长而无结果的会议。以黄兴为首的稳健派主张用法律手段来对付袁，孙文和陈其美领导的激进派坚持用武力与独裁的总统摊牌。

这时袁大总统下了决心，要一举消灭他的国民党对手。一九一三年四月下旬，袁世凯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註4），国民党在国会投票反对，但进步党的贊成票多于国民党。国民党失败后进行反击，由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和湖南都督谭延闿联名通电反对总统滥权。袁大总统的回答是在六月将李、柏、胡三人免职。

袁世凯对三位都督的断然行动，给国民党内激进派提供了所需的弹药，使稳健派对手闭上嘴巴。由此，国民党决定发动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的北京政府。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拒绝总统的免职令，起兵讨袁。安徽、广东、湖南、福建、江苏各省的国民党都督和将领相继响应，但不久就被袁世凯的优势兵力一一击败。随后，袁下令逮捕孙文和二次革命的所有带头者。十一月上旬，正式宣佈国民党为非法组织，把三百五十多名国民党籍议员逐出国会。

这样就结束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政府为袁世凯一人独佔；国民党的领袖有如在满清时的革命低潮期，被迫流亡日本，再次成为政治难民。为解放中国付出的一切战斗和勇气、计划和努力，似乎都化为泡影。

註释

註1：译者按：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成立五个部，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修订为九个部。

註2：译者按：根据国史馆档案，王宠惠是外交总长，伍廷芳是司法总长兼议和全权大使。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页四二八。

註3：根据袁和孙的协议，孙在袁完全接收行政部门后离职，中间有短暂的行政交叠期。

註4：译者按：史称「善后大借款」。袁世凯为消灭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势力，积极筹措军费，遂以处理善后为名，指派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商谈借款。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未经国会批准，非法签署《善后借款合同》二十一款，借款总额二千五百万英镑，年息五厘，八四实交；以盐税、关税及直隶、河南、山东、江苏四省中央税为担保，分四十七年还清，本利共计六千七百八十九万三千五百九十七英镑。合同还规定借款须指定用途，中国须聘用外国人协助徵收存储盐务收入。

【第6章】

权宜专制还是世袭独裁？

1

二次革命的夭折立刻带来两个后果。第一，国民党的领导权从稳健派转移到激进派。这样一来，作为民主政党的国民党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称为中华革命党的寡头革命政党。现代专制主义就是从这个源头引入中华民国。

第二，袁世凯迅速镇压了国民党人，使他觉得无须再与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合作。进步党长期以来的梦想，是改变袁大总统和他的官僚体制，从而把立宪政治引入中国；但一旦国会的国民党同仁离开，进步党就失去了与袁讨价还价的本钱。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袁世凯称帝。这两个后果都使得共和主义与议会制度在中国注定要失败。

二次革命流产后，孙文和二次革命的所有带头者逃到日本，国民党内的激进分子开始走向专制主义。悲观沮丧情绪笼罩全党，尤以稳健派为甚。稳健派不仅对袁愤怒，也不同情曾经主张不顾一切起事的同志。许多人公开宣称十年内不再谈革命。

在悲观沮丧日益蔓延的同时，孙文和陈其美带领的一小批激进派产生了铤而走险的想法。孙文对党内的近期发展一直就感到失望。他埋怨在南京的时候，同志们虽然把他推上总统的大位，却当他是个傀儡，从来不听他的意见。在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反对他起兵抗袁的计划，到后来转而赞成，为时已晚。

再度流亡日本后，孙文开始萌生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独裁者的想法。他要求追随者绝对的、盲目的服从。他的专制主义得到以陈其美为首的一群党内上层领导人支持，国民党于是变成了中华革命党。

这个新党公佈的宗旨，是「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註1）根据党章，将党员分为三等：在反袁革命爆发前即已加入的党员是首义党员，称为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在反袁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成立前加入的是协助党员，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在革命政府成立后加入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只有选举权利。

党章亦强调孙文的三阶段革命进程，即军政、训政和宪政。只有在

最后的宪政阶段，非党员的公民才享有和党员同等的政治权利。

这个党章反映出激进党员对辛亥革命后惨痛经验的不满情绪，当时包括前清反动官僚在内的诸色人等全加入了国民党，霸佔了新政府的高位，而许多老革命党人却遭到排挤。在孙文身旁的国民党激进派不知道列宁是用「不断清洗」的方法来保持党的「净化」，就弄出一个党员等级制以达到相同目的。

为了仔细挑选新党员，党章更规定，所有想加入的人依照下面的誓词，对孙文宣誓效忠：

誓约

立誓人　　　　　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目的，并创设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操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祕密

（五）誓共死生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想加入的人须亲笔抄写誓词，并在签名下打指模。孙文也同样要宣誓，只是誓词的「附从孙先生」改为「统率同志」，第（二）项「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

新党的组织大纲规定孙文为总理，其下有协理一人。党的工作由总务、党务、财政、军务、政治五部执行，每部内又设五或六个局；另有一协贊会，下分为立法、司法、监督、考试四院。

这个组织大纲事实上是个一党专政政府的蓝图，五个部指挥着党的运作，协贊会象徵政府的功能。党和政府两者都在总理及其协理的绝对控制下。

这个新党和它的前身—国民党与同盟会有基本的不同。同盟会採取

民主的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制衡机制。国民党主要以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为榜样。而中华革命党是独裁或寡头的政党，只执行一个人的意志。

中华革命党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诞生，不是以世上任何政治团体为榜样。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也是环境的产物，在许多方面和孙的中华革命党类似。但没有证据显示，孙文一九一四年改组国民党是受到西方先例的影响。

当新的改组在进行时，昔日国民党和同盟会的大多数元老，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和黄郛（註2）都觉得难以接受。他们拒绝宣誓「附从孙先生」，甚至认为打指模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为了赢得这些人的合作，有人建议改「附从孙先生」为「附从党的领袖」，但孙拒绝在党章或誓词作任何修改。他为自己辩护说：

>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
>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
>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
>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当孙文向异议者表示决不退让的态度时，在场观礼的居正记录下了上述四点，同时指出：「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毋动。」（註3）

孙文的说词，在任何现代独裁者的演说集中都很容易找到。但作为一个有学养的现代政治家，民主是孙的天性。他暂时使用有效率的独裁手段来达到民主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在五权宪法下的议会政府，不是因为他改变了信念，而是迫于走投无路的政治形势。

当然，孙很难预见到，革命力量一旦走上了极权主义的道路以后，就绝无可能顺利地改辕易辙而不被另一个革命毁灭，一如国民党后来的歷史所显示的那样。因此，孙文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五年逝世为止，真正相信一个极权的革命力量，在巩固了对全国的控制后，轻易可以民主化。在上述演说四点中表露的高傲自大，清楚地反映他对达到民权主义之最终目标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民权主义就是民主，但必须通过一个极权主义的管道，这个管道就是他的训政时期。

然而孙文的理由和雄辩未能说服稳健派追随者；他们本身也对理论有认识，相信真正的民主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些人无意与孙争夺党的领导权，于是相继离开日本。到了六月下旬，原来希望他担任协理的黄兴去了美国；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黄郛等国民党不可或缺的军事将领去了东南亚和欧洲。其他人用拒绝入党作沉默的抗议。甚至孙的左右手汪精卫也拒绝参加新党，留在法国。

在主要的反对者离去后，孙文就可放手大干了。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孙自任总理，一百多位代表八个省分的创始党员，一如中华革命党党章所要求，宣誓入党。旧组织的一些老将，如陈其美、胡汉民和廖仲恺，把党籍从国民党转移到新党，分别形成浙江和广东两个地域集团；但大多数党员都是新人。八月二十三日，新党通告同志，党员不得擅自个别行动和自由表达政治见解。

新党成立，旧党自动解散。稳健派原是旧党的大多数，这时没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无可避免地分裂为许多小团体，各自东西。稳健派分散了，拥护孙文的激进派，人数、资源和经验都有限，不足以再举革命，显然他们无法在短期内发展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新党。

尽管如此，孙文开始派遣他手下寥寥可数的追随者回国，从事地下的反袁活动。但他们的行动，无非是一些不必要的暗杀和对公共设施微不足道的破坏。这些活动只能伤害他们在大众心目中的声誉，却无损于在北京的敌人。

绝望使他们铤而走险。有人怀疑，并有些证据显示，在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期间，孙文曾打算以中国主权作交易，让日本扩

张主义者在蒙古和东北享有特权，以交换日人支持他的反袁活动。

与孙的打算相反，在日本的国民党稳健派以公开信声援袁大总统，支持中国政府就「二十一条」与日本的任何谈判。他们表示，宁可做老死异国的政治流亡者，也不乘国难出卖中国主权。这一宣示明显是对激进同志的警告，因此进一步扩大了温和的国民党人和中华革命党间的鸿沟，使稳健派的多个团体靠向北京政府的进步党籍政治家，为他们后来在反帝制运动和一九一六年六月袁死后之反孙文运动的合作铺路。

后人很难评价那时国民党两个团体的行动和意识形态。虽然稳健派对民主原则的深刻信仰值得赞扬，但激进派的真诚和爱国心也同样毋庸置疑。激进派虽然高度重视民主理念，但认为这些理念遥远而不切实际，便提出了权宜之计。他们觉得孙文的三阶段理论既合理又实用。稳健派总是温和的，更积极的激进派渐渐取得革命领导权，他们选择了极权主义的办法而不是民主原则。

一九一四年七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于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及其指导思想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国民党转变为中华革命党在当时并未引人注目，但中国的革命因之从共和主义和代议政府的意识形态，转向专制主义和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孙文仍然是最高领袖，他的革命生涯现在迈入第三阶段，而随着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将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来接棒。

2

当孙文逐渐领着国民党人走向激进主义的时候，在北京簇拥着袁世凯的官僚体制正疾速逆行，筹划恢復君主制度。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想根据《临时约法》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只为了这个目的，他容忍国民党作为合法政党存在，直到他就职总统为止。袁在战讯中从不正式谴责孙文或国民党，只是简单地归罪于乱党和流氓。当保守的国民党北京本部在二次革命宣佈中立时，袁就让它自生自灭了。

根据《临时约法》，作为国民大会的国会，先得通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才选举总统。由于袁个人的压力和狡猾操纵，这个程序给倒转过来。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北京的国会选举中国第一任总统，由参、众两院的议员担任选举人。袁不能控制国会的选举人，他们可以自由投票，使袁在上午八时开始投票时深感不安。袁果然有先见之明，在头两

次投票中他并没有得到当选所需的票数，而黎元洪和孙文却获得不少选票。

在第二次投票开始后不久，袁的警察纠集了北京的乞丐和地痞包围国会大厦。暴民高举标语，自称「公民团」。他们声称是由所谓的公民党带领，有许多党员是国会的议员。这些「公民」高嗯拥护「公民的候选人」袁世凯。除非他们的候选人当选，否则不让投票者出外吃饭。到了晚上十时，袁终于取得所需的票数，因为多数的投票者已饿得非如此投票不可了。袁就这样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个选举产生的总统。次日，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袁就职后，开始计划一举粉碎国民党对手。十月十五日，当国会争吵不休的政客们还在辩论新宪法草案时，袁下令通缉「乱党首魁」孙文、黄兴及国民党其他领袖。二十日后，他下令撤销国会所有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国会因此不足法定人数，从而永远瘫痪。三週后，他又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当时不得民心的国民党人反对外，袁对共和体制的倒行逆施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抗议。事实上，袁即使没有立法机关，也可以统治全国。但他还是谨慎地徵求地方当局的意见，并请外国法律顾问—尤其是美国人古德诺博士（Dr. Frank J. Goodnow）和日本人有贺长雄教授—提出建议。古德诺因此于一九一三年底向袁呈上一份意义重大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影响了袁此后的政治操作，直到他去世。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Brooklyn, New York City）区，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古德诺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伊顿讲座教授（Eaton Professor），是美国的行政法主要专家。他受聘为袁大总统的宪法顾问，一九一三年春天前往北京，为新共和国起草一部永久宪法。古德诺教授的学问和国际知名度，使他在北京成为宪法问题的权威。

备忘录向袁大总统指出，西方和东方的政治传统不同。代议政府的制度是西方传统，而东方对人类政治发展的贡献，是一个集所有政府职能于朕一身的强有力君主或帝王的构想。虽然最近二百年的歷史证明，代议政体比其他政体更有效率和适合现代的情况，却不是非西方国家容易模仿得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代议政府条件不成熟，过早地採用这样的制度，可能引致像现时拉丁美洲那样的军人独裁。古德诺认为，军人独裁式的独裁政体是最恶劣的政体，远不如东方传统的世袭独裁政体。

再者，代议政府不一定要有普选。古德诺解释说：「英国原来的上议院就是由英皇个别召见的人组成的。换句话说，这个机构的成员是委任而不是选出来的。」根据这个理论，只有经过长时期的进化，议会制度才演进为由民选代表来表达各个经济和社会阶级的需要和意愿。

古德诺表示，就中国的现况来看，它是个农业社会，经济条件有如中古时期的英国而非现代的欧洲。因此，中国是在议会的基础还未奠定前就要建立共和。「如果情况是这样，」古德诺说，「大可假设昔日适合欧洲国情的事物，也适合今日的中国国情。」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要创建议会制度，最好成立像英国中世纪时那样的原始议会。

他随后对中国成立议会提出具体建议。应该只有一个院，由代表士绅、地主和商人三个阶层利益的成员组成。代表的选举，除了小部分由各省谘议局选出外，大多数国家立法机关的成员应由总统及地区首长委派。总统有权解散立法机关；解散后，除了总统委派的成员，其他所有成员的任期即告终止。

古德诺的建议正好符合袁的需要。袁世凯显然受到他的美籍宪法顾问影响，在一九一三年底组织了一个为总统提供谘询的政治会议，其成员半由他本人和总理委任，半由地方当局推荐。不久，政治会议经过「审慎讨论」后，建议总统解散本已瘫痪的国会。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国会解散。

袁的下一步是依据古德诺的建议修改《临时约法》。援引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为范例，他在二月下令设立由学养丰富、歷练老成人士组成的「造法机关」，重订《临时约法》。这个机关亦称「约法会议」，负责起草新的《临时约法》，随后由政治会议通过，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由总统发佈，正式取代旧的《临时约法》。（註4）

根据袁大总统的说法，《新临时约法》是基于古德诺的理论，而以有贺长雄为主要起草人。在《新临时约法》下，行政权集于总统一身，他不必考虑政府任何其他部门的意愿，在共和国内可以为所欲为，有如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总统有权缔结条约，但变更领土或增加人民负担之条款，须经立法院同意。这一条是为了总统的利益而设，并不是用来限制他的权力，因为在人民反对的时候，有立法院来分担责任。

总统下设国务卿一人及政事堂，协助处理事务。政事堂成员由总统委派，只不过是总统的僕人而已。立法机关限定只有一个院，叫做立法院，权力极为有限，召集、开会、休会和闭会全由总统决定；总统也有

权否决立法院通过的任何法案。

《新临时约法》又授权总统恢復古代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授予有功勋的公民。古代的皇家仪式，包括祭拜天地和祀孔，也依法恢復，每年由总统率领文武百官，穿着色彩斑斓的古服，到从前的皇家坛庙举行。

《新临时约法》实施三个月后，新的《大总统选举法》公佈，取代旧法。它将总统的任期由五年延至十年，而且可以无限期连选连任。如若立法院认为连任为政治所必需，不用正式选举就可自动连任。

再者，现任总统不用提名就自动成为下任的候选人，并有提名其他总统候选人的特权。提名的程序是：「推荐有被选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储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石室尊藏之。」（註5）候选人的名字到举行选举前才揭晓。现任总统的后裔理所当然地有被推荐的资格。

《新临时约法》一经颁佈，袁即废除内阁，代之以委任的国务卿。到了一九一四年五月末，参政院依新法律组成。袁懒得费心去建立一个新国会，下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

在所有新法律颁佈后，中华民国一如古代的罗马共和国，只剩下共和的虚名。袁事实上自立为凯撒（Caesar）。

3

正如创立中华革命党使孙文与他的稳健派追随者各行其是，袁世凯的独裁措施也吓跑了和他合作的、具有理想的进步党人。国民党解体后，进步党人在北京大有可为，成为开明政治家和有经验的行政官员。他们梦想着和袁合作，带领中国政府回到立宪政治。这个梦想在一九一三年九月部分实现了，进步党领袖熊希龄受命为内阁总理，并应袁大总统要求，组成了后来被誉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的进步党内阁，梁启超是阁员之一。

进步党人顺从大总统的主意，甚至为袁的大多数反动命令连署，例如解散国会和省议会；但当袁提出新的《临时约法》时，进步党的领袖开始意识到袁的意图是一人专制。他们与袁争辩，熊在一九一四年二月中旬辞去总理职务。此后，进步党的领袖在极端失望之余，开始脱离袁派，并与前国民党的温和分子合力反袁。他们离开北京，政府任由首都

最保守的政客摆佈，这些政客在一九一五年初开始策划恢復帝制。

帝制的主要推动者是大总统的长子袁克定。克定有野心和才干，常自况为助父创建唐朝（六一八～九○七）、后来又成为太宗皇帝的李世民。克定在德国留学时，跟德国的皇太子是好友，对于德国的秩序和纪律，以及皇帝和王储的威望，印象深刻。他为一群主张帝制的政客包围，成了这个新运动的中心。

在袁氏家族之外，最热中恢復帝制的是湖南籍的参政院参政杨度。杨度是黄兴的同窗好友，在东京同一所学院就读。杨聪明博学，长久以来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杨度说：「故自此而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而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註6）现在正是他把信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再者，杨也颇有野心，梦想成为新中华帝国的第一任宰相。

一九一五年初，袁克定和杨度二人合作，试图说服梁启超加入他们的运动，为梁所拒。由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运动一开始也受到挫折。中日交涉在五月结束后，杨度加紧进行。已返美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长的古德诺教授七月中旬再度来华，仍为袁大总统的宪法顾问。

应袁要求，古德诺在八月完成另一份重要的备忘录，陈述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之优劣，尤其谈到中国国情。古德诺在这份备忘录中，用很大篇幅评述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共和制度。至于中国，他认为既然已经尝试共和制度而且失败了，最好是由一个受民众爱戴的天潢贵胄，挺身而出为国服务。中国目前还没有解决总统的继承问题，接踵而来的危机可能威胁它的独立。因此，他毫不怀疑「君主制度比共和制度更适合中国」。（註7）但他强调在中国改变现有的政体前，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不为国民或列强反对；适当解决将来的继承问题；保证将来实行宪政。

古德诺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中译本给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大量分发，一个叫做筹安会的新社团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名义上是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为恢復帝制大肆宣传，引用古德诺之说来鼓吹帝制运动。筹安会在一份全国性宣言中表示：

> 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

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着，故乃亦谓中美情殊，而不可强为移植。（註8）

古德诺为备忘录被滥用而恼怒，却又不能置身于帝制运动之外。

筹安会因此声势大振，带头的是所谓的「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严復、刘师培、胡瑛、李燮和六人。他们每一人都在肇造共和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孙、刘、胡曾是老同盟会的活跃分子，孙和胡还险些在满清的监狱里送命，刘是着名学者和《民报》的撰稿人。严復及李燮和属于以前的光復会。严是举国知名的文人和开明政治家；李也有光荣的革命歷史。虽然六君子对袁即位为新君的信心各不相同，但他们之中再没有人主张共和了。

筹安会从北京到各省迅速发展，同各省的军人都督和文官大多数有了联繫，很快就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吆吁总统登基的陈情书和请愿书如雪片飞来。九月，参政院审议恢復帝制问题，接着吆吁召开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是否要从共和转为君主。国民会议议员的选举在十一月中旬完成，于十二月初投票表决。一千九百九十三名投票者以全票通过变更国体。参政院引述压倒性的民意，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全中国人民的名义敦请总统登基。

在帝制运动开始时，袁世凯并不是那样热中于自立为帝，但是由于家族里的迷信而越陷越深。据说袁家几代以来，没有男子能活过五十八岁。袁那时是五十七岁，家族、朋友和下属，担心他没有为他们的未来作好安排就死去。他们纷纷向迷信的总统进言，说登极庆典必然有上天赐福，帮助新皇帝越过他五十八岁的生死大关。又有人说在袁府看到歷来象徵皇帝的金龙出现，袁对此深信不疑。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呈上推戴书，请袁登大位，次日就获得「皇帝陛下」的迅速批准。

人们着手筹备登基大典以及新皇帝所需的龙袍、御座等各式物品。新王朝称为中华帝国，改元洪宪。一九一六年称为洪宪元年，不再是民国五年。

4

这样，经过四年的不断摸索，中国的民主实验以失败告终。分别由孙文和袁世凯领导的两股强大力量各走极端。孙派主张暂时性的极权主

义（或至少是专制主义），以期最后建立民主。袁派要推行永久的世袭独裁政体，宣称是为了推行宪政。尽管他们的观点南辕北辙，却都同意现存的共和制度不可行。

为什么共和制度在中国一开始如此顺利，后来却失败了？扼要回顾，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一九一五年后的政治发展，也可指出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类似的问题。

传统是主要的因素。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传统和西方完全不同。虽然一群受过现代教育和具有理想的人，的确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代议政体，但对旧秩序却不能作大幅度改变；旧秩序还是完全无法适应代议政体。这样，把一个新制度强加于一个没有改变的旧社会之上，就如安排一场花卉展，那无根的花朵总是要凋谢的。

再者，除了一小撮有高度学养、后来又因自己的现代思想受累的政治家，极少参与建立此一制度的政客明白共和主义的重要意义。袁世凯一度询问他的现代顾问，共和国的意义是什么。听到解释后，他怀疑这样一个制度，即使适合中国国情，是否优于帝制。尽管如此，在就任之初，袁似乎也愿意按照共和的规则办事，虽然他明显对这些规则不太了解。

袁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是个受西方教育的现代政治家，唐任职数月后，和袁二十年的友谊就为了是否符合宪法的争执而终结。作为责任内阁总理，唐任命了一位直隶都督，袁大总统拒不接受，又另派他人。（註9）唐指责总统行为违宪，袁则认为总统的权力高于总理。唐于是辞职，结束了现代中国首届和仅有的责任内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争执期间，舆论同情的是总统而不是总理，因为很少人明白遵守宪法的含义。依照中国的政治伦理，总理是下级，必须服从作为上级的总统的意愿。一个不因人而转移的法律制度，超出了中国人的理解范围，因为他们习惯了官大权大的传统。

人，尤其是有野心和才能的人，如果没有监督，必然滥用权力。人们很难希望像袁世凯这样蛊惑民心的政客会遵守宪政规则，特别是当舆论站在他那边的时候。这样，唐绍仪就为自己的现代思想所害，因为中国还未能接受这样的思想。

民国时期的政客，包括大多数以前的革命党人，和袁一样没有做好管理代议政府的准备。几千年来，中国为一职业官僚体制所统治，官员

主要来自士大夫阶层。传统上，中国的读书人一般而言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不习惯团队合作，更不要说政党政治了。「党」在传统的儒学中是个贬词。中国的君子认为服从上级是一种美德，也一定会谴责那些为政治目的而结党的人。因此，在不曾改变的中国社会突然採用共和制度，甚至连传统的政治道德规范也破坏了。

由于不适应现代观念，民国政客极少能够摆脱官僚陋习。许多人在晚清时期是狂热的革命党人，到了民国时期成为另一群官僚，全然被辛亥革命后残存的数百年官僚体制同化了。例如，在革命后的浙江省，都督朱瑞—原来是功勋赫赫的革命党人—每次陪同妻子观剧，总是有十几个贵妇簇拥前往，路人为之侧目。四川和云南都督们的排场较朱尤甚，各省新贵实际上与他们在满清政权的前辈一样腐败，甚或过之。

中央政府的情况亦同样严重。从前朝延续下来的旧官僚，甚至有三分之一曾在日本受教育的新国会议员，也变成了一群可耻可憎的官僚。他们毫不关心自己的选民，组织政党的动机不是为了选民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因此，一人同时加入几个宗旨相悖的政党，稀松平常。这些政客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个人利益，以及永久多变的政见和决定。他们绝不代表人民，而且行事一如旧日中央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员。

这些人私生活腐败，许多人沉迷于鸦片和嫖赌，政治行为愈来愈堕落。在清代，政府高官的私人日常生活，经常受到监察御史的监督，现在旧有的监察制度荡然无存，因而新官僚为非作歹变得肆无忌惮。国会里的选票可以买卖，在这个分赃制度中，当官者成了求官者的经纪人。

国会的政客年薪六千元，却对公事漠不关心。缺席频繁，常使国会会议达不到法定出席人数。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曾批评说，二十多天选不出议长，过了一百多天才能制定国会议事规则。此外，政治上的操作往往根据个人的好恶而不是政治的需要。一个议员如果敌视政府或另一政党，政府的任何提案，不管好坏，都会阻止通过。在唇枪舌剑时，恼怒的议员会毫不犹豫挥拳相向，还有人使用桌上的墨砚。因为石砚可能砸破脑袋，所有国会大楼中的砚台都给钉死在桌上。

总而言之，国会不是政府正常运作的部门，无能的议员也无法使国会正常运作。民众因此认为他们不比昔日清廷的官僚好多少。虽然名义是代议政府，共和制度却让更多官僚有更多机会插手人事任命和国家税收的支出，情况更甚于清朝。因此许多老实的百姓支持恢復帝制。

註释

註1：译者按：引文取自《中华革命党宣言》。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五辑（台北，一九五五年），页一。

註2：陈炯明曾为广东都督，黄郛是陈其美的前任总参谋长。

註3：译者按：以上誓词风波，见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革命文献》，第五辑，页八一～八三。

註4：译者按：约法会议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议决成立。新的《临时约法》一般称为《中华民国约法》。

註5：译者按：参看《袁氏当国》（远流出版公司，二○○二年），页一六九～一七○。

註6：译者按：引文取自杨度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向袁世凯进呈的〈君宪救国论〉上篇。见刘清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下册，页五六九。

註7：此文本是供袁个人参考，却为人在一中文报纸自行发表。经古德诺博士要求及袁大总统允许，英文原文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的《京报》（*Peking Daily News*）刊载。后来又重印于*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pp. 53-58，以及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中国公论西报》（*National Review*）。

註8：引文英译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p. 50。

译者按：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杨度等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全文刊登于《顺天时报》上。

註9：译者按：一九一二年三月，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衔命组阁。唐试图调和南北矛盾，经与南方革命党人协议后，推荐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起初允诺，后来又食言，六月，他以军界反对为由，仍用亲信张锡銮督直，改委王为南方军宣慰使。唐绍仪愤而辞职，远走上海，以示抗议。

【第7章】

从帝制到军阀割据

1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大总统正式接受「中国人民推戴书」，自立为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洪宪皇帝退还推戴书，中间刚好过了一百天。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事件，不仅是袁世凯的噩梦，也是上天的赏赐，让中国各股政治力量重新组成反帝制的联合战线，迫使皇帝退位，并左右了中国其后十年的政治发展。

从理论上说，古德诺教授的政治哲学认为，世袭独裁胜于非世袭独裁，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歷史并不总是按照人的意志前进。再者，立宪运动在中国的歷史，特别是康、梁领导的百日维新歷史，显示出君主立宪的思想，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说，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维新运动失败，不是由于皇帝是异族满人，而是部分由于败坏的传统官僚体制阻碍改革，部分由于中国民众对政治无知。君主立宪的思想已为共和主义的思想取代，连前一次君主立宪运动最坚决的领袖梁启超也转变立场了，杨度和古德诺再来尝试，当然为时已晚。

早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英国人经营的英文週刊《北华捷报》（*Northern China Herald*）在预测发展前景时敏锐地指出：「中国政府的共和制度已经失败了，但是不能只因为这个理由，就认为可以忽视导致尝试共和制度的力量。」正是「只因为这个理由」，形成了反帝制的联合战线，甚至号召到最保守的人士。

一九一五年底，拥护帝制的计划逐渐成熟，而反对者也在重整旗鼓，准备联合行动。一直在反袁运动最前线的国民党激进派，现在加强活动，陈其美回到上海亲自指挥。半退休的国民党稳健派也抓住这个机会重返政坛。在美国的黄兴和黄郛，在欧洲的李烈钧，在南洋的陈炯明，还有在日本由钮永建和李根源带领的其他人，全都活跃起来。他们一方面和国内反袁的进步党人联络，另一方面向日本的领袖寻求物质帮助。

不过，在这个反袁运动中，国民党人，尤其是孙文和陈其美领导的国民党激进派，在二次革命时几乎失去了所有国内的行动基地，所能做的极为有限。因此，进步党人就成为新的反帝制运动的先锋，他们不仅与国民党稳健派，而且与在北京政府的文武要员，都有紧密联繫。首先发难的是梁启超及其门人蔡锷。

一九一五年底，筹安会的活动才刚刚开始，梁出版了小册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示反对。梁在文章开头说，他曾是君主立宪的死硬派，但现在认为这样的体制不再符合中国国情。再者，现在也不是袁大总统作这样尝试的好时机。若他渴望称帝，首先必须为国家建立丰功伟绩，例如在对外战争中获得大胜。只有如此才可树立个人威望，够资格坐上皇帝大位。与此相反，袁刚结束了和日本解决「二十一条」的谈判，令全国蒙羞。梁因此宣称，他誓死反对帝制运动。

蔡锷响应梁的号召，开始祕密接触在日本的国民党稳健派和云南旧部的将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初，蔡乔装离开北京，绕道日本返回昆明。在昆明，他联合都督唐继尧及当地军队的指挥官共同行动，让云南省脱离北京政府。

蔡锷原籍湖南，是个三十四岁的军人，在家乡读书时曾是梁启超的学生。一九○○年代初期，蔡留学日本，和已成名的昔日恩师重聚，成了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其后在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

一九一三年底，蔡被袁调到北京，明升暗降，挂上总统军事顾问的虚衔。然而他留下的滇军，沿袭效忠个人的东方传统，仍对他忠心耿耿。云南地处偏远，袁鞭长莫及，因而成为首倡反帝制运动的一个独特基地。

与此同时，一直和云南地方部队及华南各省都督具有渊源的前国民党稳健派李烈钧、李根源、陈炯明和钮永建诸将军，都从海外归国，和蔡锷联手组织护国军。护国军分为三个军，分别由蔡锷、李烈钧和唐继尧担任总司令。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位总司令正式通电全国，谴责袁为背叛民国的罪人，吆吁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倒袁。一九一六年初，三个军分三路进入四川、贵州和广西，这标志着云南起义，开始了反帝制的内战。

虽然护国军的人数不多，袁却无法镇压，因为现在全国都不齿他的所作所为。在宫廷内，副总统黎元洪与国务卿徐世昌公开反对袁的政策，拒绝执行政务。最重要的是，实际指挥无敌北洋军的将领，由段祺瑞和冯国璋带头，也声称要维护共和；他们的窝里反，事实上瘫痪了袁对抗护国军的军事行动。再者，云南义旗一举，各省随即纷纷响应，正如辛亥武昌起义后一样。贵州和广西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带头响应，其余的省分亦紧随其后。

除了国内的反对，国外对袁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由于害怕中国内战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有利，日本、英国、俄国、法国和义大利纷纷警告北京政府，反对恢復帝制，由此毁灭了帝制派的最后希望。

绝望之余，帝制派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下旬忍痛撤退。新皇帝于三月二十二日将「人民推戴书」退还参政院。同时袁宣佈重新支持共和。

虽然帝制运动给正式宣佈取消了，南方的反对者却不就此罢休，要求袁永远退休，理由是袁背叛民国政府，丧失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合法地位。因此总统职位，已自动转移给副总统黎元洪。袁拒不退让，反对者因而也加强行动。

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护国军得到两广响应，于广东省西部的肇庆建立都司令部，选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

一週后，护国军在肇庆成立了称为军务院的军政府，号称临时国民政府，选出云南都督唐继尧为抚军长。军政府自称具有合法性，因为法定的总统黎元洪被软禁在北京，只能由肇庆的军政府代黎执政。新政府成立后不久，由袁最信任的将领管辖的四川和湖南两省宣佈独立，要求袁辞职。护国军全军北上，迫袁退位。

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退位的袁世凯，恼怒交加，加上劳累过度，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昏倒，继而逝世。他家族的迷信应验了，他没有活到五十八岁。

2

袁世凯之死，终结了中国现代史上世袭独裁的一章，却打开了军阀割据的苦难另一章。在命途多舛的帝制运动以前，袁被认为是维持国家完整不可缺少的领袖。他是庞大的北洋军的总司令，这个军事系统只对他效忠。他是传统官僚体制的龙头，只有他能够使这体制的运作稍具效率。因此，如果军阀的定义是指一个将领，带领着唯命是从的军队，只要他本人不同意，就不能和平地依法撤除他的职位，那么在袁世凯当国的时候，除了袁本人，的确没有几个军阀。但袁世凯不仅仅是个军阀，他还是个军事独裁者。

袁死后没有继承人，这也许是非世袭独裁最坏的一面，使得庞大的军事系统和官僚体制四分五裂。此后十年，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争斗不休，横行全国。虽然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几个比较强大的军阀觊觎的目

标，但它只是个有名无实的招牌。

实际的权力全由军阀们掌握。军阀可粗略分为北洋、地方和流动三类。北洋军阀由着名的北洋军的司令官组成；北洋军原来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训练的军队，直隶总督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间，又称为北洋大臣，故名。北洋军从精锐的六镇开始，指挥官主要来自袁模仿德国设立的现代军事学校。袁极少任用从日本受训归国的士官生，所以北洋军就没有被革命党人渗透。这支既精锐又无革命党的军队，把袁世凯送上第一任总统和独裁者的宝座。民国初期，北洋军从原有六镇迅速扩张，在袁死时人数已超过五十万，是全国最大、装备最精、训练最优的军队。

尽管北洋军是一支现代部队，但它不是国家的而是私人的军队，只效忠袁大总统一人。袁死后，北洋军分裂为两个互相竞争的集团，皖系（或安福系）和直系。具有不同地域背景的指挥官则形成许多中间的、半独立的派系。皖系由段祺瑞带领，他原籍安徽，曾是袁的参谋长和代总理。直系由冯国璋和曹锟指挥，两者都是直隶人，后来又加入山东籍的吴佩孚。北洋军阀的这两个派系轮流控制着北京政府，直到最后垮台。他们控制的地盘从整个华北平原一直到长江北岸。

如若北洋军齐心协力，它可以平息任何地区性的叛乱，保持全国政治统一。但是如果分裂，就不可避免地助长地方军阀割据。

第二类（或地方）军阀数目众多，可以大致分为南北两个集团。东北张作霖大帅旗下的奉系在北方集团中最强大。英俊的张作霖原是东北马贼的头目，清末时向地方政府投诚，变成了军官。他精明能干，一路高升，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时是个师长。在帝制运动的初期，他对即将称帝的袁表示效忠，因而在东北的同僚中佔据比较有利的位子，也实际帮助他在袁死后抢到更多的权力，成了真正的东北王。

张辖下着名的东北军，后来人数超过二十万，在东北从未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即使张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为日人炸死后，由儿子少帅张学良继位，仍然如此。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被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到华北。张学良统率这支军队，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西安劫持蒋介石，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铺平道路。这是后话，暂且不表，现在先来说一下袁世凯死后十年的事情。

山西都督阎锡山和他的晋军是华北另一个地方军阀。阎原籍山西，在辛亥革命时夺得都督职位。阎是个极为精明的政客，也善于行政和带兵，能够安然度过全国和地区的所有危机，担任山西省长的职位近四十

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为中共赶走。

中国的西北由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省和内蒙古的一部分组成，统治者都是类似张作霖和阎锡山的地方军阀，但统治时间不像张、阎那样长。他们都只是名义上服从北京的中央政府。

长江以南的地方军阀集团中，最强大的是由两广巡阅使陆荣廷领导的桂系。和张作霖大帅一样，陆大帅原来也是个草莽英雄，在中国和法属安南边界打家劫舍多年，晚清期间接受招安，由清军收编，累迁为广西提督，辛亥革命后就成了广西都督。在一九一六年反帝制运动的末期，陆又把地盘扩张到广东。他在南方沿海地区独掌大权，直到一九二○年在广东受挫于陈炯明，一九二四年在广西再败给桂系后辈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李、黄、白其时已归附孙文领导的国民革命。

云南省为另一地方军阀唐继尧统治。唐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一三年继蔡锷任云南都督。一九一六年，他被选为肇庆的军政府抚军长，声望达到了顶峰。唐统治云南直到他一九二七年去世为止，死因没有公佈。继任者是前滇军司令官、云南边区彝族人龙云。龙直接控制云南省到一九四五年，之后又间接左右省务，直到一九四九年该省为共军佔领。

四川是一伙小军阀的战场，直到一九二○年代中期才为刘湘带领的几个军阀吞併。刘原籍四川，统治他的家乡到一九三八年，那年他到汉口参加中央政府的军事会议时离奇去世。

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和福建的统治者更迭频繁，他们同中央政府及其他军阀的关系，全以个人的和政治的利益为依归。到了一九二○年代末期才归附到国民党政权之下。

第三类（或流动）军阀和其他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固定的地盘，无法靠税收维持给养。虽然他们原本附属于某个派系或地方势力，由于各种原因，例如政见不同、经济冲突或个人争执，使他们与母体脱离，随处漂泊掠夺。在这类军阀中，最着名的是冯玉祥，他的军队原称为国民军，后来又称为西北军。冯原是直系下面的一个旅长，保持半独立状态多年，然后脱离直系自成一派。冯直到一九四八年去世前，我行我素，先后与段祺瑞、孙文、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军阀和势力集团联合。

孙殿英是另一个自由行动的北方军阀。孙原是个赌徒和黑社会老大，入伍后一路升到将军，最终成了流动军阀。孙的部队是一支职业佣

兵，由他率领着像流星一样横扫过中国。在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战争前，没有人能把孙消灭。

南方陈炯明的粤军也与北方的流动军阀类似。陈一九一六年回到粤东故乡，组织小股部队参加反帝制运动。通过孙文的协助，他在原籍广东省抓到二十个民兵营的指挥权。桂系「征服」广东后，情况对本地的指挥官不利。陈移师粤闽边区，往来流窜寻求给养。

指挥所谓滇军的范石生和杨希闵，指挥湘军的谭延闿和程潜，指挥川军的熊克武，以及其后指挥桂军的刘震寰，均属南部沿海地区的流动军阀，原来都是本省的地方部队。他们或因省内的争执，或因本省给养不足，移往比较富饶的广东觅食。广东人客气地称之为「客军」，他们无论到哪里都祸害当地民众。

军阀的性格，就像他们的背景一样，各异其趣。有留日的，也有留德的。有在本国的军事学校毕业的，有在前清获得文、武功名的，也有在现代中学、大学毕业的。有些人是老式的士绅出身，也有人纯粹从行伍中爬升。最后还有原来黑社会的头目，甚至土匪。他们管理地盘和训练部队的方法也因而各不相同。有现代意识的军阀，如阎锡山和谭延闿，企图在他们的地盘内建立现代政权。例如，阎锡山宣称要在二十年内把山西省建设成中国的小日本。谭延闿任湖南都督时，也取法西方，模仿美国的联邦制度制订了省自治政府的宪法。

保守的开基者如唐继尧和张作霖，在自己的地盘内甚至像皇帝一样。唐在日本受过现代教育，羡慕罗马的凯撒大帝，所以他的卫队都穿着古罗马式的铠甲，戴着银盔。在正式场合，三十来岁的唐继尧，身穿彩袍高坐台上的宝座，两旁排列数百名「罗马式」卫队，吹奏号角致敬。美丽的小城昆明成了没有大理石宫殿的罗马。

出身草莽的张作霖自嘲在「绿林大学」受教育。没有唐那样时髦，他的品味不是来自罗马歷史，而是来自京剧的舞台。在正式场合，张坐在大殿中央高台的虎皮交椅上接见访客，一如京剧台上的传统霸王。

许多军阀是职业军人，带兵颇为在行。「基督将军」冯玉祥治军甚严，每天凌晨三时即起，操练整日。他的军纪甚至不准抽烟。冯像古代暴君，有时和下属将领通电话，会打断话题大喝一声：「跪下！」在电话另一端的下属即遵命下跪，要等到冯记起再打电话收回成命，才敢站起来。

军纪过度严明的另一极端是军纪废弛，许多军阀的行为无异于武装

匪徒的头领。例如，孙殿英的大帐简直就是个流动的赌坊。孙本人是个赌博天才，个人的财富和军队的给养很多是靠赌博得来。他不时会邀请地盘内的大财主到总部玩几把。他决不耍老千，却常常使他的军队财源滚滚。

在落后的内陆地区的军阀，除了保持本色地抽大烟和娶姨太太，也大肆享受现代的奢侈生活。有时遇到在不能行车的道路，数百名赤足士兵抬着司令官的美国汽车前进，令乡下居民目瞪口呆。在四川省，有些将领以姨太太们生养数不清的儿女着称。滇军据说都是双「枪」兵，随身带一枝步枪一枝烟枪。总之，在独裁者袁世凯死后的十年，受到军阀割据蹂躏的中华民国几乎万劫不復。

概言之，中国军阀割据是各级政治体制分崩离析直接造成的现象，但助长它的因素有二：一是列强插手，企图浑水摸鱼，支持这个或那个头领；一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贫穷与无知。对许多穷人或无业的农民、工人、甚至知识分子来说，当兵是个好差事。只要有枪，士兵就可以比土匪更顺理成章、更彻底地抢劫人民，而且大元帅、将军、上校、乃至下士这些头衔，听起来要比小偷、强盗来得体面。

再者，军阀割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从孔子的年代以降，它几乎在每个王朝崩溃的时候一再出现。事实上，在朝代循环的末期，它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基本问题，把旧秩序彻底摧毁，使得新王朝能在新社会上建立新秩序。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局面与唐朝（六一八～九○七）末年尤其相似，当时藩镇通过传统的个人效忠和地方主义，在中国创建了十五个以上的王国，史称五代十国（九○七～九六○）。史官把邻近大唐故都的王国定为正统朝代，其余的则称为国。这些军阀互相混战五十三年，最后才被宋朝（九六○～一二七九）一统天下。

这种老戏又同样在现代的舞台演出。控制首都北京的北洋军阀，自命是国家的合法统治者，有人直接登上国家元首的大位，有人担任傀儡总统的摄政。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军阀只会想到控制自己的省分。但是，一有机会，他们也会结成联盟，挑战北京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不然就接受中央政府的委任，头衔因人、枪的多寡和地盘的大小而定。除了常用的督军头衔外，也为个别情况创造特殊的职位。有时管辖两个到几个省的大军阀被任命为巡阅使。不用说，一旦巡阅使战败或被敌人所杀，中央政府就会取消他的特别职位，随后视情况需要再创造另一职位。同样的，当一个地方军阀无法控制其部属时，会在地盘内创造新的职位，例如警备司令、镇守使、护军使等等，来配合各人的需要。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系统就这样土崩瓦解，演变成春秋战国的形势。一个地方

势力一旦崩溃，有时会在一省之内分裂出几百个小军阀，例如在四川发生的情况。

一般来说，在军阀时期之初，混乱的内战后紧随着一个分崩离析的模式：在最上面的头领分裂，在其下的从属军官背离。这个普遍的崩溃趋势，不久就为另一个重组和吸收的趋势取代。经过无数的战争和谈判，较小的队伍被合併或收编为较大的队伍，渐渐地统一了一个区域、省分，然后再取得更大块的地盘。

若以政治倾向来划分，北方的军阀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落后，特别是北洋军阀。不管他们的官衔如何，都只是一群官僚，公私生活摆脱不了根深柢固的老套。他们中没有几人接受过现代政治和行政工作的训练，因此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却不知如何运作。这就为进步党的政治家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活动环境。

南方的军阀刚刚在一九一六年结成反帝制联盟，以拥护共和为荣，从那次的经验学到以联合行动对抗北京政府。再者，因为地缘，他们传统上和革命党人及其后的国民党有关连。国民党拥有国会的多数席位，为南方军阀提供了法理的依据，使联合对抗北方具有合法性。因此，前国民党党员，无论激进派或稳健派，得以在南方政治中一展拳脚。

由于没有任何南方的军人真正拥有全国性领袖的声望，他们欢迎孙文，利用孙的声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孙对自己在联盟的职位过分认真，就把他踢开，或只把他视为合作者。他们对孙文的利用，也确实帮助了这位无权无势的领袖重新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一方面孙的法律地位允许他按照军阀的要求封官授职，增加他作为一个有力集团领袖在全国和国际的声誉。另一方面，他的声誉和法律地位又有助于筹款，好收买佣兵参加内战。佣兵现在多的是，来源有流动军阀，有海军，海军也成了在内河流动的新军阀。孙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和这些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接触。

有些忠诚的追随者提醒孙文，他所支持的流动军阀在欺骗他，他们只对他的钱有兴趣。孙回答说，如果百中有一是真诚的，这些钱就值得了。事实上，或出于东方的效忠心理，或仅仅是受孙文政治学说的影响，许多人只要能拿到经费，都愿意为孙作战。反之亦然，只要孙文能筹到经费，总是能找到为他作战的人，而孙文从开始就是个筹款专家。就这样，孙文在民国初期一直是无休止内战的主要参与者。

孙文参与的内战和政治冲突的十年军阀割据期间，是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最复杂和最难以说明的一个时期。要对这动乱的十年及其后革命的赓续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首先必须回顾从这段时期到孙文去世的歷史事实。这些事实可以分为六个时期，每一时期用一个关键性的日子作标记。

⑴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

第一个时期，在袁世凯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去世、副总统黎元洪就任总统时开始，全国名义上统一了十五个月。北京在短暂地辩论两个临时约法的合法性后，抛弃了袁的《新临时约法》，恢復旧有的《临时约法》和国会。这样中国再次名义上统一在一个政府下。

不过，几个月后又出现了危机。一九一七年二月，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威尔逊总统（Thomas Woodrow Wilson）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总理段祺瑞亟欲接受美国的邀请，但国会反对，双方请求总统解决。黎大总统对段心怀妒忌，偏袒国会，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免除段的总理职位。段总理却不是政府里一个可以随意依法免职的官员。段离职后不久，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华北七省宣告脱离中央政府，甚至催促退职的总理在天津组织新中央政府。

黎大总统深感震惊，请求安徽督军张勋出面调停。张是个仍然忠于逊清皇帝的守旧军人（他的军队还保留辫子），虽然答允总统的请求，却走上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首先，他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作为调解的先决条件。黎大总统没有办法，只好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二次解散国会，这是重演一九一四年一月的旧事。数日后，张勋率领几千辫子军进入北京，随即取消共和，重立满清的小皇帝溥仪为帝。

復辟震惊全国，也给予退职总理一个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七月十五日，段祺瑞带领两师人马重返北京，驱走张勋，辫子军全部缴械，溥仪第二次退位，民国政府也第二次在北京恢復。段重掌大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终结了黎大总统的政府。黎退休，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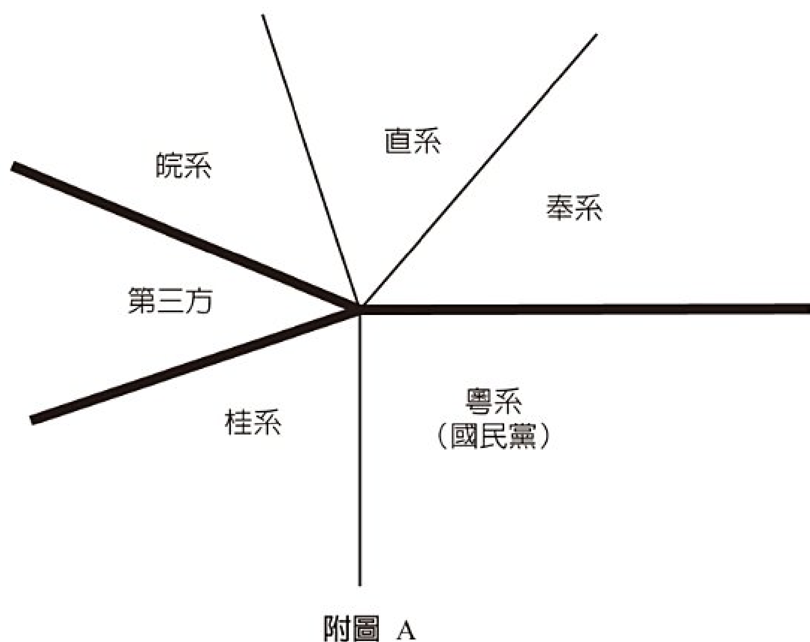
段继续在新政府任总理职，得到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支持，在八月十四日对德国宣战，但拒绝恢復旧国会，改而组织临时参议院，为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作准备。段宣称将颁佈新约法，同时以参加欧战为名向日本贷得巨款，实际上是要增强实力，推行所谓「武力统一」的新计划。

段的独裁行动使南方军阀藉此良机团结一致御段，因此吸引了在国会解散后失去议席的议员一百五十人，由政学会──前国民党稳健派在国会内组成的一个有分量的政治团体──带领到广州。与此同时，孙文也成功地说服了海军的一支舰队随他南下，参与新的反段运动。

他们都受到两广巡阅使兼桂系领袖陆荣廷的欢迎。以桂系为主导的南方流动军阀对孙文的到来都喜出望外。在孙和陆的领导下，南方的领袖立刻在广州组织政府，与北京政府对抗。（註1）为了使他们的新运动具有合法性，国会解散后失去席位的议员在广州开会。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合法地召开国会，因此称为非常国会。根据非常国会的所谓授权，一个军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并选举孙文为大元帅，领导新政府。

⑵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孙文正式就南方军政府大元帅职，开始了第二个为期十五个月的时期。于此期间，南北内战，各自宣称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在其他地区的第三方军阀则袖手旁观。南方称这个新内战为护法战争。（参看附图A）



附圖 A

内战开打后不久，南方的团结就开始恶化。孙文只有一些流动军阀和几艘海军砲艇支持，却高踞南方政府的领袖位子；桂系的军阀和非常国会中以政学会为首的政客都因此感到不快，联合起来把孙挤走。一九

一八年五月，他们投票取消大元帅制，代之以有七个总裁的总裁合议制，孙文降为只是七总裁之一，同时推举桂系的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文受到重大挫折后，不得不把南方政府让给桂系和政学会政客，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北方政府也发生类似的变化。冯国璋也如他的南方对手一样失去总统职位。冯国璋是接替黎元洪为总统，而黎则是继承袁世凯所遗职位。根据《临时约法》，第一任总统任期五年，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为止，在这个任期内已经有三个人担任过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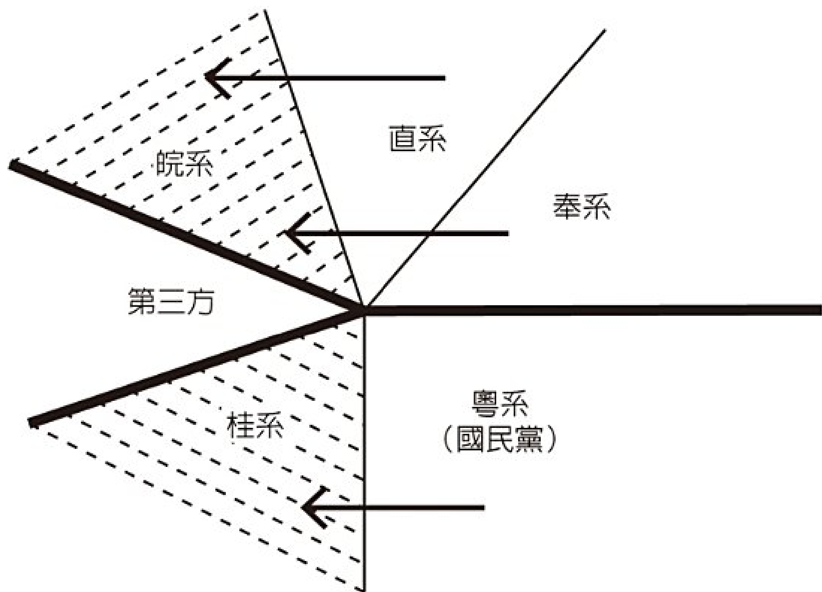
冯的任期将满，皖系和直系两个北洋集团内的竞争对手为提名继任者相持不下，野心勃勃的奉系在旁虎视眈眈，随时加入逐鹿。最后三方达成妥协，推举徐世昌为下任总统。徐是个与北洋和奉天两集团都有亲密关系的老政客，但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

⑶一九一九年一月

这些内部的斗争使南北内战僵持不下。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徐世昌总统就职，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一九一九年一月，议和会议在上海召开，正好与巴黎和会同时，也开始了第三个时期。于此期间，南北和平共存约一年半，直到两个内战分别在南北集团内部同时爆发为止。

⑷一九二○年夏

两个内战在一九二○年夏天同时开打，直皖战争在北，粤桂战争在南，构成第四个时期。（参看附图B）



附圖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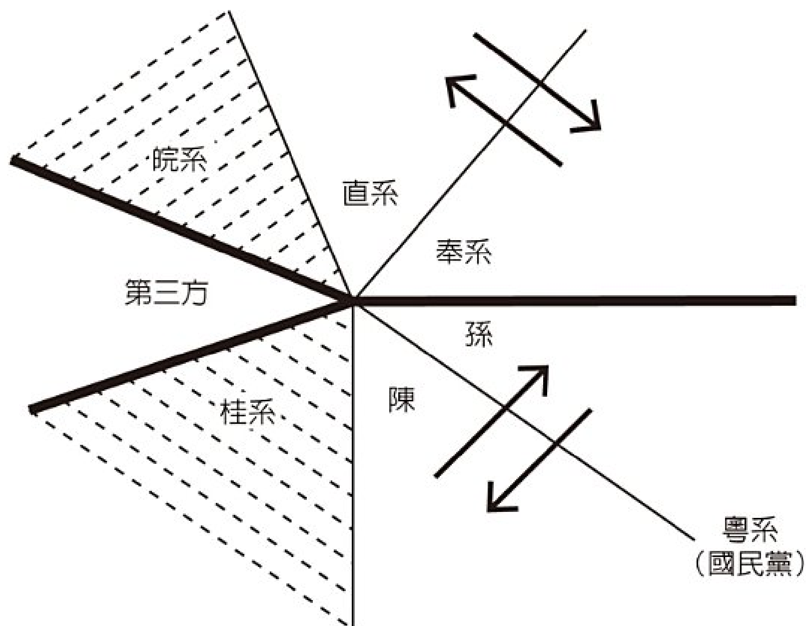
在一九二○年七月爆发的北方战争，皖、直、奉三个派系都参加了。最强大的皖系在一边，较弱的直、奉两系在另一边。战争只持续了几天，皖系彻底垮台，段祺瑞被迫退隐两年。皖系崩溃后，北京政府被战胜的直、奉两系共同控制，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两个伙伴之间又开始了新的战争。

南方战争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事实上是广东的流动军阀叛变，反抗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广东集团由驻扎本省东部的陈炯明领导，其时陈的部分军饷来自孙文，就打出孙文的旗号并以「粤人治粤」为号召。腐败的桂系无法应付当地人的挑战，在数週之内崩溃。一九二○年十一月，陈炯明和孙文以广东英雄的身分凯旋广州。

孙文在广州恢復非常国会，重建军政府。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孙文在非常国会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带领南方军政府。

⑸一九二二年四月

第五个时期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开始，另一同时爆发的两个内战打乱了南北两方的现状。（参看附图C）。史称北方的战争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它在四月爆发，只持续了几个月，没有一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直军总算成功地将奉军阻挡在长城以外，直系从而独自掌控北京的中央政府。



附圖 C

南方的战争由陈炯明和孙文两人之间的摩擦而引发。从一九二二年四月开始，冲突逐渐发展到六月十六日的广州兵变。是日，陈的部队突袭孙文在广州的总统府。孙文侥倖逃生，藏身砲舰上，他怀孕的妻子宋庆龄却在弹雨横飞的街头流产，此后这对名人夫妇就再无所出了。倔强的孙文虽有舰队的协助，仍无法收復广州，只好与夫人逃亡上海。

一九二三年初，在广东由外地的流动军阀指挥的所谓「客军」，着名的如杨希闵与范石生的滇军、刘震寰与沈鸿英的桂军，共同袭击陈炯明。陈败逃。虽然「客军」击陈的真正动机是觊觎广东的富饶，却声称支持孙文，为他们鸠佔鹊巢找到法理的依据。

孙文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回到广州，再次充当他人的门面。孙重建军政府，再挂大元帅头衔，直到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为止。

孙文在广州恢復原职后不久，由于对直系极为不满，就联合东北的奉系北上讨伐北京政府。事件经过如下：直系在巩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后，想效法此前的皖系，与外国谈判巨额贷款。但外国的银行家不会贷款给一个不能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所以在南方政府因陈炯明叛变而崩溃之际，直系领导人展开了新的行动，要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遂解散北京的安福国会，撤除总统徐世昌的职位。黎元洪重任总统，旧国会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恢復。

这个新动向正中南方的陈炯明下怀，也使得广州的非常国会失去根据。所有议员由政学会带领回到北京，重拾他们原来在旧国会里的席位。当孙文在一九二三年初回到广州时，因为没有了合法的立法机关，不得不放弃总统的头衔，并迫使他投入东北奉系军阀的怀抱。

这个时候，在北京发生的新丑闻，使得广州与浀阳之间有了结盟的新藉口。一九二三年六月，直系军阀强迫再无利用价值的黎元洪总统辞职。黎在十月任满，国会准备选举新总统。直系的领袖曹锟认为是该他当总统的时候了，但恐怕无法获得旧国会的多数票，就以每票五千大洋贿赂国会的议员。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曹锟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五百九十三票中的四百八十票，当选总统。

这个称为「贿选」的丑闻，给予反直系的张作霖、孙文和段祺瑞极佳的口实，他们形成统一战线与北京政府对抗。一九二四年底，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和段祺瑞都站在奉系的一边。直系军队在长城战线捷报频传的当儿，曹锟政权却由于基督将军冯玉祥倒戈而突然崩溃。冯是直军第三军的总司令，在十月二十三日战火正酣时祕密从前线回师北京，突然软禁曹锟总统，使得直系的另一领袖吴佩孚一时手足无措。吴急忙撤兵，但无法收復首都，就逃到武汉策划捲土重来。这时北京和中央政府全为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联合掌控。三人取得协议，一方面以段祺瑞代理国家元首，挂中央政府临时执政衔；另一方面，联名邀请孙文到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孙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北京，未能实现国家统一。

(6)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曹锟大总统倒台，终结了民国初期的总统与国会制度，也开始了军阀割据的最后一个时期，首都没有总统也没有国会。中央政府最初由临时执政段祺瑞统治，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为张作霖取代。张的中央政府毫无合法性，张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的头衔，统治北京到一九二八年夏天，最后才由国民党政权统一全国。

4

民国初年的混乱，几乎是无法分析得清楚的。要长话短说，也许可以这样总结：混乱之源，是一个巨大的政权连同它的职业官僚体制和传统军事系统迅速崩溃，崩溃过程一如改朝换代的中国传统。但由于受到当时较优越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也加速了老旧文明和其传统社会模式及国民经济分崩离析。两股潮流交相激荡，产生

复杂的漩涡，所有的事事物物，老式与极端现代的、诚实与虚伪的，都在漩涡中载浮载沉。几代以后重新回顾这段歷史，对于参与政治运动或军事冲突的人们，我们不可能完全认同，也不可能完全谴责。如果要谴责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那么孙文与奉系军阀合作的「北伐」也同样不当。

简言之，每一个内战的参与者代表一种社会力量、文化传统或现代思潮，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的公共活动与个人行为也缺乏共同的道德规范；在武力斗争或政治倾轧时，也没有大家都接受的社会、政治或法律守则。每一个人只能依据本身的传统或教育各行其是。他们最终的命运不是由好、坏来决定；关键在于是新还是旧。适者生存，优胜劣败，「旧的」和不适合现代情况的东西逐渐遭到淘汰。歷史洪流有如长江大河，通过瀑布与激流险滩朝向最终目的地奔流而下。

在中国歷史进程中的军阀时期，不管表面如何混乱，有两股强大的暗流最后引导歷史前进。其中一股是完全为现代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激发，而在全国形成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另一股是在沿海地区一尤其是上海市一兴起的新民族资产阶级，它的财力足以与广大农村群众的人力抗衡。正是这两股暗流引导着下一代中国革命的发展。

註释

註1：译者按：桂系只是虚与委蛇，并非诚心支持广州军政府，实际上它没有参加组织政府的工作。陆荣廷还多方破坏军政府。参看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页一二六和页一五一。

第三部　新方向

【第8章】

新舞台：经济转型，文化真空

1

民国时期最初二十年，上演了无数政治与军事大戏的国家舞台，基本是建筑在一个农业社会上。辛亥革命时，虽然中国拥有近六千英里的铁路、几个大型的现代矿场、一家用小汽船行走内陆河道的华资轮船公司，以及几个有工厂、电力、电报的大城市，国家整体而言仍以农业为主。十八世纪以降，农村的生活条件一直在恶化，到了民国初年，农民显得比在满清承平时期的祖辈更为穷困。尽管革命给大城市的现代金融和工业带来一些成长的新希望，但没有使内陆的农村地区取得任何重大的进步。正好相反，革命产生的军阀把农民的生活弄得比以前更糟。农村到处是不满的民众，从而为农村革命创造了条件。以下一些数据将有助于说明那时的情况。

一九一○年代末期，中国人口估计为四亿五千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以务农为生。全国耕地面积的官方数字约为二亿四千万英亩，农民的人均大约是○·七四英亩。每一农家以五·五人计，平均可得田地约四英亩。当时的统计数字显示，约三分之一农家每户的田地不到一·五英亩，七成农家每户的田地不到五英亩。

由于缺乏精确的全国性统计数字，我们只能採用地区性的研究成果。它们显示，一·五英亩田地的农产品每年收入约为大洋七六·五元，每年的人均收入约为大洋十四元。因为农产品的收入在中国通常是一个农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一个小型农家的平均家庭年所得约为大洋一百零二元，或平均每人约为大洋一八·五元。这就是佔中国农业人口至少三分之一和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小农的一般情况。较大的农户情况略佳。（註1）

一石（一三三·三三磅）稻米的价钱是三元，因此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仅可餬口。他们怎样过活？一个曾对北京郊区的农村生活作彻底调查的美国经济学家回答说：「答案是，每日两顿窝窝头配腌萝蔔，用大口热开水下咽，在美国也花不了多少钱，在中国更要便宜一半以上。」（註2）事实上，农民挣扎求生，在欠收的年头，没有几人能活下去，即使较大的农户和小地主也是如此。甚至在丰年，也有过半的农民人口经常靠借债度日，要用粮食和现款偿还。

地主所有制和高利贷当然是农村的另一个问题，但并不像包括共产

党作家在内的许多人所说的那样，认为这是共产党建国前中国的罪恶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在于人口过多和耕地普遍缺乏。农村社会，一如孙文所说，是一个「小贫和大贫」的社会。阶级差别其实是普遍贫穷的后果，不是原因。

尽管农村经济是这样的情况，北京政府五分之一的国库收入来自极重的地税，再加上盐税和商品进出口的关税，佔国库收入一半以上。这些税收本来已经造成农村人口的超额负荷，而农民还得负担当地政府和地方军阀强加的税捐。农村地区普遍破产，一方面产生了一大群不满现状和失业的农民，他们被迫当兵、为盗、加入黑社会，甚至参加激进的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凋零使得传统的土地投资既不安全也无利可图。这样就引致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其中不仅包括寻找工作的农民，也有携带资本的富有地主，使得大城市里中产阶级的人数膨胀起来。

简言之，在传统中国，改朝换代常因农村不安而起，广大农村群众往往是建立新王朝的支柱。但是在中华民国，农村人口在全国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性却由于城市中产阶级的成长而相形见绌。

2

大城市的现代中产阶级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已逐渐形成。虽然早期的工业化运动失败了，这个新阶级的成长并没有受到严重阻碍，而且在民国时期仍然持续。

辛亥革命后不久，本土的金融业和工业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为其后数十年的工业发展打下基础。促成这个新发展有各种原因，包括革命激发的民族主义和现代精神、长期以夷为师、西方训练的新人才，以及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资本。

在新企业中，银行和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后的本土工业异军突起。在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本土的金融和工业新贵，是人数少而团结的城市中产阶级的骨干，他们不久就在全国政治中举足轻重。若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本土企业的总资本和生产力还很小，但是，却足以打乱国家旧有的经济秩序。大城市的财力对于新政治运动的重要性也超过了农村的人力。

第一家华资的现代银行是在一八九六年组织的中国通商银行。（註3）其次是一九○四年户部（清朝管理财政的机构）建立的户部银行，地位最为重要，辛亥革命后改名中国银行。此后本土的银行家迅速涌现。

一九○六年，本土银行的数目达到了一百四十一家，总资金为大洋三亿七千五百一十五万元。它们以两个大银行集团为首，所谓南三行和北四行（註4），分别由江苏的张嘉璈与浙江的吴鼎昌领导。两者合称为江浙财团，是现代中国最强势的资本家集团。

随着本土银行业务的扩张，各式各样的金融业务，像保险、地产、股票经纪，蜂拥而起。有本领的金融家，善用他们充足的资金，如滚雪球般经营企业。生意场上的一本万利也吸引了经验丰富的商人、新手和身无分文追逐横财的投机者。职业军人、政客、甚至老革命党人，全来参加这个赌博。只是到了一九二○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衰退后，尤其是纺织业股票的崩溃，许多没有经验的投机者才被迫重操军旅和革命的旧业。但有经验的金融大亨还是继续兴旺发达，任何国内的政治势力都不能忽视他们。中国银行就是个例子。

户部银行改名中国银行后，就一直保留这个名字到现在。一九一三年，中国银行正式增加资本六千万元，原来打算一半由政府拨款，一半以认股方式招募私人股东。因此在民国初年，这家银行成了北京政府之下分赃制度的一部分，高层管理人员随着财政总长的更替而频繁变换，几乎摧毁了银行的业务。幸运的是，腐败的北京政府无法完全交付规定的资金，私人股份就因而增加，为私人金融家提供了掌控银行的机会。一九一七年夏，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就任财政总长，有影响力的党员张嘉璈是中国银行的副总裁。在张的领导下，银行的私人股东向梁启超施压，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的法定程序，就成功修改了银行的章程。根据新章程，原来由政府委派的银行总裁职位，改为从银行董事中选出，而董事则由政府和所有私人股东平等选出。

这个新规则限制了政府的任命权，使其徒具形式，并使中国银行脱离北京政治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政府逐步抛售股票，私人股份随之增加。于是，中国银行也就像任何其他私人银行一样独立经营，却仍然享有原来作为政府经费主要储存者的特权，并因而拥有跟本土的银行和在中国的外资银行竞争的优势。一九一八年，中国银行对一向为外人独佔的外匯业务进攻，这是本土银行的第一次。数年内，它成了在那个年代全国最大的公司，发行的流通货币总值，从一九二一年的六千二百四十九万三千元增加到一九二五年的一亿二千七百零九万一千元。掌握中国银行管理和政策大权的张嘉璈，一跃而为中国新的金融大亨。

在业务扩张的数年间，张嘉璈把他的影响力延伸到北京政府。绰号「太上财政总长」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glen），是唯一有权为中国债券提供保证的人。中国银行活跃的副总裁与实际操作者

张嘉璈和他合作，几乎垄断了中国债券的买卖，为中国银行的股东赚得可观的利润。北京经过无数次政治危机，中国银行的总裁也数度更换，但张得到投资者和政府内合作者的支持，稳坐第二把交椅，从未间断对银行业务的管理。

在他的金融事业歷程中，张还协助创立一批以他为中心的强大的卫星机构。例如，一九一五年陈光甫在他帮助下，以五万元资本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银行的存款在一九二九年达到六千万元，一九三一年超过了一亿元。

军阀和他们控制的北京政府既不能保护本土银行扩张业务，也不能保护它们与拥有特权的外国金融机构竞争，但都理所当然地把本土银行视为可以予取予求的摇钱树，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榨取本土银行的金钱。例如，在短短的十三个月中，张嘉璈两次为军阀拘捕，先是吴佩孚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后是张作霖在一九二五年十月，都在他们控制北京之后。同样的事例也在其他地区发生。虽然军阀採用的绑架办法过于原始，难以控制现代的银行企业，但军阀割据和没有效率的北京政府却着实给本土银行业务的扩张制造障碍。这样就使得现代的银行家们支持各种政治运动，包括任何在中国鼓吹推翻腐败的北京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拥有特权的外国竞争者的政治运动。

3

在金融业务不断扩张的同时，本土工业也蒸蒸日上。根据有关报导，一九一二年在数以千计的本土工厂中，使用电力的只有三百六十三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竞争者被迫撤离中国市场，本土工业就突然间蓬勃发展起来。一般来说，本土工业集中在几个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和无锡，还有在内陆的武汉。

然而欧战时的工业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在战后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工厂纷纷倒闭，使得本土工业家和银行家一起，站到反外国、反军阀的一边。本书无法详细而全面地回顾中国工业的兴衰，只能用在共产党建国前最大的本土棉纺工业和一些关键产业来举例说明。

第一家现代纱厂建立于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六年以后，外国的工业家也开始加入。到了辛亥革命，中国共有华资和外资的纱厂三十二家，纱锭总数八十三万一千一百零六。英国人的工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落，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纱厂却是前所未有地兴隆。华资纱厂的数目从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二家增加到一九二二年的六十四家。它们的纱锭开始

时为数约五十万，在这段时间内增加为三倍，织布机的数目从二千增加到八千。一九二二年，本土纱厂的总资本估计约为一亿元。许多本土纱厂都是从小格局开始，几年内成长起来，变得规模庞大。

然而好景不常，从一九二二年起，本土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普遍衰退。光是在一九二三年，倒闭的中国纱厂就有十多家，倖存下来的工厂，大多数的纱锭也依然闲置着。股市崩溃，数以百计的经纪人破产。

由于日本纱厂的资金、管理和保护较佳，在战后短短的几年期间使本土纱厂相形见绌。在一九二五年，虽然中国纱厂的登记纱锭数目仍比日本纱厂的多，但日本纱厂在中国的资本总值达一亿五千六百万元，是本土纱厂的两倍。甚至英国人战后重整的纱厂，其资本额也和中国纱厂不相上下。有些中国纱厂并没有真正开工，还有许多停业的工厂等待出售。其余的欠下日本人的债，许多甚至把物业权转给日人抵偿债务。一九二○年代以后，中国人的纱厂就再没有恢復昔日的辉煌，中国的工业家也从没有忘记这段时期的悲惨经验。

和棉纺工业一样，本土的烟草工业也出现类似的兴衰起伏。在民国初年，中国两大烟草公司—华资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外资的英美烟草有限公司（British-American Tabacco Co., Ltd.），是相互竞争的两大巨擘。经过了一次大战期间的短暂繁荣，本土公司在一九二○年后开始衰退，而外资公司的净收入却继续上升。（註5）

和官督商办（註6）时期的失败一样，本土工业在一九二○年代倒退的种种因素是难以分析的。虽然如此，统计数字显示出外资竞争的严重性。当时的观察家都明白，本土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的投资增加额显着地不平等。例如，一九○二年外国的总投资约为七亿八千七百九十万美元，一九一四年增加到十六亿一千零三十万美元，一九三一年到三十五亿美元，几乎是註册的本土制造业资本总额的二十倍。举例来说，单是一家美资的上海电力公司（Shanghai Power Plant）生产的电力，就等于所有本土电力公司发电量的总和。（註7）

这种情况，加上半世纪以来不利的外贸和固定关税税率，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工业家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他们认为外国竞争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是中国工业化运动失败的原因。然而这时中国工业最需要的，是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以维持国家的和平安定和扩大国内市场，并保持关税自主，以保护本土工业，使其不受外国竞争打压。北京的军阀政府无法满足这两点需求，因此工业家们也自愿加

入大城市金融家和农村地区农民的行列，支持任何鼓吹反军阀、反外国帝国主义运动的政治力量。

4

随着工业在大都市的成长，一个现代都市的劳工阶级开始形成，准备参与国家的政治运动。关于实际劳工人口的数目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一般认为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传统的手工业者仍是劳工阶级最大的群体，为数约一千二百万人。手工业者除了一些有行会的特殊行业，一般缺乏组织，而且大量分散在全国的每一角落，虽然人数众多，但对政治并不积极。

现代产业工人形成劳工人口的第二大群体。正如雇用他们的现代工厂一样，产业工人集中在几个大工业城市、矿场和铁路沿线。根据一九一八年农商部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除去铁路工人、矿工、海员、搬运工人、交通工人和公营工厂的工人，全国产业工人有六十一万人。但是即使把各式各样的产业工人加在一起，总数也不过一百万出头。一九二七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的最高数字是二百七十五万人，其中甚至包括了邮政工人、市政府的雇员和警察。

这个新的产业劳工阶级不仅人数偏低，而且在开始时也不是强大的政治力量。欧洲的劳工兄弟是专业工人，常常从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寻求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民国初期的中国产业工人，全是从工业中心附近招募的农村过剩人力；如果农村的情况改善，或市区的生活恶化，他们就回乡去了，因此有些欧洲的观察家称之为「兼职农民」。

虽然如此，中国的产业工人首先形成了全国现代城市无产阶级，比手工业工人更具潜力从事今后的政治运动。产业工人在一个和原来的农业背景完全不同的新经济系统下，过着群体生活。即使他们自己不熟悉集体谈判，劳工团体以外的煽动分子会找上门来，要他们加入改善生活、救国或救助劳工阶级的群众运动。他们在重要城市形成了最大的群体，如果开始集体行动，虽然可能对自己带来更多伤害，却会吸引全世界的注目。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是个动盪不安的群体，而贫穷一直是动盪不安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二○年代中期，上海产业工人的工资为全国之冠，视技能和职责而定，每日可得大洋三角到二元不等，一般工人的每日工资只有大洋四角。一个技工的工资虽然比在乡下的劳动兄弟高，但也极难在城里维持一个小家庭勉强餬口的生活。在上海，维持有两个小孩的劳工家

庭，每月最低费用是大洋二十一元，约为一般工人月薪的一倍。

在生活费用远比上海低廉的华北，情况也一样恶劣。一个西方观察家在一九二四年记述：「苦力一日三餐，早上五时、中午和晚上八时。每日有两顿是喝热的蔬菜清汤，还有约一斤加上梅子的玉米粥。这些梅子是当地的干果，价钱便宜，供应充足……。第三顿是碎米煮的饭、菜汤和腌萝蔔等各种咸菜……。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但可以吃饱。这些东西的每日最低费用约为二十铜板，每月六百铜板，大约折合四个墨西哥鹰洋。苦力们食无酒肉，技工的食用略佳，主食有大米和玉米，偶尔有一小块肉。」（註8）

在这样的环境下，产业工人自然很容易采取集体行动来争取较高工资，不管是对抗雇主、军阀或外国帝国主义。他们着眼的是光明的未来。在一九二○年代初期，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特别明显，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内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不管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还是农村的地主阶级与佃农，都愿意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合作，即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求中国之自由。他们所需要的仅是一条能把他们缀合在一起的金线。不久之后，这条金线就由参加到一个觉醒运动的新知识分子阶层提供。这个觉醒运动亦称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中国的文艺復兴。

5

新文化运动由北京大学开始，从一九一○年代末到一九二○年代初传播到全国各地。带领运动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与一九一一年以前也曾发起类似运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有所不同。老一代知识分子，大体上在传统的环境中成长，饱受旧有的儒家教育，几乎所有人都能背诵部分甚至全部四书五经及其注疏笺解，因为这是参加科举考试所必需。许多人能写典雅的古诗、古文。总之，儒家传统根深柢固，因此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个人举止、社会关系和政治伦理。这一代人中，很少人认真怀疑过传统儒家伦理及人际关系是否适合将来要建立的现代社会。虽然许多人在日本接受过一些现代教育，然而对现代西方思想的理解相当肤浅，不能与他们深厚的文化传承相比。例如，在现代共和政府的概念中，他们可以忍受政府官员违宪，却不能原谅下级不服从上级。前者是他们尚未认真接受的新观念，而后者违背传统的政治伦理，显然是他们接受不了的。因此，他们所受的现代训练不足以运作议会政府，但是他们承继的旧官僚传统却足以使他们成为民国政府的新官僚，驾轻就熟地在又一次政治改革或革命的循环中再度出现。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来自完全不同的环境。一九○五年废除科举后，新式学堂成了全国的潮流，传授的中心内容是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与现代科学。虽然儒学仍然列入课程，却已失去主导地位。吸引青年的，正是这些西方的科目，而不是儒家经典。在十年内，新的学校制度产生了一个稳固的新知识分子阶层。（註9）

再者，不像老式学堂是分散全国各地的私塾，新式学堂规模较大，集中在都市和城镇，年轻的学子在宿舍中过着现代化的规律生活，因而能够组织庞大的团体和採取集体行动。现代的训练，再加上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在民国初期产生了一个志高气扬、蓄势待发的学生阶层。

与此同时，去欧洲和美洲求学也成了全国青年的新潮流。大批出身良好家庭和成绩优秀的青年前往海外留学。他们接受第一手的西方学术训练，很快就在中国的教育圈子里比留日学生更受欢迎。西化的日本，后来居上，成为威胁中国独立的新帝国主义强权，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下降。从西方归国的学生逐渐取代留日学生成为领袖。像人类歷史上许多改良运动一样，热情洋溢和激进的人往往矫枉过正，中国最新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也要扬弃所有传统的东西。许多人甚至憎恨中国旧传统，提出了西化运动。在西方归国的学生中，有些受尊敬的领袖，如吴稚晖，甚至公开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这种新知识分子的舆情民意在一九一六年底黎元洪总统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时达到了临界点。

蔡元培，一八六七年出生于浙江省一个士绅家庭，一八九二年点翰林，取得那年代士子梦寐以求的最高功名。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为创始会员，其后往欧洲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Leipsig University）研读四年。他参与辛亥革命，翌年任孙文内阁的教育总长。深受现代欧洲思想的影响，蔡元培是少有的几个中国知识界领袖，国学和西学修养深厚，在中西学界享有盛名。任北大校长后，竭力宣扬现代欧洲思想。北京大学成为他把教育改革付诸实践的场所，并取得丰硕成果，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北大从原来的官僚机构改变成现代学府。

蔡在北大所有的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坚决提倡学术自由，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不同意见，各家各派的主要学者，保守的、自由的和激进的，都一视同仁，招聘为教授。

这些人中，声誉不佳的陈独秀于一九一七年初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原籍

安徽，成长的背景和蔡元培相若，十七岁中秀才，次年又中举人。受到现代学术研究的激励走向新思想，他中举后就放弃科考的老路，一九○二年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并加入革命团体「中国青年会」。次年归国，从事革命报业，在一九○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是第一份用白话取代文言的报纸。

陈一九○六年再往日本，由于不相信其时革命党人追求的狭隘民族主义，拒绝参加同盟会。一九○七年，他转往法国留学三年。陈独秀在那里深受法国浪漫思想以及现代政治与社会理念的熏陶，也使他有机会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生活方式。归国后，他参与辛亥革命，并在一军事学校任教。辛亥革命后，安徽都督柏文蔚委任他为都督府祕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一三年，他和柏都督逃亡日本。

陈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回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后来在封面加上法文名字La Jeunesse（青年），以示对法国的仰慕。通过这个杂志，陈独秀传播他的现代西方思想，狂热地从根本上攻击儒教。他在一九一六年刊登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註10）所以他建议，不符合现代生活的儒教，必须为现代西方的体制所取代。

陈独秀以这篇文章，前所未有地打响了反儒家传统之战的第一枪。这一枪震惊全国，却赢得新知识分子的热烈掌声。正是通过他的杂志，陈联络到一群热心的支持者，包括后来的现代中国最着名的文学家鲁迅（本名周树人）、世界共产主义烈士李大钊，以及被称为中国文艺復兴之父的胡适。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远较陈独秀年轻，没有受过像他的老一辈朋友陈独秀和蔡元培那样的传统教育，虽然他们的家庭背景类似。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孩提时与为官的父亲在台湾短暂居住，一八九五年父亲死后还乡，在乡村的私塾学习儒家经典。一九○四年由三哥带往上海，到新式学堂继续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习英语、数学和科学。其时科举已废，他无须以文言写诗作文，就模仿流行的通俗小说，学习用白话写作。

一九一○年，青年胡适通过庚款官费留学生的考选，被政府派往美国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学习农业。过了三学期，胡适开始怀疑农业是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由于对人文学科的浓厚兴趣与受到祖国革命的激

励，他从科学转到哲学。他选修一个把四百个苹果分类的实验课程，成绩不佳，促使他最后决定，从康乃尔大学的纽约农学院转到文理学院，因此而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胡适在一九一五年夏季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在杜威（John Dewey）门下研读哲学。此后在纽约市的两年，正是他探讨中国文学改良的孕育时期。

亘古以来，中国的书面语言即存在文言和白话两大类。所有官方和正式的写作只用文言，白话只偶然用来写民间故事。尤有进者，中国的诗歌都是从文言发展出来。诗句採用的韵脚，都根据古音人为地规定在一本韵书里。因此一如胡适所说，写作中国的古体诗实际上是一种填字游戏。这样写成的诗文有趣，间或很美丽，但缺乏创造性。年轻的胡适，对欧洲文艺復兴的歷史和当时所谓的「美国文艺復兴」都深有了解，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和朋友们讨论中国的诗歌革命。他建议打破束缚创作的古老枷锁，用白话和自由体写作「新诗」。他又提出写作白话文学的一般法则。他的论证没有说服朋友们，胡适就给陈独秀寄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建议以活泼的白话取代死气沉沉的官方书面语言。

这篇文章在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新青年》刊登。和陈独秀攻击儒教的文章一样，胡适攻击传统的书面语言也得到知识界的响应。保守派用勐烈而相当幼稚的抗议攻击他，新一代却对他的新理念热烈鼓掌。几乎一夜之间，二十六岁的哥大研究生成了祖国大地的新文学英雄。在他获得的荣誉中，有蔡元培校长的北京大学教授聘书。没有等到哥大接受他的博士论文，胡适就于一九一七年夏天挂上「胡博士」的头衔买棹归国，在北京就任教授席位。他的博士学位是直到一九二七年重访哥大时才颁发的。

在北京大学，胡适立刻加入其他知识界激进分子的队伍，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成了一本白话文的杂志，胡适派的「新诗」也成了全国的潮流，使得每个对文学有兴趣的中学生自命为「新诗人」。虽然鲁迅直到一九二○年才加入北大的教授行列，他在《新青年》的白话讽刺散文和写实的短篇小说，成为千百万人的典范。桐城派古文老学究的高贵形象完全破碎了，易卜生、托尔斯泰、莫泊桑、克鲁泡特金、萧伯纳和中国旧有的通俗作家，主导着新的文学世界。文学革命迅速扩散，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白话文不久就取代艰深的古文，成为大众沟通的主要工具。

除了文学改良，激进的知识青年也号召普遍的思想解放。他们把思

想大致分为新、旧两类，旧思想必须给新思想让路，而新思想则由两位来自西方的绅士—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指引。任何制度，不论中外，都要根据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标准重新评估，然后决定是否继续或接受。每一个现代人必须是个自由思想者，自我选择一己的信仰，不能任由权威牵着鼻子走，不管是中国或外国的，是孔子还是耶稣。在新标准下，儒家传统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源头，必须彻底予以摧毁，科学与民主才能获胜，现代的社会才能建立起来。（註11）

新文化运动如野火燎原，全国的老一辈人和保守派深受震撼，年轻一代和进步力量则热烈响应。这样就在新旧两个阵营间掀起一场文化战争。年长者联合一起反对新文化运动，年轻人也同样联合一起造反，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復兴」。当北京和广州的内战正断断续续地在战场上进行时，每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不断地展开了新、旧思想之战。内战可以安排休战，最终也这样做了；家庭的交战双方却永无妥协的余地。

年长者和保守派老迈乏力，无法有效抗拒，年轻的进步分子咄咄逼人。所有学生都给发动起来，参与有组织的行动，北大的学生无可避免地走在前列。在陈独秀教授的贊助下，一九一八年底出版了一本白话杂志《新潮》，它的英文命名是Renaissance（文艺復兴）。虽然是《新青年》的衍生物，这本学生杂志的版面和编辑却更为完善，不久就成了畅销刊物。全国各地的学生跟进，白话学生报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随着《新青年》和《新潮》之后，到一九一九年夏天，估计中国出版的学生杂志数目超过四百种。全国每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现在都从儒教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了「自由思想家」。如果每个中学生都是「新诗人」，那么每个大学生就必然是「哲学家」了。在四百多位学生编辑和数以百万计的「自由思想家」中，有一个湖南人叫毛泽东，在一九一九年夏天编辑了《湘江评论》。

这个多彩而浪漫的中国知识分子觉醒运动，自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三～二二一）百家争鸣以来，绝无仅有。但是与古代的百家争鸣不同，新运动造成了暂时的文化真空，一段失落和虚无的岁月。因为在一九一七年后的数年，没有任何东西填补被扬弃的儒教。对科学和民主的新崇拜还太模糊，新思想的年轻哲学家们寻找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政体和新的社会型态，却在树林里迷失了。政治形势使他们更难找到出路。

6

当新运动在扩张的时候，它的领袖们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唯一把他

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共同反对「旧思想」。「旧思想」就如同十年前「满夷」扮演的角色，把各路革命党人团结起来。简言之，大家都同意摧毁现存的结构，但废墟上要建设些什么，大家却意见分歧。

就方法而言，胡适选择非暴力的、不受政治干扰的文化运动。陈独秀并不作如是想，他不能容忍异议，主张热烈参与政治。其后的事件显示，陈的想法比较接近那时新知识分子的舆情民意，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被引入政治途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浩大的学生爱国示威，给予新运动第三个名称：「五四运动」。

五月四日的示威，是因学生们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而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期望巴黎和会纠正日本人在战时侵略山东的问题。大战开始时，日本以英国盟友的身分佔领德国在山东省胶州的租界。这个佔领区在战时日益扩张，直到山东的大片土地受到日本人控制。中国因此期望在巴黎和会收復失去的领土。但由美国总统威尔逊领导的四强（即美、英、法、义四国），却同意将前德国的租界转移给日本，而不是交还给也是同盟国一员的中国。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因为英、法、日三国原已有祕密协议，支持日本在山东的要求；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就已祕密承诺，「欣然同意」日人的要求。

巴黎和会快要结束，北京政府指示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署协约国同意的条约。这个消息引起全国震惊，纷纷起来抗议，终于导致五四示威，参加的有来自北京十三个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三千多人。他们向北京政府请愿，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罚未经国会同意就决定中日密约的「国贼」；还呚吁全国同胞、商人、工人、工业家和农民，召集抗议大会，抵制日货。

示威游行开始时很有秩序，后来发展成暴力和纵火。北京的军阀政府铁腕镇压，不惜拘捕、流血。同情学生的蔡元培校长辞职以示抗议，其余北京各大学的校长亦相继辞职。全国教育界一致向政府抗议。学生公开示威，继而全体罢课，在数週内几乎完全瘫痪了教育系统，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到街头和乡下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的「卖国」政府。

这个运动不仅影响中国的所有学者，也影响了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五月七日，数百中国学生在东京大游行，和武装的日本警察冲突，百余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这件事更使中国本土的抗议运动火上加油。

学生的示威在五月里席捲全国。虽然许多人被军阀的部队殴打或杀害，却仍然势不可当。六月四日，北京警察拘捕学生一千一百五十人入狱，但在街头的学生依然成千上万。从北京开始，全国各地学生会都组成称为十人团的基本单元。凡有学校的地方，就有学生会和用白话文宣传爱国思想的机构。六月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各地的学生会自愿加入为分会。

与此同时，学生的活动扩散到其他社会组织，而且到处都大受欢迎，产生轰轰烈烈的影响，引致上海商人在六月五日全面罢市。所有在上海和附近地区的中国人店舖全部关闭。同一时刻，以纺织业为主的近十万没有组织的上海工人，宣称同情学生，举行罢工，乞丐、小偷、歌女、甚至娼妓也随即加入。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上海瘫痪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才恢復正常。

上海的罢工、罢市很快就得到全国的响应，数日之内，几乎长江两岸的每一个重要城市都爆发罢工、罢市。这个运动甚至扩张到边疆。京汉（北京–汉口）和津浦（天津–浦口）两条铁路干线和长江各轮船公司的工人，虽然没有工会，都全部怠工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许多军阀的部队和警察也有要加入的迹象。北京的军阀在这个时刻害怕了，开始向学生的要求屈服。

为学生归咎该负中日密约之责的三个官员，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被政府免职。三日后，内阁倒台。北京警察为非法拘捕学生向胜利的学生公开道歉，甚至总统徐世昌亦向国会辞职。虽然国会挽留，但这段插曲提升了学生对军阀政府的胜利感。六月二十八日，对德国的和平条约在凡尔赛宫签订，中国代表团缺席，满足了学生们在五四宣言（註12）提出的要求：「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竭尽心力斗争近两个月后，学生们心满意足了。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学生联合会正式取消罢课，一切回復正常状态，但是全国的学生、商人、工人和所有的公共组织现在都和运动开始前大有不同。两个月强烈的反政府行动实际上给他们上了一堂珍贵的政治课，政治觉悟大为提高。只要有机会，他们随时可以发起类似的政治运动。

数以百万计的造反学生现在组成了一个对国家政治特别敏感的巨大团体。千百年来被屏弃于政治之外的中国商人社团现在也随时准备利用活跃的组织和金钱介入国家事务。工人也学到採取集体行动的现代技

巧，不仅用它来谈判提高工资，也用来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民携手，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总的来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进入了一个普遍政治觉醒的时代。五四示威是新文化运动和当时文化真空的自然结果，事实上是一个除了纯粹的爱国主义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哲学的政治运动。因此，五四示威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新战争奠定了基础。

註释

註1：那时中国的流通货币是称为「大洋」的银元。在民国时期的前二十年，兑换率是一美元对大洋二·二五元到三元。除非特别指出，此后本书的货币以银元（大洋）为单位。

註2：引文见C. F. Remer,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4, p. 259。

註3：译者按：中国通商银行是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于一八九七年在上海成立的。它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

註4：译者按：「南三行」是南方的金融集团，即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三家银行。「北四行」是北方的金融集团，即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

註5：这两家公司的起伏情况如下：以一九二○的净利为基数（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九二一年的利润下跌到八三·二，一九二四年到三○·五，一九二七年到五·九。一九二九年达歷史低点，利润指数跌到负六五·九。在同一时期，外资公司的利润指数，一九二一年上升到一四四·七，一九二四年到一七六，一九二六年到二三六·六，一九三五年到三一四·七。

註6：参看第一章第六节。

註7：根据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的调查，符合工厂法註册登记的现代工厂，在十七行省约有三千家，其总资本估计为大洋五亿五千七百六十九万零七百五十四元。

註8：引文见*China Year Book*, 1924-25, p. 655。大洋与墨西哥鹰洋的币值相等。

註9：一九○五年，中国有新式学堂四千二百二十二间，各级学生共十万零二千七百六十七人。经过十年的增长，一九一五年有学校十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九间，学生人数四百二十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一人。

译者按：统计数字来自Chinese National Welfare Society in America,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Volume 3, Issue 1, p. 40, October, 1919。

註10：译者按：此文原载于《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註11：《新青年》攻击儒家传统的文章聚焦于传统的体制和伦理：忠君、孝道、祖先崇拜、部落主义、家族祭祀，对上级、长者、父、夫无条件的服从，性别的双重标准，包办婚姻、纳妾、缠足。这些被视为封建、落后、野蛮，甚至是「吃人」的礼教。

註12：译者按：即《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

【第9章】

中国共产党之创建

1

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数年，中国知识分子扬弃了旧有的东西，却不能找到、贊同或确认新方向，他们实际上是在搞意识形态的内战。一直以来主导中国政治思想的共和主义和议会政府，在当时大众普遍怀疑的气氛下，遭受不可弥补的挫折。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西方民主的本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祕密外交和强权政治，尤其是巴黎和会，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更加疑惑。在理想破灭之后，寻求新的思想启发。许多学会为探索新学说而成立，并邀请外国的哲学家访华。

第一个受邀的是杜威，他在五四示威前两日抵达，并且一住两年，周游全国，传播实用主义理论和他的思维方法。他的演讲稿几乎在所有报纸刊登，读者数以百万计。他的着作和讲稿译成最畅销的书籍。杜威热感染全国，美国学术大师佔领了世界最古老文明的领袖们的思维。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掀起了第二个热潮。几乎他的所有重要着作都在他一九二○年十月来华前译成中文。他在中国逗留约一年多，受到数百万人欢迎。有一本杂志以他的名字命名创办，宣扬他的哲学。罗素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杜威。此外还有其他出类拔萃的外国哲人学者，虽然他们的思想各异其趣，亦同样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热切的知识分子尽管受到新的启发，显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是在杜威和罗素的学说中无法找到的。这些躁动不安的中国青年，现在要的是一幅清晰的新中国蓝图，用来建立新文化、新社会和新政治体系。他们渴望有所行动，展开战斗，对军阀和顽固保守的老一代作战，尤其是对外国帝国主义者作战。他们无法抗拒「打倒军阀」、「抵制日货」、「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无阶级社会奋斗」、甚至「打倒孔家店」等激情而天真的口号的吸引力。

和这些口号对比，步调缓慢、言语温和的教授和哲学家的大道理，流于太稳健、太遥远、太不明确，而且毕竟太与政治无关了。这些道理既苍白无力，也满足不了建立新中国的雄心壮志。革命不仅需要理论家的智慧，还需要群众的狂热和激情，而后者常与理论家的计划背道而驰。因此，既然杜威和罗素不能迎合中国民意，马克思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填补了这个空隙。

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后人，但在五四示威前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学术性多于政治性。除了几个具有理想的领袖，活跃的革命党人中几乎没有人把社会主义当一回事。然而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予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新的开始，扭转了原来的趋势。

俄国革命一开始就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热情关注。在革命后的两年中，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抗拒了外国的干预，与中国五十年来追求同样目的却落空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苏联因此成了中国人新的仰慕对象。苏联外交部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加拉罕宣言》（*Karakhan Manifesto*），宣称放弃帝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并允诺无偿地归还从前俄人夺取的中东铁路和所有开矿、採金、伐木的优惠，使得苏联实际上在中国人眼里成了君子国。无数赞赏的信件如雪片般从中国各地的公众组织飞向莫斯科。许多人把俄国革命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看作拯救中国的新希望。

第一个归依马克思主义、向俄国革命寻求指引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是陈独秀。一九一八年底，他创办政治杂志《每週评论》来宣传他的政治信念，其见解得到同仁李大钊热烈支持。李是留学日本的政治学家，同年二月受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是否如中共作家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五四示威前就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并进行政治活动，尚有疑问。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分裂。一九一九年夏，胡适写了一篇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实用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辩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所有社会问题都有「绝对真理」和「根本解决办法」，胡文是实用主义者对这些理论的攻击。李大钊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志大力还击。由于谁也不能说服对方，辩论没有结果，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己见。

他们继续宣讲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都是些初步的、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东西，却的确吸收了一批在大学的青年，包括学生张国焘和一九一八年冬季短暂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月薪仅八块大洋的毛泽东。

陈独秀积极参与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示威，不懈地鼓吹激进主义，因而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为北京警察拘捕。陈在判刑关押三个月后并没有任何驯服的迹象，警察一直在监视他，驱使他从学术转向政治。一九一九年末，陈辞去北大的教职逃到上海，在那里直接闯入共产第三国际地下特派员敞开的怀抱。

2

布尔什维克巩固了对俄国的控制后，列宁和共产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的领袖就下了决心，要把布尔什维克推行到亚洲，尤其是中国。列宁说，从莫斯科到巴黎的捷径要经过北京，由此可见其决心。与俄国共产党人有联络的旅俄华侨，组成称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团体。他们的领袖刘绍周〔和张永奎〕，参加了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註1）但实际在亚洲散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动，在一九二○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才开始实施，五四学生示威肯定促进了这样的行动。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推行到亚洲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此外并通过一系列严格规定。决议案提出，各国的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不能有独立的意见，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革命策略方面，共产国际指示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与「本国的革命运动」结成临时联盟，但决不能与临时的盟友合併。反之，它们必须准备将来和盟友对抗。

根据这些条件，共产国际派遣两名特派员，俄国人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註2）和华侨杨明斋，祕密前往上海，试图在中国发起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与陈独秀及几位国民党领袖联繫，特别是戴季陶，此人乃当时国民党阵营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于是，一九二○年暮春，一个小型的共产党核心在上海组织起来。戴季陶起草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但随即在他的老上司孙文强迫下退出了这个新运动。

除了已经成为共产党喉舌的《新青年》，还有两份基本上以工人和小商人为对象的小型白话期刊。此外又建立一家小规模的语言学校，作为新组织招募人员的门面。维经斯基和妻子担任俄语教员，把聪明的年轻人选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的训练。招募的新人被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在最早期招募的人员中，有二十二岁来自湖南的刘少奇，他在一九二一年和一群学生给送到俄国，后来回国参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模范的布尔什维克」。

一九二○年底，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炯明是当时华南最强大的军事领袖，刚把桂系军阀逐出广东，邀请孙文从上海回粤担任南方政府名义上的领袖，陈则自任国民政府的粤军总司令。

在广州，陈独秀召集一些前北大学生，着名的如陈公博和谭平山，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李大钊和张国焘在北京成立类似的小组。毛泽东利用学生时代的人脉，在长沙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在武汉，以及其他人在山东省会济南，也成立类似的小组。经过通信，一些还在东京读书的学生，在周佛海的带领下，也给说服加入这个新运动。一九二一年夏，中国未来的共产党人总数约为五十人，成立全国组织的时候到了。

经过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细心策划，一九二一年初夏，从各地区选出十二个代表，包括上面提到的各地领袖和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李汉俊。一九二一年七月底，祕密大会在李汉俊的住宅舉行，其后中共的歷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註3）

因为陈独秀和李大钊不克出席，大会由张国焘任主席，共产国际特派员马林（Maring）和尼科尔斯基（Nicolsky）列席观察指导。马林是荷兰的共产党人，以前曾在爪哇指挥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活跃于共产国际。尼科尔斯基显然是俄人，但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纪录里消失了。

大约在一个多星期内，代表们在晚上开了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时，一个法国警方的密探闯进来。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马林建议立刻停止会议，因此没有人被捕。此后会议从上海移到浙江嘉兴风景秀丽的南湖，代表们伪装成游客，在一艘画舫上开会。会议结束时大雨倾盆，水雾氤氲；周佛海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是在滂沱大雨中诞生的。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为党书记，第二号的副书记位子给了二十来岁、还在东京读书的大学生周佛海（註4）。大会通过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为CP或CCP，这两个缩写以后在无数中共的文件里出现。除党章外，大会也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註5）和《中国共产党宣言》（註6）。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包括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写成，其中宣佈党的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纲领中还提出中国共产党联合第三国际，彻底断绝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註7）的一切联繫。党员的当务之急是把工人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凡是党员超过三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本要在大会闭幕后向大众公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述及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解释为什么必须实行社会革命。第二部分歷数当时在中国并存的南、北政府的罪恶。这样就把孙文和北方的军阀都视为一丘之貉。文件认为，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南、北政府都必须推翻。

这个反国民党的立场显然和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冲突。由于第三国际特派员的影响，宣言因此被及时撤销，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份丧失的文件。（註8）

3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收到莫斯科提供的一笔可观经费，党员开始努力工作。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位，回到上海接掌党务。虽然他们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遇到挫折，却相对成功地渗入那时组织松懈的工会。

为了指挥这方面的工作，共产党在上海设立一个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特殊劳工部门，以张国焘为主任。在北京、广州、汉口、长沙及其他几个城市也设立分部，由当地的领袖掌管，例如毛泽东在长沙和谭平山在广州。

同时，招募年轻的大学生担任组织劳工的工作。因为早期的共产党人没有谁是劳动工人，这些学生被送到工会担任义务的文书或教师，为文盲或半文盲的工人免费服务。他们渐渐在工会垄断权力，鼓励工人罢工，与雇主对抗。一九二一年十月，在上海外资的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发起了第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虽然并不十分成功，却标志着共产主义来到了远东。

一九二二年一月，俄人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的许多工会都派遣代表团出席。带领中共代表团的张国焘，自视为所有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在他的影响下，广东机器工会派遣的代表团几乎被逐出大会，因为此前谭平山曾经被迫退出这个工会的工人补习学校，不再担任教员。虽然大会没有取得任何显着成就，却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机会在国际活动中宣称代表中国工人。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一日，着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劳工运动中的声望。大罢工有中国海员两万多人参与，数日之内，其他行业的超过十四万七千名工人也罢工声援，完全瘫痪了

这个英属殖民地。大罢工维持了近两个月，直到英国殖民地当局接受工人的要求为止。

指挥这次海员大罢工，国民党的功劳要大于共产党，因为半数的罢工者拥有国民党的党籍，而只有少数海员是共产党人。然而大罢工给予共产党人的鼓舞却多于国民党人。共产党决心加强在劳工阶级内的活动，不久就和国民党工运人员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华南—针锋相对。有趣的是，国民党因早期和三合会、哥老会等祕密会党的渊源，从兴中会时代起就扎根于华南的劳工阶级内。国民党早期从事工运的人是如假包换的工人，也是祕密会党和行会的头头。

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是从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团体开始。它的创始人和早期的党员没有一个与劳工阶级有任何关连，其实都是局外人，因此他们开始时在工会中极受歧视。例如在海员大罢工的前夕，谭平山被广东机器工会撤除义务教师的职位。谭不是工人，费了很大力气，由陈独秀向广州的地方当局推介，才被工人补习学校破例接受为教师。虽然如此，他后来还是被免职了。

不过，共产党人很快就迎头赶上，不久甚至在国民党的根据地华南也与国民党人旗鼓相当。一般来说，共产党从事工运的人比对手的国民党人更了解时事，受过更好的教育。共产党工运人员有如宗教狂，刚刚醉心于某一政治信念（说起来，这就是一种无神的宗教）；他们既有虔诚的传教士的坚忍，又有造反者的狂热。国民党工运人员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仍然固守着传统的祕密会党与行会，与现实脱节，变得毫无效率、落伍，有时甚至腐败。共产党工运人员具备现代手段，更加有效率、干劲和说服力。因此他们能深入国民党的根据地，在不同的行业另立工会，直接与附属于国民党的旧组织一争高下。他们在华北很快就超过了国民党，主导在大城市的产业工会和各条铁路干线—尤其是京汉线—工人的工会。

一九二二年五月，由张国焘领导的共产党工运人员向前跨出一大步。共产党利用陈独秀与广东省长陈炯明的私人关系，在广州召开中国工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与会者有来自各地的代表一百七十三人，号称代表二十万产业工人。大会议决，发起组织全国总工会，鼓吹八小时工作制。虽然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和独立的工会也派遣代表参加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肯定是一个共产党担纲的演出。不仅如此，共产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被指定为全国总工会的筹备机构，隔不了多久，全国总工会就成立了。

这样就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年的工作，莫斯科为此提供了超过二十万元的经费。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杭州西湖召开，有二十人参加，代表一百名党员。（註9）通过这个大会，中共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遵守共产国际的严格规定；共产国际正式接受了申请。此前，最少有五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曾经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其中有的互相仇视。在共产国际接纳陈独秀的团体为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后，共产国际指示其他团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团体中，有在巴黎的一群中国学生组成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者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以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与乔年。赵世炎被选为总书记，周恩来、李立三各掌组织和宣传部门。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和赵世炎在莫斯科会面，巴黎的团体就纳入陈的指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急剧的改变。正如第一次全代会，第二次全代会也通过了宣言和政治纲领。宣言是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公开声明，没有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词语，而是公开吆吁中国所有的进步力量成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来对抗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新的政治纲领包含七项目标：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註10）

这个政纲是在共产国际不容争议的指示下起草的，读起来更像国民党的政纲，不像是共产党的政纲。在「联合而不混合」的原则下，共产国际的代表不顾中共领袖的一致反对，成功地通过了联合其他政治力量以促进民族革命运动的新政策。在北方的军阀中，共产国际代表争取民

望颇高的吴佩孚和冯玉祥。在华南，他们考虑接触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接近的孙文，以及比孙拥有更大政治与军事力量的陈炯明。

不过，中国最强大的军阀吴佩孚却是一个无法合作的盟友。吴佩孚极度无知与落后，无法接受任何现代政治哲学。他对儒学深信不疑，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道教的一个变种。因此，如果非要他相信共产主义，他宁可选择老子的而不是马克思的。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只是在所谓二七惨案后才放弃与吴佩孚联盟的想法。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沿线十六个铁路工人工会举行总罢工，骄横的吴佩孚大帅冷血镇压，劳工和工运人员伤亡超过百人。花了两年时间在铁路工人工会建立的共产党小组也被清除了。此后，共产党人视吴为国内的最大敌人，把注意力转向基督将军冯玉祥。虽然冯玉祥当时还不知道「帝国主义」是什么玩意，但他野心勃勃，投机取巧，同时也像他在华北的所有敌人一样，亟需获得一些外国支持。因此，二七惨案后共产党在其他铁路线上的劳工运动遇到挫折，但受冯玉祥保护的京绥铁路却容许共产党开展工运。冯的友善态度不久就赢得俄人的全力支持，而他的政敌随即送给他一个「北方赤军」的绰号。

共产党人在华南寻找联盟的努力不久就渐入困境，因为陈炯明和孙文的暗斗迅速发展成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的公开决裂，陈的部队发动反孙的武装政变。孙侥倖脱险，几乎是只身逃往上海，陈炯明独霸华南。共产党人不得不在两者中作一选择。广州当地由陈公博带领的共产党人属意陈炯明，而俄人和在上海的中共领袖则偏向孙文。结果陈公博退党，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代表开始接触心灰意冷的孙文。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孙感觉温暖。在两相情愿的情况下，蓝色国民党和红色共产党之间的蜜月隐约浮现。

註释

註1：译者按：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可参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一九年三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页三四○ ~ 三四一。

註2：译者按：维经斯基，或译作威金斯基、魏金，中文名是胡定康或吴庭康。

註3：中共官方宣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显然不确。可参看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为*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 essay written in*

*1924*一书所写的绪言（Introduction, pp. 20-21）。该论文作者署名Ch'en Kung-po（陈公博），一九六○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第七号刊物（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Institute series, no. 7）出版。

译者按：根据李颖，《党代会现场：九十九个歷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二○一二年），页四记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着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通过对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多方面严格认真的考证，最后得出党的一大确切开幕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的结论。这一考证成果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另据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歷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所载资料：

七月二十三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六号（今兴业路七十六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见网页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3/4427940.html〕

註4：译者按：根据李颖，《党代会现场：九十九个歷史深处的细节》，页一九～二○记载：「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说，一大『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即李达—引者注）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这显然与会议的记载和其他当事人回忆有些出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俊汉、包惠僧和周佛海，选定由周佛海代理书记。」

註5：译者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原件早已遗失，陈公博一九二四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的附录一，是「纲领」的英译本。现存的中文「纲领」，多为据此附录重译。可参看陈公博着、韦慕庭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页一二六～一二七。

註6：译者按：一大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原稿遗失，有英文译本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后来张国焘再从英译本回译为中文。可参看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五四七～五五一。

註7：译者按：引文取自《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页一二六，是据英文“yellow intellectual class and other such parties”直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一九二一～一九二五）》，页三，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纲领》俄文稿，则为「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

註8：译者按：关于一大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可参看杨冬权，〈破解中共一大之谜：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共「一大」档案介绍〉，《党的文献》二○一一年第三期。

註9：译者按：据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歷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所载资料：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十二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一百九十五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见网页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4/4428161.html〕

註10：译者按：参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一九二一～一九二五）》，页一一五～一一六。

【第10章】

国民党改组

1

一九一四年夏，孙文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实际是解散了由各路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战线。革命党人推翻了满清，但在议会政府方面却徒劳无功。国民党的稳健派在改组后四散，组成不断变化的多个政治团体，同各种政治和军阀派系结盟。激进派在孙文的直接领导下，恢復了兴中会的原来面目，俨然是祕密会党而不像政党。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后，孙文在中国政坛几上几下，断断续续地参与多次内战，中华革命党名存实亡。虽然孙文号称有一大群忠诚的追随者，正如他有一次对俄国友人说的那样，这些人就像孔子的三千弟子，仰慕夫子的人格、学问和爱国情操，但不是严谨的革命政党的党员。国民党仍然有一些团体拥有活动场所和工作人员，但这些团体更像社交俱乐部而不像政党。再者，它们虽说遵循党的新规约，但大多数海外的支部甚至仍然使用旧日国民党的名称，而不使用新的中华革命党。

孙文因为革命运动毫无进展而气馁，但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他重振信心。的确，尽管工业落后的俄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必要条件—无产阶级，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却仍能革命成功，那么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也许值得模仿。翌年，在上海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孙文电贺列宁。苏联外交委员的回电令人鼓舞，其中暗示莫斯科可能与广州展开谈判，虽然孙和南方政府只有名义上的关系。

一九一九年夏，汹涌澎湃的学生示威更鼓舞了孙文。他催促海外追随者紧急筹款，渴望能把这股新力量引为己用，来挽救他垂死的政党。同年八月，五四运动仍余波荡漾，孙文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加上中国二字，以示和旧的国民党有别。

到了一九二○年底，孙文正要派遣私人代表团去俄国，但由于突然重新掌权而使计划中断。这时陈炯明把桂系军阀从广东赶走，请孙文回广州担任南方政府名义上的领袖。

孙凯旋广州，引起莫斯科的注意，马林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协助创立中国共产党后，立刻与上海的国民党领袖接触，建议合作。张继和上海的其他国民党资深党员表示接受，陪同马林前往广州，十二月再往桂

林，会晤正忙于筹划「北伐」直系军阀的孙文。马林提出三项建议：（一）改组国民党，联合工农；（二）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三）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文害怕与苏联亲近会开罪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后者的反对会影响北伐计划。因此孙只对马林许诺道义上的支持，婉拒与俄国或中国共产党联合。

在和马林的谈话中，孙文高兴地获知苏联的状况，尤其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其实是他自己的经济理论的俄国版本。孙后来说，民生主义在中国失败了，却被列宁在俄国实行。这就使他相信俄国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准社会主义，和他一直以来的主张相似。

和马林会面后仅仅六个月，孙文就因为陈炯明的叛变被迫离开广州。陈主张重建两广，反对毫无希望的北伐，孙于是要撤除陈的职位，陈随即叛变。孙文再次沦为流落上海一筹莫展的半退休政客。南方仍然对孙效忠的军队惨败于叛军，在上海只剩下一批无所事事的忠贞追随者，有些人还因为最近纺织业的衰退而破产。就在孙极端绝望之际，马林旧事重提，建议国、共两党间「对等和平行的合作」。孙断然拒绝。另一方面，张继推荐李大钊拜会孙，即使李愿以个人身分申请加入国民党，似乎亦为孙所拒。孙文明显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完全解散，才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在这个关键时刻，孙文的日常访客中多了些由新任苏联驻华代表越飞（Adolph A. Joffe）派遣的俄国密使。越飞是个颇有名气的苏联学者，苏联政府派他到北京谈判，设法重建北京与莫斯科的外交关系。孙文的新访客表示，如果孙接受他们的条件，陷于绝境的国民党人就可以获得实际的物质援助。与此同时，多数在上海的国民党高层领袖，以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将领，纷纷向孙要求军需供应，并提议尽快与俄人结盟。

外在的利诱和内在的压力终于软化了孙文的坚强意志。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他在上海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俄国和共产党问题。国民党高层约五十人出席，陈独秀和几个共产党的主要人物亦应邀与会。虽然国民党工运人员大力反对，仍然达成改进国民党的协议，允许共产党要员数人参加改进运动，并选举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个小组起草《国民党改进案》。

经过约两个月的工作，新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提交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并获得通过。这是一份并不十分严谨的文件，例如，总理有掌管党务的权力，但总理的职位却不

限于某一个人，委任总理的办法也没有载明。一般的党务由六个部门和五个委员会处理，各部人员经全党代表大会提名，再由总理委派。然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则非常严谨，明文规定开除任何属于另一党的国民党党员。既然陈独秀参加了新总章的起草工作，这就显示孙文一直坚持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共只好屈服于孙的固执要求。

总章通过两週后，越飞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抵达上海，要求修改国民党的决议。李大钊立刻获准加入国民党，但维持中共党员的身分，这表示孙文最终突然改变了长期以来的立场。

作为对孙的补偿，越飞同意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公开宣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且，越飞再度向中国民众声明，苏联有意履行两次《加拉罕宣言》的承诺。此外，越飞显然还提出向孙提供物质援助的具体计划。

越飞从上海转往日本，孙文派遣廖仲恺随行，在日本谈判其他细节。廖是孙最信任的助手和财务专家，在陈炯明叛变前任孙的财政部长。其他国民党高级党人还在高谈阔论「无责任借款」时，廖就不以为然。他比党内任何人更清楚财政的问题，而且较为实际，他的论断获得孙文的全力支持。俄人似乎坚持国民党允许中共党员加入，作为俄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交换条件。廖仲恺显然最能劝说孙文接受俄人的条件。（註1）

从这个时候起，国民党人就很少提起禁止党员加入他党的事。新总章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名存实亡。因此，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毛泽东和其余的许多中共高级党人，不久都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正式取得国民党的党籍。

2

越飞赴日本后不久，南方政府再次邀请孙文回来担任名义上的领袖。另一群小军阀把陈炯明从财源茂盛的广州赶跑。和陈以前一样，这些小军阀欢迎孙文成为挂名领袖。孙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以胜利者之姿重返广州，但他现在放弃了大总统的称号，自任为南方政府大元帅。支持孙的军阀都只管捞钱，任由孙文及其政治追随者、国民党资深党员和中共党员进行政治活动。

中共利用这个新环境，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几乎公开地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註2）经过冗长的讨论，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全

力合併；从一九二三年初到一九二七年夏天，所有中共党员都同时拥有国、共两党的党籍。

在斗志昂扬的青年共产党员协助下，国民党大力进行改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许崇智等军阀控制着广东省所有经济资源，但俄国的卢布大量流入广州，大大增强了孙文与这些人的谈判力量。

由于俄国当局的邀请，孙文派遣代表团赴俄，考察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一九二三年八月中旬，包括蒋介石和几个老国民党人的代表团起程前往俄国，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经常和托洛斯基和史达林会谈，听取二人介绍俄国的共产党组织、红军制度以及政治和经济状况。蒋介石等亦被邀请到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另一方面，列宁派遣着名俄人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到中国，协助孙文的革命工作。加拉罕（着名的《加拉罕宣言》的作者）其时接替越飞担任苏联驻北京大使，开始与北京政府重新展开谈判。鲍罗廷带着加拉罕的介绍信，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抵达广州。鲍罗廷生于俄国的犹太家庭，幼时原姓格鲁申贝格（Grusenburg）。年轻时由俄国到美国居住，简化姓氏为贝格（Berg），在芝加哥开办商业学校。其后重返俄国，改姓鲍罗廷，成为布尔什维克在墨西哥和苏格兰的鼓动者，曾任土耳其元首凯末尔（Mustafa Kemal）的高级顾问。他有不凡的个人魅力，风采慑人。鲍罗廷和孙文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因此两人可以私下交谈。

孙文听从鲍罗廷的建议，在十月二十六日指派廖仲恺和谭平山等九人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工作。青年共产党员的勇于任事，不久就使一群国民党的老党员感到警惕。他们虽然感激俄国的援助，却在十一月十二日孙的寿辰当天向他请愿，表示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陈独秀。

对于这些人的反对，孙置之不理。他解释说，广州与莫斯科的关系是他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直接建立的，陈独秀与共产党人没有参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因为信仰国民党的宗旨并要分享俄国的援助。他强调说：「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孙文可说是言而有信，在十一月时，鲍罗廷试图改革国民党成为一个农民和工人的政党，提出在中国没收地主田地的新土地政策。国民党如若接受这个建议，就只能自动消失，变成另外一个共产党了。孙文断然拒绝鲍罗廷的建议，但接受关于改组的意见。因此鲍罗廷在给莫斯科的祕密报告中嘲笑孙，说他是个自大狂，对他的五权宪法自以为是，其

实三权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另外两权则来自中国早期的政治家。鲍罗廷认为孙文思想落伍，是「愚昧无知的小总督」，不足以承担任何进步与合理的任务。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孙文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长达十日，其间曾休会三天，对列宁逝世表示哀悼。与会代表共一百九十六人，半数为孙文指派，半数由各省党部选送。除了老国民党人，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和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要员。

在一次会议中，共产党员的问题又被提出讨论，但孙文再次不顾反对意见，即席找来李大钊提出口头说明。下面是李的部分声明：

> 我们（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国民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註3）

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政纲》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总章》原件由鲍罗廷以英语起草，廖仲恺译成中文，未经显着改动由大会通过。总章的本质是独裁的。名义上党的最高权力属于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权力首先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然后属于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最高权力集中于总理，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毋庸置疑的最后决定权与否决权。再者，总章甚至定为制度，孙文是唯一有资格担任总理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党章下，任何政治团体甚或个人，只要有总理站在他的一边，都可能不顾多数派反对而统治全党。与党魁的独裁权力形成对比的是，党章并没有规定党员不准参加别的政党。

《政纲》放在《大会宣言》内，二者合併成一个文件。在分析共和时期的政治缺失后，国民党吆吁建立一个联邦政治制度，国家宪法和各省的宪法一同实施。促进普选、人民的基本自由、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和土地法。有独佔性质的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

至于外交政策，国民党吆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于自愿放弃这

些条约的友好国家，国民党政府将视为「最惠国」。

为了对党进行政治管理和监督，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党的领导层认真讨论后，孙文被赋予亲自挑选所有候选人的权力，然后将候选人提交大会集体通过。孙提出的人选包括：一批主要的国民党元老，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和戴季陶；所有在孙麾下的军事将领，如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许崇智和柏文蔚；一批激进的青年共产党员，如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毛泽东和张国焘；一两个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如蒙古人恩克巴图和满人傅汝霖。在这个原则下，许多曾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党员落榜，而一些年轻的、那时在党内还是没没无闻的党员，如张国焘和毛泽东，却置身党内最高机构。张与毛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祕书处，以及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和军事等八个部，构成了广州的中央党部。由于鲍罗廷的影响，位居首位、最大且最重要的组织部由谭平山任部长，谭是那时最杰出的青年共产党员。根据规约，谭负责委派党的组织人员、批准或拒绝入党、同意或拒绝申请建立党支部、制定条例和对各党支部解释党章。

另一个能干的共产党员林祖涵接掌农民部，管辖所有国民党领导的农会。虽然其余各部的部长都是国民党元老，但各部的祕书全是与共产党有关的激进青年。国民党元老全忙于处理各部的行政事务，各部的祕书就成为实际的主管。例如，廖仲恺是工人部长，但也是包括祕书处在内的十二个部门的领导。于是，以前在华南一直和国民党工运人员是死对头的冯菊坡，就成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理工人部长。虽然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中央党部好像是被共产党接管，但长期被忽视的党务现在的确效率大增，国民党几乎在一夜间改观。

为了推动华北的党务，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各地设立了执行部，但其中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在实际运作。李大钊指导北京的执行部，直到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遇害为止。上海的执行部由一批国民党元老管辖，年轻的毛泽东任组织部祕书，这是毛在国民党旗帜下的第一份工作，但不久被迫离开上海，回到故乡湖南，在那里为共产党祕密开展农民运动。上海的执行部慢慢地成了老国民党人的避难所，因为他们在广州同鲍罗廷顾问和年轻的激进派无法和平共处。

由于俄国提供经费与经验，再加上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加入的新党员勇于任事，给垂死的国民党注入新的生命。国民党的復活确实是现代政

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国民党改组后的所有事业中，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最是不同凡响。这个军校最终帮助国民党清除广东的地方军阀，巩固对华南的控制。也是这所军校的毕业生最终帮助他们的蒋校长成为中华民国的蒋总统。

3

蒋介石的早年生活，像其他统治者一样隐藏在歷史迷雾中，早已成为传奇。一九二○年代，河南就有一个来歷不明的农民宣称他是蒋的哥哥。这事一直到了红色政权建立也没有人提出疑义，更增加了蒋介石传奇的神祕色彩。

蒋的官方纪录显示，他乳名瑞元，学名志清，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生于浙江奉化一个盐商的家庭。父亲在他八岁时去世，享年五十有四，由年仅三十一岁的母亲抚育成人。一个年轻的寡妇生活在古老的大家庭里，还带着原配留下的成年子女，命运是悲惨的；蒋永远没有忘记母亲守寡的痛苦生活。

在乡下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一九○五年春，年轻的蒋志清到了日本，但不久归国，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就读。一九○七年春，蒋获官费再往日本，进入为中国学生设立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完成基本的训练后，在日本陆军一个特殊的部队入伍为士兵，期望日后能被选入日本着名的陆军士官学校。蒋在一九一一年夏天归国前，始终未能进入士官学校。

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蒋组织了浙江敢死队约二百人，支持在上海的革命军都督陈其美，受命为团长。为了协助巩固陈在上海一带的革命领导地位，蒋亲手刺杀了卧病医院的陶成章。陶是同盟会一个有力派系的领袖，也是光復会不容置疑的首领，是陈其美争夺当地革命领导权的主要对手。蒋因刺陶入了上海警察的凶犯名单，遭各国租界追捕。

二次革命失败后，蒋和他的把兄陈其美逃亡日本，参加了孙文的中华革命党。在国民党低潮的岁月，蒋加入长江流域一带很有势力的祕密会党青帮，也投入上海股票市场。开始时赚了点钱，破产后又回归政治。他的许多朋友和把兄弟都到北京去碰运气，蒋却走了相反的方向，一九一八年断断续续地在陈炯明的总部担任中级军官。再次投身革命时，蒋改名为中正，字介石。一九二○年代中期，蒋成了广州的后起之秀，无知的西方记者以广东方言音译「蒋介石」为Chiang Kai-shek，此

后就沿用为他的英文姓名。蒋成了着名的委员长后，却选择蒋中正作为正式名称。

蒋出入陈炯明幕下时，在粤军中并不引人注目，把蒋推荐给陈炯明的孙文也不重视他。实际上他受到南方人的严重歧视，因为他对于广东方言，除了军队一些下流粗话，一点也听不懂。一九二○年后，全国都陶醉于《加拉罕宣言》的甜言蜜语时，蒋介石似乎亦视俄国为一个新的希望，开始学习俄文。但他放弃了一九二○年孙文派他去俄国考察的机会，因为他自认当时只是一条小鱼，在大鱼充塞的池塘里难有作为。

然而在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中，蒋和孙的关系突然变得密切起来。当孙文在一艘砲舰上与广州的叛逆孤军作战时，发现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常在左右。蒋获悉叛变事发后，立刻赶到广州，他的军事知识和个人勇气给孙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蒋介石就这样超越了许多国民党的前辈，进入了党的内层，成了孙不可或缺的助手。一九二三年秋，又有一次去俄国考察的机会，他欣然接受，并担任代表团的团长。

从俄国归来后，蒋负责军校的筹备工作，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被任命为国民党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军校在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註册入学的学员四百七十人。名义上孙文是军校的总理，但学校的行政仿效苏联的模式，由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负责。

在蒋、廖二人的双重领导下，教学和管理人员分为几个部门，教学又分为政治部和教练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胡汉民和汪精卫等杰出的资深党员也加入为政治部的教官。除了这些老前辈，还招募了年轻的知识分子担任各级政治教官，他们大多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又出国留学。戴季陶在一九二四年底离开广州，职位由年仅二十八岁、从法国回来的周恩来继任。在周的领导下，许多共产党员都在政治部任职，着名的有和他一起回国的陈毅和聂荣臻。

教练部由出色的粤军将领李济深任主任。李原籍广西，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从基本军事学校到最高的军谘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的训练，在粤军中逐步升至最精锐的第一师师长。他因为工作繁忙，不能在军校任全职，教练部实际由何应钦主持。何来自贵州，时年三十五岁，曾在日本受训。学生队由广东人邓演达指挥，邓在中国完成军事教育后留学德国，当时还不满三十岁。邓的工作效率极高，献身于国民党和社会主义，在热血澎湃的军校中成为最积极任事的一员。

除了本国教职员，俄国人担任的工作更为重要。首先，在军校草创

期间，学校的维持费用、枪械和给养都来自俄国。开创的规划及后来的管理与课程都由第一流军事天才加伦将军（General Galen，是俄人布留赫尔〔Vassili Blucher〕在中国的化名）带领的大批俄国军事顾问共同参与。在一九二○年代中期，蒋介石指挥革命军时最初取得的成就，大部分要归功于加伦。

从军校的课程看，它的军事训练浅薄得可怜。学员们只受到六个月的基本训练，仅仅是现代军队的军士训练程度，完全谈不上军官训练的水平。然而军校灌输给它的毕业生的，是一种无形的精神，使他们以后打赢了无数次的战役。虽然多数学员是从中学招募而来，对政治理论所知不多，然而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们在军校里再受到当代中国最热情的革命家六个月的教化熏陶，毕业后都成了盲目狂热的爱国者，愿意为国家和党献身。他们经过六个月的军事训练，勉强可以应付一九二○年代的原始战争，但高昂的士气却使得他们所向披靡。

第一期的学生尚未毕业，第二期招募的五百人已入学受训，到了一九二四年底，已有学员约一千人可以投入战斗。不久两个教导团就组织起来，由黄埔毕业生充任班长或排长。何应钦从教官转任第一团的团长。在一九二四年年终之前，用转任或招募的方式任命了各级党代表，这样就为将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奠定了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成绩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广东省那时为一群军阀统治，陈炯明的军队仍然佔据粤东，对广州虎视眈眈。广州市及其附近一带被滇军和桂军控制，名义上在孙文旗下，实际却是独立的。广州的街道由一个买办陈廉伯指挥的数千人商团巡逻。商团有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撑腰，配备英式枪械，宣称要消灭「孙政府」。

此外，广州的国民党人更因为自己领袖无理的固执而变得束手无策。孙文无视内部的反对和广州岌岌可危的局面，仍然念念不忘对控制北京的直系军阀发动北伐。孙在粤北的韶关设立总部，与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结盟，督率几个似乎服从命令的地方军阀杂牌部队，准备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内战。一九二四年十月初，广州的情况危急，孙命令蒋介石放弃黄埔军校，率领学生队和刚刚召募的新兵北上参加北伐。蒋抗命，坚持国民党在和北方的军阀开战前，必先巩固广州的基地。其实这也正是孙文与前都督陈炯明争论的重点。

孙文还来不及重申他的命令，就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黄埔的学生队和商团在广州西郊发生战斗。虽然学生队极少实战经验，却是勇勐无比的战士。战斗从郊区蔓延到广州市内，学生队高声呐喊攻击，商

团溃不成军。几小时的街头肉搏后，数千装备精良的商团弃械投降。这次的胜利使孙文的权威首次进入广州市内。

一星期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佔领北京，软禁总统曹锟，迎接前总理兼皖系领袖段祺瑞回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冯、段联合通电，邀请孙文和张作霖到北京，共商国家统一。北京新的政治危机使北伐毫无意义，孙决定接受冯、段之邀，结束韶关总部，返回广州。

十一月初，孙令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在他离开广州期间主持南方政府。孙随即于十一月中旬离开广州前往日本，行前组织了一个参谋团，到北京与他会合。孙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抵达北京，华北大批民众夹道欢啕，热泪盈眶。他对这垂死的国家而言是一个新希望的象徵。但是，执政段祺瑞的态度相当不合作，孙文尚未达成任何协议，竟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以肝癌病逝，享年五十有九。

註释

註1：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戴季陶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今日改组，又不事独立之规画，而乃以外力为动机，一切纷纠，必由此起。……而尤期期以为不可者，则借款之一事，借款非不可，借小小之款，而事事时时受人之节制，决非党之福，他日必因此而致大权旁落，不可挽回。故当日告仲恺以三点，一绝不能借款作党费，即借款亦须如旧日吾人借款之办法，绝对自由，不因借款而受牵制。……为此一事，与仲恺争论累日……盖其时仲恺一心一意，欲图党之整理与改革，而为财政所苦，故对于俄国财政援助之事，殊不敢毅然打消也。」见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台北，一九五九年），卷三，页九八○～九八一。

註2：译者按：据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歷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所载资料：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三十一号（现恤孤院路三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四十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四百二十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见网页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5/4428209.html〕

註3：译者按：引文取自〈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收于《李大

钊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下册，页七○四～七○六。

【第11章】

提心吊胆的蜜月

1

孙文在临终时耿耿于怀的是革命尚未成功。他感到失望，其实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中国革命可以由国民党那样的革命力量来一次「完成」。孙文也像所有中国近代革命领袖一样，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中国革命的性质要比孙文预期的更复杂。革命发展的过程极难预料，没有任何哲学的公式或一蹴而就的方法可以用来完成革命。某一特殊阶段常常持续数年到十年，为了解决这个阶段迫切的问题，由西方输入的某种意识形态看来比另一种更为管用，因此它就凌驾其他而成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赢得大批的追随者。但不久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已发挥几尽而变得过时，又为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因而，西方许多现代政治思想在现代中国交替出现。这些频繁的思想更替正好与新革命力量的兴起同时发生，使革命看起来具有周期性，分为许多阶段。每一个阶段看来由某一政治思想主导，譬如说，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国的革命理论家认识到各种现代的主义仅适用于中国问题的某一特殊方面，却只有孙文大胆地把各种主义混合成一个孙文式的学说，即他的三民主义。孙文无视各种不同政治理论间不能协调的矛盾，自圆其说地表示，他的民权主义即是民主主义，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一个世界性国家（universal state）（註1）是他的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基本问题，或更准确地说，对于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政治学说中根本无法协调的个人权利问题，孙文并没有答案。

虽然这样含煳的政治思想，使孙文无法被称为具有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家，却使他成为中国各式各样革命的象徵，民主的、民族的、纳粹的或共产的。和林肯一样，孙文也死得其时，不必为他制造出来的争议亲自作出决定。

中国各种不同的革命运动构成了「未完成革命」的一连串阶段，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改组是又一个阶段的开始。虽然孙文仍是总领袖，但这是一个全新的运动，有新的意识形态和一批新的革命党人作为骨干。它一如既往，以一个包含不同团体的统一战线开始，有年长的前同盟会

成员，也有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共产党员，有腰缠万贯的新中产阶级领袖，也有身无分文的农民。

这个新的统一战线要比孙文在一九○五年领导的同盟会复杂得多。不同的团体的确代表了一个转型社会中某些特定利益、意识形态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前一个阶段的意识形态，即共和主义与代议政府，对作为新革命之骨干的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已经不合时宜。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连同严肃的生活和铁的纪律，现在大行其道。因此，一九二○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必须是个左派才显得进步或高明。

国民党改组后，虽然年长的国民党资深党员因名气大仍据有高位，他们的想法和体力已不足以在新的阶段实际担任领导。用蒋介石的话说：「老同志是古董，仅供摆设。」新旧两代革命党人的不协调，更鲜明地反映在国民党的老党员和鲍罗廷带领的青年共产党员之间，不久就使得老党员发起反共运动。两党开始时的亲蜜合作变成了相当提心吊胆的蜜月。

2

第一个反共运动由张继带头发起，他本是最热心鼓吹国民党容共的人。一九二四年六月初，两党合作才不过六个月，张继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两份共产党的祕密文件，其中要求所有青年共产党员，把国民党内所有具有阶级觉悟的人都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註2）

张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分，拿了这些共产党密谋从内部渗透的证据去见孙文，同时要求鲍罗廷作解释。然而，对于这个反共的举动，孙文看来要比他的俄国顾问更为不快。七月，在特为这个问题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孙文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否决多数人的反共意见。他愤怒地宣称：「如果你们都反对共产主义，我就去加入共产党。」（註3）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重演，孙文进一步限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它的权力转移到一个较小的机构。在这次全体会议后，他立刻组织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由他个人领导，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孙去世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已是国民党体制内行使党最高权力的常设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了橡皮图章。

一九二四年十月发生商团危机时，孙文甚至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打算集中党的权力，选择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的年轻党员为委员会

成员。他下令说：「革命委员会可随时以总理的名义发佈命令。」鲍罗廷是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设计者，急于一举清除党领导层内的老党员。他建议革命委员会除了廖仲恺和谭平山外，应该加上蒋介石，但不包括胡汉民和汪精卫。鲍罗廷说服了总理，但没有说服蒋介石。蒋的资歴太浅，还不能晋升到领导层。蒋更表示，革命委员会如果没有胡和汪，他也不会加入。

这个小事件显示，到了一九二四年底，鲍罗廷藉着苏联的卢布、枪械和给养，加上个人的口才，已完全掌握了孙文。孙在十一月北上前，甚至公开命令他的追随者要像听命于他一样服从鲍罗廷顾问。一九二四年底，鲍罗廷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把国民党的权力完全从老党员那里转移到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少数几个亲共的年轻激进派手里。他代替了孙文，现在成了国民党的真正独裁者。因此，孙文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后，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国民党老一辈领袖们发现，广州再也不是值得居留的地方。他们集体离开广州，追随孙文到北京，希望说服孙改变主意。孙的逝世，使得他们对返回广州和重掌权力完全绝望。

这个时候，随孙文同往北京的鲍罗廷和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大使加拉罕商议，选好了继承孙文的国民党领袖。有报导说，最初他们心目中有三个候选人：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最后他们放弃胡、戴而看好汪，因为胡顽固而「不易相处」，戴则「无法预料」。他们认为汪是个「有野心的人」，但只是有野心而已。他们召唤汪到苏联大使馆，告诉汪他们的选择以及将来苏联会给予支持。汪满心欢喜，对自己能够继承总理的衣钵深具信心。

在同一时期内，蒋介石带领着新组成的革命军与一些地方部队合作，成功地完成了统一广东的第一步。一九二五年初，蒋发动他的「第一次东征」，攻击陈炯明在粤东的叛军。经过两个月的血战，在三月底佔领汕头和潮安。五月六日，汪精卫在东征大胜之际由北京抵达潮安，亲自与刚打胜仗的蒋司令官会谈。汪返广州前似乎赢得了这位崭露头角的军事明星的坚决效忠，蒋随即也凯旋回师广州。

六月中旬，蒋介石迅速地将在广州郊区的杨希闵和刘震寰的部队缴械。广州市和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因而第一次处于国民党的有效控制下。汪精卫于是开始政治行动。到了六月末，汪巧妙地在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取消大元帅府，由七月一日成立的国民政府取代。（註4）

在新的制度下，国家元首称为国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选

出。汪获得政治委员会的全票，包括他自己的一票，共十一票，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汪投自己一票这件事不久成了国民党的政治丑闻，因为这违反了传统的政治伦理，在中国政坛从未发生过。此外，政治委员的投票，不能和总统的竞选相比。它是一些老同志之间友谊的试探，相互推荐担任这个最高荣誉的位子。汪对权力的渴望，使他忽略了应有的对老朋友、老同志的礼貌和尊敬；他们同样值得尊重，也有资格得到这个荣誉。九个月后汪终于下台，没有人施以援手，可能是汪自投一票种下的恶果。

政治委员会是一个没有党章依据的法外机构，做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改变，却没有通知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务委员会。因此，在大多数国民党老党员的眼里，汪当选为新主席是一个针对胡汉民的政变。当这位前代理大元帅被贬为新政权底下的外交部长时，许多老一辈领袖闻讯，热泪盈眶，据说戴季陶还悲极而泣。

此后不久，戴季陶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叫《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巧妙地论证，汪领导的国民政府是非法的。虽然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孙故总理创立的，却不能滥用，因为国民党不只是总理遗留的一个组织体制，而且要体现他永恆不变的主义。任何委员会不可以通过违背他的主义的议案。戴因此主张用民主的方式来执行党务，党员对党的责任和在党内的活动，只能是「用很正当的方法，做争决议的功夫」。（註5）

鉴于国民党当时仍然和睦相处，戴不愿意归咎于个人，而只说是右倾或左倾的「幼稚」。不过，作为国民党人，原则上他可以「忠告」党内的共产党员，要他们放弃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如若不然，他们就该发展自己的独立政党，「不要做自欺欺人的国民党党员」。（註6）最后他呼吁所有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团结起来，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

戴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的定义，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画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右派老党员都拿它当作新的福音，藉以进行反共，重新夺取权力。党内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派分子，在汪精卫、廖仲恺和蒋介石的领导下，斥之为反革命。这样，国民党的左右两派之间正式展开意识形态的内战。不久共产国际也来参战，几乎在他们的所有刊物和言辞中谴责戴季陶，给戴扣上了反革命的「戴季陶主义」创始人的帽子，认为这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大敌人。

冷战之后不久就发生流血事件。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左派三巨头（汪、廖、蒋）中最敢言和最勤奋的廖仲恺，在中央党部大楼办公室前被蓄意暗杀，暗杀者显然是右派同志。鲍罗廷利用这一事件，打算在广州拘捕所有重要的右派领袖。当有人提出证人的问题时，鲍罗廷回答说，拘捕应以意识形态为准，不必根据法律证据。鲍罗廷无疑得到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的支持。汪在廖遇刺后两日的一个公开演讲中强调说：「我们同志要反帝国主义的，便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使中国永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国主义之永保势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註7）

在廖仲恺的追悼会上，蒋介石也宣称：「从现在起，同志们，我们要与反革命分子为敌，和『反共产派』对抗，以慰廖先生之灵。」随后一个指挥对抗反共产派行动的特别委员会被组织起来，宣佈戒严，并跟着逮捕了许多人。所有过去对共产党或一般左派有意见的人，都遭到蒋介石的部队监视。

受害者的名单，不久甚至延伸到一些亲共但与汪、蒋二人的领导对立的领袖。九月十九日，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突然被他的参谋长蒋介石逮捕或劫持。许随即从广州给送到上海，他的粤军也跟着被能干的蒋参谋长改编，合併到黄埔部队去，不久就重新编为着名的第一军，由蒋直接指挥。与此同时，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转到第一军任政治部主任。

放逐许崇智后四日，胡汉民也给「任命」为国民党驻苏联的代表，不得不登上俄国军舰离开广州。然而，胡绝对不是个右派，反而是第一个替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第三国际为正式成员的重量级元老，只是申请被共产国际拒绝了。他被迫离开广州是因为他的堂弟胡毅生遭人指控为右派。

此后，华南的国民党政权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指挥下笼罩着红色恐怖。汪、蒋二人被他们的共产党崇拜者誉为中国的托洛斯基和史达林。

3

虽然汪、蒋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维护者，二人却不如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样，急着要实施社会主义政策。这两位领袖致力于国民革命。蒋介石常常提到国民革命，但只是作为实行三民主义的一个笼统口号；他从未提出如何付诸实施的方法。

汪精卫拟订了国民革命三步骤的方案。由于他认为孙文的民生主义

即是共产主义，他不主张在国民革命的三个步骤完成前付诸实施。汪在题为〈怎样才能实行民生主义〉的演说中指出，三个步骤如下：「第一步是联合全民实行政治革命，以打破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第二步是联合全民镇压反革命者以实现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以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为根据以实行民生主义。」（註8）

汪坚持这三个步骤要一步一步地全部实施，他强调说：「不可半途而废，也不可躐等，我们的理想中，纵然有极高尚极完美的主义，但都是第四步以后的事」。（註9）汪坚决认为，在革命的阵营内，不允许任何政党提前採取任何政策，以免混淆了革命的程序。

汪的三个步骤，其实就是孙文在辛亥革命期间提出的《革命方略》的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社会主义修订版。汪的新修订版代表了那时多数国民党人的信仰，但这显然与当时共产党人的信仰不符。

共产党人从来不接受全民革命的想法。从与国民党合作开始，他们就人为地把国民党人分为左右两派。根据共产党的定义，右派如西山会议派是反革命分子，要尽快清除。左派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或淡黄的民主社会主义者（yellowish democratic socialists），共产党人可与之结盟，但不能合併。与国民党合作的真正目的是发展共产党自己独立的组织，使他们可以逐渐取代国民党的革命领导权。如果左派国民党人将来拒绝转变为正式的共产党人，就只能是下一批要清除的对象。共产党人也期盼实现一个人民的国家和人民的政府，但它们的颜色必须是红的而不是黄的。汪所说的第二步已经走得太远，使得共产党无法与国民党合作，遑论第三步和第四步了。

当时的许多祕密文件透露，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技巧一般来说是追随在后。只要汪和蒋不能真正变成中国的托洛斯基和史达林，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组织就会继续独立地成长。国民党在完全转变为共产党之前，共产第三国际不会批准它要求加入的申请。

在汪、蒋联合领导的庇荫下，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迅速发展。因为国民党新招募的年轻党员，要先由共产党人主导的组织部委派国民党党工人员严密调查后才被接纳，国民党的成长直接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

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员在给莫斯科的正式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发展甚缓，全国党员不超过一千人，加上共青团也不超过三千人。但单在一九二五年，共产党增加了十倍，就是说到了一九二六年初，党员人数达到了三万人。到了那年

年底，前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谭平山作为中共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报告，在一年之内，中共党员的人数增加了四倍。

因此，孙文去世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党职，尤其是与招募党员和组织群众有关的部门。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农会和工会，不是共产党的农民和工运人员差不多全被挤走。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名义上这个大会是由国民党劳工部召集，却是个共产党的集会。有一百六十六个工会的代表二百七十七人出席，号称代表中国有组织的五十四万工人。大会表决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而且不久就建立起来，并推选前海员大罢工的领袖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和毛泽东当选为副委员长。总工会随即表决通过加入赤色职工国际（The Red Trade Union International）。

与主张温和的中国劳工运动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不同，第二次大会是纯粹的共产党色彩，宣称中国劳工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由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阶级斗争，决不能妥协。

五月三十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后三星期，上海发生了总罢工，起因是一个中国纺织工人为日本雇主所杀。罢工迅即蔓延到所有棉纺厂和其他行业。罢工开始后，共产党人立刻组织所有罢工的工会，成立上海总工会，并选出曾在苏联受训的年轻湖南党员李立三为首任主席。六月一日，李签发通令，宣佈实行总罢工。一百一十五个行业单位的十五万七千工人立刻离开各自的工作。在工人的吆吁下，大多数上海商店罢市，以示同情。这就实际上瘫痪了上海市，并开始了一个全国的反日运动。

在这次罢工中，国民党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显示它的实力。罢工也使李立三成为以后五年的主要劳工领导人。

跟劳工运动类似，共产党人带领的农民运动也蓄势待发。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期间，同时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随即成立了广东省农民总会，号称代表来自省内二十二个县有组织的农民二十万人。和劳工运动一样，农民运动也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由有效率的共产党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员指挥，着名的有彭湃和毛泽东。彭出生于广东省东部海丰县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时任国民党农民部祕书。毛泽东其时三十二岁，是国民

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毛泽东的事业从在这里组织农民开始，最后引领他掌握大权。

4

毛泽东是湖南省南部湘潭县人，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是三个儿子中的长子。父亲毛顺生，拥有肥沃的稻田二十二亩，住的是瓦房，部分还是两层楼的。毛顺生也做米和猪的买卖，手上经常有大洋二、三千元，以高利借贷给小商人和农民。这些家庭生意看来非常兴隆，因为十来岁的毛泽东每晚都得替父亲算帐，这在中国农村颇为罕见。

中国大陆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出版的一本毛泽东传记说，毛顺生暴戾贪财，曾短期入伍当兵，并在那时积下了一点钱。毛泽东对第一个为他正式作传的美国作家史诺（Edgar Snow）说，他并不喜欢他的父亲。辛勤劳动的父亲似乎也礼尚往来，动辄批评他的长子「好吃懒做」。

毛泽东八岁时，给送到农村的私塾学习儒家经典，直到十三岁，但他读得更多的是英雄豪杰一类的小说。在他离开私塾的那年，他和一个比他大六岁的农村女子结了婚。

没有证据显示毛一家人亲自下田干活，因为按农村的标准毛家算是富有的。一九○九年，毛泽东十六岁，父亲送他到一所都是富人子弟就读的新式学堂。过了一年，又去长沙进入一所更昂贵的学堂学习「新学」。辛亥革命期间，毛曾短期在革命军当兵，然后考入长沙最好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毛年轻任性，厌恶「繁琐的学校纪律」，转读水准和声誉较低的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读五年，完成他的正规教育。

一九一八年底，毛泽东和一群同学前往北京，希望参加去法国的勤工俭学。在逗留北京的短暂期间，毛获得一份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大洋八元。这份工作的介绍人是毛在长沙的老师杨昌济，杨的女儿后来和毛结婚，两人大胆採用了即使在当时也算新潮的「试婚」办法。时值五四运动前夕，是一个北京大学大多数的教授和学生都以天才自居的年代。毛泽东偶尔在他们高谈阔论的集会出现，却被视为仅是个从落后乡下来的半文盲农家子弟。这种屈辱的经验使未来的独裁者终身难忘。也是在这里，半文盲的乡巴佬学习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一课。

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回到长沙，和一群朋友组织了名叫新民学会

的学生团体，出版了几期只有一页的学生刊物《湘江评论》。一九二一年，他以前的雇主兼老师李大钊筹办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这个小团体使他获得出席大会的资格。

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一九二四年获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在其后的两年中，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使得毛在国民党政权里步步高升。一九二四年末，他被戴季陶逼离上海，但在一九二五年底回到广州，担任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而戴季陶却被迫辞去部长的职位。毛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取得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一职。有如李立三之于劳工运动，毛后来成了主要农民领导人，尤其是在他的原籍湖南省。

5

共产党人主导国民党的党务相当成功，但在要主导任何革命最重要的工具—军队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一九二五年底，在干练的俄国顾问协助下，广州军事委员会重新改编约九万多人的国民党部队，统一指挥。仿效苏联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六个军。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一军，其余五个军的军长分别是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和程潜。他们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年龄上也比较成熟，不会只为几句口号就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所能做的，只有通过能言善道的政治指导员去说服较低层的军官和士兵，或者去争取黄埔军校的学生。

到了一九二五年末，黄埔的学生达到了三千人。这些热情的青年军人渐渐成了国民党一股决定性的力量。虽然俄国顾问和多数是共产党人的中国政治指导员竭尽全力，也不能说服所有学生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学生和非共产党学生之间渐渐产生了隔阂。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鲍罗廷的指示下组织起来，包括了大多数共产党学生。三个月后，在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类似的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成立了，几乎包括了所有非共产党学生。此后，这两个团体间的摩擦越来越严重。当毕业的学生被任命为军官后，摩擦就从黄埔军校扩散到革命军里去，特别是在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一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向鲍罗廷和中共效忠，孙文主义学会视蒋介石为当然领袖，后者还成为其他反共派系争相渗透的团体。

起初，汪精卫和蒋介石似乎真的为他们共同领导下产生的分裂感到难过，但当这两个领袖或两党开始各自争取权力时，青年军人联合会只

听命于共产党，而孙文主义学会则成了蒋介石的私人势力。事实上，孙文主义学会为未来国民党内的黄埔系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它帮助蒋介石争取权力，控制国民党，另一方面它又帮助国民党最后镇压共产主义运动。

再者，共产党人不仅很难渗透国民革命军的前面六个军，对在一九二五年底加入国民政府、由邻省广西将领指挥的第七军也完全没有影响力。

广西的地方军阀也经歷一段分分合合的常见过程，几乎和广东同时统一。一九二二年，广西的国民党政权因孙文、陈炯明交恶而崩溃后，全省为几十个当地的军阀割据。跟着是两年的内战，最后由三个年轻的军官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取得胜利。这三人受过中国现代军事学校的良好训练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洗礼，决定加入国民党的阵营，向孙文大元帅请求委派正式的职位。孙文採取以前应付许多广西的不友善军阀的同样办法，按照他们的要求给予官衔。此后，三人在外援极少的情况下统一了广西，并转而支持国民政府统一广东。两省随即正式合作，广西部队组成第七军，以李为总司令、黄为党代表、白为参谋长。但在他们和国民政府的合作期间，从广西省的行政、党务到第七军的补给，始终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因此，直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去大陆前，这三人和他们的集团，被称为国民党内的新桂系。他们尽管在各方面协助广东的国民党当局，但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部队，隔绝了共产党的渗透。

6

一方面广东的革命力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离开的老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一九二五年九月初，老党员们计划採取集体行动，和广州对峙。经过数月的个别协商，十四位出走的中央委员，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孙文停柩的碧云寺开会，宣称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会议的参与者通过五项决议和一篇宣言，要求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离，解除俄人鲍罗廷顾问职务，将中央党部移往上海，尤其重要的是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他们自称是党的最高当局，宣佈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作为对他在广州错误行为的警告。

此后不久，他们在上海成立正式的组织，设立独立的中央党部。这个新组织一般称为西山会议派，被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右翼反共派系。然

而，他们在宣言中明白宣示，西山会议派并不自命为反共机构。虽然他们公开警告本党党员注意「共产帝国主义」可能的阴谋，但只要废除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恢復在他们领导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他们仍然建议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因此西山会议派的性质是一群为国民党新领导层清洗的老党员。

西山会议派企图重获他们在党内失去的领导权，想要与蒋介石联盟来打倒汪精卫。因此在上海和其他地区，他们集中力量攻击汪精卫。然而，他们精明的策略却激怒了蒋介石，后者谴责西山会议派为反革命分子。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蒋介石在纪念十月革命八周年的宴会上发表公开演讲说：「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最有力量，最能动人听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的指挥。』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的指挥。—但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说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情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註10）这位年轻的将领慷慨激昂地问他的同志要为什么牺牲生命？然后他自己回答说：「我们为三民主义、也为共产主义而献身。」

在「第二次东征」快要胜利完成时，蒋介石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汕头发表又一声明。引用孙文的「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蒋谴责西山会议派为反革命，背叛总理遗教。蒋说：「今日中国革命已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革命成功则世界革命为之促进；亦世界革命成功，中国革命始真正成功。」（註11）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汪精卫领导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期正式结束，张继带头的西山会议派几个首脑被开除出党，其他人也受到别的纪律处分。

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扩大了两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戴季陶，所有参加西山会议派的老党员都被赶出领导机构。除了汪精卫和胡汉民带领的几个国民党资深党员之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十六个委员中，有七个是由李大钊带领的共产党人；二十三个候补委员中，有包括毛泽东和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在内的七个共产党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委员和八个候补委员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

在两个中央委员会新出现的名字中，有一大批近来在党内崭露头角的青年。除了首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蒋介石外，他们是一些新的军事明星、年轻的行政人员和党的组织人员，这包括了故总理的公子孙科、宋子文和三位年轻女性—宋庆龄（孙文夫人）、何香凝（廖仲恺夫人）、陈璧君（汪精卫夫人）。委员们不必说多数是汪精卫的亲信，例如陈公博和陈友仁。蒋介石在高层也有几个亲密伙伴，特别是陈其美的姪儿陈果夫，果夫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是国民党第二次改组，大多数保守的老党员被赶出国民党。此后，汪精卫成为党的新总理，据有几乎所有党和政府的最高职位。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主席，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以及所有革命军的党代表。

汪的领袖地位其实缺乏牢固的基础。作为一个新领袖，他无法控制军队。七个革命军各有自己的传统，只对他们的司令效忠。它们也许愿意在汪的领导下合作，和北方的军阀作战，但在党内战争时不会服从汪的领导。第一军和黄埔的学生已成了蒋的个人军队。国民党没有建立不属于个人指挥的军队。再者，由于蒋此前和军阀作战取得胜利，他指挥的卫戍部队控制着广州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在他的保护之下。

在广州，能干的蒋介石就开始和他的顶头上司并驾齐驱了。但蒋不是那种甘居人后的人，因此公开表示不愿屈居「第二个总理」之下。两个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间日增的冲突，更把二人间的嫌隙扩大。再者，在鲍罗廷因公北上的时候，西山会议派渗入孙文主义学会，实施他们「联蒋打汪」的政策。因此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摩擦就越来越严重了。

内在的发展渐渐引致蒋、汪二人相互猜疑。当权力慾望使猜忌加重，同志情谊不久也就荡然无存。三月十九日，由共产党的黄埔毕业生指挥的中山舰不知何故在黄埔军校前下锚，使蒋介石的猜疑达到了顶点。蒋怀疑汪和共产党人企图绑架他，就像对待胡汉民那样，要把他送往俄国。蒋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可靠副手数人紧急会议后，于三月二十日凌晨宣佈广州市戒严。几个在广州的武装工会被立刻缴械，一批俄国顾问遭到软禁。蒋在牢牢控制广州后，向汪报告事件。二人在会面后大吵，因为没有汪的许可，蒋无权採取这样的行动。蒋显得决断而冷静，汪却突然像小孩一样大发脾气，拒绝处理繁忙的日常公务，退隐到广州郊区去了。（註12）

汪自我引退，实际上使国民党政界高层人人称快，尤其是那些九个

月前投他票的人。随后高层当局宣佈汪主席「失踪」，不知去向。那时的广州，连个小偷也无法藏身，但汪主席就是找不到。因为公务不能永远置之不理，国民党政客在谭延闿和张静江的带领下，筹划重选因汪离职而空置的各机构首长。蒋介石大力支持这个建议。结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开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兼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又推选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废除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因为苏联也取消了这个制度。谭和张二人都无法坐稳大位，蒋不久就成了政治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谭和张后来担任蒋的代理人。

汪精卫几乎一夜间失去所有头衔和荣誉，由于东方人的「面子」问题，让他没有脸面再在广州出现。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汪与妻子默默地乘船前往香港。在旅途中，他意外地遇到胡汉民。汪仅在九个月前取代胡成为南方政府的首脑。当胡和鲍罗廷于四月二十九日从莫斯科回到广州时，鲍罗廷在广州得到蒋介石和一批新主席的热烈欢迎，但他的同伴胡汉民却完全被冷落。在广州逗留数日后，胡发现此地无法居留，就悄悄前往香港。纯属偶然地，胡、汪两个来自广州的沦落人又见面了。

7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那幕戏剧（国民党官方称为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就在广州独揽大权。西山会议派三月末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新希望寄託在蒋身上，衷心电贺蒋的明智决定和自保措施。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许多右派分子在广州被捕。同时，蒋愤怒地指控西山会议派是「外国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的所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颠覆行动，应该予以无情地镇压。蒋在作出公开声明后，发表一连串亲共的公开演说，向俄国人和中共保证坚定不移的支持。

在蒋表示歉意的同时，共产党人也藉此机会重新检讨对付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举行的国际共产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产国际决定继续和国民党合作。然而在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后，由季诺维耶夫（Grigory Zinoviev）和托洛斯基带领的反对派开始建议改变中国政策，要求一个独立的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但史达林不同意，他指示广州的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执行原来的政策。

此外，经过审慎的自我检讨后，广州的俄国人和中共党员也承认犯了错误。他们认为此前在国民党旗帜下、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各种活动过于鲁莽，引起了蒋不必要的怀疑。对于中山舰事件，俄国顾问似乎责备他们自己比责备蒋介石多些，显然他们仍旧相信蒋是好朋友，正如第一军的俄国顾问斯切潘诺夫（V. A. Stepanov）将军在一个祕密会议中所说：「倘吾辈对彼灌注一小部分之革命主义，并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则可使三月二十日之事永远不再发生。」（註13）因此，他们为安抚蒋也摆出抱歉的姿态，把几个「鲁莽」的顾问送回俄国。

一九二六年五月上旬，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决定在第一军撤离以周恩来为首的政治指导员，许多共产党的军官也一起撤离。孙文主义学会的领袖们欢欣雀跃，而蒋则似乎极为不安，恳请他们归队。

不过，在汪精卫离开后，蒋採取另一措施来调整国、共两党的关系。五月十五日，他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称为《整理党务案》的决议。这个冗长的议案可以简述如下：建立两党的联席会议，以审查所有与两党有关的问题，裁定涉及两党党员的纠纷。联席会议聘请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必须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名册，表明身分。

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不得充任中央机关之部长。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註14）

这个《整理党务案》，事实上把两党合作带到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新的方案听起来好像是限制共产党人假国民党之名而行的活动，另一方面，它是国民党传统的共产党政策的大倒退。从那时起，由国民党孙故总理启动的「容共」政策突然间转变为「联共」政策。这原是布尔什维克以前提出的要求，却为孙文坚决拒绝。这样的改变正好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当中共还年幼不能自立时，国民党像让它坐在膝上的奶娘；现在它能够自立了，国民党承认它是共同事业的伙伴。

利用这个新措施，蒋介石第一次插手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他剥夺了谭平山组织部部长的位子，自任部长，并以陈果夫为该部祕书兼代理部长。

因为党内各级党务工作当时都由「纯党员」（非共产党员）和「双重党员」（共产党员）充任，陈果夫和他的弟弟陈立夫合作，开始组织一个祕密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招纳来自各级的「纯党员」，力图在国民党内从共产党或左派的群众组织人员手中接管组织工

作。由于在中央俱乐部的「纯党员」也和对手的共产党人一样激进、年轻、大胆，他们不久就在组织工作上向共产党人挑战，而且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死敌。

陈立夫，一九○○年出生，专业工程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理工硕士。他一九二四年归国，首先在黄埔军校任英文秘书，后来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由于他组织群众的能力，使他渐渐超过患肺结核病的哥哥，不久成为国民党中央俱乐部、即后来众所周知的CC系的真正领袖。CC这个名称，原是英文Central Club的缩写，却被人们误认为二陈兄弟姓氏的缩写。

一如孙文主义学会后来成为控制国民党军队的黄埔系的骨干，CC系控制着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此后三十年，它们成了蒋介石的中国独裁制度的两大支柱。

当新的《整理党务案》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付诸实施时，眼下国、共两党似乎都感到满意。因此，红蓝双方提心吊胆的蜜月持续到即将来临的北伐。

註释

註1：译者按：这是唐先生自己在《晚清七十年》内的译法。

註2：译者按：两份中共方面的文件，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和《团刊第七号，即扩大执行委员会特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刊行）。见《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乙）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事实」，收于《革命文献》，第九辑（台北，一九五五年），页七二～七六。一九二三年六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于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号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大会的精神，积极参加国民运动。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此前党的决议遂成为该团的二全大会一切决议的依据和基础。附录于议决案及宣言册上的中共《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第六条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註3：译者按：可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八年），第一章第四节「孙中山与弹劾共党

案」，页四三～五三。

註4：译者按：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大本营取消），汪兆铭、胡汉民、戴传贤、于右任、徐谦、张继、谭延闿、许崇智、林森、廖仲恺、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十六人为委员，本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戴、于、徐、张、林未到）。见郭廷以编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七九年），第一册，页九○二。

註5：译者按：引文取自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一九二七年），上编，页四二。

註6：译者按：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说：「但是我苦心孤诣希望你们，要真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国的政党。要不然你们就真正组织起一个工党，或者把你们自己的党拿出来，不要取自欺欺人的态度，要明明白白以青天白日作一个道德的标准。」（见该书上编，页五七。）

註7：译者按：引文取自汪精卫，〈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收于《汪精卫先生讲演集》（上海：爱知社，一九二七年），页五五。

註8：译者按：汪演说词的原文见《汪精卫集》（上海书店，一九九二年），第三卷，页四六。

註9：同註释註8：。

註10：译者按：引文取自蒋介石，〈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苏俄革命纪念讌会讲演词〉，收于文砥编，《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一九二六年），下册，第四编（甲）讲演，页二三一。

註11：译者按：引文取自蒋介石，〈告同志书〉，收于《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第三编（乙）文书，页五一～五二。

註12：译者按：关于中山舰事件当年的史实，近年因蒋介石未刊日记在美国公开，学术界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可参看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收于《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二○○五年），页三○三～三二四。

註13：译者按：引文取自《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党分部集会对于蒋介石与俄共产党间之裂痕及利用蒋介石计画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收于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十七年》（文海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册，「广东事项类」，第三十七页（总页四七九）。

註14：译者按：参看《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和《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歷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上册，页二三一～二三四。

【第12章】

北伐与清党

1

国民党最后藉以统一中国的北伐是个旧有的计划。孙文曾尝试了几次，都徒劳无功。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并在一九二五年底取得广西的支持后，北伐又旧事重提。

然而中、俄两国的共产党一开始就反对北伐。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喉舌《嚮导週报》，一次又一次表示异议。俄国在中国的顾问和莫斯科的战略家也是这样，甚至在北伐开始后仍然继续反对。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召开的中国事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坚持国民革命军「不应开离广东省」。（註1）共产党的反对，显然是因为害怕中共还不够壮大，如果革命军迅速统一中国，跟不上军事胜利的形势。

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看来的确短暂推迟了北伐，然而不久发生一个意外事件，又使它重整旗鼓。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广东北面的湖南省爆发内战，两个地方军阀━省长赵恒惕和湘南的实际统治者唐生智师长━打了起来。

三月中旬，唐把赵赶出省会长沙。可是唐的初步胜利引来了强大的直系领袖吴佩孚。吴刚在北方彻底打败了冯玉祥，现在打算以唐的叛变为藉口，进一步控制湖南。结果，唐被逐回湘南，甚至有可能失去叛变前的所有地盘。唐在绝境中向两广求助。

广州国民政府还在和战败的唐生智讨价还价时，李宗仁领导的广西当局已经迅速伸出援手，派兵前往湘南。唐李联军与北方的来犯者相持不下，二人要求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增援。广州军事委员会看到胜利有望，派遣第四军分别由张发奎和陈铭枢带领的两个师前往湖南参战。与此同时，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国民政府收编唐的湖南部队为第八军，并任命唐为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第七军奉命与第八军并肩前进，佔领长沙。这样，虽然事出意外，着名的北伐就实际发动了。

六月五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白崇禧为总参谋长（註2），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财政部由宋子文担任部长，筹得银元五十万，充作中国中央银行的存底，发行钞票两百万元，作为北伐的启动资金。

不仅如此，由于组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把国民政府所有的权力集于一身。例如，《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八条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註3）因此，光是根据这一条，只要战争状态存在，总司令就是个军事独裁者。

七月九日，蒋介石正式就职，派遣国民革命军主力向北方的武汉进军，但部分由何应钦带领的第一军则向东挺进福建，再沿东海岸指向浙江。

北伐既是军事行动，也是政治行动。革命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在许多关键性的战斗中，北军不敢使用重武器或机关枪，因为这只会鼓励进攻的革命军冲锋陷阵，去抢夺这些武器。这是在近代中国其他内战中从未发生过的事。

邓演达领导效率极高的革命军总政治部，又是个能干的群众组织者，赢得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员的支持。在有组织的农民帮助下，邓的政工人员有时甚至在大战开打前就已经到达战区。北军经常在战败前就被孤立起来。换句话说，北伐是一个政治战争，它得到中国各行各业人民的支持。

七月二十七日，蒋总司令离开广州到前线，在八月中旬抵达几乎兵不血刃就给佔领的长沙。第二阶段的攻势不久就发动了。吴佩孚大帅赶忙南下，亲自指挥在贺胜桥的决战，但他的精锐部队在八月三十日彻底溃败。吴从此一蹶不振。革命军随即佔领汉口、汉阳。虽然北军在武昌勇勐顽抗逾月，还是再次以战败告终。

佔领武汉地区后，革命军随着七十五年前太平军的老路线，兵锋东指江西省，与另一北方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交战。孙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心存观望，现在轮到他品尝失败的苦果了。经过两个月的血战，国民革命军最终控制了江西全省。十一月九日，蒋介石把总司令部移到省会南昌。

这时，全国各地的地方军阀开始派遣代表向总司令恳求，自愿归附到国民党旗下。看来迅速统一全国，为期不远。但就在这关键时刻，革命阵营出现裂痕，几乎把整个北伐大业毁掉。

2

随着蒋介石的权力迅速上升，在广州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职党员很快认识到，不久就会出现总司令摆脱党的控制而成为军事独裁者的危险。鲍罗廷领导的共产党人、亲汪精卫的派系、两个中央委员会内的独立政客，以及在前线如邓演达等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都有这样的恐惧。他们盼望制定出一些制衡总司令的办法。出于个人的妒忌、党派的利益和真诚的政治考虑，他们很快就形成反蒋的联合战线。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威望领导这个新运动，自然而然地想起汪精卫来。这样，一个「迎汪运动」很快在革命军稳定长江流域中部后开始了。在这个运动中，组织严密的共产党人自然比个别的国民党政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由蒋的同乡张静江、陈果夫带领的蒋方高层人士竭力抗拒汪的归来，但当蒋自己电请在法国的前领袖回国时，他们就不便再反对了。

蒋的这种姿态不难理解。虽然他是革命军总司令，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但他个人的军事实力却很有限。在北伐初期，实际作战的是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战利品亦由它们获得。第四军受到共产党渗透，形势危险。第七、八两军各有其地域背景和补给资金的来源。因此，他们自愿受蒋的节制是名多于实。直到一九二六年底，蒋自己盘算，忠于他个人的部队不超过五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他永远无法面对党和政府内的多数反对力量，而鲍罗廷在党和政府里肯定比他更有分量。蒋明显地看到，对付一个渴望权力的党内领袖要比对付共产国际容易得多。这样他很快就站到召回汪精卫的那一边。

反蒋派似乎也认识到蒋的弱点所在。他们除了在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注入反蒋的说词，还企图说服军队的司令官唐生智、张发奎、程潜和李宗仁来支持他们的路线。佔领武汉后，唐把他的第八军扩充为四个满员军，张发奎升任为着名的第四军司令。程潜的第六军在粮饷给养方面长期受到歧视，也对总司令心怀不满。唐、张、程因此不久就加入反蒋的阵营，但第七军的李宗仁仍维持着「第三势力」的立场，身价节节上涨。

到了一九二六年底，国民党的分裂看来迫在眉睫。被共产党指为新右派的蒋介石和他的一小撮支持者站在一边，共产党人、反蒋的国民党人和自命左派的人站在另一边。当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内的反蒋大多数获得唐、张、程三位将领支持的保证时，就决定将国民党政权的首都从广州移到武汉。

蒋竭力争取把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同他一起留在南昌，但他的建议立刻被驳回。因此，一九二七年初，这两个中央机构及其多数重要领导

人搬到新首都武汉，并说服英国政府把汉口的租界归还中国。到了武汉后，两个机构的成员召开联席会议，选徐谦为主席，并宣称执行国民党政权的最高职权。藉着这个联席会议，武汉的领导人发起了一个「恢復并提高党权」的政治运动。就是说，总司令的个人权力必须减少，以使党的威权能够提高和集中。虽然蒋总司令谴责联席会议为非法，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随即把这个运动合法化。

第三次全体会议事实上是个反蒋大会。会议决定，现由蒋充任的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职位都改为主席团。因此，革命军总司令必须服从这些委员会的决定，而它们全由左派控制。

同时，第三次全体会议任命汪精卫为组织部部长，一群汪的亲信被委任为其他部门的领导。会议还通知蒋介石，此后革命军的经费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控制。所有各地徵收税捐的机构全归宋子文领导的财政部管理。在新的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前，不再向革命军提供经费。虽然仍允许蒋介石保留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继续完成北伐未竟之功，但这些决议却剥夺了他所有的政治和财政权力。

乍看之下，武汉的左派国民党领导人似乎赢得了反蒋运动的初步胜利。然而事实上，他们的胜利只限于表面，不能对防止军事独裁的崛起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武汉国民政府无法控制唐生智的部队。张发奎的第四军虽愿听命于政府，却受到共产党的严重渗透。因此，国民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左派国民党政客缺乏真正实力。有组织的民众、政府和党的机构都是由共产党人把持，他们只听从莫斯科通过鲍罗廷转述的命令。在经济杯葛蒋介石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只有不足四百万元的现款可供支付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需要依靠共产党的支持，鲍罗廷因此成了武汉的真正独裁者。利用这样的时机，共产党人开始策划取代国民党左翼在武汉的革命领导权，建立真正的共产政权。这个共产党的计划，很快就改变了此前反蒋运动的性质，从国民党的内斗转化为两党角逐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要明瞭这一转变的过程，得注意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政策。

3

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托洛斯基正式谴责史达林的中国政策，要求一个「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问题就成了莫斯科两派热烈辩论的问题。但那时主导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是「布哈林—史达林」路线（Bukharin-Stalin line），因此陈独秀和谭平山领导的中

国共产党，也和在俄国的史达林主义者一样，大力谴责托洛斯基主义。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议的谭平山报告说：「托洛斯基主义的第一个宣言刚出现，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立刻一致议决，反对托洛斯基主义。」（註4）

共产国际通过的史达林主义的政策，可以概述如下：首先，史达林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不能脱离。史达林在第七次全体会议发言，回答托洛斯基说：「真是荒唐，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离开国民党会是个最大的错误。」他的理由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民族自由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革命。它得到所有受压迫阶级的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把中国的革命引向「合作」，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阶级。因为中国的民族大资本家极端弱小，比一九○五年的俄国资产阶级还弱小，指导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责任，无可避免地一定落到比中国资产阶级更有组织、更活跃的中国无产阶级手中。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中断和国民党的合作，抛弃有用而无害的支持者，是不智之举。

不过，史达林告诫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不要只仅仅限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因为甚至像张学良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共产党要加强劳工运动，在城市发起更多罢工，来改善劳动阶级的物质条件和法律地位。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必须加强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而且，史达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强他们在国民革命军的工作，训练更多红色指挥官，使非革命的指挥官信仰共产主义，从而创立一支真正的红军。根据史达林的观察，中国的革命在形式上与过去欧洲的革命完全不同。欧洲过去是非武装的人民与政府的军队对抗。「在中国，」史达林强调说，「是武装革命和武装反革命作战。」

这个史达林路线的中国政策得到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审查和确认，因此命令中国共产党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为了防止国民党成为纯粹资产阶级民主的党，又命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右派及其「基本理论」戴季陶主义斗争；但中国共产党必须协助国民党的左派，并与之密切联合。然而，它又指示共产党人不要参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

此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国共产党，促使所谓国民党左派领导的革命政府实施三个重要的计划：（一）铁路及航运系统国有化；（二）大工厂、矿山、银行及所有与外国特权有关的机构充公；（三）土地国有化。这三个计划应该由国民政府经常地予以强制执行。

中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了这些史达林主义的指示。革命军北伐不断进展，湖南的农民运动，在毛泽东和国民党农民讲习所训练的许多干部指导下，也如火如荼地展开。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地区普遍无法无天，甚至出现残酷的屠杀。这样不仅吓坏了地主，也吓坏了小地主、乃至富农和中农，他们的子弟正在前方和军阀作战。

到了一九二六年底，中国这种激进的农民运动开始在农村遭遇到严重的反对，成了不仅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之间，也在各级共产党人中热烈争辩的话题。史达林发出一连串命令，反对从农民运动退却。史达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指出：「越快、越彻底地说服中国农民加入革命，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战线就越强大、越有力。」

同时，史达林派遣土地专家—印度共产党人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到中国视察土地革命，他和谭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底抵达中国。因此，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在湖南省，在来年变得更为激烈。

与农民运动同时进行的大城市的劳工运动，在李立三、张国焘、刘少奇及许多曾经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指导下，推行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以至于大多数国民党治下的工业城市，因为经常罢工而完全瘫痪。在华中和华北尚未为国民革命军解放的城市，居民对于即将来临的混乱和共产主义也同样害怕，不仅是大工厂的经理和银行家，连只有几个雇员的小商人和店主也是如此。正如史达林后来所说的：「共产国际收到从中国各城市传来的报导，都是说工人斗争的发展导致危机、失业、工厂和作坊倒闭。」（註5）但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再下达指示，不准从他的中国劳工政策退却。

利用国民党党内的争论，共产党人向武汉政府施压，要它採取更激进的措施。结果，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其中一条规定：「作为紧急措施，土豪劣绅可由人民直接审判，毋需政府参与。」（註6）通过这些条例，共产党事实上把国民党政权让给了暴民统治。

这样的史达林主义政策在中国造成极为复杂的政治局面。首先，它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把共产党领袖分为两层：上层是在中央政治局做决策的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下层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指导群众运动的活跃的实地工作者。

纸上谈兵的战略家由鲍罗廷、陈独秀和罗易领导，年纪较大，性格上也相对地温和，提出政治意见时深谋远虑，着眼于全国层面的政治及

军事形势，把地区的群众运动看作次要。此外，他们在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高层的人数远少于国民党左派。当激进的群众运动成了高层辩论的主题，尤其是在一些强大的军事领袖也反对时，鲍罗廷、陈独秀和罗易不得不妥协求全，按照史达林不容置疑的指示中第一部分的要求的，继续「与国民党左派密切联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承认，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运动「太过分了」，「脱离了正轨」。

在下层活跃的共产党实地工作者，像李立三和毛泽东，都是激进分子。他们生性冲动，提出政治意见时情绪多于理性。不同于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居于少数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实际上把大多数温和的国民党左派挤出了群众运动的领导层。数百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工人在他们牢固的控制下，他们深信就像在古代中国一样，这些力量势不可当。他们显然忽视了，在现代战争中，像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那样的暴民战争完全不可能发生。因此，他们认为没有理由要缓和激进的群众运动，不须对反革命分子、甚至对左派的要求让步，也没有认真注意国民党军事指挥官的请求。此外，这个「不退让」政策，正是史达林在其指示第二部分中所强烈坚持的。

这两层的中国共产党人各自遵守史达林指示的一部分，开始互相谴责对方犯了错误。两者都衷心相信共产国际主张的政策是正确的。高层的领袖指控下层的同志左倾幼稚，下层的同志回过头来指责高层的领袖实行「机会主义」。

差不多十年以后，毛泽东对陈独秀「摇摆的机会主义」仍然深恶痛绝，认为陈对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该负最大责任。鲍罗廷约略站在陈的右边，罗易约略在左边。事实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中所有活跃的共产党人，都是忠实的史达林主义者。他们的私下的争论，其实是史达林主义政策自取其咎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但是没有谁敢站出来批评共产国际。两年后，陈独秀提出关于史达林主义政策失败的评论，他被谴责为托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

不仅如此，史达林主义政策对国民党的发展造成的结果，甚至比对共产党更严重。在武汉拥护激进的群众运动和共产党政纲的国民党左派，事实上把支持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甚至整个城市中产阶级都吓跑了。

一九二六年冬，反蒋运动的声势在武汉越来越大，蒋总司令在南昌开始祕密向上海的商人请求财务援助。直到这时为止，蒋只是国民党内

反独裁运动中一个孤立的政治难民，商人们对蒋的请求反应相当冷漠。然而几个月后，尤其是共产党人似乎在国民党于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成为主导力量后，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开始认真考虑支持蒋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一个基于需要的结合逐渐成形，蒋介石不久就改弦更张，从被击败的政治难民变成领导反共的英雄。国民党内军事领袖与一群在武汉的文官领袖间的领导权之争，转化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因此起了激烈的变化。

4

甚至在佔领南昌前，蒋介石就开始派遣专人到上海拜访张嘉璈，请求财务援助。执金融界牛耳的张反应冷淡，只礼貌性地提供了五十万元。蒋巩固了对江西的控制后，加强他的金融活动，派遣个人助理张群到天津，邀请黄郛南下协助。

黄郛是蒋的义兄，曾任北京政府的总理，在旧政治和金融圈内极具声誉，尤其在中国的东南地区。黄郛出生于浙江，家庭是江苏望族，一直和最有影响力的江浙财团的多数领袖，尤其是张嘉璈，关系密切，并备受尊崇，而张嘉璈又深得长江流域的英国利益集团的敬重。

黄郛与上海的友人密集商议后，于一九二七年初抵达南昌，带来一张由张嘉璈发出的中国银行一百万元支票，这数目相当于宋子文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全部现金储备的四分之一。宋后来成为蒋的内兄，这时却是武汉一个竭力反蒋的领袖。

除了财务援助，黄郛的工作范围还包括外交。长久以来，中国海内外视黄为主要的亲日派。他受过良好的日本教育，能说流利日语，并且得到日本各行业甚多领袖的高度赞扬和敬重，其中许多人还与他有私交。

黄郛有一次到江西牯岭蒋介石的临时总部拜访，同行的是日本在长江流域观察政治形势的特使佐分利贞男。日本人对国民党内斗的消息，自然要比西方人灵通得多。

这时，害怕共产党的上海富商们，派遣知名的领袖虞洽卿祕密到南昌拜会蒋介石。有报导说，上海的大财主答允以数百万巨款帮助孤立的总司令，条件是他在佔领中国东南后採取反共的立场。

因此，一九二七年初，沿长江向东挺进有利于蒋，这是蒋在武汉的

对手也十分清楚的。在一月初的一个战略会议上，多数出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像唐生智、邓演达和俄国顾问加伦将军，全都竭力反对蒋东进佔领南京、上海的计划；他们建议直捣北京。然而由于蒋的坚持，最后还是採用了东进计划。

蒋介石对此前武汉及二届三中全会对他的指责保持缄默，专注于佔领中国东南的军事行动。对于这个地区，他要比国民党内外的任何对手更为熟悉。蒋显然意图拉拢桂系及其第七军，委派白崇禧担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要职。

一九二七年初，东征顺利推进。几场战役后，革命军在三月二十二日佔领上海，两日后取得南京。然而在佔领南京时，一小队革命军野蛮地抢劫市内一些外侨住宅，并杀害了几个洋人，其中有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 E. Williams）。长江江面上的英、美砲艇马上向南京发砲，杀死了许多中国居民，但日本的砲艇奉命没有开砲。这就是「南京事件」。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一般人都相信，该事件是共产党人制造的阴谋，目的在破坏蒋在长江流域下游的地位。因为实施暴行的中国士兵来自第六军，它的政治部主任是着名的共产党人林祖涵。而且，事件经过周详计划，并不是自发性的违反军纪行为。

南京事件并没有产生策划者所预期的严重后果。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在上海的示威却无可弥补地损害了两党间的合作。国民党佔领上海的前夕，北军正在撤退，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发起大罢工。数以千计的工人奉命从当地警察和北军残留市内的部队夺取枪械。这样，总工会就组织了有八千名武装工人的工人纠察队。凭着这股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成立了市政府，第一次要求取得与国民党同仁「公开和平等」的地位。这种前所未有的举动使当地的国民党领袖十分恼怒。

白崇禧麾下的东路革命军进入上海时，面对的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军队，他们有八千多人，控制着这个国际城市的华人区。共产党人要求政治权利，不肯让步，并炫耀武力，不仅使佔领上海四日后甫抵达的蒋总司令恼怒，也惹恼了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的桂系领袖白崇禧和李宗仁。他们不受共产党渗透的第七军正在南京附近驻防。

出于实际考量，白决心把工人纠察队缴械，最少加以严厉规范和控制。他得到总司令的充分肯定，也得到富商、外国租界当局以及国民党内望重一时的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都因共产党人

争夺这个地区的革命领导权的嚣张行为感到愤怒。因此，同李、白关系密切的广东的李济深和广西的黄绍竑，被邀到上海制订清党计划。

针对这个反共计划，武汉国民政府派遣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到上海。宋的任务是统一财政的管理，郭的任务是指导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这样，国民党在上海当地的领袖与武汉的中央之间的冲突势将难以避免。在这个关键时刻，刚恢復国民党主席职位的汪精卫，从法国访问莫斯科后，在四月一日抵达上海。

当时，大多数国民党领袖认为汪精卫是唯一能在党内亲共和反共两派之间折衷协调的人。汪和上海的反共领袖举行一连串的商谈。据说，商谈中元老吴稚晖跪在汪面前，恳求汪带领即将来临的反共行动。尽管如此，汪还是决定站在共产党人的一边。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保证两党继续合作。事实上，这个宣言只能给上海的反共情绪火上浇油。汪因此被视为整个亲共派的领袖而不是全党的主席。汪曾经建议召开四中全会，并且徵得了两派同意，他作为党主席原应该可以在四中全会上居间斡旋，取得两派之间的权力平衡。上海显然不是亲共领袖可以久留之地，汪在发表宣言的当夜祕密前往武汉，这样两派的公开分裂就无可避免了。

5

在国民党派系分裂扩大的时候，莫斯科也有所行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连串命令，指示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反欧洲人的暴乱，必要时导致杀戮亦在所不惜。为了避免国际的干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避免任何与日本人的冲突。指示说，在这个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仍应躲在幕后，让国民党承担罪过。

再者，史达林显然错误地以为蒋介石的沉默是俯首听命。史达林的反对派再次要求去掉蒋介石，并支持一个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对此史达林在四月五日回答说：「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为什么要搞政变？」

史达林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右派仍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用，因为他们和富商有联繫，能在富商那里筹款，供革命之用。「所以对国民党右派应该利用到底，」史达林强调说，「像榨柠檬一样把它们榨干，然后丢掉。」

如果史达林知道在他演讲后仅仅二十四小时，汪精卫就给逼离上

海，肯定会大吃一惊。「柠檬」拒绝被榨，反而从富商那里筹得更多款项，把共产党这个柠檬丢掉。

汪精卫离开上海后不久，国民党的反共派就开始行动。为了使行动合法化，由他们佔多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下命令给总司令，授权他看管监视所有共产党人。虽然根据党章，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没有这样的权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白崇禧的便衣人员伪装为工人，突袭共产党的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奋勇抵抗，但遭到久经战阵的革命军无情地镇压，被迫缴械。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地区的清洗。数日内，八十多个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被搜查，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被拘捕，数百人被枪毙。这样就开始了国民党一九二七年的大清洗。

周恩来也在被拘捕等候枪决的人群中，由于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是他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适时伸出援手，让他侥倖逃过一劫。

清洗扩散到别的城市，特别是在广东和广西，那里数以百计的人给处决，而且并不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这样就在反共国民党人统治下的地区造成了白色恐怖，其可怕程度与在武汉政府管辖下的红色恐怖不相上下。

清除共产党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汪精卫召开了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紧急联席会议，正式开除蒋介石、白崇禧和其他在上海领袖的国民党党籍，撤除他们所有的文、武官职。武汉政府立即下令逮捕蒋，悬赏二十五万元取其首级。

针对武汉的举动，中国东南的反共领袖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声称是中华民国唯一的中央政府，由胡汉民任主席。同时，欢迎所有以前的「反革命分子」归来参加新政府。流亡东京的西山会议派主将张继就在这时回到南京。

南京新政府全靠江浙财团的帮助才能存在。在召开筹备会议时，国民党的领袖们估计，新政府每月的最低开支约为一千六百万元，只有一半能从正常税收获得。上海的实业家因此承诺补足另一半，这样就奠定了南京新政权的财政基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准确地报导说，南京政府成立前三日，上海商人给

予蒋一千五百万元，条件是要镇压共产党和劳工活动。两星期后，又送来开创南京新政府所需的三千万元。

6

武汉和南京两地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正式分裂后，史达林的反对派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全体高声抗议。史达林却对他们说，蒋介石背叛武汉政府并不表示中国革命倒退。刚好相反，把蒋赶走更彻底净化了革命阵线，使中国革命向前跨出一步，蒋最终难逃北方军阀那样的命运。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史达林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章（註7），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应继续与武汉国民党合作。根据史达林的说法，南京政府的建立只是把中国革命带引到「第二阶段」；以前在「第一阶段」和中国无产阶级联盟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受到工农运动的威胁，开始背叛中国革命。因此，在这个新阶段，原有的「全民族联合战线」就该为「工农联盟」所取代。这样，武汉政府应该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史达林更进一步解释，原来的「孤立右派，但予以利用」的政策，在当前阶段不再实施。旧政策应该为新政策取代，即赶走右派，把国民党改变为一个没有右派分子的党。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留在国民党内。

然而，史达林也认识到，国民党支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和平转变到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共产党一党实现。因此，共产党人只有到了将来成立由工农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准备一个「中国的十月革命」时，才从国民党退出。到了那时，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就要被与国民党的「党外合作」取代。这样的「党外合作」，应该和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十月革命时的联盟如出一辙。

但在「党内合作」期间，共产党人应将武汉政府向左推。共产党人首先要迫使武汉政府支持土地革命；其次是利用现在的政权，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拔更多新领袖来取代旧领袖，同时扩大如农会这样的基层组织，还要使军队及军官转变为可靠又强大的红军。

只有在所有这些任务都成功地完成后，才需要组织苏维埃，通过它建立一个政府和苏维埃「双重权力」的制度。此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共产党人通过苏维埃从现存的武汉政权夺取权力。

按照这样的指示，国、共两党继续在武汉合作。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作了六小时的演说后，大会贊同与国民党左派联盟的政策，无可避免地重复先前的恶性循环。共产党实地工作者继续加强工农运动，但大会没有採取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因为史达林强调，这样会惹来国民党的反对。

这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沿京汉铁路继续北伐，消灭奉系军阀，作为最后压倒蒋介石的先决条件。基于两个理由史达林同意这一策略。第一，他认为张作霖的东北军是最邻近的敌人，对武汉的威胁最迫切。第二，武汉政府必须与冯玉祥联合，冯的军队在俄国支援下正由中国西北迅速向东挺进。史达林认为与蒋介石作战比较困难，因为蒋在上海地区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武汉政府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准备讨蒋。

对张作霖的战争立刻就开始了。经过了几次战役后，武汉的军队终于沿京汉铁路取得决定性胜利，于六月一日佔领华中最重要的铁路枢纽郑州，不久与冯玉祥沿陇海铁路从西北向东推进的部队会师，这时武汉的部队也佔据了陇海铁路的西段。

武汉和南京各自清除了最迫切的北方军阀威胁后，双方的内战就如箭在弦。但是武汉政权内部的共产党问题日益严重，不久就使得国民党两派的内战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7

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后，共产党的活动虽然受到南京政权的残酷镇压，但在武汉政权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除了即使深入渗透仍无法确实控制的军队外，共产党人几乎主导了国民党所有党和政府的机构。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农民运动。这个运动推行土地国有化，在没有政府参与下随意审判土豪劣绅。这些情况常常造成流血事件，甚至连身上仅有几块银元的人也受到「公审」。

因为所有大地主和豪绅都在人民公审前逃离家乡，真正吃到苦头的都是无法逃走的小资产阶级、下级军官的家属、教师、政府公务员和所有受薪阶级。再者，武汉部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都来自湖南、湖北的士绅家庭，农民运动严重地影响了武汉军队的士气。于是武汉政府辖下的武装部队逐渐变成潜在的反共运动的先锋。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在长沙被

捕受审，何其时正在前线和北方军阀作战。这件事引发了反共火燚。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驻军进行了一次血淋淋的反共屠杀，它迅速发展为更多部队参与的护（国民）党运动，导致更多的共产党人被杀害。

这起事件自然震动武汉。当政府高层辩论此问题时，国民党领袖倾向于同情军队，而共产党人则坚持要依法惩处叛乱的军官。由于担心肆无忌惮的群众运动会危及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鲍罗廷与陈独秀都尽量与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妥协，共同谴责共产党带领的群众运动为「过火行为」，想要把它带回正轨。但现在才加以处分实在太迟了。湖南、湖北的群众像燎原的野火，已经失控。由毛泽东、瞿秋白和许多年轻激进派领导的基层的共产党群众组织者，公开反对中共中央传达的命令，他们谴责鲍罗廷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

在这个关键时刻，史达林也在政策上急转弯，使国、共两党提心吊胆的蜜月一下子变成了鲜血淋漓的离婚。史达林在五月底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点指示，命令中共推动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以新领袖替换旧领袖。尤其重要的是，史达林命令中共，清除国民党军队中所有不可信赖的将领。革命军军官要由革命法庭来审判。最后，要组织工农的军队，取代国民党的正规军。换句话说，这是指示共产党巧取豪夺，使用政治手段和新的共产党红军来接管武汉政府。当鲍罗廷与陈独秀二人还在思索如何实施新命令时，罗易却快刀斩乱麻，私下把新命令拿给汪精卫看，以为国民党领袖会因为害怕而屈服。

汪突然发现共产党针对他和国民党的阴谋，自然大为震惊。他并没有如罗易想像的那样向共产党的领导层屈服，反而和他的许多亲信密谋，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清洗出去。六月六日，他到郑州和军队的司令会谈，指望把部队撤回武汉应变。他还试图拉拢冯玉祥，不仅希望冯支持清洗共产党的计划，还支持将来对南京的战争。为此，汪与冯在郑州举行会议，把所佔领的地区交给冯的部队驻守。

冯玉祥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莫斯科邀请冯作短期考察，在考察期间，一九二五年底，冯的部队沿长城一线大败于直奉联军。在莫斯科，俄国人说服他加入国民党。他因此从莫斯科得到大量物质援助，并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回到中国。国民党立刻任命他为西北总党代表和国民联军总司令。他召集在西北溃散的部队，东进郑州与汪精卫会议。冯在会议中并未向汪作出任何承诺，一週后又到徐州与蒋介石举行会议，成为举足轻重的第三势力。

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一回到武汉就计划清党，虽然许多国民党

的高级领导人对驱除共产党人出党仍然犹豫不决，但等到冯玉祥具名从徐州发来电报，露骨地暗示武汉政权在实施恐怖主义，他们很快就站到汪精卫的那一边。

虽然冯在徐州会议时没有立刻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承诺将来支持蒋与武汉的战争，但他同情蒋的反共立场，因此向武汉发出了上述产生决定性作用的电报。

认识到武汉的情况严重，鲍罗廷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辞去顾问的职位。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宣佈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因为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依赖反动的地主阶级军官，背叛了孙文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他们仍然愿意和「真正的」国民党合作，所以留在国民党内，以免国民党被假冒分子篡夺。

然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把所有共产党员逐出国民党，并批准鲍罗廷辞职。鲍罗廷和中共领袖在江西九江开完最后会议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假道外蒙古返俄，结束了他在中国多姿多彩的事业。

开除共产党员的命令採取了和平的执行方式。对于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提议承认它为政党，但不是执政党，共产党员只要不妨碍国民党的事务，其个人身体自由受到法律保护。（註8）

共产党的活动却没有因为被国民党开除而停止。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尤其是与那些「反动将领」的摩擦，并未因《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而有所改善。在武汉政府管辖的区域内情势一片混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突然起义反对国民党政权，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府。

为此，武汉政府对共产党开始实施铁腕镇压。张发奎不久率部收復南昌，同时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另一决议，宣佈共产党为非法。所有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从谭平山到毛泽东，全为国民党开除。武汉政府随即大举屠杀共产党人，迫使共产主义运动转到地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指出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是一切失败的源头，解除其党主席的职位，代之以瞿秋白。两个革命党离了婚，因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註释

註1：见N. Mitarovsky, *World Wide Soviet Plots*, Tientsin, 1928, p. 10。

註2：译者按：组织北伐总司令部时，原定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但军事委员会后来议决，李济深总参谋长留守广州，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随军出发，代行总参谋长职权。

註3：译者按：引文取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三十八号，页十四。

註4：引文取自L. D. Trotsky, *The Draft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he Militant, 1927, p. 95。托洛斯基引用原文为打字稿的报告，第二○五页。毛泽东与许多反陈独秀的共产党青年领袖后来宣称他们在这时期反对陈的「机会主义」。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曾经支持要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托洛斯基主义。后来被中国史达林主义者谴责的所谓「机会主义」，原是个史达林主义政策，为陈独秀、谭平山忠实地奉行。

註5：引文取自“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是史达林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表的与中国革命形势有关的演说词。原文的英译本，可参看Emile Burns, *A Handbook of Marxism*, London, V. Gollance Ltd., 1935, p. 903 ff。

译者按：原文的中译本，可参看〈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摘录），收于《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页九～三四。

註6：译者按：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歷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在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全会纪录的附录上有「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略）」一项（上册，页三三七），条例略去。此处引文是从唐先生的英译再直译回中文，条例原文待考。

註7：译者按：原文的中译本，可参看〈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九○号）〉，收于《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四月），页一九九～二○七。

註8：译者按：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称十五日通过的《取缔共产党案》（分共）乃根据革命利益，执行纪律，

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

第四部　割裂的革命

【第13章】

从机会主义到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内斗（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1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清党的结果，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各自分裂为两个敌对的派系。在国民党内，亲共派与反共派对抗。在共产党内，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机会主义对抗冒险主义。清党后，国民党的亲共派迅速为反共派击败，而反共派的领导权则落入蒋介石领导的右派手里。这个向右转的运动渐渐使国民党放弃所谓工农政策，转而提倡重建旧社会秩序和儒家传统。最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右派甚至发展为准法西斯主义运动，全面实施官僚资本主义，牺牲自由放任经济，一直到离开大陆。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机会主义迅速崩溃，产生了一个有如俄国托派的少数反对派集团，他们甚至被称为中国托派。另一些人和以前亲共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组成了社会主义第三党。这样，在以后的十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就落在采取极左政策和制造红色恐怖的共产党冒险主义者手里。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五年完全失败为止，这时旧机会主义政策又在另一些人的领导下捲土重来。

简言之，国共合作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破裂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沿着两条轨道，朝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前进；国民党走向极右，共产党走向极左。站在中间的，特别是国民党左派和第三党，则在国、共各走极端的兄弟阋墙的斗争里迷失了方向。在以后的二十年间，又在中国内战中造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在面对日本侵略时，国、共两党痛苦的婚姻还是覆水难收。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尽管有许多外界人士竭力促成，联合政府还是无法成立。现在不妨检视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大清洗后的发展。

2

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武汉清党完全出乎共产党意料之外。一直像寄生虫一样附存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的共产党，突然被逐出寄生体外。尽管他们对建立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做出了贡献，现在却既没有政府也没有军队。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建立的所有文武机构都被清洗得一干二净。

大城市的武装工会虽由共产党单独控制，却给南京或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镇压和缴械。共产党仍然在农村得到有组织的农民给予支持，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土地政策来指导农民运动。简言之，在清洗后共产党马上发现，过分倚赖使他们突然间无法自立。他们必须挣扎图存，重新制订政策，却没有一个如何展开重建的固定计划。

一和国民党分裂后，基层的共产党人觉得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和彭述之等党中央的稳健领导人的方向错误。他们认为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实施更有力的工农政策，就能阻止国民党清党，而这些领导人忽略了这个问题。

因此，基层的共产党人普遍忿忿不平，要求党中央的高层领袖完全承担与国民党斗争失败的责任。他们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失败。共产国际也加入指责，无视此前它坚持要和国民党继续合作的指示，批评中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按指示推行有力的工农政策。共产国际派遣新代表罗明那兹（Vissarion Lominadze）到中国帮助纠正错误。他的工作成果之一是撤除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任中国共产党代总书记。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底，陈的继任者准备召开紧急大会，建立新的党中央，规划一个全面反国民党的农民起义。

与此同时，武汉的部队在两个反共将领唐生智和张发奎的联合指挥下，沿长江东进，准备和在南京的蒋介石作战。在这个行动中，共产党看到大举武装起义的机会，因为那时集中在南昌的两万精锐部队，是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和教导团团长朱德两个共产党将领率领，有野心而亲共的贺龙则是第二十军的军长。几乎所有当时知名的共产党领袖都出席了在南昌附近举行的紧急会议，会后于八月一日在南昌爆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标志着一支新的共产党军队在中国诞生，因此八月一日成为中国红军建军节。

然而，共产党叛军很快就给忠于张发奎的部队逐出南昌。他们向南撤退，企图佔领一些港口以便与俄国联繫。沿途经过几个星期的战斗后，在广东省东部被国民党军队击溃。贺龙和叶挺脱离部队逃到香港，朱德和他担任后卫的部队跟主力部队失去联繫，往北撤退，向当地由范石生率领的滇军投降，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时认识的军阀。朱德从老朋友处取得充足的粮食、弹药和兵员之后，再次叛变。

朱德的大部分部队在脱离范石生时弃朱而去，但朱还保留了少数几个军官，例如他的新任党代表陈毅和十九岁的黄埔毕业生林彪营长，以及数百名自愿追随他的士兵。他们成了将来独立红军的第一支部队。

3

当贺龙和叶挺带领的共产党叛军南下粤东时，罗明那兹和瞿秋白领导的一些共产党领袖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个会议正式撤除陈独秀党总书记的职务，并选瞿秋白为代总书记。会议还决定在六个月内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大多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就由新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掌握。

新的中央政治局以瞿秋白为首的七个委员和包括毛泽东、张国焘在内的五个候补委员组成。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被要求更加听命于中央，所有活动转入地下，加强反军阀和反国民党的行动。然而，新领导班子仍然认为国民党的名字和旗帜是对共产党革命有价值的工具，因此决定沿用这一旗帜，打造一个新的国民党左派，继续两党合作。虽然将来的革命运动全由共产党单独带领，仍应打着国民党左派的名字和旗帜进行。

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共产党人应该渗透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因为在大城市的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只能潜伏其中。然而在农村，新领导班子下令尽可能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在即将到来的收割季节进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就是着名的秋收起义。但在每一起义的地区，共产党将组织前敌委员会来指挥行动，而前敌委员会又由革命委员会监督，后者由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国民党人组成，决定权为共产党人掌握。起义一旦成功，革命委员会即转为革命政府。再者，在起义期间，要加强土地革命，没收拥有五十亩以上的大、中地主之土地，建立一个包揽所有政治权力的农民政权。根据新领导班子的这个指示，在任何情况下起义都要进行，不管有没有武力的支持，但不同地区的共产党人可以视当地情况选择起义的日期。

八七会议最后发表长篇的告全党党员书，其中论述了前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预测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最后号召全党同志抓紧时机，通过即将到来的起义，取得全国胜利。

会议一结束，就派遣有经验的共产党领导人到各地指挥秋收起义。彭湃和毛泽东是两个当时最有名的农民组织者，分别被派往原籍粤东和湘东。在他们组织农民的时候，贺龙和叶挺带领的共产党部队正被国民党军队击溃，数以百计的农民遇害。国民党军队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制造的「白色恐怖」，使得共产党向左更跨进一步。九月初，党中央决定放

弃国民党的旗号，完全割断和国民党的关系，也改变土地政策，决定不管土地大小一律没收。党中央又指示它的前线指挥部加强农会的组织，并且宣传组织苏维埃的想法，但实际组织却要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彭湃和毛泽东看来都无视党中央最后一项指示。初步组织一完成，二人就着手组织地区的苏维埃和农会。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第一个苏维埃在粤东的海陆丰地区出现。它在彭湃的领导下维持了半年多，直到给当地的国民党军队捣毁。

在湖南，共产党号称组织有五百万农民，毛泽东却小心谨慎，并没有依照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发动起义。他首先组织一支工农革命军，然后在他的军队攻击的地方组织农民起义。毛把这种谨慎的方法称为「合拍主义」。

九月初，毛泽东成功地组织了一支五千人的农民军队，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自任师长。他的队伍包括一小群来自湘东的武装农民和汉阳的矿工，此外还有一些原属武汉警卫团却反叛国民党政府的正规军，总共只有几百枝枪。

这支军队和准备进行的起义都由毛自任书记的湖南前敌委员会领导。尽管毛有长期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他和同僚并未能召集农民参加他们所计划的大规模协调行动。当他的军队在九月中旬出动时，湘东有小股农民在这里或那里暴动，但他们很快就给国民党的机关枪扫平了。

像毛泽东组织的那种农民起义，在中国悠久的歷史中曾推翻过数十个强盛王朝，然而时代和武器都改变了。在血肉之躯与钢铁武器的对决中，数以千计的人遭到屠杀。光是白色恐怖就瘫痪了秋收起义，不是把暴动的农民赶回老家就是送进坟墓。有一次毛泽东自己和农民一起给反共的地方民团抓到，可是他运气还算不错，竟然在送监的途中逃脱。

毛的军队给击溃时，许多人不告而别，不少人被杀掉。经过两个月和国民党军队且战且走，毛最后带领残部四百人到了井冈山。井冈山在江西、湖南边界的山区，地形险要，方圆约一百五十英里，长久以来为当地土匪盘踞。毛抵达时已有一股六百人的绿林好汉，毛说服他们加入，两名首领成了他部下的指挥官。

荒僻的井冈山没有引起远在城市的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使毛和他的部队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毛重整队伍，又进一步得到流亡的共产党人前来增援，渐渐把势力扩大到邻近的地区，组织农会，分配土地。在湖南茶陵的乡村，毛组织了中国的第二个苏维埃。

4

农民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和瞿秋白领导的中共党中央都拒绝承认失败。瞿秋白将总部从汉口迁往上海，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仔细审查了贺、叶起义与秋收起义，认为起义的政策「完全是对的」，但在各地指挥行动的同志没有把党的指示付诸实施。会议指责这些当地的同志没有号召农民参与大型起义，不是对起义採取了修正主义的态度，就是使它成了纯粹的军事投机。根据会议的决议，这样的做法是继承了此前的机会主义传统。因此多数当时负责其事的共产党领袖受到处罚，其中包括谭平山、张国焘和毛泽东。

谭平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中共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因为反对党的土地政策和计划组织第三党，被开除出党。张国焘被撤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因为他对起义政策缺乏信心，打击了八一起义的士气。毛泽东也被逐出政治局、前敌委员会和湖南省委员会，指责他身为政治局特派员，却忽视了到湖南指挥起义和推行土地革命的职责。他的合拍主义纯属军事投机，用那时共产党的话来说，是枪桿子主义。他对发动群众缺乏信心。

除了这些纪律处分，会议决定继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经常督促的发动起义政策，不管地方的条件如何，也要执行这个政策。决议关于起义的一段说：「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註1）「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的目标要让位给组织农村的苏维埃。为了尽快推翻反动政权，决议还下令，要迅速扩大地方起义，合併为一个大范围的起义。如决议所说，政治局预见新的革命高潮不久就要到来，使得个别的农民起义很「容易地」扩张和联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也扭转以前的劳工政策，下令在大城市发动工人普遍起义。决议指出，工人不该把他们的行动看作只是响应农民起义，应该积极地把城市和乡村的起义连结起来。只有这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中国建立。

总的来说，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莫斯科的指示和身材瘦长、脸色苍白的年轻诗人兼作家瞿秋白的命令下，仍是不管任何情况、不计代价地发生暴动。正如周恩来所说：「现在党的任务，是起义、起义、再起义！」不久，广州就有了一个好机会。

在贺、叶起义期间，张发奎率领所部在江西追逐叛军，但他获悉李济深在广州的部队已开往粤东和共产党作战，就放弃追赶，回师不设防的广州。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很快也到广州和张会合，他们在那里计划突击桂系，然后重演歷史，控制两广，从头再来发起北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和那时在上海的蒋介石祕密交易，蒋支持他们反桂系的密谋，答允资助五十万元。

制定详细计划后，张发奎派出着名的第四军主力到两省的边界，留下那时是地下共产党人的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少量部队在广州维持治安。留守部队的主力是由前黄埔武汉分校一千二百名学生组成的教导团，其中九成属共产党。

共产党仍然主导着广州两个强大的工会—人力车工会和海员工会，有会员共二千人。它们可以很快武装起来，和共产党主导的部队并肩作战。看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张太雷领导的广东省委员会全都主张立刻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广州。

稍作计划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带着一群最能干的共产党领导人于十二月十日悄悄进入广州。翌日凌晨三时，武装叛变爆发。在叶挺和叶剑英的率领下，教导团突袭市内所有公共建筑及军械弹药库，杀了数百名反革命分子和无辜人民。两个共产党主导的工会武装起来，组成赤卫队，许多不是共产党的工人和士兵被迫加入，脖子上缠上红领巾。叛军的总数很快就超过一万人，其中武装的约有一千六百人。

叛军控制大部分市区后，宣佈成立苏维埃政府，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徵为主席。其时苏不在广州，由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暂代。苏维埃政府立刻根据中国共产党既定政策，发佈劳工政策和土地条例。

尽管共产党大力宣传，城市的广大群众，包括许多华人海员、海员工会的挂名会员以及铁路工人，对共产党的起义，不是保持敌意就是无动于衷。共产党也无法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召开群众大会来支持苏维埃政府。

这时，张发奎从广州逃脱后，命令他的精锐部队从西线回师，重佔广州。第四军很快和地方部队会合，向共产党反攻，在广州展开巷战。因为教导团本属第四军，作战双方极端混乱。共产党人结了红领巾作为记号，让反革命部队能够据以搜查叛乱分子，因为领巾虽然丢掉，身上仍留下红色印记。共产党反过来专杀没有红色印记的人作为报復。这样

一来，数以千计的无辜人民，不管脖子是否染红，都给杀掉。

共产党最后被迫放弃广州，离开时把广州市中心付之一炬。到了十二月十四日，广州废墟里堆积了六千具尸首，死难者中有苏维埃政府的代理主席张太雷和五个俄国人，其中一人是俄国驻广州的副领事。这样，后来共产党史家所称的广州起义就结束了。随之结束的，是汪精卫和张发奎第二次北伐的狂热梦想。更令汪、张沮丧的是蒋介石食言，把承诺的五十万元送给桂系首领；他们毫不留情地屠杀张的败兵，驱使汪、张逃亡海外。

5

共产党在广州起义，确实有助于桂系首领把势力扩展到邻省。桂系部队把第四军赶出广东后，开始搜索在粤、湘、桂边区的共产党游击队，他们不久就找到一小群由朱德带着躲在深山里、约二千人的共产党队伍，展开追击。两军玩了几星期的捉迷藏后，朱德渐渐走投无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听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带着疲惫不堪的军队到井冈山和毛会合。

合编的朱、毛部队约有三千人，称为红军第四军，「第四」是取自张发奎又称铁军的第四军，共产党矢言要延续铁军的传统。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旧有的青天白日旗改为红旗，旗幅中间是白色五角大星配以交叉的镰刀、斧头标识。

红军认识到打阵地战处于劣势，制定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由朱德和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初夏拟订的战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还为中共的军队沿用。

到了夏末，朱、毛的军队，又得到彭德怀带领数百名训练有素的队伍增援。彭是在湖南军队里任团长的地下共产党人。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反出湘军，随后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追逐到井冈山避难。他的队伍改组为红军第五军。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反共行动，驱使数以千计的学生、逃兵、工人和贫农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寻求庇护。到了一九二八年底，井冈山地区的红军人数差不多达到了一万人，其中全副武装的有二千人。他们组织苏维埃、分配土地的行动，渐渐扩展到邻近的六七个县，使得江西、湖南两省的当局紧张起来，不得不採取军事和经济手段来反击叛乱。军事行动没有得到怎样的结果，但经济封锁颇为有效。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

山的共产党人不得不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以期寻求粮食。

彭德怀的红军第五军留守井冈山基地，朱和毛率领红军第四军突破国民党的重围，向江西省南部挺进。在此期间，国民党内正酝酿内战，无暇兼顾赣南的防务。这样，朱、毛未经战斗就在江西和福建边区找到避难的处所，后来在这里发展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6

在朱、毛、彭扩张红军和组织苏维埃的同时，其他共产党领袖也在全国各地采取相同的行动。张国焘和黄埔毕业生徐向前巩固了在湖北、河南、安徽边界山区的基地，组织一支称为红军第一军的小型农民军队。贺龙潜返鄂西，在洪湖地区佔领基地，组织了称为红军第二军的小队伍。同样的共产党基地，也在粤东、桂西、陕北、赣北和海南岛建立起来。

共产党游击战的成功正好和劳工运动的痛苦失败成为对比，使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从大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加强了农民领导工人兄弟的地位。事实上，在一九二七年后，红军的增长是中国共产党生命得以延续的唯一原因；红军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而是农民的军队。

这个趋势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感到警惕。对他们来说，革命运动只能由城市的无产阶级领导，一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出现分歧。陈独秀倒台后，野心勃勃的领袖间的权力斗争使情况更为复杂。共产国际因此感觉有责任提出解决办法。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专门审查和中国革命有关的形势。托派分子已被整肃，史达林主义者可以更自由地制订指导中国革命的新策略。首先，他们假定中国革命已经呈现出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因为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兴起的浪潮刚过去，第二次高潮「不可避免地」将会到来。不过，中国革命正进入两个高潮之间的「低谷」，因此也要相应地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

共产国际指出，陈独秀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好好利用以前的高潮。瞿秋白在低谷时期採取左倾盲动主义，也同样犯错误。为避免这两个倾向的缺陷，共产国际制定了新策略，称之为准备武装暴动的原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为将来大规模工农起义做好充分准备。当下一个高潮即将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就能选择最佳时刻，协调城市与农村

地区一致起义，建立工农专政。

共产国际认识到农民军队是将来武装暴动的主要工具，但谴责运动中的「农民意识」与「流氓无产阶级心理」。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农民起义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个原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得到确认，又于一九二八年初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与会的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一百七十名代表。（註2）

以共产国际制定的理论为基础，六大通过冗长的决议，其中首先确认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打倒国内的军阀政权。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必须协调一致同时暴动。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必须竭尽全力恢復党的工人阶级基础。大会闭幕后立刻在党内分发的一份文件说得很清楚：「如果不极力去纠正这种农民意识的危险，将使革命完全消灭，党亦趋于死亡。」（註3）

这就是六大通过的总路线。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观念，甚至得到毛泽东的全心支持，他本该是农民第一的主要提倡者。一九二八年底，毛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註4）因此，在六大后，最少在文件上，共产主义运动的趋势正式逆转了。再次被大力强调的是城市的行动而不是土地革命。

再者，大会产生了新的党中央。瞿秋白被撤除总书记的职务，羁留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瞿空出的最高职位由向忠发担任，向来自湖北，此前是个没有文化的苦力，曾在武汉的小轮船上任职。那时他是中共高层里唯一的真正工人。大会选周恩来为组织部长，后又任军事部长。李立三为宣传部长，刘少奇和彭湃分掌劳工部和农民部，没有与会的毛泽东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长。因为这时的新党魁识字不多，无法阅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他们全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得到周恩来的帮助，不久就成了新党中央的真正领导。这样，李立三的朝代开始了。

7

李立三时年三十岁，长期从事劳工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他领导二十万工人示威，从此一举成名。苦干、倨傲、刚愎自用，他天生具备了湖南人好斗的性格。李立三在总书记向忠发身后主持一切，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年完全主导着中国共产党，实行后来称为立三路线的激进政策。

立三路线来自共产国际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又源自史达林的所谓「第三个时期」理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的一次演说中，史达林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共产党革命分为三个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三，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及一九二八以后。他说，在「第三个时期」，爆发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正在成熟。用史达林的话说，那是「工人阶级为即将到来的阶级战争作准备的时期」。（註5）

根据这个理论，立三路线鼓吹利用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实行一个大规模的、精心策划的暴动，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然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胜利只能以成功佔领多少重要城市来衡量。虽然李立三遗憾中国没有像巴黎、柏林那样的城市，因为如果在这些城市取得胜利，就会蔓延全国；但他认为只要佔领武汉──中国的芝加哥，也就可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李立三要尽快攻击和佔领大城市，他没有耐性听从党内着重农村的人的敦促，要好好利用农村。根据这个理论，共产党一定不能单靠红军来夺取城市。恰好相反，应该结合共产党能利用的所有力量来取得胜利，即农民暴动、士兵譁变、红军积极的进攻，以及各种革命力量的配合，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工人罢工。这四种革命力量缺少任何一种，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立三乐观地制定他的路线。他预测中国的决定性的胜利会改变世界局势。他说：「中国革命……不简单是影响世界革命，而且可以掀动世界革命高潮」。（註6）

李的权力在一九二九年迅速上升，他在五月成立总行动委员会（註7），把此前半自治的共青团和工会同中国共产党合併，受他完全控制。这个任务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完成。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和一些老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进一步提升了李在党内的威望。开除陈是因为他不同意中央政治局的革命策略。陈从一开始就反对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的说法，因为这会引起毫无纪律的农民军队放火、掠夺、杀人。但是导致开除他党籍的直接原因，是对于中、苏之间关于中东铁路权益的冲突，陈的立场与中共无法调和。一九二九年七月，俄军入侵东北，中国共产党公开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甚至要组织国际志愿军与俄人一起入侵东北。

陈独秀、彭述之和一小群老共产党员，十分不满这样的不爱国行动。在党中央多次驳回他们的书面抗议后，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内组织一

个反对派，并得到托洛斯基的鼓励。李立三利用这个机会，马上把这群人开除出党。

一九三○年初，立三路线看来大有可为，蒋介石和三个强大的国民党将领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正在扩大内战，使共产党得以乘机扩大苏维埃的领土和红军。五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最少有十四个苏维埃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地区，共有二十一支红军，士兵十万人，此外还有相同数目的赤卫队（即不带武器的后备军人）。

在李立三的坚持下，大会决定把所有苏维埃地区和红军置于统一的指挥下。大会建议在中国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由李立三担任主席，但因为在等候佔领一个够分量的城市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没有做成决议。大会又通过了《组织法》、《暂行土地法》和《劳动法》，在所有苏维埃地区实施。分散各地的红军随后被整编为四个军团，分别由朱德、贺龙、彭德怀和徐向前任总指挥。毛泽东和张国焘分任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四军团的政治委员。（註8）

与此同时，国民党动员百万大军参加的中原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共产国际的史达林主义策略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因而中国共产党也受到压力，不得不採取行动。

为了有助于发动群众採取新的措施，共产国际派遣它最能干的人物、前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Pavel Mif）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新驻华代表和东方部（设于上海）部长，并带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一群最优秀的毕业生和教师。这批由陈绍禹（化名王明）、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和王稼祥带头的留俄学生，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国际派的骨干。他们在一九三○年五月祕密抵达上海，进入党中央。

为了准备立即行动，李立三在六月上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六月十一日，会议通过着名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这是反映立三路线最全面的文件，有条理地陈述李的策略和手段。决议在列举李立三过去一年半主张的所有观念与原则后，突然吩吁党员「准备革命的转变」，令人惊讶不已。就是说，在一省或几省首先取得胜利后，新的革命政权不仅要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也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银行、企业、工厂，并且必须从工农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迈进。

同一时刻，政治局下令所有苏区和红军军团作好攻佔武汉四周各大

城市的准备。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一军团奉命攻击九江和南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夺取长沙，红二、红四军团则从两面包围武汉。

另一方面，政治局号召大城市的所有工人和农村的所有农民响应红军的进攻，发动全国暴动。沉醉于劳工运动的成功经验，李立三和当时的多数领导看来都对发动城市工人阶级的罢工极具信心。六月十一日的决议这样说：「群众好久以前就在说：『暴动的时候，通知我，我一定到来』，现在党应当勇敢的号召群众，『暴动的时候快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註9）

在所有红军为出击准备停当时，李立三对在上海的中国工人发出特别吆吁，他说：「暴动的时候已经到来！组织起来！」然而近百万的上海工人中只有一百二十五人到赤卫队登记。其他工人对于共产党的号召，不是心怀抗拒，就是漠不关心。

而且，江西、湖南与湖北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工人兄弟一样，也拒绝响应共产党号召的暴动。李立三的面向城市行动成了又一个纯粹的军事投机。八月二十七日，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佔领长沙，这是因为一个月前才和蒋介石作战的桂系部队现在缺粮，被迫放弃了长沙。湖南在这年旱灾非常严重。

共军佔领长沙数日，在那里审判及处决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然而城内是心怀敌意的居民，城外是庞大的敌军。红三军团和先前的桂系部队一样也被迫弃城。他们逃入深山，留下一堆堆战友的尸体。

彭德怀的部队损失惨重，使其他红军司令员更为小心谨慎。和以前所有的中国军人一样，红军将领採取了传统的军阀策略，即保存实力以图再起。朱德和毛泽东带领的红一军团甚至连佯攻大城市南昌、九江也不干，部队稍作调动随即回防，没有失去他们在赣南的苏区。李立三和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发现无法控制红军将领，彷彿军阀时期北京政府无法控制督军一样。这样，攻击城市的立三路线就如同两年前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以悲剧结束。

中国共产党的歷史显示，每当遇到严重挫折，党的核心人物总要承担过失。领导人採取的错误策略，就会简化为一句简单明瞭的共产党术语，让党内的批评者和权力斗争对手了解他的过错。不管他如何诚心诚意地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的战略家们总可以找出予以严厉指责的理由。就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

三的策略和手段被称为立三路线，而这路线失败了。

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着手清算李立三和他的路线，米夫和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现在出来领导反立三路线的行动。瞿秋白从莫斯科被派回来调查此案，但在一九三○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他没有办法给李立三定罪，到了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才达到目的。立三路线被指责为「反共产国际」。李的新对手陈绍禹和秦邦宪攻击他轻视苏联，竟然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

结果李立三和他的一些同僚，除了精明的周恩来外，都被逐出中央政治局。他们的职位其后由陈绍禹、张闻天和沈泽民接任。李立三为共产国际召往莫斯科，他留在那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向忠发继续担任总书记，成为另一批主导一切的留俄学生的傀儡。新的领导班子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歷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广大的党员并不熟悉这群新人的名字，而且他们对党务毫无经验，权力并非来自群众，而是来自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驻中共代表米夫。

米夫有一个昂贵的办公室，还要供应在上海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每月经由纽约花旗银行从莫斯科收到匯款墨西哥银元（註10）十三万元。据报中国同志一般每月从米夫那里领到薪金十五元，但向忠发和上海的党中央每月领到维持费一千二百元。

然而在这个时刻，上海的中共党中央除了每日将来自莫斯科的讯息转发各地的苏区及红军外，无所事事。因为多数共产党老党员都去了内陆的苏区和红军工作，前线指挥部距离很远，日益壮大，上海总部的少数几个年轻领导再也指挥不动了。现在是尾大不掉的局面，上海的中共党中央变成了另一个北京政府。

再者，国民党的中原大战于一九三○年底结束，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获得胜利，南京开始把刺刀转向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初，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被拘捕处决，受害者包括重要的派系领袖。「白色恐怖」加剧，使得更多共产党领袖到江西及其他苏区寻求庇护。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忠发被处决，上海的中共党中央结束，这有助于朱德和毛泽东崛起为共产党的主导人物。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以这二人为主要目标，加强了剿共行动。

註释

註1：译者按：引文取自《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第九节「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的第三段。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一九二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页四六一。

註2：译者按：到会代表人数有误，应是一百四十二名。这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据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歷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所载资料：

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一九二八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祕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八十四人。〔见网页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428360.html〕

但关于中共六大会址，另有一说是位在莫斯科南部的「五一村」。近年发现了三份原始档案文献，据其落款及时间，已证明六大会址是在今俄罗斯纳罗法明斯克区五一村。可参看李颖，《党代会现场：九十九个歷史深处的细节》，页九五～九七。

註3：译者按：引文取自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二节的第四点。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一九二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页六九九。

註4：引文取自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卷，页一○二。

註5：引文取自J. V. Stalin, “The Right Deviation in the C. P. S. U. (B.),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Plenum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entral Control Committee of the C. P. S. U. (B.) in April 1929,” in Stalin's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5), Vol. XII, p. 23。

译者按：原文的中译本，可参看〈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速记记录），收于《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页三～九六。

註6：译者按：引文取自《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一九三○年六月九日）》，第一点。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一九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页九八。柏山是李立山的化名。

註7：译者按：近年有资料说总行动委员会在一九三○年八月六日成立。

註8：译者按：根据现有公开资料，一九三○年五月，中共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同年六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七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註9：译者按：引文取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第二十三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一九三○）》，页一二九。

註10：译者按：晚清、民国年间，外国银元输入中国者，以墨西哥鹰洋最多，在中国南部、中部各省流通非常广泛，几乎成为主币。墨西哥鹰洋重七钱二分，为光绪元宝的重量标准。后来在井冈山的红军造币厂，用打土豪和战争中缴获的银器铸造银元，式样亦仿效墨西哥鹰洋。可参看张宁，〈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流通〉，《中国钱币》二○○三年第四期。

【第14章】

国民党清党后的派系斗争（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1

国民党清理门户，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党后，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经歷一段痛苦的分裂和重整过程，其悲剧性并不亚于共产党内所经歷的。紧随着武汉分共，失败的国民党亲共左派由孙夫人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带领，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和谭延闿带领的国民党反共左派于是再无顾忌，一方面执行更严厉的反共行动，另一方面着手「东征」南京。

然而在军事行动中，唐生智越过汪精卫，一跃而为主导人物。一九二七年，唐加入国民党仅及一年，却成为武汉的最高军事司令，控制着超过二十万仅忠于他个人的大军。他热切鼓吹与南京作战，主要出于个人野心，而不是基于任何政治信仰。在计划东征的行动时，唐公开表示在推翻蒋介石后，会让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总理，他自任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官，特别是张发奎，都很清楚这种情况。张现在是一个纵队的司令，掌握一支久经征战和有政治觉悟的六万人的部队。虽然张的部队为共产党深深渗透，他本人却是忠诚的国民党员，效忠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既然晓得唐的个人野心，张和他属下的司令员都不愿意参加东征。由于他的部下贺龙和叶挺在八月一日叛乱，使他找到摆脱东征的藉口，率领余部南下广州。

唐生智的行动并未因张的擅离职守而中断。他照样往东挺进，同时与华东的军阀孙传芳祕密交易，准备共同夹击南京。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的文官领袖对唐的举动惊惶失措，但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南京遇到相同的情况。名义上，蒋的手下仍有十三个军，部队总数约二十万人，共三路兵马，但第二路和第三路分别听命于桂系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李、白二人是桂系的首领，只为了反共，在蒋介石可能同汪精卫及武汉政府作战时才支持蒋。武汉一旦分共，这两位将领就联合冯玉祥，吆吁武汉与南京政府和平统一。第一路军司令何应钦，素被视为蒋的嫡系，也採取同样的立场。

蒋似乎认识到，如果南京和武汉开战，首先受害的是他自己。当他发现汪精卫也处境相同的时候，立即在八月十二日宣佈下野。南京政府在蒋离职后陷于瘫痪状态。

虽然蒋的下野只让汪精卫和武汉政府取得名义上的胜利，却使唐生智失去了任何对南京作战的藉口。汪在武汉政府的分量相应地增加，开始要求唐取消东征。

唐生智并不因为汪精卫致力于和平而改变军事行动，部队继续向东前进。唐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佔领安庆和芜湖，直逼南京，希望与军阀孙传芳联手进攻这个古城。

孙传芳显然不耐烦了，不愿坐待唐生智到来，决定独自行动。八月二十六日，唐军离南京还有两天行程，孙传芳就率所部七万人乘夜渡过长江，突袭一片混乱的南京。在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三位将领亲自指挥下，国民党的守军英勇迎战。经过几个昼夜的拉锯战，八月三十日，国民党军队终于在南京以东三十英里外的龙潭镇力克孙传芳北上来犯的部队。这时唐生智的部队佔领了当涂，在南京城以西只有三十英里。

龙潭大捷巩固了南京的防御，唐生智决定不再进攻。唐和他的部队放弃芜湖向西撤退，孙的败兵亦往北撤退。沪、宁两地解除战争威胁，南京和武汉就这样和平统一了。

2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领导人到上海商讨党务，把总部设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元老也来参加。会议随即同意组织一个过渡性的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直到一九二八年元旦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止。

特别委员会由党内三个重要派系组成，成员共三十二人，汪精卫领导武汉派，胡汉民、蒋介石、李宗仁领导南京派，张继领导上海派或西山会议派。

新的特别委员会于九月十六日在南京成立。第一次会议通过组成新的国民政府、新的中央党部和新的军事委员会。随后选出来自各派系的四十七名国民党资深党员，组成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又从其中选出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闿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

新政府，谭延闿随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新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有委员六十七人，包括几乎所有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将领。又从其中选出以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和唐生智为首的十四人组成主席团，指挥新政权的军事事务。

特别委员会开始运作，所有派系都参加同一个组织，看来国民党真的统一了。然而，表面上的大好形势只是空欢喜一场。国民党最重要的军事领袖蒋介石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任何会议，胡汉民也态度消极。汪精卫起初看来很热心，但不久就发现，汪派在新组织的人数少于独立政客和西山会议派的联合人数，他本人也在新政府失去主席的职位。虽然西山会议派没有军队，也没有追随的群众，却是个由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元老们组成的庞大团体，他们的资歷、声望、经验，尤其是在人数上，都要高于新组织内的其他对手。因为大多数西山会议派的高级领导人都被纳入新组织，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西山会议派就宣佈解散，结束了它在国民党内两年的反对派歷史。

西山会议派重拾权力与谭延闿等独立政客的崛起，令汪精卫及其亲信很沮丧。汪的亲信大多数是暂停运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由汪亲自挑选的。西山会议派一直在执行「联蒋反汪」的政策，汪和他的朋友们自然不愿意看到，一个由西山会议派主导的特别委员会取代了前中央执行委员会。

西山会议派和独立政客其实与桂系更为接近。桂系以重兵保护新政府，成了南京新政权的支柱。他们甚至比西山会议派更支持蒋介石，不喜欢汪精卫。

新国民政府一在南京成立，汪及其亲信就脱离特别委员会，随即开始了反对特别委员会的行动，坚持要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来解决党务问题。他们首先试图鼓动在武汉赋闲的军事巨头唐生智参与行动。唐欣然同意，不久就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宣佈脱离南京政府独立。

唐生智那时在国民党内是个没有人缘的武人，他在东征时表现的个人野心和独断专行，几乎使和他打过交道的国民党资深党员都敬而远之。谭延闿领导下的南京政府现在有了武力讨伐唐的藉口，随即组成西征军，任命李宗仁为总指挥。李宗仁在十月中旬出征，数週后击败唐生智，于十一月十六日佔领武汉。唐乘日本人的砲艇逃往上海，被国民党「永远」开除出党。唐遗下整整四个军的队伍全为桂系吸收，因而把桂

系的势力从宁、沪伸展到两湖地区。

与此同时，张发奎和他着名的第四军不动声色地进入不设防的广州，因为守备部队这时正在粤东追击反叛的贺龙和叶挺。张佔领广州并拒绝原守军返防。十月底，汪精卫及其同伙放弃唐生智，回广州与张会合。在这里他们计划首先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取代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然后密谋消除桂系在华南的势力，以武力佔领两广，为将来行动奠定基础。

蒋介石短期访问日本后，于十一月十日回到上海，看来是全力支持汪针对桂系的计划。两个领导人随即达成祕密交易。蒋支持汪佔领两广，汪支持蒋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行动，让蒋藉此恢復原来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汪精卫说服李济深和他一起离开广州，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建议的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李济深那时是广西最出名的人物，在粤军的地位也很高，使他成了两广最有影响力的军人，因此被视为桂系的首领。李刚踏出广州，张发奎就在绑架桂系前敌总指挥黄绍竑失败后，领军西征广西。

在张、黄之战一触即发时，被称为广州公社的共产党起义爆发。（註1）其后在广州发生的烧杀，使得汪精卫和张发奎成了广东乡梓的罪人。这些行动也给桂系提供了反击的口实。指挥上海警卫部队的白崇禧甚至计划拘捕汪精卫。全国的报章都指责汪和张要为广州事件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汪除了暂时宣佈下野，别无他法。十二月十七日，汪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距离他从法国归国的时间不过八个月。

汪离开后不久，胡汉民和孙科也离开中国去欧洲。国民党的内斗因此急转直下，蒋介石再次崛起为领导人物。

3

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下野后到日本作短期访问，与首相田中义一及其他日本政要多人在东京会谈。虽然民间对蒋在日本的活动有许多谣言，他们谈话的内容却从来没有公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蒋介石与美丽的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宋美龄当时二十六岁，是孙文夫人宋庆龄、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和宋子文的妹妹，美国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荣誉毕业生和基督徒。她

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立竿见影，几乎一夜间把她的丈夫从反基督教的无神论者转变为上教堂礼拜的信徒，从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军人转变为贊同自由经济。

蒋介石婚姻得意，在政治上也乘着汪精卫跟特别委员会和桂系斗争的时机纵横捭阖。汪在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主动提议，恢復蒋原来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蒋于是重返南京再掌军权，同时也接管政府。特别委员会自行解散。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蒋的领导下召开。

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没有了西山会议派和桂系的领导人，也因为其他派系的重要领袖，如汪精卫、胡汉民和孙科都在海外，蒋主导着二届四中全会。会议决议改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关于前者，组织一个新中央常务委员会，选委员九人，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推举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于右任和丁惟汾五人为常务委员，其余四席空置。

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有成员四十六人，但国民政府其实由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和于右任的五人常务委员会领导。谭延闿是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就是国家元首。军事委员会有七十三人，蒋介石任主席。

在这样改组后，谭延闿成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物。然而，谭是个油滑的政客，不属于任何特殊派系，却随时愿意与任何个人或派系合作。其他当选的委员不是蒋的人马就是靠蒋支持的独立政客。二届四中全会终结了整整一年的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权力斗争，蒋介石大获全胜。

二届四中全会又通过由崛起的CC派首领陈果夫拟订、但由蒋介石提出的议案，整理各地党务和党员重新登记。国民党下令各地党部一律暂时停止活动，直到中央党部派员监督和指导工作，包括彻底的党员重新登记。这就使得CC系的影响力从党中央延伸到地区党部。国民党其时在国内及海外约有党员五十万人，七千个左右的基层党部。此后，地区党部渐渐被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控制，二人只对蒋介石效忠。

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国民政府决定完成北伐。为了拉拢主要的将领，蒋建议成立四个集团军，他自任国民党政权之下所有部队的总司令，并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的部队为第二集团军，由冯任总司令。最近加入国民党一边的阎锡山的晋军整编为第三集团军，由阎

指挥。李宗仁的部队整编为第四集团军，李任总司令。其他各省和地区部队则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为了监督军事系统，国民政府恢復中央政治会议，并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地设立政治分会。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四个分会分别任命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主席。各地分会是半自治的地区政府，各自管理两三省的政治、财政和军事事务。（註2）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国民政府重新开始北伐。第一、第二和第四集团军沿着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向北挺进，直指天津和北京。第三集团军从山西向北京进发。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军阀联盟无法阻挡革命军的攻势，准备放弃北京，退回东北老家的基地。

这时，对于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和东北扩展，田中义一首相领导的日本政府深感不安，因为日本人认为这是他们在亚洲大陆的势力范围。福田彦助率领日本部队奉命开进山东省的青岛和济南。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佔领济南时，日本突然出兵。五月三日，中、日两军有小冲突，发展为福田部队屠杀中国平民，遇难者包括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专员蔡公时和十六名随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挖掉舌头和眼睛后枪杀。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济南惨案。

福田佔领济南，并要求蒋介石缴械。日本外务省竭力维护日军，还扩大要求，要限制中国在华北和东北的军事行动。虽然日本的出兵未能阻止国民党扫平华北，却使蒋的第一集团军无法继续北进，天津和北京其后为另外三个集团军佔领。

白崇禧率领的革命军就要抵达北京前，张作霖在六月四日放弃首都，乘专车返回渖阳。专车开到京渖铁路与日人拥有的南满铁路的交会点皇姑屯时，日本人埋设的地雷在张作霖的车厢下爆炸，张被炸死。

日本在一九二八年接二连三干预中国内战，使南京政府和此时由少帅张学良领导的奉系军阀的地方政权认识到，必须停止东北的战争。面对日本可能侵略东北，张学良毅然向国民党政权投诚。作为回报，南京当局允许他继续担任东三省地方政府的首长。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改称北京为北平，改奉天省为辽宁省。

4

北伐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完成，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各地，并没有为国

家带来真正的福祉。正好相反，国民党政权却因此分裂为互相敌对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情况和军阀时期一样糟糕。日渐扩大的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地区成了全国唯一的颠覆团体。此外，国民党的政客和军人又将中国的西南与西北分裂为独立或半独立的省分。四个集团军形成了四个巨大的军事派系，谁也不服谁的领导。

各派系政客勾心斗角，使得情况越来越糟。西山会议派虽然已经解散，创立它的政客们仍然存在，他们除政治外别无专长。此外，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被蒋介石的人马夺去中央党部的控制权后，于一九二八年冬天成立国民党各省市海外党务改组同志会，后来被称为改组派。这两个坚决反蒋的政治团体，寻求与任何愿意和南京抗争的军事集团合作。

胡汉民和他的广东追随者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却是个团结而有影响力的团体。他们和南京的蒋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CC系的权力在蒋介石保护下迅速上升。活跃于军阀时期的前政学会政客，在国民党政权中重新展开政治活动。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组织，却是黄郛、杨永泰和张群领导的一群团结合作的能干政客，其后在国民党内被称为政学系，处于蒋的荫护下。这两个派系虽然同为蒋的傀儡，蒋却使它们保持敌对状态，以便分而治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只是一个空架子。南京为蒋的人马控制，得到胡汉民及其追随者的有条件支持；其他军事集团与反南京派的政客合作，佔据一些地区，半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中国在北伐后的政治割据，实无异于以前的军阀时期。南京政府和执政派系要取消地方自治区，解散半独立的地区部队，所面对的问题一如从前的北京政府。

一九二八年八月中旬，在蒋的指示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次努力。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议决扩大国民政府的组织，取消政治分会，整理和裁减军队。

根据孙文的五权分立政府的理论，国民政府扩大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个院。蒋介石随即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分掌五院。

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和李宗仁四个地区司令官也分别在内阁中担任要职，并规定要留在南京。这明显是集权于中央，取消地区政府和裁减军队的第一步。

这些地区司令官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改组计划还相当合作，但对它的军事计划却难以接受。国民党政权当时约有军队二百五十万人。根据二

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只保留八十万人。为了解散其余的军队，政府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召开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四个集团军的司令官自然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会议对每个部队要遣散的比例争持不下。在辩论中，地区司令官犹豫不决，缺乏诚意，中央政府的筹划者则偏袒不公，双方实在毫无二致。

尚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阎锡山就第一个熘回山西老家。冯玉祥也有样学样，称病不到军政部上班，并终于设法祕密离开南京，跑回他在陕西的总部。

编遣计划就此流产。国民党各军事集团不仅没有解散军队，反而准备开战。蒋主导的中央政府决心要用武力征服各地区部队，各地区司令官也同样决心回击。国民党政权弥漫着新的内战气息。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桂系领导的第四集团军开了第一枪，在武汉叛变。这就是武汉事件，是接踵而来众多叛变的第一桩。

桂系那时是与南京对抗的最强大的集团，它的领袖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一起指挥着四十二万训练有素的部队，第四集团军是它的骨干。桂系控制了全国几个重要的战略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上海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集团的地域色彩太深，虽然它的领袖都是优秀的军人，他们的训练、经验和胸襟却不足以操纵全国性的政治。再者，轻易取得的胜利、贪污和奢靡的都市生活，严重地腐化了许多勇勐的战士，赤足的农家子弟一跃而为身着晚礼服进出夜总会的豪客，已经世故老练到不会再去为落伍的战争卖命了。

地域色彩对桂系尤其不利。桂系指挥的十几个部队中，大多数具有不同的地区背景，尤以来自广东和湖南的为甚。传统的乡土观念破坏了军队的团结，使南京乘虚而入。李济深于三月中旬被诱骗到南京遭到软禁后，手下的广东籍指挥官在华南宣佈向中央政府输诚，桂系的根基因而动摇。白崇禧麾下的湘军在华北亦继起效尤。在大部分的队伍弃桂系而去后，南京政府以压倒性的兵力征服桂系的核心中坚。赫赫有名的第七军，在中国内战中战无不胜，却在四月底未经战斗就被缴械。军队一旦崩溃，桂系随即瓦解。

桂系的领袖逃亡到香港和法属安南，为国民党开除党籍并通缉。然而，共产党的威胁在广西日益扩大，不久给予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三个流亡领袖重掌广西的机会。从此，他们和南京政府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直到最后离开大陆。

5

南京一面同桂系作战，一面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汪精卫一人主导，这次则是蒋介石的大会。蒋的旧对手只有胡汉民一人与会。西山会议派和桂系都给开除了，汪精卫及其同伙从前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多数，现在也出局。结果是黑马CC系脱颖而出，实际上操纵三全大会。因为CC系还没有完全控制各地区党部，曾以民主程序为荣的国民党竟然废弃了党内的自由选举。结果，八成以上的三全大会代表都是由上级委派，其余的从地方选出，但必须得到南京的批准。这一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三全大会产生的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由蒋介石本人或CC系领袖亲手挑选出来的年轻委员主导。

陈布雷就是个例子。他原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编辑，一九二七年初，由陈果夫推荐到蒋介石的总部担任幕僚及撰写讲词，其后加入国民党。仅仅两年，在他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选入三全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潘公展是陈布雷的新闻业同僚，和陈同一时间加入国民党，他的事业更为成功。潘在党工作两年后，成为CC系的主要成员，此时则是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代表了据称总数达五十万人的党员。

这些事实显示，中国国民党的演变正如许多一党专政的政党一样，在所谓「集体领导」的长期权力斗争后，总是由一个独裁者取得最后胜利。此后党领导机构的成员就不再由下面的普选选出，而是由在上的所谓「最高当局」挑选产生，党的各级领导的权力都来自「最高当局」。

虽然蒋介石这时还没有完全控制国民党，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镇压武汉事件使他取得初步成功。三全大会闭幕后不久，南京政府决定彻底解决冯玉祥和第二集团军问题。一九二九年五月底，冯玉祥被免除所有政府职务和头衔，并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桂系採取集体领导方式，而冯玉祥则是孤家寡人，几乎由他一个人指挥着四十万大军。冯个性特异，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而且要求部下和他一样。他治军极严，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北伐完成后，冯玉祥由于大量募兵，经济上又遭受南京的破坏，处境更为艰苦。虽然冯的俭朴生活为他赢得清誉，但他那些半文盲或文盲的下属将领真正嚮往的，却是北方型的军阀，因此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弃主子而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于是，南京提供的高官、黄金和美女，吸引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

一九二九年夏，冯玉祥意识到战败不可避免，因此想出国学习。南

京政府下令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将冯的部队缴械。阎如果服从南京的命令，就得和冯作战，不服从命令，就给予南京以讨伐的新口实。

在中国派系政治打滚二十年的阎锡山十分明瞭这个情况，对南京的举动採取两手策略。首先，他和冯同时辞职，宣称他也要到海外学习，这样南京就得自己将冯的部队缴械。其次，他说服拜把兄冯玉祥到山西访问，向冯承诺採取一致立场，却把冯软禁起来。当南京继续催促冯履行他出国学习的承诺时，阎锡山祕密邀请所有其他反南京的势力到太原议事。

阎的邀请马上得到改组派、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政客的回应。汪精卫早在冯玉祥战败前就策划一个类似的会议，现在他成了北方反南京联盟的当然领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蒋介石主导和胡汉民协助下，开除汪的党籍，下令逮捕缺席的汪精卫及一大批国民党元老。

一九三○年初，华北的反南京联盟已经逐渐成形，在北平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邀请所有前中央委员参加。无可避免地，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政客成了多数，但扩大会议的骨干却是一大群从前由冯、阎、李领导的四个集团军的军人。

一九三○年二月十日，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物阎锡山露出真面目，致电南京政府主席蒋介石，请他和自己一起引退，使党内的争端得以和平解决。接着是一连串由阎、冯、李三个总司令共同发出的宣言，由数十个全国知名将领联署。他们指出国民党内现有的争端是由于党权崩溃，而党权应该属于全体党员。为此，他们要求由全体党员举行普选，产生一个真正的党权，一切争端都由它来解决。为了支持这个要求，将领们建议把他们的军队组成四个方面军，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阎随即在一九三○年四月一日就职。南京与反南京联盟的内战一触即发。

6

双方为这场无可避免的战争作准备，时间超过一年。一九三○年五月初，战争爆发，动员的兵力超过一百万，战场从北平延伸到广州。就在这个时期，共产第三国际预言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启动了立三路线。（註3）

在华南的战争，主要是桂系和张发奎的部队跟拥护南京的粤军和湘军作战。到了五月底，桂系领袖和张发奎冒险出击，放弃广东根据地而

入侵湖南，打算佔领武汉，和北方的冯、阎会师。他们不久就夺取长沙，但当时湖南大旱，加上粤军反击，被迫在六月十五日弃城而去。在湘军尚未进驻的时候，彭德怀和共产党的红三军团乘机佔领了长沙。（註4）

冯、阎的部队和南京的部队决战于华北。长达三个月的大战在秋收季节进行，是民国时期造成最大破坏的内战，不仅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老百姓，焚烧无数的房屋，还摧毁了中原的庄稼，数百万人沦为饿殍。

这场战争被当时的新闻界称为蒋、冯、阎中原大战，除了个人野心外更无任何目的。战争初期，冯玉祥偶尔与革命学者章炳麟见面，问章对战事的看法和预测。章直言相告：「一场土豪、劣绅和流氓的打斗，还值得评论吗？」被章直指为土豪的冯玉祥闻言大笑。随后冯问章的预测，据说章预言蒋会胜利。他解释说，在一场生死豪赌中，具原始农业背景的土豪劣绅无法和有现代工业都市背景的流氓抗衡。确实有趣，战争的结果正如章疯子的预测。

光从兵力来说，双方旗鼓相当，决胜负的因素是足以左右势力平衡的第三股力量。拥有二十万东北精兵的张学良正好有资格扮演这个角色。

战争还未开始时，张在渖阳的总部就吸引了来自双方的代表团。双方都给予少帅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但从事谈判的两支代表团，组合却大不相同。冯、阎代表团由几个能言善道的老将军组成，但可以运用的经费不过区区数千元。

打对台的南京代表团，由洋派的上海市长张群带领，不仅拥有训练有素的宴会主持人、高尔夫球和扑克牌高手，还有电影女明星和社交名媛，正好配合花花少帅的下午高尔夫球、晚上舞会、午夜扑克和早上美梦的作息表。

对少帅和他的顾问来说，黄金要比愉快的玩伴更具吸引力。南京花了一千五百万元，六百万是现金，其余在战后交付。除了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外，中央政府还允许张对冯、阎叛逆在华北的地盘予取予求。

少帅也有他自己的难题。他不像老于世故的老帅那样，让俄、日在

东北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利；少不更事的结果，把两方都得罪了，自己却一无所获。日本人早已对他跃跃欲试，俄国人藉口中东铁路主权的一点小争执，于一九二九年夏天入侵东北。东北军大败，由南京政府接手谈判。光是外交的原因，少帅也难以和中央政府闹翻。

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南京有利。张学良接受了出价最高的一方，在一九三○年九月十八日宣佈加入内战。他的部队立刻入关，兵不血刃就佔领北平和天津。冯、阎的防御全线崩溃，战争以南京的胜利收场。

战争方酣之际，北方反南京联盟于七月十三日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汪精卫七月底到达北平，亲自主持。会议发佈的第一个宣言指责国民党当局已被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小撮人把持，背叛党义，篡窃政权，以致党内分崩离析，祸乱相寻。因此，会议的当务之急是「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註5）扩大会议筹划召开「真正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按照总理遗嘱召开国民会议，在中国建立宪政。为此目的，扩大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但约法尚未在全国生效，冯、阎战败，北平失陷，扩大会议流产，反南京联盟亦随即瓦解。

7

一九三○年秋南京对冯、阎叛逆的胜利，巩固了国民政府，提高了蒋介石在党内的威望与权力。随着蒋的权力上升，两个附属于他的集团—CC系和政学系—也水涨船高。CC系加强了对党的控制，政学系则在政府之中扩展势力。

十月初，蒋介石突然向党和政府提出一个召开国民会议的详细计划，主张由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临时约法》和选出中华民国的总统。当时的政治评论员搞不清楚这些想法有多少来自蒋本人，但在他的智囊之中，只有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对这个新举动表示热心。

虽然在南京的政客极少人敢于表示不同意见，但胡汉民提出反对。他认为应该忠实遵循孙文的遗教，而孙文从来没有认可《临时约法》这样的想法。胡汉民说，根据孙文学说，走向宪政的第一步是训政而不是临时约法。胡的顽固和教条式的理想主义同蒋的务实和随机应变的主张相持不下，胡的倨傲自负与蒋的专横独断针锋相对。

胡和蒋是原来集体领导中硕果仅存的两人，他们不能用投票或抽籤的方式来化解歧见。因此，解决争端的唯一方法是实力的较量。然而，这样的方法对胡极为不利，他虽然高谈雄辩，下笔成章，却没有实力。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邀请胡汉民到他南京的总部晚餐。胡抵达宽敞的饭厅时，发现他是唯一的客人，附近坐着没有资格参与这样场合的南京警察厅长。没有好酒好肉，只有蒋总司令递交胡的一封长信，指责这位没有实权的政治家从事各种颠覆活动，例如煽动军队叛变、与反政府分子勾结，尤其是反对制订《临时约法》。胡汉民给扣留在总司令部数日后，于三月二日被送往南京郊外的汤山软禁。同日的政府公报宣佈胡辞去立法院院长的职位，胡在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胡汉民那时是国民党内最受尊重的元老，是蒋在政府内最后一个老资格的对手。虽然胡没有领导一个派系，普通的党员大都对他同情。海外的党部尤其对蒋愤怒难平。在胡的家乡广东，拥兵的将领一度对蒋拘捕两广领袖李济深（被囚禁在离胡软禁处一箭之遥的地方）表示欣慰，现在却对胡被囚禁感到不安，因为胡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名义上的领袖。

胡被拘捕后，南方领袖们大都逃往广州，在那里和地方将领共同谴责蒋介石。一九三一年五月初，蒋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广州也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来打对台。

在胡被捕前曾与广东作战的桂系领袖，现在应邀到广州，成为新的反南京计划的名誉伙伴。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接受邀请。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现在轮到你了！〉（註6）的嘲讽文章，谈论胡汉民的不幸，接着出现在广州，成了非常会议的最高领导人，着手营救胡汉民。在北方反南京联盟瓦解后仅八个月，一个南方反南京联盟就形成了。北平的扩大会议和广州的非常会议，性质相同，时间有别，只是后者增加了来自南京的逃亡者。

五月底，南方联盟谴责南京政府为非法，要求蒋介石立刻辞职。南方诸人也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选汪精卫为主席，与南京的蒋介石主席抗衡。两广的国民党军队随即改编为两个集团军，分别由广西的李宗仁和广东的陈济棠指挥。反南京的北伐即将开始。

国民党的领袖之间经过好几年的权力斗争后，蒋介石最后成为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唯一巨人。斗争中倖存的对手全被逐出中央领导机构，成为地区的派系领袖。但是国民党政权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内战频仍，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人祸之外，还遇到更为严重的天灾。由于古老的灌溉系统年久失修，水旱大灾年年遍及全国。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正要在华北展开大战，一份官方的报告揭露，仅河北一省因旱灾而面临飢荒的人口就超过八百万，每日饿殍数以千计。一九三

一年夏，宁粤冲突开始，长江流域发生史无前例的洪水，造成一亿人（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流离失所，这些灾民从政府得不到任何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能倖存真是个奇迹。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已确实消耗殆尽，无法抗拒任何严重的外侮或内乱。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註释

註1：译者按：参看第十三章第四节。

註2：译者按：广州分会管辖广东、广西，武汉分会管辖湖南、湖北，开封分会管辖河南、陕西、甘肃，太原分会管辖山西、绥远、察哈尔。

註3：参看第十三章第七节。

註4：同註释註3：。

註5：译者按：引文取自中国国民党扩大会议《联名宣言》（一九三○年七月十三日），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歷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页八三九。

註6：译者按：找不到原来的文章题目，唐先生的英译题目是“Now, it is your turn!”。

【第15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和毛泽东崛起

1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通往权力之路并不平坦。一九二九年秋，乘国民党将领之间内战的机会，毛和战友朱德、彭德怀在赣南和闽西巩固了一小块苏维埃地区。中共党中央领导层混乱不堪，使毛有机会不受外来的控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也明智地认识到，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一九三○年夏，毛泽东任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主持和同志们一道创立的政府。根据共产党的惯例，前敌委员会是组织苏维埃政府的前奏。

到了一九三○年底，南京发动对毛的第一次围剿，更提高了毛的声望。围剿以失败告终，毛从此成了全国报章头版的风云人物。声望大振后，毛具备了在中国割据一方所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地盘、军队和官僚机构。他能够击退外来的武装入侵，也能够压制内部的反对势力。

一九三○年十一月的富田事变是毛泽东进行的第一次清洗，清洗的对象被指控为反革命组织AB团（Anti-Bolshevik Corps〔反布尔什维克团〕）的成员。后来的研究显示，这样的罪状如果不是凭空捏造，也是罗织而成。

AB团本是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大清洗时由一群年轻党员组织的反共小社团，不到三个月就销声匿迹。因为国、共两党的干部本来都在同一阵营，许多共产党人的确与前AB团的成员有个人甚至组织上的接触，但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AB团有可能渗透进了共产党组织。

富田事变是党的领导和共青团间长达十年冲突的结果，传统的地方主义也可能触发了这次流血事件。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二月前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一九二○年，自始在行政上就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猜忌和误解常常引致二者冲突，派系不和一直延伸到苏维埃时期。毛早在井冈山时期就觉得共青团的领袖难以共事，到了赣南，共青团在当地人领导下根深柢固，使得困难倍增。当地的干部大多是该地区受过教育的地主富农子弟，领导着人数不多的红二十军。突然来了数千湖南部队，党的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又是湖南人，领导权就要易手。毛的过激主义更令当地人不安。一九三○年十一月初，红二十军一个营在福建富田叛变。叛军拘捕了一些中共领导，包括几个江西人。他们公开宣称，要继续和红军将领合作，但坚持除去「野心的阴谋家」毛泽东。由于红军将领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叛变以数百名共青团团员惨遭杀

害收场。

富田事变使得上海的党中央手足无措，只好明智地接受既成事实。立三路线失败造成党的领导层分裂。陈绍禹（化名王明）联合一小撮没有经验的「留俄学生」领导新政治局，几乎难以自保。上海在蒋介石的祕密警察的「白色恐怖」笼罩下，蒋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正在进行。这一切使得共产党人无暇争辩，必须重新努力，摆脱上海和江西的困境。

2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政治局开始各苏区的重组。毛泽东和他的伙伴所佔据的地区是那时最大的苏区，改称为中央苏区。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成立，取代毛领导的总前敌委员会。根据组织法，中央局的地位和权力跟其他地区局（如华北局和长江局）相等。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派项英担任中央局的代理书记，新的中央局理论上直接受上海的中央政治局领导。

设立中央局的目的是为党中央最后从上海迁移到江西作好准备。党中央成立新的中央局，显然打算维持传统的权力架构，要把权力日益壮大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毛泽东置于控制之下。不幸的是，党中央领导人不断更换，无法把计划有效地付诸实施。

陈绍禹在上海的领导权是在一九三○年秋天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产生的，但他因清算立三路线的表现不力而受到严厉批判。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否定了陈的一系列决策，令他权力尽失。然而，陈的挫折使敌对派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结果，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前所未有的大震盪。六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谣言说线报来自向忠发身边的同志。共产党的地下小组逐一被破获，千余人被捕。但最重大的打击在十月发生，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立刻向拘捕他的国民党人投降，并提供他所有的绝密情报。周恩来指挥共产党杀手报復，残酷地杀害顾的全家，包括顾的老母及幼儿。与此同时，上海的共产党高层，包括陈绍禹、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秦邦宪和刘少奇，都立即收拾行装，仓皇逃往江西。（註1）

因此，到了一九三一年夏天，共产党在「白区」的活动遭到严重破坏，但在苏区的发展却迥然不同。在同一段时间内，江西的红军击败南京的两次围剿，第二次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第三次在六月。光是第三次行动，南京就调动了近三十万大军。但九月突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随即有蒋介石在十二月第二次「下野」，一九三二年一月又爆发一二八淞

沪抗战（亦称上海事件），使得南京的「剿匪」行动完全停顿。这一连串事件，给扩张红军和苏区地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绝佳机会。因为项英在江西中央局仅是有名无实的领导人，所有作战和扩张的计划全由毛领导执行。从上海逃亡来的党领导人要安居在陌生的乡下，受毛的特警保护，就得先同毛商量。朝着这个方向跨出的第一步是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大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的瑞金举行，与会的代表约有六百人，宣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大会通过共和国的宪法，宪法规定国家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未来大会的代表将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中选出，「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註2）

在大会闭会期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佈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委员六十三人，以毛泽东为首，还包括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陈绍禹、彭德怀、贺龙、刘少奇和陈毅等。三週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张国焘没有出席大会，这个时候，他正在巩固长江北岸鄂豫皖三省边界的另一个苏区。江西苏维埃中央政府选张国焘为副主席，正是对其成就的适当认可。

3

毛主席创立的第一个共和国位于赣南和闽西，面积约为二万四千平方英里，人口约有八百万。

苏维埃中央政府是个专政政体，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政府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机构。副主席张国焘是个能干和有野心的官僚，但他有自己的苏区要照顾。项英副主席个性温和。毛泽东因此保持政府实际第一把手的位子，最少在苏区形成初期是如此。

在苏区政府付诸实施的诸多法律和条例中，土地法尤其值得关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直到苏维埃时期前，都没有固定的土地政策来指导中国农村的共产革命。一九三○年春，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颁佈第一部土地法，这部法

律要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然而，这部法律影响极小，因为它随即被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在毛泽东的苏区政权中实施的另一部土地法取代。新土地法规定「贫农和中农」平均分配土地，地主和其他「反动分子」不得分配任何土地，而「富农」或可分到一些「较坏的劳动份地」。（註3）不过，没有组织合作社，分配的土地可以出租或买卖。

共产党如何将江西农村数百万人分为四个或更多的阶级？这是党而不是政府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政权下，所有法律文件都自动成为政治文件。法律的执行方式与西方政府不同。共产党把法律交给「人民」。苏维埃政府因此只颁佈了几条富有弹性的规则，用以指导在农村地区划分阶级。在党的指导下，人民为了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各自的阶级成分，必须进行自己的「阶级战争」。结果是由贫农和不良分子（痞子）到处制造恐怖。他们滥用阶级仇恨和原始的政治权力，又得到经验不足的共产党撑腰，为中国悠久的农民造反歷史再加上血腥的一页。数以千计的人仅因拥有一些土地就被杀害。毛泽东在他写得很好的报告《农村调查》中纪录了许多滥杀的事件，后来只把《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里。

革命概念同样贯彻到其他与财政、劳动、婚姻和教育有关的政府政策。苏维埃政府有自己的银行系统，发行用六台石印机印刷的钞票。虽然自由市场仍然存在，却对个人提前徵收沉重的所得税。

工人阶级在新社会中自然地位最高。在劳动法规定的权利中，有固定的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女工、青年工与成年男工，同工同酬。

苏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为文盲，苏维埃政府实施全民的义务教育。根据一份一九三二年的报告，在毛统治的十四个区内，有小学二千二百七十七所，学生八万二千人。甚至「剿匪」的国民党人也深表钦佩。

婚姻法的效应更是惊人。虽然合法婚姻必须男女双方同意，但确定离婚自由，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离婚。一份缴获的共产党文件显示，在江西的弋阳和横峰两个小县，人口不到一百万，在一九三二年的某三个月内，纪录在案的离婚有四千二百七十二宗。因此，共产党的婚姻自由和离婚自由，对惨受数千年包办婚姻之苦的中国叛逆青年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不过，苏维埃政权能够存在，全靠由红军和赤卫队组成的武装部队的支持。红军专门负责作战，赤卫队则是民兵。

在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时候，红军已有十几支部队。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由朱德总司令直接指挥，组成第一方面军，下面有四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七）以及数目颇多的地方部队。第一军团原由朱德亲自指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那时二十四岁，是红四军的军长，不久接替朱德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毛的政委职位后来也交给周恩来。

彭德怀指挥第三军团。第五军团由一位前国民党将军指挥，他在一九三一年底率领两旅全副装备的士兵向共产党投诚。（註4）第七军团的司令是萧劲光。（註5）林彪和萧劲光都是毛挑选出来的人。陈毅一度担任红四军的政治委员，现在掌管地方部队和赤卫队。

仿效苏联的制度，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由毛泽覃任局长。（註6）在瑞金有一所给红军军官培训和进修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叶剑英担任校长，教员包括刘伯承和一些游击战专家。开始时，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人数约为十万，两年内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这就是第一方面军的基本实力，它以第一军团为基础建立，从此成了中国红军及其后人民解放军的核心。

中华苏维埃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实施徵兵法的政权，苏区内所有从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成年男子都是徵兵的对象。在一九三三年的扩大红军（扩红）运动期间，许多地区内身体健康的合格男子，超过八成被召入伍。妇孺亦接受训练，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共产党能将整个农村组织成一个庞大的军营，一有战事，在战场的每一人都可为友军提供情报，对入侵者进行狙击。如战况有利，红军像滚雪球般胜利前进；一旦形势逆转，又迅速消失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中。敌人就像在蒙着眼睛作战。

挣扎求生的经验让红军学会了必要的游击战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着名军事着作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写成。事实上，每一个红军指挥官都在无数次的讨论和会议中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毛泽东后来有系统地把这些想法整理成动人的文章。从此这些文章成了某一种军事经典着作，指导着当代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游击战。

在湖北和湖南二省西部山区流窜的红军游击队由贺龙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于一九二八年初回到湘西的老家，在那里组织一个小苏区和一小股红军，到一九三○年改称为第二军团。第二军团后来又改称

第二方面军（註7），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前夕约有一万人。

5

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也值得一提。这个苏区建立在大别山区，共有十几个县，分属鄂、豫、皖三省管辖。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期间，湖北大别山区的小股农民将他们的运动扩散到其他地区。苏区零零星星地在各地建立起来。在大力执行立三路线的时期，这些零星苏区奉命联合统一行政，称为鄂豫皖苏区。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农民队伍也进行合併，统一指挥，其后成为红四方面军，奉李立三之命参与攻打大城市，但以失败告终。

一九三一年，刚从莫斯科归国的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奉命出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黄埔毕业生和参加广州起义失败的徐向前负责军事。张通过中央分局领导鄂豫皖苏区的边区政府，政府设在安徽大别山的高山小城金家寨。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万人，步枪四万枝。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时，鄂豫皖苏区也召开类似的地区大会，参加的代表有数百人。因此，短期之内，鄂豫皖苏区的力量和成绩，至少可以与中央苏区相提并论。许多歷史学家因此相信，如果不是为了控制毛泽东的独立倾向而把中央委员会迁往江西，党中央很可能会迁往鄂豫皖苏区。

其实有许多因素影响上海领袖们的决策。战略上，鄂豫皖苏区位于南京统治地区的中心，四周交通便利，还有大江贯穿全区。在那个时候，游击战只能在「边区」进行。边区是位于两个（或更多）地方势力集团之间的地带，游击队可以在势力集团之间找到生存空间，避免被具绝对优势的敌军消灭。从这个观点看，鄂豫皖苏区就完全不是边区。

再者，大别山脉与其他山脉并不相连，一边是大江，另一边是平坦的平原。崇山峻岭的粮产不足以养活大军，周围的平原也没有洞穴和树林可供隐藏。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出身士绅家庭，早年就读北京大学，这使他成为能干的士绅官僚，却不是能够在基层组织农民的人。他和毛泽东一样拥有重兵和高效率的干部队伍，却缺乏有效的农村组织。他是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钦差大臣」，但毫无组织苏区的经验。打个比方，张也许擅长指挥北越的正规军，但在越共总部却一筹莫展。他与蒋介石打的或多或少是常规战争，注定是会失败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两个苏区十分了解，才会作出选择。党中央迁往瑞金的最后决定，

绝不是由于毛不服从领导或张唯命是从。事实上，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中，张在当时是个更惹起争议和批评的人物。

6

苏维埃政权在长江流域中部建立，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带入一个新时期。首先，革命的中心从沿海城市转移到自给自足的农村地区，无产阶级革命现在逐渐转变为农民运动。因此，革命的性质、共产党的社会结构和它的领袖所需的资格都完全改变了。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不到两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红军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下面是一份共产党的官方统计数据：

党员和红军士兵（一九三三年九月）的社会背景（百分比）

	工人	農民	文員	其他
黨員	一三·九	六〇·三	〇·二	〇·八
紅軍士兵	三〇·一	六七·二	一·六	一·一
軍官	三九·四	五七·四	二·二	一·四

＊统计数字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提供，见《陈诚档案》，微胶片第八号。

这种以农村为基础的发展经验主要发生在中国，使俄国人和以俄为师的理论家们（当日的中共领袖大多如此）手足无措，却令出身农村的农民组织者毛泽东在与面向城市的同志争权时佔了上风。然而，要共产党摆脱它的城市传承是很困难的事。转型的痛苦清楚地在所有决策会议上反映出来，毛常常面对大多数，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在一九三二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多数是精明能干、三十来岁的青年。毛最年长，三十九岁；张闻天、瞿秋白、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三十二到三十四岁之间；陈绍禹二十七岁；秦邦宪二十五岁。他们几乎全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受过高中、大学甚至外国教育，对问题所知不深，却喜欢高谈阔论，下笔千言。他们是一群高傲、无畏、反抗旧制度的叛逆青年，目无法纪。如果团结一致，或可能翻天覆地，但要他们依照议事规则，彼此合作却不容易。不管是什么模式的民主，都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这些红色造反者必须由一个位尊权重、望之生畏的权威来统御，才可能成事。

在苏维埃时期以前，中央政治局可以提供这样的权威。政治局直接听命于拥有步枪和卢布、权力不容置疑的共产国际。随着俄国人的影响在江西削弱，旧有的权力结构也跟着削弱。现在的双首长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苏维埃政府是为地方实力派、尤其是为毛泽东设立的。党中央的领导位子却留给从上海来的合法领袖，如陈绍禹、瞿秋白、张闻天和秦邦宪。这些人组成一个牢固的派系，即一般史家惯称的国际派。中央政治局仍由他们控制。

与他们在南京的对手不同，共产党和政府在理论上和组织上是分开的。虽然政府的政策要接受党的指导，党不应插手政府日常事务的管理，但是两者的权责却没有清楚的界限。甚至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上实际存在的差异，也因为政客之间必然的猜忌而复杂起来，使毛成了备受批评的目标。尽管困难重重，毛仍是苏维埃共和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不过他也不能无视党的合法权威，因为党在法理上仍然是他的上级。同样，党中央面对毛也无能为力。他们具有合法权威，可以继续发号施令，但缺乏真正的力量。在双方发生争执时，朱德、周恩来、陈毅和其他许多着名的领导人都感到左右为难。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见机行事，不时改变立场。如果现代的极权政党没有一个大独裁者就不能运作，江西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这样的党。混乱是无法避免的了。

毛的灵活土地政策是第一个受攻击的目标。批评者指责他执行反革命的「富农路线」。毛称批评者为「钦差大臣」，认为他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的回应又给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认为违反了马列主义。和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同志一样，毛只能低头认错。

毫无疑问，毛泽东受到公开批评，使他丢了面子。据说在这时期，他三度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他的政治对手不太可能完全压服他。经验教训告诉他「枪桿子里出政权」。因此他忍不住对成功地建立「中央大军」的蒋介石公开表示佩服，称蒋为「我的老

师」。毛学了他的老师，似乎没有把军权让给任何人，反而全神贯注于扩张军队。为此，他又给批评为迷信「枪桿子主义」。

一九三二年暮春，南京与日军在上海地区停火后，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行动。到了围剿的末期，中共党内的反毛运动也达到了高峰。国民党的战略家决定，要孤立中央苏区，得先扫除另外两个比较小的苏区。这个战略相当成功。经过数月的血战，张国焘和徐向前率领的八万红军溃败，逃往川北另闢根据地。同样的，南京的进攻迫使贺龙从湘西流窜到邻近的山区。

当战况最为激烈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将领对于该採取什么战略展开争论。毛泽东建议在苏区内打一场因地制宜的防御战；为了保存军事实力，必要时不妨放弃一些土地。周恩来、张闻天和秦邦宪佔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多数，坚持在「白区」发动「攻击战」。他们以为应在南京集中兵力入侵苏区前出击。多数票佔了上风。攻击战开打，南京又吃了一次败仗。战事结束后，党中央发起反罗明路线运动。罗明是福建省的代理省委，曾建议採用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此公开遭到严厉批判。

一九三三年秋，毛泽东再度受到羞辱。他的爱将红四军团司令萧劲光在一次撤退中打了败仗。萧被拘捕、受审并判入狱五年。周恩来等人认为，萧的案件不只是战术错误的问题，而是一个错误的集团接受了错误的意识形态、执行「退却逃跑路线」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毛被指责为这个集团的头头。（註8）

毛另一不能饶恕的大罪是没有利用福建事变（闽变）和南京对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群国民党左派将领在福建叛变反对南京，他们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建议与中华苏维埃政府合作。据说周恩来等人贊同立即结盟，毛却犹豫不决，以为只不过是两派反共恶棍的内战。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数週内崩溃；南京随即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华苏维埃政府因而失去一个有力的盟友。由于毛举棋不定（似乎只有他要负责任），引起一片反对他的喲声。一九三四年夏，第五次围剿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据说毛被迫离开苏维埃首府，到乡下的一个小镇避难。一位昔日同志回忆说，毛谈起当时的挫折，凄然落泪。（註9）

尽管迭遭挫折和羞辱，毛泽东在江西时期的大权似乎从未真正旁落。反之，在最高领导层的一系列会议中，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党中央最高决策者之一的地位一再得到确认。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的五中全

会上，毛泽东甚至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是苏维埃共和国权威最高的职位，虽然他仍受到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的监督。其时总书记陈绍禹在莫斯科代表中共，秦邦宪当选代理总书记。（註10）

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确认了毛泽东的主要行政职位，选举他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主席。在任何的情况下，毛总是红色政权内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像中国政治中的两位先行者袁世凯和蒋介石一样，遇到任何紧急情况就要把他找回来。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第一次面临致命的惨败，毛泽东被召回瑞金，参与计划和指挥即将来临的长征。红军不久突破国民党的包围，向西逃走，南京的军队尾随其后，乘机进入地方军阀的地盘。这位未来的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统帅的革命生涯，从此展开新的一页。

註释

註1：译者按：中共现在的解释是，王明在一九三○年底藉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更「左」的政治纲领。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扩大），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他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同年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指定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九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临行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註2：译者按：引文取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第二点。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七（一九三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页七七二～七七三。

註3：译者按：参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七（一九三一）》，页七七七～七八一。

註4：译者按：投诚的国民党将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

註5：译者按：根据现在公佈的资料，军团长是寻淮洲，政委是萧劲光。

註6：译者按：根据现在公佈的资料，局长应是邓发。

註7：译者按：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旬，中共以红二、红六军团为主体，加上原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改称的红三十二军，组成了红二方面军。

註8：译者按：一九三三年，萧劲光担任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教员、政治科科长。同年十一月被「左」倾冒险主义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遭撤职判刑。由于毛泽东等人反对这样处理，他在被关一个月后，释放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註9：译者按：根据最近出版的专题研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最后三年，处境十分困难。有关这段歷史的记载，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二○○四年），第十四章。另可参看余伯流、陈钢着，《谁主沉浮—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几起几落》（长征出版社，二○○四年）。

註10：译者按：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所载资料，中共临时中央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王稼祥、凯丰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全会还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见网页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1/10555436.html〕

【第16章】

第二次蒋汪合作与共产党长征

1

中国两大政党自一九二七年年中分道扬镳以后，它们的命运就一直交替起伏，一党的祸难自然成为另一党的喜讯，反之亦然。九一八事变时，苏维埃运动正声势汹汹，南京的威望则受到严重打击。蒋介石原来打算在国内两面作战，一面讨伐党内反对派，一面围剿共产党叛军，日本侵略东北使得他的计划难以执行。

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学生，长期以来都反对内战。新的民族危机使年轻一代有了绝好的理由示威游行，反对失去民心的政府。各处反蒋的政客也抓着这个机会煽风点火。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连数月，年轻人的示威抗议瘫痪了许多大城市。

蒋难以应付，向南方呶吁和解，并恢復李济深和胡汉民的自由。然而南方团结一致，拒绝退让，坚持蒋彻底下野。蒋同意引退，为了表示诚意，命令他的部队撤离南京和上海，派遣十九路军接防。新任的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是广东人，和南方各领袖关系融洽，作为南京与广州之间的调人，他保证南方诸人到南京继任时的安全。南方欣然同意，派出由汪精卫带领的代表团往上海，开始与南京谈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践诺下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批准蒋辞去一切党、政、军的职位，并选出前西山会议派的元老林森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暂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

上海和谈达成几项协议，其中一项是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立即召集所有敌对人士在一起举行和平会议颇为尴尬，双方进一步同意，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两地各自召集代表进行选举。除共产党和某些以前的军阀外，所有自一九二四年一大以来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人，将在四大自动再度当选，成为新一届中央委员。（註1）根据商定的数额，将增加一些中央委员名额。然后南京和广州分别选出的委员合而为一，使全党完成统一。

和会又同意：国民政府主席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由文官担任；未来设立的五院互相独立。行政院院长（总理）不得干涉其他各院。海陆空军总司令及其司令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取代。要言之，将来的

南京国民政府会是一个更民主的体制，由各派系集体领导，再没有强人把持的余地。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两个国民党四大就这样分别召开。然而，来自南京的压力一减轻，原来团结一致的南方就无法再团结。在广州的四大发生争执，汪派人马中途离席，到上海和汪会合，在一个游乐场召开国民党的第三个四大。

同一时期，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和在江西的共产党红军正各自血战，国民党政客却在三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抢夺职位。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后来合併，在十二月下旬召开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的国民党本应在这次重要的中全会制定一个改革党务和政府的计划，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却一致予以杯葛。蒋诚然在大会的开幕会议致词，却拒绝参与任何讨论实务的会议。结果由二线的领导人通过一系列的决议，再度确认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并选举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按照决议，三巨头应该轮流担任国民政府最高政策制定机构━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但三人无一露面。经过数週的挣扎，孙科发现只凭家世在南京产生不了权力，只好辞职。

在蒋介石之下权倾一时的CC系领袖陈立夫曾与笔者评论这一段歷史。陈以为孙科接受行政院院长的职位纯属政治幼稚。蒋和当时大多数观察家都知道，没有蒋的参与，任何南京政府都不可能有丝毫作为。汪与胡二人亦认识到，蒋介石无论如何不可或缺，也不能单独一人重掌权柄。三巨头坐观其变，但选择权却在蒋的手里。应该恢復以前的三头政治，还是选择一个伙伴？蒋明智地选择了后者。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与蒋家多年来关系密切，他告诉笔者说，委员长最喜爱的中国古籍是《孙子》和《战国策》，他从这两本书学到的东西，在与两位广东籍政界元老的较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永远不容许汪、胡二人携手与他合作或与他对抗。从一九二五年以来，蒋一直有办法令二人分裂。唯一的错误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夏天，他把胡软禁起来，却让汪安然在外。蒋的无心之失使得两个以前的政敌极不寻常地捐弃前嫌，在南方组成牢固的反对势力。这个失误几乎使蒋的功业毁于一旦，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立刻亡羊补牢。

一九三一年底，从上海和谈开始，蒋就不断表示愿意服从汪精卫的「全面领导」。孙科被迫辞职后，汪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扶病前往杭州与蒋介石会谈。二人用了近一週时间来拟订第二次合作的计划。事实上，他们的合作维持了七年，是国民党漫长的革命斗争史中唯一的

一段和谐时期。

2

第二次蒋汪合作，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两人返回南京时正式开始。这座古都的政治气氛一夜间改变。现在很清楚，两位强人将联合领导党和政府，却各有明确的权力范围。汪是行政首长（行政院院长），全权处理一切政治和外交事务，但不干涉军事，那是委员长独掌的范围。党在他们的联合领导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不久就为组织委员会取代，陈立夫任主任委员，由汪阵营的年富力强的群众组织者谷正纲协助。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和蒋介石分别就任行政院院长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三月七日，蒋经汪提名，正式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日，日军在上海重启战端，遭遇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中国士兵展现了现代中国并不多见的抵御外侮的英勇气概，使得敌人惊讶，全国沮丧的人心为之振奋，更赢得海外普遍赞扬。为了应付新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迁都河南的古都洛阳，在那里筹划长期的对策。

毫无疑问，日本是中心议题。国民党领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第一步是将战事局限于上海地区。战斗就这样在三月上旬暂停，两个月后签署停战协定。华北的局势难以预测，但南京肯定不会採取任何刺激敌人的行动，也没有立刻收復东北的意图，而是等待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和李顿伯爵（Lord Victor Bulwer-Lytton）完成调查工作，希望有利于中国。尽管日军已入侵长城之内，南京仍然选择循外交程序解决，不进行武力抵抗。

内政方面，新中央政府决定，对手只要不是共产党，都可以接受。陈济棠和李宗仁领导的南方将领，可以组织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分别负责地区政务和党务，中央几乎全不干预。国民党最受尊敬的元老胡汉民，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派系的领袖。他的追随者都是一些小派系的头头，其中以孙科的势力最强，而孙已同意回返南京，担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不满，蠢蠢欲动，但安于现状的南方将领不予支持，令胡无能为力。

淞沪之役后，蒋把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调去福建，使得陈济棠愈加谨慎。十九路军的将领全是广东人，他们很想返回故乡，但腐败的「南天王」坚决拒绝。双方的相互猜忌，让南京更容易加以控制。

其余内陆及边区各省由打着国民政府旗帜的地方军阀统治，南京政

府决定不予干涉。除了这些半自治地区外，中央政府仍牢牢控制着五个半省分—江苏、浙江、安徽、河南与湖北，江西则与共产党平分。

幅员超过三十万平方英里，人口达一亿，蒋、汪两位合作伙伴着手重建共同的事业。二人视共产党为治下的「心腹之患」，决心予以剿灭，最少也要把他们驱逐到军阀控制的地盘去。

3

淞沪之役一结束，蒋介石马上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他选择这个地区作为重新开始剿匪行动的第一个目标，确有充分的理由。这个地区处于南京统治五省的中心，战略位置重要，不容忽视。共产党曾公开夸口，说他们有能力「截断长江，动摇南京，直取武汉」。只要善于运用兵力，他们佔据的地利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地理形势并不是完全有利于共产党。鄂豫皖地区山势崎岖，不利生产，周围的平原又无险可守。南京一直在修建公路网，进口的车辆不久就跑得比共产党最快的飞毛腿还快。封锁的效应与日俱增，打了就跑的战术已不再是中共游击队的专利。现在游击队也会遭到突袭。

而且，从一九三二年起，南京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就增设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通过航空委员会，西方各国协助南京装备和训练了一支很有成效的中国空军。成千上万的红军翻山越岭时全是空军学员练习的活靶，空军不久成了装备简陋的农民军队无法承受的威胁。

南京除了採取军事行动以外，也开展有效的政治工作。中国的农民基本上保守而安分，若非走投无路，不会为渺茫的画饼铤而走险。国民党这时暮气未深，它的干部和政工一如他们的共产党兄弟，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他们以同样的热情针锋相对地组织农民，而且日见成效。红军和国民党一样向农民徵收沉重的赋税，声望下降，而中央军在「匪区」反而威信日增。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南京把残留的六万红军赶出鄂豫皖地区，迫使他们去川北另谋发展。苏区的首府金家寨易名立煌县以表彰卫立煌将军，他是佔领金家寨的这场战役的指挥官。

南京在地方部队的协助下，又把贺龙领导的游击队赶出鄂西，然后调动大军，再一次在江西採取大规模行动，称为第四次围剿，它的战略计划在一九三二年六月的庐山五省剿匪会议上制定；实际的行动在下一年的一月展开，蒋自任五省剿匪总司令，并委任「南天王」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但陈依然按兵不动。

这次出动的兵力不下三十万人，虽然实际作战的只有半数。蒋任命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务，陈诚直接指挥前线战事。陈诚并非虎将，却是个精力充沛的管理干才。他为自己及国民政府着手收集了中国共产党的资料，这些江西时期共产党的第一手珍贵文献深受后世史家重视，现存台湾，甚至令大陆共产党的档案专家眼红。

毛泽东的防御计划遭到否决，红军将领主动出击，要在敌人未站稳阵脚前发动大规模反击。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有助于他们取得胜利。江西的内战，正好和日本在华北加强侵略战争同时发生。日军从东北南下，在一月初数日内佔领热河全省，然后攻击长城东段的所有关隘，威胁平津地区。大多数国民党守军败逃，只有少数部队坚守阵地，壮烈殉国。这些烈士是时代的民族英雄，受到全国景仰，热血沸腾的学生尤其认为内战罪不容诛。

这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向日本宣战，共产党自称是最爱国的力量。他们对红军士兵灌输仇视南京「汉奸」的思想，说他们把国家「卖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此同时，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士气消沉，蒋调兵遣将又有欠公允，使得情况更为恶化。一如既往，南京的部队分为两类：中央军和「杂牌军」。他们的军饷和装备也因而各有不同。但待遇优厚的部队不一定比受歧视的打仗更卖力。事实上，大多数中央军在后方压阵，在前方的主攻部队却是「杂牌军」。

第四次围剿并不尽如南京之意。担任主要进攻任务的三个师在数週内全军覆没。战事在三个月之内结束，南京在声望和物资上再度受挫，而日军在华北长驱直入，又使南京举步维艰。它必须先与日军达成协议，才能分兵剿共。

4

行政院长汪精卫对少帅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至为愤慨。一九三二年八月，汪致电少帅，要求与少帅同时辞去政府的职务。

汪提出这样的建议自有其原因。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宋子文又拒绝合作，使汪再次住进医院。宋虽是财政部部长，却好像独立于行政院之外行事。宋的所作所为，蒋介石知道的要比顶头上司行政院长更多。汪获准暂时离职，十一月乘船赴欧洲休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

短暂的欧洲之旅急剧地改变了汪的外交政策。此前，他似乎对国际联盟满怀信心。然而，经过几个月亲自研究欧洲的情况，汪认识到，就

中日冲突来说，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可信赖；列强不可能或不愿意帮助中国面对日本日益扩大的侵略。中国的武力抵抗徒劳无功，只会让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得利。对国事的看法改变了，汪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返回南京，正好及时批准少帅辞职。从此之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政权中主张中日合作的带头人物。

汪的改变正好和蒋的时间表配合，使得这对貌合神离的政治伙伴的第二次蜜月成为可能。蒋介石决心通过外交管道和日本在华北达成协议。即使不能持久，短期的和平也是好的。蒋不能让以前的对手汪独揽与日谈判之事，也要插上一手，找义兄黄郛来担任这个角色。

黄郛是杭州人，早年就读浙江武备学堂时被选派留学日本，在那里加入孙文的革命团体。一九一一年归国，参加在上海的革命战争。在上海时，基于友谊和政治利益，他同陈其美和蒋介石两位革命党人结拜；沪军都督陈其美居长，黄郛其次，年轻的团长蒋志清第三。蒋后来易名为蒋介石。

一九一三年，黄郛随孙文流亡海外，为袁世凯悬赏捉拿。黄在袁去世后归国，往北京参与新的军阀政府。他精明能干，而且时来运转，一九二二年受命筹办全国财政会议；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先后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黄郛在担任内阁成员时，联合冯玉祥发动一九二四年的着名政变，成为新政府的代总理。

一九二六年，北伐进展迅速，黄赋闲天津，但不久就为蒋徵召，在年底应召上庐山密商。黄可操流利日语，在中、日两国广有人脉。他也被视为前政学系的首领和江浙财团的主要顾问，这两个组织都倚赖他作为与蒋介石交涉的中介。这些不寻常的人脉使得他能直接为政府所用。一九二七年，黄曾短暂担任上海市市长，一九二八年就任外交部部长，直到济南惨案使他蒙受不白之冤才辞职。

一九三三年三月，黄郛担任新成立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则受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註2）黄总揽华北地方政务，并专责处理对日事宜；何负责军事。何立刻北上，而黄则逗留上海多日。许多人怀疑，黄在离沪赴平前曾与日人祕密谈判；但在黄的个人文件中没有证据，日方的档案也找不到佐证。有些事实似乎可以验证这一传闻，但无论如何，一九三三年他到华北任职，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爱国情怀。

中国报界（其中包括许多蒋的支持者）和全国学生都谴责黄为卖国贼。甚至有人企图在天津刺杀他。精明的蒋介石从不表示个人对和、战

的看法，以免有损他的抗日爱国形象。黄不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政客多所诽谤和妒忌，而且不予支持，日本人对他也绝无好感。

幸亏日本人也不是团结一致的。在东京、沈阳和天津的日本政客和军国主义者互相猜忌，同床异梦，又缺乏大举侵华的勇气和具体计划。东北已大得难以消化，现在他们宁愿暗偷而不想硬抢。中国这位第一流外交家因此才有机会扩大他们彼此的矛盾，与相关各方达成协议。解决方案最终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签订，史称《塘沽协定》。该协定使长城外日军的进犯暂时停止，为南京赢得足够的时间对共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最后把赤党逼向「长征」。

5

一九三三年秋，南京政府调动了五十多万部队，继续内战。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指挥南京最精锐的部队作为进攻的主力。这支部队布置在苏区北边，称为北路军。布置在苏区南边的是广东、湖南的部队和来自福建的十九路军。

蒋介石从惨痛的经验中学到了怎样对付游击战。围剿连续四次失败后，现在命令部队在下午四时后不与敌人作战，如无友军的密切配合也不应深入苏区。另一方面，他指示政府部队围绕苏区构筑一条坚固的小碉堡封锁线。每一碉堡由一班或最多一排人驻守。一个编制满员的团因此就能固守一条长达十二英里的防线，不会因暴露而遭到攻击。

蒋可用的兵力约为三百六十个团。全部布置完毕后，足以形成一条像长城那样的防线，围绕着整个红区。这是个老战略，中国古代的将军常用来围剿「流寇」或抵挡「蛮夷」入侵。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是纳粹陆军前参谋总长，现在担任蒋的军事顾问。在这位能干的德国战略家协助下，蒋把古老的战略现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吸收的教训在这里完全用上了。公路网修建起来，为各小碉堡输送粮食、弹药。共产党游击队是农民军队，没有重武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按照时间表，慢慢把包围圈缩小。第五次围剿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正式发动，预期在一年内完成。

然而，包围圈并不如蒋所要求的那样牢固。在南面的各省军队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彻底完成使命。着名的十九路军发动的闽变几乎使蒋的围剿计划功亏一篑。

十九路军的前身是北伐时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受到中共渗透，从来没有与左派歷史切断關系。即使在大清洗后，共产党及其同路人遭到

集体屠杀，十九路军军长陈铭枢还是利用政府职权，贊助出版《读书杂志》，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在中国的实际应用。这杂志其后成了现代中国出版的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它刊载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术辩论文章，为现代中国史学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英勇作战，声誉极隆，但是其将领后来在福建遭受种种委屈，使十九路军总部成为一个新的政治避难所。左倾知识分子、稳健派政治家以及不满现状的军人纷纷匯聚，组织了许多社团和政党，例如第三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充满资产阶级习气，无法忍受共产党的戒律，又太崇尚自由，不愿向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屈膝。十九路军总部对他们来说是个最理想的庇护所。

一九三三年年中，这样的理想主义逐渐在福州发展，并制定了一个反南京计划。为了争取支持，他们和台湾的日本人及江西的共产党接触，但两方都对这计划的意图和能力置疑。共产党和他们在十月二十六日签了祕密「协定」，答应「未来提供支持」，条件是福州方面必须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履行所有反南京的承诺。一些歷史学家认为，这个一面倒的文件是近代中国史上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本来同意带头参加即将开始的反蒋行动，因为该行动可能发展为另一个南方各省的联盟。但福州的策划者决定新政权要彻底摆脱国民党过去的光荣歷史，使胡在最后时刻突然变卦。他们计划组织一个叫做生产人民党的新政党来取代执政的国民党，甚至要改变国号和国旗。胡汉民对这一新情况既尴尬又气愤，几乎在一夜间转变态度，谴责福州领袖为卖国贼。胡此时在南方所有将领中威望很高，而南方诸将又比胡汉民更为现实。

福州组成新南方联盟的梦想虽然破灭，仍照着原来的计划进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福州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民政府，挂出新国旗，选举从香港来的「贵宾」李济深为「主席」。福建事变全面展开，下一步就要看南京的了。

通过他的情报机构，蒋介石一开始就对福州的计划瞭如指掌。他担心的是日本人和共产党，而不是这些叛乱者。黄郛的人马再度应召出山。蒋的密使前往台北，预先防止叛乱者向日本人求援。任务成功达成。在军事方面，蒋迅速从江西的北路军集结十一个师精兵，命令他们穿越苏区，迅雷般一举解决福建的叛军。

红军的高层领导这时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他们应该保护十九路军，全力阻截蒋军通过？还是任由蒋的军队长驱直入，通过苏区，让国

民党人自相残杀？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最终选择了后者。毛泽东后来向美国名记者史诺说，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第一个错误」。彭德怀和林彪把红军撤向两旁，让蒋的军队长驱南下，通过得胜关直扑闽北。只经过几场激战，蒋就把福建的叛军扫进了歷史。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蒋军佔领福州；二月二十三日，最后一个叛兵放下武器。整个事变从头到尾只持续了几星期。

6

闽变的失败使南京的信心大增，也打击了红军战士的士气。第五次围剿加紧进行，苏区开始感到封锁的压力，弹药、医疗用品和粮食日益短缺。日常饮食中缺盐，严重地影响前线红军战士的作战能力。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红军经过浴血苦战，伤亡惨重，失去了战略要地广昌。毛泽东后来指出，此次战役后，红军的所有将领都认为战事已经无望。包围圈迅速收紧，苏区被分割为三块。萧克率领的六军团被孤立在井冈山地区的西线，方志敏率领的十军团，总数约一万人，被包围在东面的皖赣边区。各条战线伤亡和患病的红军人数逾五万。敌人已进入内线，李德（註3）的「短促突击」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已全无意义。红军指挥部高层考虑了几个替代方案，似乎无一可行。就如毛泽东所说，「最后，别无选择，只有长征。」

大规模突围似乎在一九三四年夏末开始计划，红军当时的兵力大约仍有十五万。李德还是在运筹决策，与军事委员会正、副主席朱德和周恩来紧密合作。初步计划显然全是以逃生为前提，红军必须突破蒋在江西的包围。由于南京的将领故意网开一面，突围看来可行。湘赣边界包围圈的西南方由地方部队防守，构筑碉堡封锁的工作做得很差，南京一直没有改正这个弱点，共产党企图利用这一缺口脱逃，正好落入蒋的战略盘算中。

中共最初的战略计划中并无「长征」，只有短暂的行军，目的地是湘西而非陕西。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一支像红军那样的庞大队伍，在全无支援的情况下行军六千英里，在开始时是无法想像的。因此，原来的计划只是放弃江西的「老」苏区，到邻近的湘西迅速建立一个新苏区，在那里贺龙和他的红二军团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的计划使长征的初始阶段看来有如搬家，全家里里外外的罈罈罐罐都要带走。红军的将领像搬家的主妇，甚至带着沉重的缝纫机，仅搬运队就有挑夫五千人。

为了大规模突围，红军的高层指挥兵分数路。萧克带领约七千人奉

命在八月初冲出封锁，协助贺龙为后到者做好准备。萧克鏖战一个月，损失了六千人，逃入湘西的大山中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师，等候江西的进一步指示。

方志敏指挥的红十军团大约一万人孤军奋战，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他的目的是拖住该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以免后者与其他部队会合，追赶逃脱的红军。红十军团不久即为国军击溃，方志敏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被俘，（八月六日）遭到处决。

江西当地民兵和不适合长途跋涉作战的人，共约四万奉命留守，由陈毅和项英联合指挥。他们也英勇作战，随后分散为小股游击队，流窜于赣闽山区。许多人后来被国民党杀害，其中包括苏维埃政权的前教育部长瞿秋白，在逮捕后于当年夏天被枪决。

这时红军的主力大约有八万五千多人，编号为第一方面军，在内部称为中央红军。他们分为五个军团（一、三、五、八和九），在湘赣边界附近的信丰祕密集结。红军总指挥是朱德，由李德协助。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别由林彪和彭德怀指挥，是突围的主力部队。参加长征的还有三十五名妇女和一些儿童，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她有孕在身，还带着两个幼龄的孩子；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经过精心准备，红军小部队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奉命全线发起佯攻，而主力部队则把围堵的国军推向两侧。在十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的三天内，长征全队人马冲过山径进入湘南，歷史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註4）

当时新闻界称为「朱毛赤匪」的长征部队，在湖南为薛岳率领的第二路军（以南京的精兵组成）尾随不捨，但双方之间总是保持一两日脚程的距离（约二十到四十英里），极少直接接触。薛提出一个更有效歼灭赤匪的战略，但蒋介石宁愿让地方部队各自防守本土，如无必要，中央军决不介入。与此同时，蒋悬赏二十五万元，求取朱、毛的首级。（註5）

地方部队在江西的战绩欠佳，但在保卫自己家乡时却颇为勇勐。广东和湖南的地方部队从两侧顽强地夹击，联合南京的追兵在十二月初把「赤匪」推到广西省。

这时南京的宣传机器开始散佈谣言说，政府截获了红军与广西领袖的来往电报，似乎双方有所图谋。然而，在广西全县的湘江附近一场血战后，广西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电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声言有红军俘虏

六千人，希望上海收容。上海市长尷尬之余，自然敬谢不敏。李、白会同其他的追兵，把红军赶过湘江，进入湖南省西南。

长征头两个月，红军且战且走，损失惨重。跨过湘江后，全军还剩下不到三万五千人，在北边有六倍的精锐敌军正严阵以待。但以李德、朱德和周恩来为首的红军指挥官仍然计划突破这牢固的封锁，与红二军团在湖南省西北会师，因为后者已经配合南方的行动发动攻势。可是，据中共官方史料记载，在（湖南）通道县的会议上，毛泽东可能第一次在长征中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在毛的坚持下，红军放弃原来北上的计划，转而西向，朝贵州挺进，在十二月中旬进入贵州。毛的新动向正好配合了蒋介石的战略大计。（註6）

在当时中国西南各省中，贵州的防务最为薄弱，军阀省长王家烈和抽鸦片的贵州军根本不堪一击。当王调动地方部队防守省会贵阳的时候，「赤匪」未经战斗渡过了凶险的乌江，向北挺进，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他们一弹未发就佔领了战略要镇遵义。在这里，共产党暂时摆脱追兵，可以稍作喘息。

现在是高层领袖们作检讨反省的时候了。他们的使命显然失败了。在三个月内失去三分之二的兵力和全部辎重，倖存者飢寒交迫，疟疾缠身。原来乘轿子的女眷们，现在失去了听话的轿夫。毛泽东的妻子甚至被一架侦察机丢下的炸弹炸伤二十余处，无法行动。夫妇两人不得不将爱子託付给一个贫农家庭，从此再无音讯。贺龙还在山的另一边。搬家的阶段到此结束。红军实际上已沦为一伙漫无目的的土匪，在山岭中流窜，遭遇怀有敌意的土着和地方部队伏击，大队的政府军又越追越近。他们正在一步步沿着太平军的同样道路，走向覆灭，而与地方军阀进行的困兽之斗，却使南京渔翁得利。因此，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起，所有长征的高层领袖暂时卸下军务三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拟订死里逃生的计划。

7

共产党的官方史家曾指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全面领导的开始。这个说法大致不差，但模煳和扭曲了歷史事实。这次会议事实上是党的总书记秦邦宪（博古）召集的。具有合法参与会议资格的共十八人，显然除了一位译员外，还有一些列席旁听的人。（註7）会议检讨了过去的失败，秦邦宪作为党的第一把手，不可避免地要为所有失败承担责任，但会议并没有就他过去三年的领导出现严重争议。除了刘少奇对党在

「白区」的工作缺乏活力略作批评外，党的总政策仍被认为正确适当。虽然秦被撤除最高职务，取代他的张闻天（洛甫）却来自同一派系，政治观点亦相同。因此，这次总书记职位的更替，看来有如例行公事，并不是根本性改变。这时，潘汉年奉命前往香港，改善党在「白区」的工作。（註8）

会议在讨论军事时发生激辩。李德（又名华夫）、周恩来和朱德都受到严厉批判。李德的「短促突击」战略被批为共产党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因素，他的「搬家式」作战部署被指责为「逃跑主义」，只会导致长征的失败。如果红军採用毛泽东建议的流动战法，反围剿和长征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彭德怀首先开砲，他的意见显然得到林彪、刘少奇、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据说，周恩来不久就承认错误，但李德拒绝屈服。他受到的指责是不了解中国国情，而这位德国佬回击说，中国人以前也是同样指责别的外国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错误全是中国人犯的。尽管李强词夺理，会议还是表决撤销了李及其合作伙伴的职务，他的军事生涯就此在这次会议上结束。会议随后重组军委会，取消了朱德的军委会主席头衔。这个职位自此由毛泽东担任。周恩来保留了副主席一职，辅助这位新上司。会议恢復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位，又赋予他撰写会议决议的重要工作。决议完成后共有二十四点，近一万字。

毫无疑问，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由毛泽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策略开始形成。毛经常告诫他的将领，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他自己在江西时由于党内派系斗争被孤立多年，只能隐忍不发，待时而动，直到遵义会议的政治环境绝对有利时才出手反击。

一九三○年发生富田事变时，受到毛泽东迫害的人认为他是个「大阴谋家」，擅长「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手段。这样的毛泽东式手段在遵义会议充分展现出来。他联合彭德怀和刘少奇，中立周恩来和朱德，监视秦邦宪、张闻天和所有其他国际派。毛深信枪桿子里出政权。遵义会议最为重要的一面就是让毛抓到了枪桿子。新的军事委员会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总司令朱德也失去了对红一军团的直接控制，改由二十八岁的林彪一人指挥，林从此成为毛主席在背后操纵指使的木偶。彭德怀当时是新领导班子底下的一个关键人物。所以会议后几个月是这两位湖南老乡的蜜月期，彭、毛组合事实上取代了以前的朱、毛组合。

在中央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坚定支持下，毛实际上控制

了政治局。他不再在乎谁是党的总书记，这个职位后来也在他的操控下取消了。国际派从此再也不能掌权，但朱德和周恩来倖存下来。朱德后来能够留在领导层，是因为他心胸宽广，周恩来是因为他的勤奋和精明。这两人都不敢在党内形成任何派系。朱德直到一九五○年代都得以保留中共军队的「总司令」称号，但诚如一个红卫兵歷史学家在一九六七年所说的那样，他从来没有「司令」过一天。然而，毛和彭德怀的联盟直到一九五九年年中才结束，和刘少奇的联盟则止于一九六六年。（註9）

陈志让（Jerome Chen）教授也许说得对，他认为遵义会议是「农村苏维埃战胜城市党中央的胜利，是一个把全身心投到农民和社会底层的人对那些精通东西方学说的人的胜利」。（註10）但除了权力转移，遵义会议在军事或政治运作上很少作出任何政策改变。事实上，遵义会议后立即发生改变的是统一战线政策，这原来是由国际派提出，但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加以实行的权力。

遵义会议事实上显示了独裁领袖在极权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成长的过程。没有独裁的领袖，就不可能有极权主义的革命运动。要产生这样一个统率群雄的人物，需要时间、机遇、流血、智慧、才干以及必要的恶行。在老「家长」陈独秀被罢黜后八年，遵义会议标志着产生新「家长」的时候到了，但歷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是天生的领袖，不管他是城市的绅士还是农民的首领。

当「赤匪」在黔北休整的时候，南京中央军和桂系部队争先恐后地往贵阳进军，结果中央军抢在桂系部队之前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进入贵阳。不久，薛岳被任命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依法受其节制。数月后，蒋介石亲自飞到贵阳视察。王省主席到机场给蒋送行时，被邀登机，就再也无法下机，成为蒋的贵宾飞往南京。这是民国时期第一次结束了贵州的军阀统治，自然非感谢「赤匪」不可。

「赤匪」在佔领遵义十一天后发起扩红招兵运动，结果徵集农民生力军约五千人。同时，红军着手整编，取消了师级编制，使军队的指挥官可以直接控制团级部队。由于认识到不可能如遵义会议前计划的那样在这地区建立新苏区，红军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继续北上，企图渡过金沙江，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东北部会师。「赤匪」夸口说，他们「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註11）

四川的军阀确是被吓着了。现在他们面临的选择，是向中央军还是向「赤匪」让步。他们选择了前者。于是，中央参谋团（全称是「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四川剿匪军参谋团」）应邀到达重庆，一支中央军的新部队也适时赶到，以应付新的威胁。此后不久，蒋在重庆和成都设立行营，胡宗南率领庞大的中央军亦从北面入川。胡是要对付红四方面军，让川军到南面佈防。稍后蒋在峨嵋山设立军官训练团，在成都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分校，数以千计的本省军官及当地的学员在这里接受训练和思想教育。四川的军阀省主席刘湘为此万分恼怒，一度计划并准备作战，以抗拒南京侵佔其地盘。按照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战败，他仍能在大渡河另一边的西康立足。在四川的中央参谋团团长贺国光是刘湘的同学，由于他的劝告，刘勉为其难地取消了作战计划，服从蒋的领导。刘归附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才可以把四川省作为基地。自然，这又非得感谢红军的长征不可了。

察觉到在重庆的新发展，「赤匪」往来徘徊于长江南岸。二月底，他们回师重佔遵义，兜圈打转迷惑追兵。四月初，当政府军逼近准备决战时，红军在卓越的指挥下突然脱离战斗，直趋贵阳，迅速迂迴穿插于国军阵地之间。贵阳大为震动，但红军主力只在城东郊区虚晃一招，随即右转向西消失在群山中。在三週之内，据报他们已接近云南省会昆明。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疑兵之计。云南的军阀省主席龙云还来不及检视地图，「赤匪」又已右转北上，在五月初抵达长江上游金沙江的南岸。在五月三日到八日的一週内，全军三万人渡过金沙江，消失在西康猎头族倮倮部落聚居的高山密林中。一月之内，「赤匪」在四个省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徒步疾走近一千英里。薛岳麾下的中央军照旧尾随，但在进入云南后，薛对美丽的昆明城的兴趣似乎要比对蓬头垢面的「赤匪」大得多。在龙云省主席愤怒抗议后，他才极不情愿地开拔。

在金沙江以北，红军将领与倮倮首领达成协议，沿着滔滔大渡河的西岸北上，几乎没有遇到西康部队的任何阻拦。但红军最终的目的是渡过大渡河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通过无线电台的联繫，他们获悉后者正在西进，企图和他们会师。然而大渡河在夏天波涛汹涌，难以横渡，因为西藏边界的雪山融化，把整条大河变成每秒四十公尺流速的瀑布，只有安顺场一地相对和缓，但仅有小船数艘可用。不过，在北方一百英里外的小镇泸定，有一名叫「泸定桥」的古老悬空铁索桥。因此，崎岖陡峭的大渡河西岸是个军事上的死地。仅仅在六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擒，数千身经百战的部下全被清军屠杀。石达开率领着部队，像长征一样从南京出发，一路遭遇无数伏击和包围，最后葬身此地。

红军这时的战略是以小股部队在安顺场乘船渡江，然后与西岸的主

力部队夹岸北上，从两端夺取泸定桥。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主力部队抵达泸定。铁索上的木板已被当地的守军拆除，红军的突击队在硝烟弹雨中像杂技演员一样扒着悬空的铁索前进。赶跑了惊慌的当地守军后，他们修復铁索桥，让大军欢欣鼓舞地走过。飞越泸定桥此后成了中共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歷史学家最津津乐道的题材，他们把它夸张渲染，用来歌颂长征。（註12）

红军进入川西后，发现有大队川军在等着他们。这些四川部队由在成都行辕的蒋介石直接指挥。长征者被迫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翻越雪山。在这里他们再次遭遇危险的自然考验和当地部落的拦阻。先头部队在六月中旬抵达懋功县（现改称小金县），受到在那里等待着的红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美梦终于成真。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恰如毛泽东所述，是整个长征途中最欢欣鼓舞的一天。

中央红军已沦为一股武装乞丐，而张国焘和徐向前带领的红四方面军，人数约为他们衣衫褴褛的兄弟的三倍，装备良好，衣食丰足。他们为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补充新兵员、弹药和粮饷，然后一同向北前进。

然而，在懋功的红军知道南京中央军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已经严阵以待。红军会师后避免与胡宗南作战，绕道进入住着半开化部落的高山密林，最后抵达有歷史意义的毛儿盖。在这里，他们面对最终目的地在何处的重大问题，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

歷史学家仍然不知道这些会议的细节。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主要对手在会议上进行了一系列激烈辩论，这两人分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也是那时中央红军和更为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实际领袖。他们都承认一个原则：将来的根据地必须靠近苏联，以便取得俄国的援助与南京作战。倘若再度失败，也有一个安全的出口。但毛与张选择的方式不同。毛泽东坚持继续北上，跟陕西率领红二十军、二十五军的刘志丹、高岗和徐海东会合。那里接近苏联控制的外蒙古。一个地区性的中日战争正在进行着。毛显然想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从而终止南京的内战行动。（註13）

张有不同的意见。他选择留在西康、青海地区，避免被南京进一步包围。新疆那时由亲俄的军阀盛世才统治，此前盛曾邀俄军入境协助，与日本支持的中国军阀马仲英作战，俄军就此留下来了。

毛儿盖的这些会议做出了什么决定，说法各异，莫衷一是。据说莫斯科曾经介入这些争吵，发出了一连串无线电指示，但全无作用。中共现在开始独立决策了。

然而，张国焘的意见显然为大多数人否决，结果同意与其他红军部队北上。这样七万红军就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加上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由毛泽东带着沿东北方向经过松潘草地走向陕北。中央红军的部分（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由朱德带着加入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沿西北方向经过同一草地朝甘肃前进。

松潘草地是一大片沼泽地带，除了野草、池沼、淤泥和虫蚁外，更无他物。草地的海拔约为一万英尺。东路的红军用了五天通过草地，损失大量人员和装备。他们接着又与国民党的拦截部队作战，且战且走。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终于抵达吴起镇，遇到番号为红十五军团的当地游击队。这次的会师成功地结束了第一批红军的长征，然而原来的长征者只剩下大约八千人。

红十五军团那时刚成立两个月，军团长徐海东原为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司令，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被迫向四川转移。徐率所部担任后卫留守。一九三四年九月，他在具绝对优势的国军压迫下放弃鄂豫皖老根据地。徐带领三千人越过平汉铁路进入陕南，在那里成功地建立一个新苏区。一九三五年夏，他再次被国军击败。徐偶然在报上获悉朱、毛红军的动向，曾试图西进与朱、毛会师，但国民党的拦截部队迫使他北上。徐在陕北遇到刘志丹、高岗率领的番号为红二十六军的游击队四千人。九月，两军合併而成红十五军团。

三支部队在吴起镇会师后，总人数约为一万五千人。经过整编后，恢復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个时候，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人员渐渐说服前来拦截的少帅张学良麾下东北军，达成祕密停火协议。毛泽东从江西带来的经验丰富的干部展开工作。原来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游击根据地迅速连成一片，成为西北边区一个实行土改的新苏区。

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西路长征者就没有这样幸运。在松潘草地行军多日后，他们在波涛汹涌的岷江南岸的阿坝州停了下来，北岸有凶悍的回族骑兵等待着大肆屠杀。张国焘这时犹豫不前，坚持原来退入西康的计划。此前徐向前率所部分发到东路，现在重新归队。张掉头再过草地，在朱德的协助下，与国军连番血战。最后重渡大渡河进入西康过冬。飢寒交迫，再加上满怀敌意的土着和接连不断的战斗，使张的精锐之师很快就沦为乞丐部队，甚至比半年前经过这里的中央红军兄弟还要狼狈。

一九三五年夏，东、西两路红军正在松潘草地挣扎，在南方的兄弟部队——由贺龙和萧克带领的红二军团，在湘鄂边区有三万五千人，也开始了自己的长征。几乎循着先行者一样的道路，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底渡过金沙江，两週后和张国焘、朱德会师西康。在这里他们决定到陕北与彭德怀、毛泽东会合。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战斗后，红军第三次越过草地，这次用了四十天。过了草地，张国焘又再兴旧念，命令红四方面军余部和红五、红九军团渡黄河西进，企图打通一条连接中国苏区和俄国的通道，但是遭遇更大的失败。最后他在一九三六年冬天抵达陕北时，红四方面军的倖存者仅有一千人，贺龙的部队却有一万人保留下来。这样就正式结束了歷时两年、不可思议的长征。

根据红一军团行军日志而编纂的官方统计数字表明，只是红一军团参谋部的长征行程就有一万八千零八十八华里或六千英里，途经十一省。红军渡过二十四条波涛汹涌的河流；翻越十八座大山，其中五座终年积雪；在此期间不断与各路追踪或拦截的部队作战，头顶上还有敌人的飞机盘旋攻击。全程共歷三百六十八日，其中强行军二百四十三日，夜行军十八日。红军除了两条腿外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平均每日行程二十四英里，而且多数是山上的小径。就是说，一年之内，共产党的中央红军，包括妇女，从纽约市到三藩市走了一个来回。（註14）

共产党为长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六个苏区失去了五个，它控制的人口从八百万左右减到不及五十万。现在他们唯一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只有几个县，人口稀少，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在这两年内，原来数目庞大的红军从三十万缩减到三万，形同一小群武装乞丐。他们再度被政府的十倍兵力包围，政府方面有大军百万作为后援，还有空军高效率的三百架飞机助阵。南京的剿共行动确已到了最后阶段。根据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底的估计，要彻底消灭这一小股的「赤匪」，只需二到五週。如果没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突发的西安事变打断了他的军事行动，蒋也许已经大功告成。西安事变提早结束了两党的十年内战，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提供了新的生机。

註释

註1：译者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以及候补中央执、监委员组成。

註2：译者按：据郭廷以编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页二五七，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时间为五月三日。又

页二四○，何应钦在张学良于三月十二日辞去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后，接任该职，即日到任。

註3：译者按：李德是德国人，原名Otto Braun，一九三二年从共产国际到中国，一九三三年随秦邦宪（博古）到江西苏区，任职红军总参谋部。

註4：译者按：参看王继凯，〈近年来红军长征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二○○六年第五期。

註5：译者按：关于朱德、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首级悬赏，可参看朱少军、王晓阳合着，《征程军魂—长征中的着名将领》（中共党史出版社，二○○六年），页一三九～一四○。

註6：译者按：中央红军改变与红二、红六两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西向贵州挺进。这是在哪里决定的？近年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可参看王新生，〈红军长征研究若干争议问题〉，《百年潮》二○○六年第九期。

註7：译者按：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与会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中被选为党中央祕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

註8：译者按：张闻天和秦邦宪那时的政治观点是否相同，近年也有新资料。可参看何方，〈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炎黄春秋》二○○○年第九期。

註9：译者按：关于毛泽东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否在遵义会议中建立，可参看王新生，〈红军长征研究若干争议问题〉，《百年潮》二○○六年第九期。

註10：译者按：引文见陈志让的英文专着，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89；中译转引自陈志让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页二一六。

註11：译者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佔领贵州黎平。十八日，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中议决：「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註12：译者按：关于飞越泸定桥的歷史，可参看李维民，〈还原歷史真相：飞夺泸定桥并非完全爬锁链过河〉，《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二○○六年八月十七日。

註13：译者按：有关中共党中央以陕北为长征最终目的地的决定，可参看〈党中央在哈达铺确定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的正确方向〉，《甘肃日报》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五版「甘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专题报导」栏目。

註14：统计数字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页四三九；亦可参看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196。

第五部　抗日統一戰線

【第17章】

南京的派系政治与西安事变

1

促使南京的反共军事行动功败垂成的西安事变，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谜。参与其事的主要当事人很少透露真相，让歷史学家能够釐清史实。然而，可以笃定地说，西安事变是日本继续蚕食华北、国民党阵营内大小派系的冲突和中国共产党策略改变几个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再度发动侵佔华北的行动。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却未能实现阻止日本侵蚀长城以外地区的目的。日军现在朝着两个方向发动新攻势：西指察哈尔、绥远，一般称为内蒙古的地区；南下长城内的河北省。

在内蒙古，日本初则培植大批傀儡，继而诱导蒙古王公德王宣佈脱离南京独立，并声称要按照「满洲国」模式，建立「大元帝国」。一九三六年底，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在与日军苦战后，终于挡住了日本向西扩张。

日本企图用和平手段向南扩展，消除国民党在华北的影响力。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南京被迫忍辱签订《何梅协定》，日本获得初步成功。在这个新协定下，中央军和所有国民党的政、党机构，全部撤离华北。此后，出身冯玉祥西北军的半独立军事领袖宋哲元，奉命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当时华北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日本接着发起所谓「自治运动」，在河北省东部以「冀东防共委员会」的名义建立傀儡政府。这只是第一阶段，接下来一个更大的阴谋是推动「五省自治运动」。

与此同时，日本增加在华北驻军至七千余人，超过一九○一年《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军限额的四倍。以如此强大的兵力，日本已实质控制了平津铁路。华北危在旦夕，另一个「满洲国」随时可以在那里出现。

面对日本这样的威胁，南京进退维谷。一方面它清楚地意识到华北失陷的危险。另一方面，它仍然梦想着能够说服日本，接受与中国结盟抗俄的建议。尽管蒋、汪联合领导下的国民党高层视日、俄同为中国危险的敌人，却无力同时与二者为敌。他们取日捨俄。甚至在这个关键时

刻，蒋介石还是希望能够改变日本的侵略政策。

一九三四年底，蒋认真朝着这个方向作出努力，在经常反映南京官方外交路线的杂志《外交评论》登出一篇题为〈敌乎？友乎？〉的长文。此文由蒋委员长（註1）口述，他的机要祕书陈布雷执笔，而以行政院一个司长徐道邻（註2）的名义发表。这篇长文表示，中日两国应为「友」而非「敌」，并在结论中指出：「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那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復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在这篇文章发表多年后，徐道邻对笔者说，委员长选他为「作者」有几个理由。他的父亲徐树铮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是民国初年亲日安福系中最活跃的领袖，在日本的军、政两界有众多能产生影响力的朋友。作为行政院的一个司长，徐道邻的职位颇高，足以代表政府发言，引起日本注意，但又不会惹怒中国年轻的一代，或激起国内反对派的批评。（註3）然而南京的恳求，得不到东京的回应，反而使华北的危机日趋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派系林立的联合政府不得不作出选择。汪精卫和他的改组派不计一切代价继续推行和平政策。他们的立场不难理解。仅就国家利益而言，他们知道和日本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等于自杀，只能让俄国和共产党获益。此外，改组派不是个军事团体，既无地盘，也无武装。他们的政治权力和他们与蒋的伙伴关系，完全仰赖汪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南京同广州间的内部权力平衡。日本问题成了他们得以存活的另一个因素。中日关系持续紧张而不中断，他们就不会被蒋介石集团屏弃。只要有日本危机存在，蒋就会投鼠忌器。因此，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的蒋汪合作期间，汪集团始终是一股亲日的力量，极力抗拒对日採取强硬政策。

2

在中国的对日政策上，蒋介石的部下也是在和战之间相持不下。他们对日本的态度各有不同，正好和蒋的战略规划相配合。在蒋的领导下有三个主要的派系：CC系、黄埔系和政学系。还有许多蒋氏夫妇周围具有影响力的个别人物小集团，一般称之为「宫廷派」。

在一九三三年塘沽停战协定期间，政学系最得蒋的宠信，他们和汪派人马密切合作，执行与日本妥协的政策。为了协助政学系第一号人物黄郛在华北的工作，在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蒋任命政学系的第二把手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祕书长。杨永泰在当时被视为最具才干的智囊人物，他利用这个独特的职位，成为南昌（蒋介石）、南京（汪精卫）和北平（黄郛）三地之间的协调枢纽。这种权力激发了杨的政治野心，把他的朋友安插在全国及各省的官僚体系中。黄埔系人士基本上是军人，CC系控制着党，而文官体系正好成为政学系拓展的土壤。因此，许多没有派系关系的政客和知识分子，隐然视黄、杨为一个新派系的领袖。一个有组织的政学系开始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形成。

对国民党人来说，政学系声名狼藉，歷史上具有污点。虽然它的领导人物多曾参与辛亥革命，但不久都成了民国议会中的油滑政客。一九一○年代末期，孙文开府广州，与北洋军阀作战。杨永泰领导的政学系却能利用南方军阀，企图将孙文逐出广州。此后政学系成了国民党的死敌。一九二○年代初期，他们重新参加北京的所谓旧国会，被国民党人视为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只是通过黄郛的关系，他们才能从后门熘进蒋的总部。这些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全党的抗议，但却能以委员长个人助理的身分留了下来。政学系是另一个亲日团体，其理由与汪的改组派完全一样。因此，政学系在全国抗日运动中成为蒋的代罪羔羊。

蒋一手创立了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领导的CC系。CC系于一九二六年崛起掌权前，国民党为胡汉民、汪精卫二人领导的广东帮控制，原有的浙江帮和湖南帮在陈英士和黄兴去世后逐渐没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把汪、胡赶出广州，浙江帮重获生机。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蒋自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以陈果夫为副。果夫身患肺疾，只能做些设计筹划的工作，实际组织的任务就落到弟弟立夫的肩上。立夫年仅二十六岁，是个採矿工程师，刚从匹兹堡大学回来，担任蒋的机要祕书。

陈氏兄弟是蒋介石把兄陈英士的姪儿，按习俗蒋即为二陈的「义叔」。乡谊、家族渊源与政治利益合而为一，使得陈氏兄弟成为委员长最忠诚的亲信。能干的二陈利用蒋控制的组织部，十分有效地剷除所有对「叔叔」不友善的分子。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继而下野，国民党四分五裂，陈氏兄弟决定在国民党的架构内成立一个祕密组织，来帮助蒋争夺权力。这个组织的中文名称是中央俱乐部，但那时的党派人士惯用英文名字的缩写，有些社团甚或冠上英文名字。国民党

（Kuomintang）称为KMT，共产党（Communist Party）称为CP。AB团（Anti-Bolshevik Corps，反布尔什维克团）甚至没有中文的名字。中央俱乐部（The Central Club）一般被称为CC，它的中文名字和英文译名逐渐不为人知，此后还为人误会CC是二陈英文姓氏（Chen）的缩写。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满二十九岁的陈立夫当选为祕书长。国民党当时宣称有积极参加活动的党员五十万人。陈担任祕书长直到一九三一年。当蒋復出掌权，并开始第二次蒋汪合作时，组织部的领导改为委员制，由陈立夫和汪派人士谷正纲共同担任。陈的个人魅力正好与谷的政治敏锐触觉相辅相成。不到数年，谷就被视为CC系的一个领导人物了。

一九三○年代初期，CC系成为国民党的主导派系。它彻底控制了国民党中央总部，无须另有一个祕密组织。因此中央俱乐部的地区组织纷纷解散，但高层领导人仍然构成一个牢固核心，它的成员必须参与祕密仪式，站在巨大的蒋委员长的肖像前宣誓。不过，陈氏兄弟似乎逐渐赢得部下更多的拥戴，虽然他们实际上或口头上都是向委员长效忠。

CC系还控制着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它是现代中国第一个这样的机构。这就是着名的中统，不久就在中国的街头巷尾令人谈虎色变。这样的组织是在北伐时开始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组织復兴委员会，协助蒋总司令收集军事情报。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着名的龙潭战役中，军队有效地使用无线电通讯系统，给正在第一次下野的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另拨特别经费，下令成立更大的现代情报单位。这新机构起初隶属国民党组织部，不久就扩充为一个独立的处，由中央党部直接控制。蒋的亲信蒋先云为第一任处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祕书长后，处长一职由陈兼任。陈进一步把机构扩充为庞大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下设三处（註4），分别由徐恩曾、戴笠和丁默邨任处长。徐是受美国教育的电气工程师，戴是黄埔毕业生，丁是从美回国的留学生。配备现代科学仪器和武器，中统不再仅是一个「调查」的机构，而是一个巨大的祕密警察体系，不受法律拘束，只以长官和领袖的意旨为依归。暗杀和绑架于是成了它的例行公事。

一九三○年代中期，CC系达到了权力巅峰，当时流传的说法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当日本问题日渐成为中国政治上被人踢来踢去的皮球时，CC系领导人的反应和委员长一样，感到进退维谷。这一群在革命中成长的年轻党人，基本上是狂热爱国者，一心要把所有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但认为俄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因此，如果能与日本和解，应该是

比较好的选择。为此，陈立夫甚至想说服行政院长汪精卫，任命他为驻日大使，让他能够周旋于日本的高层领袖之间，改善中日关系。CC系也认识到，一旦被人安上「亲日」的标籤，就如政治自杀，因为年轻的一代绝大多数反日。因此，它紧随委员长的策略，扮演着双重角色，虽然公开的口号还是「抗日」，关起门来制订的官方政策却大异其趣。它对政学系和黄埔系都不满，因为前者只知一味安抚日本，后者却抢走了抗日的大旗。

然而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CC系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影响了它与其他派系的竞争。在祕密投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陈立夫竟然比委员长多了几票。这一幕使得旁观者窃笑，国民党上下震动，蒋介石脸面无光。这显然是政学系离间蒋与CC系的手段，但委员长怒不可遏，竟然不察真相。他的反应相当蛮横，在会场公开羞辱陈立夫。两个星期后，委员长派陈到西欧执行「祕密任务」，往莫斯科与史达林会谈。但是陈没有完成莫斯科之行，在西欧漫无目的地祕密游歷五个月后重返南京。他这才发现前此CC系佔据的各个要职已全为其他派系人马取代。组织部给了无派无系却极有野心的政客朱家骅。四个关键省分的委员会全部改组，而且置于政学系省主席的监督下。这是有违国民党的「党治」传统的。陈立夫自己也被明升暗降，做了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四大后无权无势的元老的「养老院」。CC系有如一个失宠的小妾，眼睁睁地看着主人的新宠霸佔了闺房。读者将会看到，代之而起的是黄埔系。

黄埔系主要由黄埔军校校友和他们的战友组成，是北伐期间第一军的骨干。其后第一军逐渐扩充为一个直接由蒋指挥的庞大军事系统，一般称之为中央军。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军兵力超过一百万。由于扩展迅速，许多黄埔毕业生很年轻就担任高级指挥官和党代表。黄埔同学会因此自动成为国民党内由蒋亲自领导的一个强大军人派系的总部。

九一八事变后，一小群称为「十三太保」（註5）的黄埔系少壮领袖，以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为首，开始组成一个祕密军人社团。军队中本来就存在一些祕密团体，但现在这个社团在蒋介石亲自鼓励之下，团结一致，取名为中华民族復兴社。蒋介石不仅同意出任社长，还积极参与该社的建立。他刻意不让军队指挥官参加復兴社的活动，因此復兴社基本上是政工人员和特务人员的组织。社员被派遣到中央军去执行政治教育工作，在全国各式各样的公共和教育机构建立祕密核心。它的特工人员也渗透到军阀和共产党的军队。其结果是在国民党内形成一

个半独立的祕密派系，运作方式与国民党大清洗前的共产党如出一辙。黄埔同学会的会员指挥着整个中央军系统，并散佈在所有军阀的军队中。黄埔同学会组织松散，而復兴社的高层领袖多为黄埔毕业生，因此復兴社就成了同学会的骨干。

当时法西斯和纳粹运动在欧洲势不可当，这个新组织也想有样学样。在筹备创社的会议上，甚至有人建议仿效义大利的黑衫党，所有成员穿着蓝色的制服。虽然这建议没有获得採纳，但復兴社不久就以蓝衣社闻名中外。许多现在流亡在台湾的社员仍以此名为傲。

一如法西斯和纳粹党人，蓝衣社社员本质上都是狂热爱国者，主张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蒋介石当然是「元首」（the Fuhrer），拥有绝对权力指挥他们的行动。该社还有自己的规章与纪律，违反者可处以极刑。据说有一个由委员长亲拟的纲领，读来有如孙文《同盟会纲领》的改订版：「驱逐倭寇、復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这个纲领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自有其吸引力。中国受军阀割据，兵连祸结数十年，对外又遭到帝国主义强权的侵凌。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中原，为了有效抵御外侮，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復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德国在纳粹的统治下迅速復兴，确实令许多中国热诚的爱国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着迷。他们渴望对日作战，也知道委员长是唯一能率领他们走上前线的领袖。蓝衣社高喲在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下抗战，触动了全国爱国者的心。因此，蓝衣社成立之后，就在大学和中学里扩散，势如野火燎原。作为中国唯一希望的象徵，蒋介石的确成了数以百万计中国青年的新偶像，他们愿意为他奉献牺牲。

中国知识分子对蒋的新行动反应不一。一些了解法西斯主义情况的高级知识分子表示需要慎重警惕。例如，为中国议会政府奋斗终生的胡适博士，就对走「政治捷径」提出警告。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也许对治疗中国当前的疾病比较有效，却会引起很多复杂的后遗症。但胡博士的许多至交和同仁，尽管地位与他相当，想法却大不相同。张伯苓博士是驰名国际的南开大学校长，他就站在蒋的一边。据说张担任过蓝衣社的顾问。受美国教育的中国史学大家蒋廷黼博士，甚至祕密地加入了蓝衣社，还公开与他的朋友胡适博士辩论，说中国在这个时刻迫切需要一位独裁的领袖，用英美模式的民主制度来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缓不济急。蒋廷黼并不是知识分子中的特例，数十位着名的学者也祕密加入了蓝衣社。

为了使蓝衣社掌握更多权力，委员长允许他们组织自己的祕密警

察。在CC系控制的中统担任处长的戴笠，奉命组织一个直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这是有如希特勒的「盖世太保」（Gestapo）的组织，使得中统也相形见绌。虽然这两个机构在战后都成为最教人害怕的机构，但在一九三○年代中期，两者在抗日的大旗下给人的印象却迥然不同。中国人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警察国家，许多人甚至期望有这么一个国家。

3

在委员长下面的「宫廷」派，和中国歷代的王朝一样，靠的是裙带关系。这群人的领袖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前者是蒋夫人的哥哥，后者是她的姊夫。两人都是受美国教育的金融家，但和执金融界牛耳的江浙财团从来没有任何关系。江浙财团在一九二七年支持蒋介石清党。然而北伐后，蒋与手下的将领们展开一系列内战，上海的金融大亨就开始退缩不前，多次对宋子文所提贷款和购买债券的请求反应冷淡，几乎破坏了南京的军事计划。蒋因此考虑，对上海金融战场来一次「歼灭战」。

要理解蒋的新动向，必须大略回顾他的金融对手在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成长过程。一九二○年代初期，上海有现代的华资银行二十八家，其中二十家属于江浙财团。一九二九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几乎摧毁了大多数规模较小的银行和尚在襁褓的本土工业。但江浙财团不仅成功地度过风暴，还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当时关于银行的统计显示，江浙财团一九三五年的资本总额是法币二亿零九百零八万九千元，约十五年前的资本总额仅为法币七千六百五十万元。他们的存款总额也同样从一九二一年的法币四亿九千六百九十三万七千零四十一元，增至一九三二年的法币十七亿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七元，一九三五年高达三十亿五千三百四十三万元，佔当时上海所有大银行存款总额的九二·五%。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浙财团十五年的扩张过程中，前七年只是稳健增长。例如在一九二七年前，每年的平均存款额是法币七千六百万元，但其后五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达到年均增长法币一亿四千六百万元，在九一八事变后增长率甚至变得更快。

此外，江浙财团的银行几乎独佔发行钞票的特权。一九三五年前，发行钞票的十家银行中，有九家属于江浙财团。所有这些统计都指出，这些银行家们支持南京赢得一连串内战的胜利，并不是免费的。他们取得了应得的报酬。前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的领袖张嘉璈先生有一次在纽约向笔者提及，那时他建立如此庞大的集团，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也许能为中国的民主社会打下坚固的基础。在一九

三○年代中期，他的「中产阶级」的确正在形成。

在南京的委员长正密切注视着这个新阶级的成长。他清楚地看到，在战场上打赢的所有内战，可能全部输给银行家们。委员长不满意宋子文的财政政策，开始转向孔祥熙寻求新的控制办法。因此，一九三三年十月，孔接任南京的财政部部长。

孔祥熙出生于歷来以钱庄着称的山西省。在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 Ohio）和耶鲁大学接受新式训练，使他具备处理现代公共财政的能力；又从晋商的传统学到，如何管好老闆的钱财，但对老闆怎样花费则不闻不问。他集古今中外的理财能力于一身，正好配合委员长那时的需要。孔与前任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样，掌管的财政部亦独立运作，有如不属于行政院长汪精卫领导的一个部门。他只听命于委员长，除了日常的工作外，只为委员长签署支票。

一九三四年，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Silver Purchase Act）（註6）引起中国的经济危机。年底，孔博士第一次表现他的管理才能。他用政府垄断的钞票取代大洋银元，从而挡住了白银流出。紧随货币改革之后，孔向江浙银行家们宣战。首先废除中国银行的老章程，恢復它在一九一七年前真正的国家银行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发行相当数额的政府公债，由中国银行认购，使得政府再度成为银行的控股股东。当张嘉璈获知他如果拒绝就无法生存后，就在一九三五年初把中国银行总裁的位子让给了宋子文。由于这一变动，孔、宋几乎在一夜间使委员长成为中华民国金融帝国的沙皇。蒋现在是下金蛋的鹅的主人，而不只是捡金蛋的人。也由于这一变动，中华民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生长停顿了，代之而起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官僚资本主义。

4

除了上述的派系外，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委员长赢得了大批国内的顶尖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是另一类的追随者，都是受过西方训练的专家，在一流的学术机构教书和研究。他们在胡适的领导下，成立一个非正式的社团，以具影响力的《独立评论》为其喉舌。经委员长亲自邀请，颇多人同意加入政府。因此，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专门用来延揽这批人才。汪精卫此前也曾拉拢他们，委员长设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与汪竞争。这些要参加政府的学人自然也知道如何选择。有人为了政治上的安全，甚至自动和蒋领导下的个别派系结合。上文提到，蒋廷黼博士就自愿加入蓝衣社。法学名家王世杰博士和着名地质学家翁文灏选择只追随委员长，但知名

的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却搭上了政学系。许多在西方受过训练的年轻一代学者，也追随他们的脚步，通过不同的管道大批加入蒋的阵营。且举一例：吴国桢博士，虽然和蒋的任何亲属没有血缘关系，却经过努力成为「宫廷派」的要员，和蒋夫人很接近。这些人各有所专，后来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国民政府内形成一个有力的亲西方集团。

在委员长的个人领导下，政治观点各不相同的派系互相竞争，使他能够在处理外交和内政事务时自由挥洒。他会在某一时间派遣某一圈子的人担任某种任务，当他觉得政策需要急剧改变，就会换上另一圈子的人。这样他个人就能经常保持既是主要鹰派又是主要鸽派的形象。只有派系的领袖们才会吞下无法预测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改变带来的苦果。例如，一九三○年代初期，政学系在委员长的指示下与日本进行屈辱的和平谈判，引来全国同声谴责。许多人逃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这样巧妙的政治手腕，使得委员长成为抗战前中国无论和平或战争都不可或缺的国家领袖。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认识到蒋是独一无二的。莫斯科和东京的决策者也承认他的地位不可动摇。

一九三六年夏，广州的军阀陈济棠向蒋挑战，以宣佈立即对日本开战为藉口，发动叛乱，结果反而使蒋的权威更加巩固。广州的这场六一事变，明显是出于叛乱者自私的目的。除了广西将领口头附和外，没有人对陈的爱国呜吁做出任何响应。在广东空军全部弃陈而去后，陈亦为其部下推翻。事变只歷时数週，使得委员长十年来第一次置广州于他的控制之下。蒋随后以和平手段使广西统治者归附，从而对西南地区取得前所未有的彻底控制。有这个地区的崇山峻岭作为大后方，他开始比较公开地谈论抗日战争。他确实作了最坏打算，但是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他的祕密军事准备工作也取得快速进展。

5

尽管委员长领导的政府在抗战前取得多方面的进展，但在文化战线上却打了大败仗。这是国民党根深柢固的特殊文化政策造成的自然结果，因为它在政策上倚重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学生」，他们不仅在党和政府高层取得主导地位，而且在主要学术机构也几乎佔领了所有关键职位。本土的和在日本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自学和创作有成的作家、艺术家和社会史学家，感觉深受新政权的歧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歧视驱使不满的知识分子「左」倾，而他们的左倾又带来更多的歧视。整个大环境逐渐把他们推到反南京的一边。

在「中国的高尔基」鲁迅领导下，一九三○年三月，这些不满的作

家和艺术家在上海成立一个社团，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组织，在会员和有关人士努力下，一九三○年代初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对鲁迅（周树人）、郭沫若、茅盾（沈雁冰）、老舍（舒舍予）、巴金（李芾甘）和其他许多优秀的作家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创作最丰富的时期。称为中国战时《马赛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时代的典型作品。它由剧作家田汉作词，年仅二十的作曲家聂耳谱曲，后来成为共产中国的国歌。

社会史学家也和左翼作家同一命运。在称为大革命的北伐期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他们与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繫。大革命失败后，在失望之余，他们把结果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无能，认为其决策者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他们现在面对的共同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的真正性质？由于意见分歧，造成激烈的论战。一九三○年是论战的高潮，国民党左派陶希圣、前史达林主义者郭沫若和独立马克思主义者李季分别是论战的主帅。这次的思想交锋被称为现代中国的社会史大论战。这是一场坦诚的学术辩论，产生了东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自由讨论，用心良苦，多姿多彩。这群社会史学者在政府和学术领域都受到执政党的恶劣歧视，许多人没有工作。陶希圣是唯一有幸能到北京大学任教的，但薪水比其他受西方教育的同事要低得多。

虽然这些人公开自称为左派，极少人是共产党员。反之，他们几乎全都出身于传统的士绅家庭。他们身穿洋服，在西化的城市过着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远远算不上无产阶级。例如，在左联近百名会员中，只有五人后来为国民党的特务发现是证据确凿的共产党员，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后枪决。（註7）甚至左联的年轻书记、后来成为共产中国的文艺沙皇的周扬，似乎那时也还未加入共产党。简言之，这是一批中间立场的人，离国民党左派比较近，离共产党比较远，但南京的不断歧视最后把他们全部赶去共产党的一边。

一九三五年，左联在共产党指定的「国防文学」新口号下解散，转而支持「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新行动事实上只让共产党人更加能够主导中国左派的文化活动。针对这一左派运动，南京原来希望从一些更受尊敬的、倾向西方的作家那里得到支持，这些人主办了一些文学刊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新月》月刊。不幸的是，安逸的生活和官僚主义把这些绅士作家关在象牙塔或政府提供的豪华轿车里。他们的声音再也不能吸引街头民众或大、中学校的年轻读者们。国民党也制造了一批自己的

御用文人，但无法引起大众的注意。事实又一次证明官僚主义和文学是水火不容的。

因此，在抗日战争前夕，左派作家几乎完全控制了全国的「文化战线」，对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具有压倒性的影响。爱好文学歷来是我国的文化传统，全国的中学和大学培养了大量的青少年「作家」和「诗人」。不管有没有组织，他们在学校中形成了青年左派运动的先锋，与蓝衣社的右派运动分庭抗礼。蓝衣社的右派兄弟大多是充满激情的年轻狂热分子（就如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只听命于「伟大舵手」或「元首」；自豪的年轻左派则自视为灵魂的探索者，只在畅销作家的名单里找到他们的英雄。蓝衣社的群众在华南的爱国学生运动具有绝对优势，左派学生则控制了华北的学运。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平津地区的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对少帅张学良麾下东北军的士气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时东北军正在西北和共军作战，迭遭败绩。学生们的反内战情绪是导致少帅跌进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圈套的主要因素。

6

统一战线是史达林主义者的新发明，配合着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用来指导一九三○年代中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的目的是团结世界所有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抵抗轴心国的扩张。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二十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这项新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原名陈绍禹）进一步阐明这个政策，作为指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

中共对统一战线作出初步响应，发表着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团结中国所有的爱国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宣言显然是王明亲自起草，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从莫斯科发出，日期却写上八月一日，以纪念南昌起义八周年。这个时期，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正在荒无人烟的松潘草地上挣扎求生。毛对新情况似乎一无所知，更说不上他是否关心这事。直到他进入陕北后，共产国际才派遣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化名张浩）携带完整的大会决议和实施新政策的指示返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完全接受新的路线。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运动在中国实行期间，可以根据它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一年之内从「反蒋」变成「联蒋」到最后「拥蒋」。《八一宣言》和其后的各项决议是第一阶段的主要文件，其

中称蒋为「卖国贼」和「日本的走狗」，同时呦吁中国其他政治团体与中共一起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

一九三六年初，红军企图进入外蒙古，在山西再遭惨败，无奈退回陕西，五月五日发出另一通电，宣称：「……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註8）由于没有从国民政府和民众得到期待的反应，中共放下身段，于八月二十五日再写了一封致国民党的公开信，表示愿意支持「蒋委员长」，「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註9）这是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称蒋为「委员长」。自然，中共要服从统一指挥意味着他们愿意将武装力量交给国民政府统率。与此同时，有非官方来源的报导说，毛曾对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表示，一经安排停火，他就马上出洋学习去。

中共作出如此谦恭的姿态，一反惯常的行为，显然是想争取舆论的支持。其实长久以来，他们暗中与南京直接接触，并向委员长提出投降的条件，但委员长态度漠然，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的答覆。

根据蒋介石的回忆，早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共产党的代表就和国民党在香港的代表曾养甫接头，讨论和谈。委员长并派陈立夫和张群与共产党的代表接头。陈非常熟悉共产党的手段策略，张对苏联有透彻的了解。中共派遣周恩来和潘汉年执行任务，前者代表中共，后者代表共产国际。潘携带可以和在莫斯科上级直接通讯的密码。谈判在上海开始，不久由于陈立夫邀请，移往南京。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高级领导人知道此事。（註10）

谈判进行很顺利，共产党谦恭，国民党有礼。最后两党达成四项协议：共产党服从三民主义；红军收编入国民政府的军事系统，受委员长指挥；苏维埃政府改为地方行政单位；停止阶级斗争、没收土地和所有

共产党在中国的宣传。

然而，这个祕密的谈判似乎对委员长予「赤匪」以最后一击的大计毫无影响。这时他的军队正在缩紧包围圈，或许是最后一次的缩紧，因此他对和谈置之不理，视若无睹。（有趣的是，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濒临失败时，共产党也採取了同样的手法。）

这个时候，委员长下令，对国内所有反内战运动提高警惕，予以镇压。由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註11）带头的大批反内战人士遭到逮捕。

委员长玩弄这样的两面手法，自有他的道理。「赤匪」已是瓮中之鳖。日本加强在华北蚕食，给蒋制造了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让他能够用武力消灭中共。中国共产主义的教父史达林明显地选择了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苏联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Vasilevich Bogomolov）一再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表示关切。「中国共产党能有什么力量？」他曾这样提醒最好战的国民党官员说，「不听话的话，就消灭他们！」蒋同时也意识到，抗日战争无可避免，他需要史达林的帮助，但他要在中国造成一种形势，让俄国独裁者只能把卢布送进他的口袋里。因此依照委员长的如意算盘，非打垮中国的红军不可。此后看在卢布的份上，在中国保留共产党作为一个装饰橱窗，也就无伤大体了。这显然就是委员长的战略思维。

蒋对他的宏图充满信心，却忽略了自己机器的零件会出问题。绝对想不到，少帅胆敢破坏他的全盘大计，把他抓了起来。

7

西安事变的主谋张学良时年三十八岁，不再是花花公子，反而成了狂热爱国者。他性格的急剧转变，似乎是在一九三三年访问义大利和德国时发生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纪律与秩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回国后，成了蓝衣社的热心支持者。他为了就近协助「元首」，甚至愿意放弃他的东北军指挥权。事实上，他曾自荐为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蒋拒绝了他的请求，反而派他去打共产党，首先到鄂豫皖地区，其后到西北。

一九三四年，在鄂豫皖地区执行任务期间，张甚至从南京邀请一群年轻的蓝衣社社员到汉口的总部，协助推动蓝衣社运动，还自任蓝衣社地方办事处的主任。然而，少帅就如他后来在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所说，是一个固执己见的狂热爱国者。光是为了爱国，就足以使他根据情况改变他的政治信念，但完全改变则发生在一九三五年末东北

军第一次和红军作战惨败之后。在麾下将领的支持下，张决心退出内战。张的意图很快就给共产党的司令员察觉，他们遣返所有张的战俘，并祕密请求张参与抗日统一战线。

经过一九三六年初的初步接触后，少帅驾着飞机在陕北小城延安着陆，延安当时仍然在东北军的防地内。他和机智圆滑的周恩来于午夜时分在一所荒废的天主教堂见了面，周的首级当时按照悬赏约值八万美元。张学良一度起了把周恩来扣留的念头，但他想到《三国演义》里「岂有鸩人羊叔子哉」的句子，于是决定自己的行为应该光明磊落。二人各抒己见之后，周恩来为张的「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的主张说服。曾经是花花公子的将军也为对手的从容谈吐所折服（周在学生时代当过演员）。二人分手时都对前途充满信心。（註12）

此后，张好几次要向蒋介石报告这个祕密会谈的情况，但蒋彻底镇压「赤匪」之心已决，使张找不到进言的机会。少帅不顾一切继续推动他的祕密和平计划，红军和东北军协议停火，中共驻东北军的非官方代表团悄悄进驻西安。就在这段祕密停战期间，美国名记者史诺于一九三六年夏天潜入共区。他四个月后回来，写下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经典着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中共接触的国民党将领不仅是张学良一人，杨虎城就是名单上的下一个。杨是陕西人，当时任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人称十七路军为西北军，因为它的将官和兵士大都来自西北地区。因此，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武力，在中国西北打下根基。它和东北军并肩作战，同样伤亡惨重，但这些西北子弟从南京得到的补偿和尊重甚至还比不上东北兄弟。当日军通过内蒙侵入西北时，委员长的内战政策使杨和他的部下深感挫折。在杨的亲随中，他的世姪王炳南尤其表现出反内战的情绪。王刚和他的妻子安娜从德国回国。一九五○年代，美国人对王并不陌生，他是华沙中美会谈开始时北京派遣的第一任中国大使。但是在一九三○年代，他却是个神祕的年轻「归国学生」。后来的资料显示，他在德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国时经过莫斯科，接受陈绍禹的详细指示，要他在西安推动统一战线工作。虽然他企图说服杨虎城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工作不太成功，但在西安为同志们提供了庇护，为即将发生的西安事变作好准备。（註13）

鉴于反内战运动的声势日趋壮大，委员长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飞往洛阳，亲自指挥剿共的军事行动。在这里他再次把两面手法玩到了极致。一方面他严令张、杨立刻向红军发动攻势，另一方面却允许周恩来在回去陕北的中共总部时经过西安。周刚完成了在南京的初步谈判，

绕道是国民党官员刻意的安排，以表示委员长接受共产党投降的诚意。然而周的访问，只鼓舞了两个地方部队的反对内战者。部队的蠢蠢欲动引起委员长的注意。他十二月四日前往西安，在那里召开一连串的战略会议，准备对红军发动最后一击。强大的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西北地区集结，但一如既往，许多部队只安排在地方部队的后方。地方部队的指挥官张学良和杨虎城现在面临两难的抉择：服从还是反叛？再没有犹豫不决的时间了。在二人的一个祕密会议上，杨建议「劫持」委员长，强迫他放弃内战。少帅初则震惊，随即表示同意。「兵谏」计划就这样仓卒达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委员长穿着睡衣被捉。与此同时，西安的反叛者向全国广播，宣佈停止内战，要求在民主的基础上改组国民政府。

这场兵谏后来在歷史上被称为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所有政治团体的复杂反应。南京的即时反应是分歧和困惑。这时首都的主要领导人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和代行政院长孔祥熙。何的反应像个军人：中央军全体要求採取军事行动营救，数十架轰炸机随时待命。一些党国元老附和何应钦，以为政府威望重于个人安全。

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和他的宋家亲属，尤其是宋子文和蒋夫人，却採取相反的立场。他们坚持不计代价和平解决。因此，为委员长与少帅信任的澳洲记者端纳（W. H. Donald）就飞往西安，和叛乱方作初步接触。宋子文与蒋夫人亦随即前往。两人代表委员长谈判，何应钦则指挥大军严阵以待，向叛军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黼照会克里姆林宫，以为事变乃国际共产党人所策划。潘汉年所持的密码不用说也充分用于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直接通讯。

和他们在南京的对手一样，西安的反叛者也是分歧和困惑交集。他们的兵谏并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初始的兴奋过后，意识到后果严重，尤其是原来期望的民众支持没有出现，反而投向对方。其他地区军阀的实际支持也不曾出现。事实上，只有共产党对他们的吆吁积极响应。

歷史学家仍然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才能断定事变头两天周恩来身在何处。他似乎在事变发难时已回到陕北，在少帅的邀请下，他和秦邦宪（化名博古）、叶剑英于十二月十七日回到西安，张派了私人的飞机去接他们。（有其他资料显示，当时周在西安，但事前一无所知。）中共协助组织了一个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作为指挥叛军将来行动的最高权力机构。张学良、杨虎成和周恩来又签了一个三方协议，保证三方的军队通力合作，抗拒南京的军事压力。他们三方的总兵力约有二十万人，其中东北军十三万，西北军四万，红军号称有三万。

蒋介石的意志坚强，拒绝在胁迫下低头，而两个劫持主将对如何处置蒋不能达成协议。张学良选择较宽容的办法，杨虎城坚持宁折不弯。激烈的争吵后，杨甚至採取行动，解除了西安城内部分东北军的武装。这使得少帅震惊，却提高了共产党代表居中调停的地位。在周恩来劝说下，三方协议依然保留，但争吵不休的两个军人已无法筹划下一个步骤。周恩来因此成了西安的主要智囊，使共产党从西安事变充分获益。

共产党人和全国各地的同胞一样，刚听到事变的消息时也是情绪复杂。激进派可能是以毛泽东和张国焘为首，要讨回血债，而明显受到周恩来影响的稳健派则选择小心谨慎。但在接到史达林的指示后，他们很快取得一致的看法。

开始时俄国人也是疑惑重重，克里姆林宫花了足足四十八小时来琢磨这个中国问题。莫斯科的官方喉舌《真理报》（*Pravda*）和《消息报》（*Izvestia*）发表社论，谴责在西安的叛党。同时史达林也致电宋庆龄，表示愿意居间调停，从而向中国共产党传递讯息。这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姿态，既表示俄国领导人与事变的阴谋无关，又显示他与中共并无直接联繫，同时还向蒋氏家族示好。这样做也避免了公众不必要的注意，以及事变可能带来的困扰。

史达林和中共都不希望蒋介石早日得到自由。事实上，中共向南京和西安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召开全国和平会议，来讨论国家的前途和「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在看到塔斯社（TASS）报导另一个正在德国策划的阴谋时，他们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约一年前汪精卫在南京为反日的刺客所伤，这时正在欧洲疗养。希特勒派专机接汪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祕密会谈，汪与希特勒相会后，在德国人高效率的协助下，迅即束装归国。与此同时，又有报导说，汪的亲随曾仲鸣也在伦敦和日本人接头。克里姆林宫感到警惕。因此，周恩来奉命在西安夜以继日地争取委员长承诺结束内战，然后在汪抵达前送他回南京。

委员长的个性集儒家伦理、倔强军人和权谋政治家于一身，周恩来通过一个惊惶失措的妻子的柔情蜜意，打动了委员长的心。周一听到宋美龄的口头承诺，就立刻会合两个懊恼的劫持主将向委员长道别，让他能够以自由之身欢度圣诞节。少帅自愿护送委员长前往南京，他们在洛阳过夜后，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首都。周恩来的安排，比德国给汪的时间表快了两星期。西安事变结束，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

註释

註1：译者按：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开始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此之前，他的职称通常是总司令。

註2：译者按：陈当时是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徐是该处祕书，以后担任过铨叙部典试司司长。

註3：一九五○年代，蒋介石在他的选集重印〈敌乎？友乎？〉，并在註释中正式揭露这个老「祕密」。见《蒋总统言论汇编》（台北，一九五六年），第四卷，页一四五～一七八。

註4：译者按：三个处是党务处、军警处和邮电检查处。

註5：译者按：黄埔系十三太保，说法不一。一说是指胡宗南、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郑介民、梁干乔、萧贊育、滕杰、潘佑强、葛武棨、杜心如等十三人。另一说则在上列中，以酆悌、曾护清、戴笠取代潘佑强、葛武棨、杜心如。

註6：译者按：一九三四年六月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属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New Deal）的经济政策之一。目的在抬涨白银价格，将作为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提高到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三分之一，发行银券。美国在国内外市场购买白银，引致银价劲扬。其时中国流通的货币是大洋银元。由于美国收购白银的价格远高于中国，在华经营的外国银行、洋行大力搜购银元运到美国出售谋利。其结果是中国的银元大量外流，银根短缩，出口货物价格上升，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害。

註7：译者按：被捕枪决的左联有关人士是胡也频、柔石（赵平復）、殷夫（徐孝杰）、冯铿和李伟森，后人称之为「左联五烈士」。

註8：译者按：引文取自《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收于《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卷，页三八五～三八六。

註9：译者按：引文取自《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一（一九三六～一九三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页八一。

註10：译者按：关于潘汉年与陈立夫的谈判经过，在《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四章第四节「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页一九八～二○八，黄祥豫根据已经公佈的材料，作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叙述。

註11：译者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救国运动浪潮澎湃不已。一九三六年五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统一抗日。该会的执行委员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等七人不久被捕入狱，时人称为「七君子」。

註12：译者按：张学良与周恩来会面的过程，可参看《西安事变忏悔录》的第十四、十五两项。《西安事变忏悔录》全文，曾先后出现四个版本，见杨奎松，〈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近代中国》第一三七期（二○○○年六月），页一六二～一八二。

註13：译者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二○一一年），第八卷下册，页五七一～五七二记载：

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曾任十七路军高级参议，是杨虎城的挚友。一九二九年杨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在日本，后转至德国。王一九二五年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派王炳南回国，争取说服杨虎城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王炳南到西安后，向杨坦率地讲明自己回国的使命……杨向王表示他愿同红军联合抗日，事实上他已同陕北红军打通了关系，有了来往。……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任命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张文彬八月二十六日到达西安后，先与杨的机要祕书王菊人以及崔孟博会晤，九月六日晚又与杨虎城密谈，双方达成了取消敌对行动、杨约束民团、取消经济封锁、设立交通站和电台等协议。会谈后，张文彬即常驻西安，与杨虎城继续保持联繫。

【第18章】

抗日战争（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1

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回忆战前德国一个企图逮捕希特勒未遂的计划，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这事真的成功，它将是证明小事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又一个例子。」西安事变就是这样一件改变了人类歷史进程的「小事」。

首先，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主义即将烟消火灭时保存了星星火种。正是这一点星星之火最后燎原。蒋一被释放，长达十年的「清剿战争」即告停止。南京派顾祝同为西北地区军事长官，取代叛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少帅在南京受军法审判，被判徒刑十年，随即获得特赦。自此以后就被一度是他的阶下囚的委员长「严加管束」。杨将军也到海外「考察」数月，抗战爆发后归国，不久就未经审判遭到囚禁。一九四九年底共军迫近重庆时，他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为国民党祕密警察杀害。（註1）这当然是后话了。

一九三七年初，南京和延安正式展开谈判。结果红军整编为三个师，纳入国民政府的军事系统，不久改编为第八路军。虽然军饷和装备都来自南京政府，共产党部队仍保持半独立状态，对南京的命令阳奉阴违。

「苏维埃政府」亦同样重组为「特区政府」，纳入国民政府的行政系统，其地位与共产党部队相似。所有这些安排原则上都为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认可，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註2）

然而西安事变更重要的后果，体现在民族主义的迅速崛起，从而使中日战争加快爆发。委员长被扣后安全归来，举国欢腾。对于这种全国欢欣鼓舞的情况，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普选」。这的确是向委员长投下的信任票，希望他在危难中领导全国。蒋介石显然认识到众望所归的原因，对日本不再让步。因此，除非日本停止对华侵略，或者至少放慢看来不太可能放慢的步伐，两国之间的战争已是无可避免。这一势所必然的发展也有助于釐清南京外交政策的方向。整整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在权衡，如何在俄、日两害之间取其轻者。现在除了找苏联帮忙，已别无选择。

中、苏两国军事结盟的祕密谈判在一九三七年初开始，进展迅速。

与此同时，委员长的长子蒋经国结束了在苏联十二年的拘留，携同俄籍妻子归国。史达林元帅亲切地与蒋经国道别，据说拔出自己佩带的精緻手枪作为礼物相赠。史达林和蒋介石马上成为并肩抗日的同志。卢沟桥事变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爆发。

2

卢沟桥事变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晚，日本以寻找一个演习失踪的士兵为藉口，决定把部队开进位于卢沟桥畔的宛平城。根据《辛丑条约》，日军并无举行演习的权利，因此中国驻军予以阻止。尽管「失踪的士兵」那时已返回营地，日军却在凌晨砲轰宛平城墙，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卢沟桥事变。

二次大战后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日本并不想在那时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卢沟桥事变只是在那个地区和那段时间发生的一连串类似事件的最后一宗。仅仅十个月前，中国驻军因为一匹马与日军发生争执，被迫撤离铁路必经的小镇丰台，宛平从此成为北京往南方的唯一通道。因此，中国政府和当地的驻军，虽然面对具绝对优势的日军，仍然坚持立场。经过一连串复杂的外交和军事交涉后，蒋介石建议双方的部队返回原驻地，以便谈判一个临时解决办法。但是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战地指挥官要求中国军队全面撤退，除此之外不接受任何其他的安排。蒋拒绝，日人决定以武力解决争端，中日战争随即发生。

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而言，战争来得正是时候。委员长正在庐山举办年度的暑期训练团。除了一般军、政人员外，还邀请了数百名知识精英、少数党领袖（包括共产党的周恩来、秦邦宪）以及社会名流就国事举行谈话会。卢沟桥事变使谈话会的情绪更为激昂慷慨。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与会人士都坚决支持委员长，一致要求强硬抵抗日本侵略。面对群众的要求，委员长宣称卢沟桥事变是国家的「最后关头」，再无退让余地。

战争使得中国的两个敌对政党前所未有地密切合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宣佈组织第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联名宣佈接受委任。此后不久，散落在长江流域下游的共产党游击队亦同样整编成新队伍，番号为新四军，共产党在南昌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叶挺和前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

为了说明它在联合抗日战争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宣佈：（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跟随共产党的榜样，其他一些少数党，例如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亦宣称向国民政府效忠，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以前的军阀和地方的半独立将领甚至自愿派遣部队到前线。这是中国悠久的歷史上绝无仅有的几次，地方军队为国家效力而不是对国家构成威胁。

随着战事扩大，国民党进一步统一指挥，一九三七年八月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取代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中国政府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同时担任新机构（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改其名称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委员长。根据新体制的条例，委员长具有紧急命令权。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不必依照平时程序，必要时「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民党建立这样一个体制之后，蒋委员长就成为中国战时的独裁者。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蒋为党的总裁，进一步增强了蒋委员长的权力。新职位赋予他行使故总理孙文享有的特权，可以否决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后决定。为了安抚党内昔日对手的情绪，大会选举汪精卫为副总裁，但根据党章，副总裁的权力和美国副总统一样少得可怜。

为领导国家度过前所未有的危机，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内容有三十二条，其中除确定以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为指导国家的准绳、确认以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外，还保证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保障人民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以及保证实施宪法。纲领还提出实行计划经济，发动各阶层人民为抗战而动员，以及许多其他政策事项。

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国民党的吆吁，共产党也承诺要全力以赴。这的确是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古老的国家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尽管委员长的权力和声望迅速上升，但中国军队在中日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却溃不成军。在华北，还不到七月底，入侵的日军就佔领了天津和北平，接着兵分三路南下。日军的左路沿津浦铁路推进，不久到了山东省的边界，在那里稍停，希望与山东的军阀省长韩復榘达成祕密交易，让日军兵不血刃佔领山东。

这时日军的中路沿平汉铁路向南推进。宋哲元带领的第二十九军在北平南郊顽强抵抗，但日军未经战斗就佔领了古城北平。驻守平汉铁路、由刘峙指挥的大军惨遭败绩。日军在九月二十四日佔领保定，然后向铁路枢纽石家庄推进。侵略军兵分两路，一支继续南下到黄河北岸，另一支西进山西企图与西路日军会师，计划包围第二战区司令、山西省主席阎锡山的部队。西路日军从察哈尔和绥远南下，与驻守南口的中国军队浴血作战一週后，首先在八月二十七日佔领战略重镇张家口，九月十五日又佔领山西大同，然后继续进军山西省会和阎锡山的总部所在地太原。板垣征四郎辖下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约四千人及汽车一百辆，在行军到战略要隘平型关的时候，为林彪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的第一一五师伏击。双方肉搏血战，伤亡惨重，日军失去所有辎重。这是中国共产党部队对日本的第一次战斗，虽然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过分夸大宣传这次胜利，这一仗的确算是打得十分漂亮。（註3）

然而战争开始时，主要的战事是在上海市郊进行。八月十三日，一小撮日军藉故企图闯入中国的军事机场，战斗便正式打响。中国原来的战略是，上海战争一爆发就立刻封锁长江，由空军炸掉所有日本在长江的军舰砲艇，同时在日军获得增援前，由国军突击消灭日本在上海为数不多的警备部队。不幸行动还未开始就机密外洩，所有日本在长江的舰艇在中国封锁长江前几小时逃脱。在上海进行巷战时，国军的轻武器无法突破日军的防御工事。双方迅速增援，战斗转为常规的阵地战。

面对二十五万日军，国军指挥部把两倍人数的最精锐部队投入战场，包括南京大多数的「模范师」，以及来自广西、广东和四川的精兵。参谋和战地指挥官都是中国的一时之选，如白崇禧、冯玉祥、张发奎、薛岳、胡宗南和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院（Military Academy of Virginia）的孙立人上校这时仅为团长，直到一九四○年代中期的缅甸战役，他的名字才广为人知。

尽管国军缺乏装备、训练和不同部队间的技术协调的经验，他们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敢死进攻，数以千计的士兵在几小时内化为灰烬。实力弱小、只有三百一十四架飞机的中国空军，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杰出表现。从八月十四日的第一次空中缠斗开始，中国的

战斗机袭击日本无护航轰炸机群，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得日机只有少数几架能够在轰炸后飞回基地。此后八月十四日被定为中华民国的空军节。这种规模和这样英勇的全民族救亡图存战争，在中国悠久的歷史上极为少见，在现代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战事发展下去，中国似乎注定要战败。中国的军队除了士气，绝对不是超现代化日军的对手。此外，淞沪战役由委员长亲自指挥，而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指挥官。他对日本的侵略愤怒万分，一开始便极为意气用事，准备随时在任何战役中战斗到最后一人。他的军事计划又受到国内政治、国际声誉和外交策略等种种考虑的影响。尽管白崇禧不断请求，委员长还是不肯下令按照计划撤退，直至伤亡枕藉，为时已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国军开始全线溃败，不到一个月，松井石根指挥的日军已兵临南京城下。

南京之战也受到委员长意气用事的影响。只是为了国际观瞻，委员长坚持死守，没有採取德国顾问亚歷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宣佈南京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唐生智受命率十万精锐之师保卫南京，但他的决心和能力都不足以担当这个荣辱存亡的任务。士兵仍在英勇作战，最高指挥官却已逃到长江对岸。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沦陷。日军佔领南京后，马上就变成一群咆哮的野兽。超过十万的平民和战俘在数日内遭到屠杀，每次都是数百人集体遇难。日军抢掠、纵火，不分老幼地姦杀妇女，受害者包括十一、二岁的女童。日本人的大规模屠杀、姦淫，被当时在南京目击惨剧的西方人士称之为「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註4）

三十年后回顾南京大屠杀（註5），歷史学家难以置信，除了屈指可数的最高指挥官外，日本战犯在投降后几乎全部马上从中国释放，而在欧洲的德国战犯直到现在仍然在受审判和遭到处决。事实上，日本人犯下的战争罪行绝不亚于纳粹在欧洲的暴行。

日军在南京停留了两週，庆祝胜利及等待中国人投降。但在南京陷落的两週前，中国已迁都重庆，政府的行政部门亦移往武汉。因为中国完全没有屈服的迹象，日人决定佔领津浦铁路，准备向西推进到中国内陆。

日军从天津、南京、青岛兵分三路向铁路枢纽徐州前进，那里由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防守。由于山东省主席韩復榘不服从命令，北方的防线失守。韩还是老式军阀的做法，为保存实力，避开日军的攻击，对铁路全不设防。由矶谷廉介带领的日军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进入济

南，三十一日又陷泰安，五天后佔领济宁和兖州。韩不久就被逮捕，由军法审判处死，但他已经为进逼的日军打开大门。幸亏李宗仁在另外两个战线能够与日军僵持不下。李判断矶谷也许想抢在另两路日军之前佔领徐州，便在徐州东北的战略要地台儿庄设下陷阱。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矶谷率领的三万日军进入陷阱。经过八昼夜的血战，日军大败，伤亡达数千人。日本士兵在前面逃命，中国追兵在后面高声呐喊，这可能是现代史上的第一次。

台儿庄一役惨败后，日军高层全面检讨，接着发动新攻势，以十倍于上次的庞大兵力包围徐州。当日军从不同方向快要在徐州之西合围时，李命令辖下的六十万大军分散往各个方向撤退。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日军在全无抵抗下进入徐州。李将军一次骄傲地对笔者说：「一场这样规模的战役，日军连我方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这话的确符合事实。

日军从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目标是另一战略性铁路枢纽郑州，希望与黄河北岸的另一支日军会师。国军高层指挥官鉴于无力阻止敌人的前进，决定使用最古老的作战方法来解燃眉之急，挖开黄河河堤阻挡来犯的敌人。原来计划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午夜在河南中牟县赵口决堤。不幸的是，释放黄河水并不比控制黄河容易。赵口堤当地人称为金堤，异常牢固，虽然动用一个工兵团使用炸药，也没能在几小时内把河堤炸开。这时日军已佔领开封，工兵团工作两天徒劳无功，只好另选西边一段堤防。在水利专家和另一工兵队伍的协助下，终于在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决堤。日军猝不及防淹死不少，但数百万无辜的农民也一起遭了殃。因为决堤的代价实在太大，重庆的宣传都说是日军轰炸机造成的灾害。

日本人把主要军事行动移到长江。他们在六月中旬佔领安庆，两週后突破马当要塞。双方在长江两岸一连串激战之后，日军逼近武汉。十月二十六日，国军弃守武汉。日军继续沿粤汉铁路南下，长沙守军在十一月十三日因一场虚惊而张皇失措，放火烧毁长沙古城。（註6）

在华南，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军轻易地在广州东南的大亚湾登陆，九天后佔领那时中国仅存的海港广州。中日战争似乎到了最后阶段。日军在佔领两个重要城市武汉和广州后再次暂停，东京开始对重庆提出比较「合理的」投降条件。到了这个时刻，一群以汪精卫为首的悲观主义者感到前途无望，觉得不妨接受这个条件。

汪精卫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悲观。战争进行十五个月后，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整个海岸线、各铁路干线和沿线的现代工业都落入敌人手中。和外界的联繫基本上依赖从兰州到苏联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简陋公路。这条路长度超过一千五百英里，沿途崎岖不平。滇缅公路才刚刚通车。连接昆明和河内的铁路时断时续。置身于偏远山区的自由中国完全孤立。只要一看地图，谁都会相信中国已经战败。对像汪精卫这样聪明的政客来说，军人的「抗战到底」的口号，如果不是自欺，也是毫无意义可言。他一再警告，更多的牺牲对任何人没有好处，得利的只有共产党和苏联。

汪也有终止与蒋介石合作的个人理由。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有人目睹汪看到选举的结果时热泪盈眶。（註7）国民党已经完全被一个资歷不如他、曾经是他下属的政治对手控制。汪曾经梦想利用国民参政会作为维持他的政治生命的新工具，但这终究只是个梦而已。

国民参政会是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设立的。一九三八年四月组织，七月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会议。其主要目的，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置参政员总额二百名，其中从各省、市选八十八人，蒙古、西藏地区选六人，海外侨民选六人，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选一百人。最后一项包括所有少数党。（註8）

一大批中国的精英被选为参政员，其中有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张国焘、吴玉章、董必武、林祖涵和邓颖超。其他包括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曾琦、李璜和左舜生，中国国家社会党主席张君劢。此外徵召了学术界和没有党派色彩的自由派人士，包括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章伯钧、顾颉刚、张澜、钱端升、晏阳初、于斌。着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当选为副议长。

虽然参政员的资格要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政府的紧急权力也不受国民参政会限制，但政府仍然需要将所有对内、对外的重要施政方针提交国民参政会审议。国民参政会的决议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交政府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佈命令执行之。

总的来说，国民参政会的确具有「一个早期议会」的特色，一如一九一三年底古德诺教授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出于战争的实际需要，不是来自理论家的凭空设想，虽然政府声明它不是一

个代议机构，它的性质却比中国歷来的任何代议制度更具有代表性。即使执政党不加以扶持，只要具备卓越的领导，并且高瞻远瞩地予以包容，国民参政会很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的真正议会。以汪精卫的精明，当然能够看到它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在取得议长职位后，很想使国民参政会逐渐变成真正的「下议院」。不幸的是，蒋介石不是华盛顿，他属下的黄埔系和CC系亲信也没有容忍如此民主发展的雅量。光是政治猜忌就使得国民参政会只能发挥谘询功能，不能成为代议机构。

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也同样令人失望。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着名的「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註9）确实使蒋委员长感到鼓舞，决定在上海增兵，把一场无望的战事拖延了一段时间。然而，即使在美国砲艇「班乃」号（USS Panay）在长江被日机炸沉后，罗斯福总统也没有採取积极行动，令中国人大为失望。美国的商人仍然继续向日本提供原油、汽油和废铁。

国际联盟也同样毫无作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国联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Nine Power Conference），讨论中日冲突。虽然在上海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正在血肉横飞，亟需会议支持，但日本没有与会，其他各国的外交官经过三个星期的无益空谈之后，承认会议失败，随即散会。（註10）一切都证实汪精卫此前的预测是正确的。

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支援，与英、美两国的袖手旁观形成强烈对比。中、苏两国在一九三七年春天祕密谈判，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只有一些含煳的字眼，没有任何书面协议，苏联就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运送武器和装备，显示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刻只有苏联提供援助。一九三七年底首批援助到达，足够装备二十四个师。除武器和装备外，还有最佳的苏联指挥官和大批顾问，其中包括朱可夫（Grigori K. Zhukov）和崔可夫（Vasili I. Chuikov），二人后来在欧洲的战争中赢得大名。

苏联也帮助中国维持一支拥有五百架飞机的空军，其中有五个联队的飞行员全是苏联人。在兰州设立了中苏联合基地，随即在成都和乌鲁木齐创办航空学校，教员是苏联人。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一次空战，正值日本天皇的诞辰，中苏联合空军击落日本轰炸机二十一架，是在抗战纪录中歼灭日机最多的一次。苏联最初给中国的援助，据史达林的估计为三亿卢布。

史达林洞悉蒋介石的心思，在运送庞大的军备时，苏联船只从敖德

萨（Odessa）港经苏伊士运河到广州，最后直接停泊在南京的军火库前。中国共产党完全受到忽视，好像不存在一样。

史达林企图制造一个由国民党要人组成的亲苏派来取代中共，除了国父孙文的儿子孙科外，他拒绝与任何人商谈。孙那时是个自由派，极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戴。他缺乏真正的政治实力，却有助于他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保持独立；而作为孙文的儿子，使他一直能够留在国民党的高层领导内。如果没有史达林的支持，孙科在中国政治的作用顶多是个门面摆设。史达林对他情有独钟，显示苏联独裁者对中国政治颇为了解。因此，孙科及其亲信负责中国政府战时的中苏外交，从而在抗战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苏联和中共说话。

一九三八年一月，孙科前往莫斯科，取得第二次贷款五千万美元，随后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又取得第三次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作为偿还条件，中国承诺把茶叶、羊毛、锡和其他原料大量输往苏联，为期十三年，年利率三厘。在第三次贷款谈判期间，所有到中国的海路都被日本封锁了，中苏交易基本上依赖陆上的公路，从哈萨克斯坦到重庆的货车，来回一趟通常需要两个月。苏联如此庞大的供应，不可能靠这样费时费力的运输系统。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史达林停止输送，第三次的贷款只用掉一半。（註11）

在战争初期，史达林似乎不惜任何代价，决心让中国继续抗战，好几次对蒋介石直接或间接表示，中国的抗战一旦到了生死关头，苏联随时可以参战。他的话可以从两次苏、日武装冲突中，苏军发动的大胆军事行动得到证实。首先是一九三八年初夏在朝鲜和伪满洲国边界的张鼓峰，其次是一年后在外蒙古的诺门罕（Nomonhan）附近。在这两次事件的战役中，苏军都重创日军。

尽管苏联表示对华支持，但以汪精卫为首的恐俄人士依然坚持言之成理的理论，认为中、日交战对双方都是得不偿失，只会使苏俄和中共坐收渔利。

虽然动机大不相同，德国驻华外交使团也和苏联的一样活跃。作为日本的反共产国际协定（The Anti-Comintern Pact）的盟友，希特勒担心日本面对日益壮大的苏联会势穷力竭。此外，即使日本在中国获胜，一个在日本主导下的中国对德国也不一定有利。甚至在南京陷落前，德国就希望结束中日敌对状态，而且发现交战双方都愿意接受它的调停。

日本军方从来没有想到中国的战事会旷日持久，日本最好战的陆军

大臣杉山元曾计划「三个月内粉碎中国」，并以为中国随即就会求和。在战争拖延日久之后，甚至杉山元也接受了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及参谋本部关于和谈的计划。因此，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utmann）到达南京，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自治；（二）在华北沿满洲国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委员长想不到条件如此宽大，甚至最主张武力抗日的白崇禧将军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以接受。据说白崇禧表示：「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

然而，很快就清楚了，日本所要的不只是这么一点。南京沦陷后，日本的和平价码也水涨船高，包括要中国承认「满洲国」、成立华北和华中特别行政区以及赔款。中国断然拒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东京正式声明，日本政府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从此日本「期待能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註12）中、日两国互相召回大使，这样就结束了交战双方祕密和谈行动的第一回合。

四个月后，近卫内阁改组，没有那样好战的宇垣一成和板垣征四郎分别取代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和陆军大臣杉山元。和平又有了希望。蒋介石觉得这是个机会，主动提出和谈。宇垣一成就任后不久，蒋最信赖的前外交部长张群致电祝贺。这就展开了第二次中日祕密交涉。日本政府准备邀请孔祥熙前往长崎进行祕密谈判，但计划因日、苏的张鼓峰事件爆发而中断。日军正与苏军激战，东京无法抽身，中国亦乐于坐观其变。和平计划就这样中断了。

然而，日军佔据武汉和广州后，近卫提出第三次和谈，建议通过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的紧密合作，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秩序」。按照近卫的说法，蒋介石的政府在战败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中国最好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来执行新使命。（註13）

蒋委员长断然拒绝近卫侮辱性的建议，所有高层的将领和所有国民参政会的成员都支持他。近卫从汪精卫的集团找到一些回应，汪既不信任中国的士兵能够抗敌，也不信任西方各国的友善姿态。汪似乎相信，如果中国愿意合作，近卫的态度诚恳，有能力以「合理的条件」终止战争。汪有一次对蒋介石提及：「敌人的困难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我们则是如何继续战争。」汪也在一些场合公开向西方记者透露他的想法，吸引了近卫的注意。因此，日本的特务就同上海和香港的汪系人马接触。

汪系的梅思平、高宗武和代表日本军方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签订非正式的《日华协议记录》。

汪精卫因此决定，为了「和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一生的事业。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汪逃出重庆，近卫在汪离开后提出结束战争的「合理的条件」，汪立即作出积极回应。如果蒋介石拒绝和谈，汪就说服一些主要将领参加，尤其是两广的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和云南省主席龙云，以期组织一个新的国民政府，迫使蒋介石就范。

汪准备周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飞往昆明与龙云相会，但龙拒绝参与。汪三天后继续前往河内。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发表事前准备好的声明，通常称为《近卫三原则》。内容是：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互相提携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日军驻守华北与内蒙古。如若中国同意合作，日本将不要求中国割地赔款。

《近卫三原则》立刻为重庆的国民政府拒绝，但汪精卫按照原先的协议，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通电，贊同近卫建议的解决办法。汪还在河内筹划下一步骤，重庆则希望他前往法国，但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打断了汪的法国之行。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午夜，一队杀手闯进汪在河内的住所。他们误杀了汪的主要助手曾仲鸣，却没有把汪杀死。这一刺杀行动确定了汪组织「新政府」的决心。他此后作为一个无耻政客做出荒谬错误、人所不齿的叛国行为，本书限于篇幅就不再详述了。

长话短说，汪在日本扶植下建立傀儡政府，显示出一个政客低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古老的中国经过日本数十年来的震盪电疗（shock treatments），终于惊醒。现在面对中日战争的挑战，屹立不移，抗战到底，决不半途而废。汪无法从重庆挖走任何一个略有声望的人，只能招徕一批贪图酒色财气的民族败类。这样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立足。

汪对日本的国情也判断错误。那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人的心态则具有强烈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色彩。除了军国主义者，日本天皇、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都支持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尽管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日本不存在像今日美国青年这样的反战情绪（註14）。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蒋介石很难有机会以「合理的条件」结束战争，汪精卫的机会就更少了。此外，近卫没有资格代表一个严重分裂的日本提出什么「原则」。更糟糕的是，汪还没有离开河内，近卫内阁就倒台了。

不仅如此，在汪走上傀儡舞台前，已经有两个表演者粉墨登场。在北平有王克敏傀儡政府，在南京也有梁鸿志傀儡政府，分别由两个明争暗斗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撑腰。汪不得不争取日本不同派系的支持，以求挤进这场演出。最后，为了苟延政治生命，汪只有抛弃所有高唱的「原则」，卑躬屈膝地听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安排，成为第三个傀儡。由于他的装扮比较鲜艳，其他两个傀儡就合併到汪的舞台上演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汪和日本签订了「条约」。不久，这个祕密条约被两个深感不妥的同伙高宗武和陶希圣偷带出境。当时的新闻界认为，汪「接受」的「合理的条件」，比「二十一条」还要恶劣。汪在南京的傀儡政府于一九四○年三月正式推出。珍珠港事变后，虽然汪没有从日本「盟友」那里听到任何风声，也跟着日本向美国和其他盟国宣战。日本投降前九个月，汪因健康不断恶化而去世了，算是死得其时，但也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人唾弃的政客。

註释

註1：译者按：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杨虎城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祕密杀害，终年五十六岁。同时遇害的还有杨虎城的次子杨拯中和不满十岁的女儿，杨虎城祕书宋绮云夫妇和儿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

註2：译者按：西安事变后，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至八月，国、共两党举行了五次会谈。参看刘聿新，〈国共二次合作与中国的发展〉，中华民国教育部顾问室八十七会计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改进计画研究报告书，一九九九年六月。本文为国立中山大学共同科「中国歷史上的分合」研究计画成果报告之一。〔见网页http://www.general.nsysu.edu.tw/plan/plan1.htm〕

註3：译者按：根据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二○○七年），〈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页八三记载：

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一个小队的护卫部队，应为二百九十四人（三人重伤）。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一百五十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乘车送回灵丘的伤兵的伤亡，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伤亡的人数恐怕应在三四百人甚或四五百人之间。

註4：译者按：「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莫衷一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坚持採信三十万人之说，这是战后国民政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相关审判中确认的数字。

註5：译者按：本书成于一九六○年代末期，距事发已超过三十年。

註6：译者按：史称「长沙大火」。起火当日（十二日）的电报代码是「文」，且大火发生在夜里，故又称为「文夕大火」。

註7：笔者与张发奎将军的非正式谈话。

註8：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打趣说他的党不是「文化团体」，而是「武化团体」。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页一一二八。

註9：译者按：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号召国际对侵略国（暗指德、义、日）施以经济压力、制裁。

註10：译者按：九国公约国会议，亦称布鲁塞尔会议。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应中国政府要求，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将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与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开会，讨论中日战争问题。会议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有中、美、英、法、义、比、葡、荷，后来加入公约的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南非、印度、瑞典、挪威、丹麦、墨西哥、玻利维亚，以及特邀的苏联等十九国的代表参加。日本和德国拒绝出席，由义大利代日本发言辩论。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与会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除发表泛泛的谴责之词外，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十五日，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国会议报告书》，吆吁尊重《九国公约》确定的和平原则，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二十四日，会议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宣佈休会。

註11：译者按：根据《中华百科全书》（中国文化大学，一九八一年），第二册，页一三五，「中苏贷款协定与通商条约」条：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后，双方先后另行签订三次贷款协定，共约二亿五千万美元，用以购买苏俄军用物资，计：

一、第一次贷款协定签订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共五千万美元。

二、第二次贷款协定签订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数额亦为五千万美元。

三、第三次贷款协定签订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共计一亿五千万美元。

以上三次贷款协定，均载明中国政府以等值茶叶、羊毛、桐油等农产品，及锡、钨、锑等矿产品，按期偿还借款本利。

上述贷款协定签订后，苏俄军用物资之供应情形，尚属良好，我国抗战初期的一部分武器如飞机、大砲等，即以信用贷款购之于苏俄。以后逐渐不能配合我方之实际需要，时有时无，迨至民国三十年六月，德苏战争爆发而完全停顿，全部二亿五千万美元之贷款，实际上仅及半数即告停止。

註12：译者按：引文译自《近卫文麿第一次声明》。日本近卫内阁三次对华声明，可参看復旦大学歷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一八四○～一九四九》（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二分册下卷，页九二～九五。

註13：同註释註12：。

註14：译者按：唐先生写这部书时，正值美国青年反越战的高潮。

【第19章】

共产主义在战时的扩展

1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佔领广州和武汉，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毛泽东开始计划不同的战争，而汪精卫则在计划不同的和平。毛是中国第二大政党的实际领袖，这政党有它自己的干部队伍、领土和武装部队。西安事变使它第一次获得合法的地位，中日战争给予它进一步扩展的机会。

在这段时期，共产党迫切需要注意的事情很多，而当务之急是稳定边区。没有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共产党就没有开展活动的基础。

在西安事变时，共产党统治其首府延安附近大约六个县，对相邻地区的村庄只能部分控制。城墙围绕的县城仍由国民党的官员管理。八路军成立后，据说蒋口头同意把地区内的二十三个县分配给八路军，以便募兵及就地补给。但是双方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这样的分配始终没有实现。南京坚持地区政府是现行法律下的一般地方政府，共产党则认为应该具有自治的地位。争论因为战争而没有结果，边区的法律地位仍然含煳不清。

含煳不清导致混乱。在战争的前几年，边区的许多县都有两个县长，国、共两党各派一个，同时执法。在争夺领土控制权方面，国民党的官老爷不是共产党农村组织者的对手，但共产党的游击队遇到国民党的正规军亦只能败退。在非暴力竞争的第一回合，国民党的县长从县城里被一个个赶走，到一九三七年底边区就从六个县扩展到十五个县，一九三八年达到十八个县，一九四○年二十三个县，一九四一年二十六个县。一九四○年底开始，国民政府决定用武力停止共产党的蚕食策略，随之以冷酷的屠杀，但中日战争干扰和中断了内讧。共产党似乎感到满足，他们已经扩展到蒋委员长曾经允诺的范围。国民党方面的军事行动亦限于防御性的封锁，但中国最精良的二十五万部队却在战争年代的后期驻防在这里，动弹不得。

在陕甘宁边区的全盛时期，领土面积达到三万二千六百八十五平方英里。这个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中央，根据何炳棣博士的研究，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由于千百年来的自然侵蚀以及世世代代的人为忽视，原来肥沃的土壤变成为独特的崎嶇地形。有一百五十万的劳苦大众

以此为家。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的原居民是文盲，战时迁来的知识青年约有十万，加上从全国各地来的士兵，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在内战时期四散各地的大批流亡共产党人，现在纷纷回到延安，恢復党籍并从事战时服务工作。这些人包括许多高层领袖，例如王明、康生（张少卿）、陈云和曾山，他们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乘俄国的轰炸机飞到延安。只有臭名昭着的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李立三仍然滞留莫斯科。

经蒋委员长许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重建自己的政府。理所当然，他们的政府结构都依据国民党一个省的形式设计，拥有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和司法系统。最高权力属于和人民代表大会相等的边区参议会。在边区参议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由参议会选出的行政人员行使，他们向参议会负责。下一级的政府向同级的参议会和上一级的政府负责。司法系统由边区政府「指导」。不用说，所有这些体制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工具，唯一掌握边区决策权力的是共产党的政治局。

边区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正式宣佈成立，林伯渠和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他们的任命获得蒋委员长认可。张在一九三八年夏天投靠国民党，但林则一直担任主席到战后。边区参议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认可再认可林的任命。

第一届边区参议会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延安举行开幕大会，约有代表十八个县和延安市的二百名议员参加。大多数边区参议会的议员和所有下属代表机构都是由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普选选出。除了十二个「特约参议员」，所有参议员都是共产党员。例如，毛泽东和林彪是某个县的代表。高岗当选为参议会议长，在战争年代一直担任此职位。代表产生的方法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召开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时彻底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採取了新政策，即所谓的三三制，限制共产党代表不超过参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席位留给国民党和「进步」人士。

在共产党大力支持下，政府机构效率高而且清廉，胜过其他地区。它促进生产，普及教育，为军队提供补给和兵员，成效显着。例如，耕地从一九三七年的八百四十三万一千零六华亩，增加到战争末期的一千五百二十万五千五百五十三华亩。轻工业、手工业和牲畜全面增加。一九四一年，重庆停止向共产党部队发放给养，边区政府就负起为军队提供衣食的责任。

共产党人像往常一样，在普及教育方面取得非凡的成绩。各式各样的公立学校，战前只有数十所，在战争末期增加到近三千所，超过三万

儿童能同时接受教育。在一个人口一百五十万的地区，这样的数字在战时是极为可观的了。

组织民兵是另一个特点。在抗战期间，边区政府组织和训练了二十五万以上的农民担任自卫工作，却不妨碍他们的农活。训练最好的就加入正规军为新兵。其余的保卫家园，在紧急时刻拿起武器抵抗入侵者。巨大的民兵系统加上高效率的群众组织，如妇女会和儿童团，使得边区政府成为最有效率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总而言之，共产党在困难的条件下为边区人民提供了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赋税当然沉重，但没有人中饱私囊；人民仍然营养不足，却无人挨饿。个人的自由有限，但谁会在乎呢？在战争蹂躏的中国，每个人主要关注的是求生。结果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边区，人民活得不错。

2

在他们安全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利用战争在全国各地重建党的机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旬，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彻底重建共产党。在毛的操作下，经过莫斯科批准，张闻天不再担任总书记。这个党的最高职位随即取消，党务由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主持。毛泽东的名字现在位居常务委员名单之首；有传闻说，这也是经过史达林批准与支持的。毛在成功阶梯上又晋升一级。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已经控制了军队。现在他的权力正式延伸到民事，涵盖党和政府。党政军三权一手抓，毛的地位扶摇直上，超过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往任何一位领导人。重建的党在他的领导下，设立了强大的地方局、省委和无数低层的办事处，公开的或地下的，都在全国各地恢復活动。经过多年的压制，共产主义再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站立起来。

恢復活动的地方局中，西北局不久就改称为边区中央局，由政治局就近监督；北方局由杨尚昆领导；长江局由王明领导；西南分局由项英领导。武汉沦陷后，长江局移往重庆，改名南方局。西南分局则升格为全面的地方局。一九三九年四月，华中局成立，曾一度领导北方局的刘少奇成为第一书记。

共产党经营的大众传媒也同样遍及全国。《新华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其后移往重庆，是中国战时最有影响力和编辑最佳的日报之一。《解放周刊》在延安扩展为《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这两份日报从此成了战时关于共产党活动的主要消息来源。

这些公开的媒体使得延安成为最繁忙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吸引数

以千计的青年前往朝圣。为了接待他们，中国共产党设立好几个训练机构，例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共产党特工在全国各地招生。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的一个难民／学生营，笔者和一群十来岁的朋友遇到几个神祕的特工，提供去抗日军政大学的「免费大学教育」。突然间这个往延安的「免费旅行」被国民党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员拦了下来，劝告我们转往由前蓝衣社办理的战时干部训练中心。我们这群年轻人确是兴奋不已，几小时内就分别遇到了极左和极右的组织。

这些共产党的学校只提供短期的马列主义课程，还有实用的游击战和群众组织等训练。受训数月后，毕业生被派到军队、党或政府担任干部，或参加地下工作。由林彪担任第一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较其他学校更为有名，它不仅训练在各个工作领域的无数新干部，还培训了数以百计接受思想教育的、有经验的军官和政治指导员。这些人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骨干，在一九六○年代中期的红卫兵运动中仍可看到他们的影响力。（註1）

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南京在检阅后发现红军实际上只有二万八千人，而不是中共官方宣称的三万人。每一个原来的红军方面军改编为一个师，一共改编为三个正规师──红一方面军是一一五师、红二方面军是一二○师、红四方面军是一二九师。他们从政府领取足够四万五千人使用的正规给养。除了已有的武器，又获得轻机枪一百二十挺、反坦克砲六门。这些供应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和战争年代的其他中国军队比较，南京确是非常慷慨的了。

八路军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地位和政府保证的补给，主力部队随即开往前线，然后到日军战线后方作战，开创自己的根据地。虽然他们的正式编号在一九三八年初从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共产党还是喜欢非正式地沿用八路军，直到战争结束才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八路军从一支三万人的小部队开始扩张，根据他们自己宣称，在一九四○年有四十万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略有减缩，在抗战胜利前夕，又增加到五十五万零八百三十五人。

和八路军不同，新四军的成长速度虽然也极快，却困难重重。从一九三八年初一万二千人的部队开始，一九四一年初达到了十三万五千人，然而皖南事变（下文另有论述）的悲剧将它减缩到十一万人。在战争年代的后期，他们在新的领导下于苏北重新集结，一九四四年底宣称有武装士兵二十九万三千九百八十二人。

因此在日本投降前夕，中共宣佈有正规军九十一万人，加上民兵二百二十万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使有些夸张，也使得毛泽东能够在抗战结束时夸称，中共已经是一个「武化」团体，不再是蒋介石所期望的文化团体了。（註2）战争确实使毛主席恢復了枪桿子里出政权的思想。

3

为了指导战时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有系统地阐述「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就是说，在争取国家团结的同时，共产党亦应为独立扩张斗争。然而，在战争年代的初期，毛主席针对自己同志的斗争，似乎要比针对国民党的斗争更多。

总的来说，当时决定共产党政策的人士可分为三派，为方便说明，不妨称之为莫斯科路线、毛泽东路线和多数派意见。三派都支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只是对于如何实施，看法分歧。

按照莫斯科路线，国际反帝统一战线（International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的利益高于一切。不用说，推动这个政策的是王明和国际派同志。他们的主调，用王明的话说，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就是说中国的两大党应该诚恳有效地合作，共同抗日。这样就能给予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在东边战线上足够的保护，中国和中共也会由此获益。

在战争之初，中、苏的国家利益一致。在前线和惨遭轰炸的城市的血迹斑斑，都说明亟需这样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在这个关键时刻认为王明是出于私心，这条路线看来符合两党的共同愿望。

蒋希望共产党人本着爱国热忱会真正言行一致。如果共产党愿意停止自身的活动，全力支持他，蒋亦预备改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来容纳他们。据说蒋曾承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改换国民党的名称。」为了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比较包容，听起来没有那样的党味，蒋提议除去青年团前面的「三民主义」四个字，改称「中正青年团」。这个提议并无自我陶醉或自我中心之嫌。从沦陷区逃到后方的难民，第一次看到蒋的肖像时很少不是热泪盈眶的。对难民及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说，蒋的肖像象徵着民族生存的唯一希望。

共产党那时看来也和国民党兄弟一样诚恳。在武汉即将沦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划时代的六届六中全会（註3），毛泽东在

会上分析三种国、共两党合作的可能形式：（一）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二）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三）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毛的选择是（一）与（二）而不是（三），他说：「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例如许多大政方针之推行，下级磨擦问题之调整，都因没有一种固定组织，让它延缓下去，所以这种办法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註4）

由于期望改善现状，中共派周恩来携带毛给蒋的一封亲笔信，提出四点建议：（一）停止两党间的一切冲突；（二）允许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员，又或先允许一些人加入，若见成效，再允许其余的人加入；（三）解散所有共青团，让所有这些组织的成员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允许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团员保留共产党籍。

任何没有偏见的歷史学家，目睹在武汉艰辛岁月的这段歷史，都不会怀疑两党的诚意和它们希望改善大后方的建议，但也会完全理解为什么两党互相不信任对方的意图。十年内战在两党间造成的鸿沟太大，血海深仇，不是因共御外侮就可以在几个月内弥补的。用蒋回忆录中的话来说，「惨痛的经验」使得双方同样小心和害怕「受骗」。互相猜疑使他们无法实现更有效的合作。「现在的办法」只证明了毛的悲剧性预言。事实显示，真诚合作维持不到三年。王明路线烟消云散，为毛泽东路线取代。

和蒋介石一样，毛泽东预测这是一场持久战。它会经过三个阶段，开始时中国会遭受失败，随即进入长期的「相持阶段」，然后中国进入反攻阶段。

然而毛与蒋不同，他在第二阶段并不倚赖地理屏障的保护，也不指望可能发生世界大战，以期在第三阶段击败日本。毛把希望全部寄託于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组织广大群众的能力。「相持阶段」会提供足够的时间来集结兵力，包围在主要铁路和河流两旁的大城市内的日军，最终把他们消灭。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陕北洛川县召开会议，讨论八路军在战争中的任务。（註5）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红军避免打大仗，集中于扩大红军和在敌人后方建立游击根据地。按照这个原则，共产党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发挥消极作用，在第二阶段发挥积极作用，在第三阶段发挥领导作用。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毛愿意让国民党统

治中国内陆，但坚持由中共完全控制「敌后地区」，所有游击队伍由共产党统一指挥。如果有任何游击队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可以「先消灭它，然后向委员长报告」。

毛的计划虽然符合实际和具有远见，但在战争开始时让人觉得过于自私自利，甚至他的同志，尤其是要求积极参战的军人，都不以为然。党内的多数意见迫使毛忍让，最初几个月服从王明路线，一九四○年将领们在中央军委投票压倒毛的意见，发动英勇的百团大战，反击日军。（註6）然而由于毛的远见和坚持，从长远去考虑，他的战略还是佔了上风；尤其是武汉沦陷后，正如毛预测的那样出现了长期的「相持阶段」。

4

据说在八路军开赴前线时，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的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虽然这句广为流传的话的真实性到现在仍然值得怀疑，但它的原则听来却很有毛泽东的特色。和共军其后在所谓「敌后地区」的发展也似乎吻合。中共用了多过七分的努力来建立敌后的游击根据地，因为长征的惨痛教训是，即使全是游击战士的部队，如果没有提供兵源和给养的根据地，也不能有效地作战。（註7）

八路军在一九三七年秋天进入山西省，自平型关战役后就不再有任何大型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的主力已经南下，只留下少量部队防守铁路线和城镇。所有在晋（山西）、察（察哈尔）、冀（河北）三省边区的农村地区全在抗日游击队的控制下。除了八路军，还有中国正规军的遗留队伍、省和县的民兵、地主和祕密会社的武装自卫队，由流亡学生、知识分子、失业的前政府官员或军官、甚至土匪和无业游民率领的游击队。许多地方政府，虽然局部停顿，离开了原来在城里的衙门，仍在农村或高山上运作。他们极端需要一个跨省的统一军事指挥和全面的地方行政机构。

面对着这些问题，八路军中经验丰富的群众运动干部如鱼得水。唯一有能耐的国民党对手是阎锡山属下的左倾青年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共产党和牺盟会紧密合作，联合整顿混乱局面。他们首先组织了一个跨省的晋察冀边区。

在国民党县长宋劭文和共产党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领导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在河北省阜平县组织筹备委员会。一个月后召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有游击队代表一百四十七人参加，选出以宋、聂为首

的九人为委员，组成行政委员会作新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註8）不久，汉口的国民政府予以认可，成为敌后的特别地方政府。

初期新边区包括五台山四周农村约十五个县，人口约一百万，九成为不识字的贫苦农民，但大批受过教育的难民和游击队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

虽然新边区的设施仿效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但两者各有其特色。从地理上看，新边区位于日本佔领区的中心，四周是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日军巡逻的公路穿梭其间。因此它所有的机构必须机动，随时准备作战与迁移。武装游击队必须与当地的居民同生活、共进退。

两者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亦不相同。陕甘宁边区从经过土改的前苏区转变过来，由一个稳定的一党政府掌管，其他参与的党派只是摆设。新边区仍是旧中国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新的地方行政机构内只是少数。它的本质是一个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是全世界的共产党第一个参与的联合政府。

边区政府经蒋委员长正式批准，开始时是真正的两党联合，后来渐渐为共产党控制。转变的过程和平而自然，当地居民和党派代表都没有对共产党实际上的统治提出抗议。虽然还打着联合政府的招牌，共产党的干部似乎随时能把它拿下来。

这是现代政治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实验，事实上不仅为共产党在战时中国、也为当代世界建立了一个典范。不妨深入探讨，看看中共当时是如何做到的。

根据主持新边区党务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所说，实验分为四个阶段，从八路军抵达到建立边区政府是第一阶段。共产党在这时协助村民建立自卫组织，这些组织又与一些仍然全面运作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密切合作。（註9）

在边区政府成立后的第二阶段，共产党筹划地区的普选，希望人民选出他们自己的县、区、村三级的官员。由于九成的人口是贫苦农民，当然以为他们会选举同一阶级的人。然而，选举的结果令人相当失望，彭真发现，除了低层阶级的进步分子，许多顽固分子甚至地主阶级的反动分子也一起当选。而进步分子一如他们的上层社会同僚，一旦掌权就迅速腐化。彭真指出，这次不寻常的经验再度证实了列宁的教导：革命人民的政治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为了建立人民

自己的政府，必须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这个工作就是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从一九三九年二月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年夏天。

一九三九年初，各级代表会建立，代表由当地居民全民投票直接选出。和三权分立的旧民主制度不同，新政治体系采取纵向控制的方式。代表会具有任命（以遴选方式）、监督和罢免同级政府负责官员的绝对权力。司法只是五个行政部门之一，其余四部是民政、财政、教育和生产。还有一个公安局指挥地方民兵和特警。和国民党的统治完全不同，新的体系确实给予人民一个充分代表贫苦农民的多数政府。它也使得经验丰富的共产党群众运动干部更能影响代表会，从而引导政府的运作。

共产党总结痛苦的经验，认识到这种形式的政府并不适合敌后的政治环境，也不符合共产党的战时承诺。事实上，彭真提醒他的同志，如果边区佔少数的居民（地主、富农和不同职业的人）的利益不受保护，一旦敌人出现，边区就会冒出许多叛徒。要保证边区政府是个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必须自愿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让步。这些让步把边区的政治发展带入一九四○年秋天开始的第四阶段。

一九四○年八月，边区实施一个称为三三制的新政治体制。共产党自己规定，在任何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政府的行政机构，或任何群众组织，共产党的位子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位子留给国民党、少数党和无党派。彭真解释说，三三制不能成为法律，因为它和自由选举的原则相违背。这是共产党自己限制党员过度参与地方政府的政策。三三制非常成功，九个月后连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实行三三制。

在经济方面也作出同样的让步。虽然拥有土地在新边区是合法的，从边区参议会建立之初就通过一连串法令限制利息，贷款的利息不超过一五％，地租不超过土地收穫总量的三七·五％（相当于减租二五％）。这些改革原是国民党的法令，不幸一直搁置在档案柜里。这进步的法令开始施行后的一段时间，鼓励了当地的农民完全拒绝缴租还债。因此，在抗战的第二周年，中共纠正这一「左倾政策」，通过了「双十纲领」，让地主和放债者得到必要的保证。

然而，这个纠正措施不久却意外地令地区的经济政策向「右」摆，特别是在发现规定的地租上限比大多数当地地主实际收取的地租还要高的时候。一九四○年秋，中共採取另一个纠正行动，在议会通过法令，实行累进税制。为了保护贫民而又不使富人负担过重，边区政府又规定纳税人数佔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九成，也不低于七成。这使得贫农和地

主和谐共处。

这样的公平政策十分成功。在新的体制下，地主变得异常地开明，而农民的要求也同样合理。因为大多数人，只要没有危及个人的利益，都是天生爱国的。边区各阶层的人都密切合作，愿意支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同日军作战，后来又共同抵抗国民党入侵。

有了两年（一九四○～一九四二）的经验后，共产党认识到，认真执行这个政策是将来成功的关键。因此，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颁佈新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命令在敌后的各地方政府「加以研究，认真执行」。这文件的导言强调说，经验显示只有那些认真实行了这一政策的地区，才禁得起日本人的「扫荡」，「软弱无力的地区」都是因为没有彻底实行这个政策。（註10）

除了政策之外，实际的群众组织也是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边区的每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幼都编进一个或多个群众组织，例如民兵、农会、儿童团、妇救会等等，经常在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干部指导下开会。这些组织要求成员遵守共产党干部规定的标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这实际上使得每一个人成了刺探他人祕密的警察，每一个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受到监视。在干部不断的压力下，夫妇在自己家里也没有隐私可言。这样严密的群众组织，使得共产政权达到了警察国家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个没有庞大警察队伍的警察国家。

一位来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的绅士也许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极权体制下，但对于一九四○年代战时中国不识之无的贫下中农来说，这可能是个天堂。对于其他阶层的人来说，当全国各地都在外国侵略者、军纪败坏的伪军、落后的官僚体制和土匪蹂躏下，共产党最少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内维持秩序与安全。如果佔农村人口九成的不识字农民算是「人民」，那么共产党的确是创立了一个民有、民享、然而党治的政府。

成功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导致领土迅速扩张。中共官方的报告指出，晋察冀边区，在一九三八年有十五县，到战争结束时扩展到五个省（加上部分的热河和辽宁）的一百零五县。领土并不完全相连，共约七万三千平方英里。

新边区的茁壮成长，从任何角度看都是现代政治学上独一无二的实验，也给毛泽东带来灵感，写下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两章：一九四○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九四五年的〈论联合政府〉。

在这个实验中，政治规划设计和军事实力互相依存，林彪后来从军事观点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军事原则，写下了着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这本书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确是中国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献。过去数年为越共成功地实践，它的作者更建议说，这一原则可以用来最后孤立美国。（註11）

5

共产党按照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深入敌人后方，组织以晋察冀边区为模式的游击根据地。整个行动从实施三北政策开始，即巩固陕北、开拓晋北、争夺河北。

这项计划如果成功，下一步就是继续向南推进，控制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之间的平原，由此往以前的鄂豫皖边区挺进。另一方面，又从冀东沿海岸线前进，控制胶东半岛，与在苏北沿海岸线两端扩张的新四军会师。新四军再南下，穿过在赣南和闽西的旧根据地，与粤东及海南岛的共产党游击队会合。国民党在重庆的战略家认为，如果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能够实现，共产党就可以从东北到海南岛建立一连串游击根据地，在敌后形成「一字长蛇阵」。

由于上述的扩张计划，共产党渐渐和一些由重庆领导的游击队发生冲突，也遇上了奉重庆军委会之命驻守的庞大国民党正规军。根据共产党的资料，在华北的这种正规部队有八十万，在华中有二十万。此外，所有国民政府在敌后的省政府仍然继续运作。

国、共的和平竞争渐渐引致武装冲突，而武装冲突又迅速发展为团和师级部队参与的内战。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只带来了更多日军的「扫荡行动」。日军佔领广州和武汉后，中日战争呈胶着状态，一种奇怪的三角战争在华北和华中的日军后方展开。由于日军不能在农村久留，服从重庆的游击队过于散漫而孤立，作用不大；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又太「正规」，不会打这种不正规的战争；再加上管理游击队的国民党官员只知道老一套的政治手段，无法与共产党擅长基层群众组织的干部竞争。最后胜利的只有共产党。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开始，在河北由张荫梧、乔明礼等率领的服从重庆的游击队逐一被共产党吸收、击溃或赶走。一九三九年初，共产党的部队顺势进入山东省，软硬兼施，收编了当地大多数的游击队。在控

制了华中和华东的广大农村地区后，就建立起像晋察冀边区那样的一些边区，开始用不同的策略来挑战国民党的正规部队。

例如，阎锡山的「新军」有十一个团，长久以来为共产党渗透，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叛变，脱离阎锡山加入八路军。与新军一起行动的是管辖晋东南专区好几个县的国民政府专员薄一波。这几个县自然就成了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

一九四○年初，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部队在冀南发生严重冲突。由朱怀冰和鹿钟麟（那时兼任河北省主席）率领的政府部队惨败，河北的农村地区全为共产党控制。

同年夏天，另一场性质相同的战争在鲁（山东）南爆发。由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率领的国军也同样大败。八路军十月从山东进入江苏北部，第一次与新四军会师。新四军由陈毅带领的一支部队不久前才渡过长江，接着与南下的同志相会。

苏北随即发生内战，双方各有数师兵力参与。政府正规军再度大败，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所部数千人被歼。游击队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因此动弹不得。韩后来甚至为共军俘虏，在重庆施压后才获释。

因此，到一九四○年秋天，共军实际上初步完成了延安规划的敌后的任务。虽然日军仍然估领所有大城市和铁路线，共产党现在控制了平汉铁路以东、长江以北的全部农村地区。唯一的例外是大别山周围的旧鄂豫皖边区，现在由国军的桂系部队驻防。在这块广大的敌后地区，共产党组织了十多个以晋察冀边区为模式的新边区。

共产党的将领由于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现在觉得他们的军队足以对日军发动大规模作战。朱德和彭德怀不顾毛泽东的反对，调动大军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人全面反击日军。战役于一九四○年八月十九日下午八时在五个省同时发动，歷时三个月。国民政府的情报指出，参战的日军有七个师。日军在击退庞大的共军部队后，在边区实施凶残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政府一九四○年的一份报告表示，共产党边区受到严重的打击，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復。这就是被广泛宣传的百团大战，是八路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抗日战争中发动的战役。虽然百团大战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但它表现的爱国心毫无疑问值得赞扬。

早在一九三九年，共产党的扩张就引起重庆警惕。针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最高指挥部发出一连串命令，限制共产党部队在敌后的行动。八路军的行动限于第二战区山西省一带，新四军只能在苏南活动，不得超出规定的范围。然而，双方都没有诚意来寻求公正的解决办法。从抗战一开始，共产党就决心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命令，只在口头上服从重庆的最高指挥部。重庆也同样小肚鸡肠，国民政府最高指挥部划给共军的地盘太小、太危险，无法保证行动的安全。继叶挺之后担任新四军指挥官的陈毅向美军在延安的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埋怨说，政府把新四军的行动限制在南京的城墙之下，根本无法从事游击战。双方缺乏诚意，使得他们的战时合作无法继续下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商讨后，于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向延安提出一个具体方案，一方面允许八路军和新四军有限度地扩编，另一方面扩大他们的行动地区。根据新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华北驻防于黄河以北，单独与日军作战，以免与其他友军发生摩擦。

这个方案显示重庆当时颇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为它自愿接受共产党游击队在华北存在的既成事实，而且划给共产党部队的地盘大小还可以商量。据说这方案至少在原则上为周和叶接受，并带回延安去进一步讨论，却给毛泽东断然拒绝，讥之为「何应钦路线」。周和叶奉命带了反建议回重庆，要求中央政府承认中共有部队五十万，并发给相应的军饷。此外，中共的游击队要留驻原地。谈判因此毫无结果，两党失去密切合作、共同抗日的最后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双方在苏北的冲突白热化，国军的一个军长和几个师长、团长被杀。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对共产党部队「整饬军纪」，因而酿成新四军事件的悲剧。

新四军不像北方的同志那样幸运，一开始就处在日军和国军的夹缝之间。一九四○年十二月九日，蒋委员长下令新四军立即开拔，经皖南渡过长江，移防华北。与此同时，国军集结了六个师约五万人的精锐部队，以保证命令得到贯彻执行。

共产党将领认识到命令的严重性，准备服从，但蒋指定的路线却十分棘手。蒋委员长显然认为，新四军一旦离开国民党的包围渡江，就会不再服从命令。他们可能东进，与苏北的共产党部队会合，不再北上。现在规定他们经皖南渡江，马上就到达也不怎样服从委员长的桂系部队

驻守的游击地区。委员长可能想一石二鸟，让桂系部队把不听命令的共产党赶往华北，不让他们东进。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开始北上的第一程，离开皖南山区的根据地。行军一天后，进入了国军的口袋，只留下向北渡江的缺口。江上有日军的砲艇巡逻，江北的桂系部队亦同样磨刀霍霍。

叶挺有点疑惑，但并不认为情势危殆，在一月六日午夜突然下令改变行军路线。部队转向东南，凌晨前抵达一个叫茂林的小村庄。共产党看来是想出其不意地突破国军的包围，冲向苏南的安全地区。国军觉得共产党动向可疑，加以阻止。不清楚是哪一方开的第一枪，反正一场战斗就爆发了。这场血战持续了七昼夜。叶挺看到突围无望，请求与国军的指挥官上官云相面谈，因为二人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时就是朋友。叶应邀到国军总部，在那里被扣留。战事再持续一日，共军约一千人突围渡江，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及士兵四千人阵亡，三千被俘。国军亦伤亡惨重。这一战役，歷史上称为皖南事变或新四军事件，其激烈和血腥的程度，甚至在中、日战场上亦不多见。

事变过后不久，重庆政府正式宣佈这只是对不服从命令的部队整饬军纪。新四军的番号遭到撤销。与此同时，政府停止所有共军的军需供应。但是，中共不顾重庆的命令，下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宣称新四军仍有部队九万人，在长江以北全面活动。国、共之争延续下去。笔者在一九四三年夏季重返大别山时，赫然看到内战全面展开。没有哪一方把几英里外困守城内的日军看在眼里。日军显然已深陷中国的泥沼，不再是国、共关注的主要问题。国、共之间的内战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歷史学家不是陪审员，寻求的不是两边的是非曲直，而是歷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两党之间的冲突意识在延安和重庆都根深柢固，但现有的资料显示，新四军事件中双方都没有预谋。事件因双方互不信任、猜疑和误解而爆发，纯属意外，似乎是双方都没想到的结果。

新四军事件不管是如何发生的，它使得中国两个政党间表面上的合作告一段落。从此之后，双方各自对共同的敌人日本消极抗战，却在彼此之间积极内战。兄弟阋墙，中国这所大厦全靠着爱国主义的支撑才没有倒下来。

中共汲取了新四军事件的惨痛教训，卸下所有的政治伪装，在日军战线后方自行建立政权。大部分由于刘少奇的不懈努力，把不同边区内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都统一在延安的领导下，尽管大多数根据地都是各自建立起来的，几乎没有得到延安总部的任何经济或技术支持。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是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它终止了所谓的山头主义，把共产党政权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红色天子君临的帝国。到了抗战结束时，红色政权宣佈已建立了十九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六百三十五个执行政令的县政府，管理人口八千六百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五万人扩展到一九四五年的九十一万人，还有民兵二百万作为后盾。延安宣称，共产党武装力量在这段时间牵制着约六成的日军和超过九成的伪军。这自然是夸大其词，但共产党在战时前所未有的扩张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一九四四年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毛泽东和一些与会者谈话，意气风发地表示：「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註12）史达林看不起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因为教皇底下没有几个师的军队；毛泽东不一样，如果要计算他有几师军队，在抗战结束时的确算得上是「二日」了。在战时昇起的这个「二日」的确值得加以简略评论。

像大多数中国王朝的开国之君，毛泽东成功的条件包括风云际会、玩弄权术、高瞻远瞩、桀骜不驯、实干苦干，再加上屠夫心肠和个人魅力。江西和长征时期艰苦卓绝的宝贵经验，也有助在延安开创新事业。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给予毛足够的声望和军事支持，使他成为党内第一把手，但也不是就此一帆风顺。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在党内仍有许多对手，着名的如张国焘、周恩来和王明。通过一连串纵横捭阖的手段，毛把张国焘逼出了共产党，派周恩来到国民党地区办外交，把王明软禁起来。与此同时，他任命萧劲光率留守兵团守卫延安。萧在江西时曾受军法审判，被周恩来判刑五年。这一段难忘的经歴使得萧对周记恨，对毛效忠。

作为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也努力增进自己的知识。毛只有高中学歴，对马列主义的学习限于几本早期翻译的小册子。由于参加了革命，使他没有太多机会自学。在战时人才匯聚的延安，知识不足往往使毛相形见绌，尤其是他要以顶尖理论家的身分到共产党的各个学院授

课。那里的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师甚至学生，许多是自负不凡的左倾知识分子，为寻求言论自由来到延安，甚至比他更善于引述马列经典。前党总书记王明口若悬河、着作丰富，他的演说和文章令毛艳羡不已。

既要打击由流亡知识分子产生的自由主义倾向，又要就政策问题与党内的主要对手斗争，毛花了很大功夫来充实自己。中日战争为他提供了足够时间和设施。战争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可怕的灾难，这个遍体鳞伤的共产党老兵却从而因祸得福。自一九二六年的北伐以来，毛从未享有这样多的闲暇时间和安全感。毛在西安事变后直到抗战早期的岁月中，专心致志地学习，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业余诗人。他第一首为人称道的诗〈长征〉就是在这时期作的。

现存的资料显示，毛写了三篇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文章，即〈矛盾论〉、〈实践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前两篇作于一九三七年，第三篇成于一九四○年。前两篇后来经过修订，编入《毛泽东选集》里。第三篇读来有如大学三年级生哲学课的期终作业，也许会被一些外国的北京学专家（Pekingologists）（註13）收入他们的毛泽东「未选集」里。不过，仔细研究这三篇文章的早期版本后发现，所有内容全是抄袭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的《新哲学大纲》。（註14）

《新哲学大纲》其实是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出版的《大苏维埃百科全书》（*Bol'shasia Sovetshasia Entsiklopedia*）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节的中译。原书由十多个苏联的哲学家合作而成，其中有史察格罗夫（A. Shcheglov）和拉里察维基（V. Ral'tsevich），主编是厄多斯特斯基（V. V. Adorstskii）和米定（Mark B. Mitin）。毫无疑问，这一节是那时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杰作，它由艾思奇和一个助手细心译为中文。艾是中国主要的辩证法理论家，但是他的俄语并不流利，他的中文文笔也不算好。他用了一本日文译本作参考，结果沿用了许多不适当的日文辞汇，使得中文文本读来不够通畅。毛显然在这书出版不久后得到了一本，就一段一段、有时甚至一句一句地抄袭，当然也包括了那些不是中文的日文辞汇。另一方面，毛的中文文笔颇佳，对此，他以前的「老师」胡适也常常称赞不已。如若毛能自己直接从俄文翻译，他的译本肯定要比艾的流畅。不幸的是，缺乏哲学和外语训练使毛无法重写，不然至少不会露出赤裸裸抄袭的马脚。

然而，这里的批评并不表示笔者轻视毛伟大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能力，在这两方面他是个无可否认的天才。事实上，他在处理实际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方面显示了不凡的卓识远见。他有关战争的着作，例如《论持久战》，可与人类歷史的任何战略媲美；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确实反映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活学活用」了他抄袭的史察格罗夫的矛盾律。

不诚实似乎是许多政客的通病。毛虽然抄袭朦混，却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使他超出其他同住窑洞、甚至连抄袭也不会的同志之上，成为马列理论家。不仅如此，毛既有办法也有能力使党内的对手和党外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国民党没有找「白区」的学者来评论他抄袭的着作，当然也帮了他的忙。

武汉沦陷后不久，王明给召回延安，被控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王后来揭露，在延安时一度中毒。他得以倖存也许是因为史达林、蒋介石和裕仁仍然健在，但他从此失去对任何重要问题的言论自由，直到一九六八年才在莫斯科公开指责毛的「十大罪状」与「军事独裁」。

毛对付流亡的左倾知识分子就容易多了。抗战开始后只有两个月，他在延安发表着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演说，警告所有在延安避难的知识分子，不要随便说话或写文章，只能跟随他以共产党名义规定的路线。可是，由于国民党的竞争和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使他无法在文艺战线上独行其是，直到新四军事件发生。

一九四一年，毛把所有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纳入统一指挥之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及史达林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自身难保之后，毛自觉大权在握，可以自由採取独立行动了。新四军事件促使国民党回到旧有的保守政策，把所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共产党同路人；毛则从另一端收紧绳索，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发动第一次整风运动，接着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发表另一歷史性的演讲，讲词后来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这篇文章从此成了指导共产党文化发展的《圣经》，直到现在。

毫无疑问，第一次整风运动的性质是政治多于文化，毛泽东思想多于马列主义，中国本土多于共产国际。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建立毛泽东唯我独尊的领袖地位的第一步。事实上，这个过程三十多年来不断进行，王明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视为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延续，确是有道理的。

然而，毛泽东需要一批坚定的拥护者来推行庞大的整风运动。他找到刘少奇担任得力助手。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夏季可以说是在毛、刘二人的共同领导之下。刘少奇自己最后则成为他协助建立的体制的受害者。

在抗战初期的几个月，刘少奇把北方局交给副手杨尚昆，其后又由彭真继任，他自己则回到延安和湖南同乡毛泽东密切合作。一九三九年九月，刘被派往晋鲁豫地区视察党务和军事工作。作为党的领导，刘致力于消除共产党党内与日俱增的军阀作风，并设法把所有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一九四一年初，刘受命为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事件后的新四军政委，他的影响力从华北扩展到华中和华东。经过他在各个军事派系之间的不懈努力，敌后的共产党游击根据地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全部正式纳入一个行政系统之下。论功行赏，一九四三年，刘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夏天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领导集体中，刘少奇位居中共五大书记之列（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国家一线领导人。

在刘少奇干练的协助下，毛泽东的战略在抗战后期得到充分实施。尽管共产党的武力已经空前壮大，却拒绝与敌人认真作战，反而和日本和伪政权大肆贸易。一九四四年初，日军对国军发动称为「一号作战计划」的最后一次攻势，共产党至少应该像一九四○年那样，在敌后发动另一次反攻，牵制日军的行动。但是，他们不仅袖手旁观，还在陕甘宁边区集结大军，显然是希望在国军大败后乘机突破国民政府的封锁，使领土与苏联连接。

在抗战末期，日本也同样希望在国、共的对抗中坐收渔利。一方面日军避免两面作战，另一方面日本在延安和重庆作出和平试探；即使不能单独媾和，也想挑起中国的内战，坐观成败。国、共双方都不愿与国家的敌人合作，他们彼此之间也不能和解。两党都消极抗战，等待美国人给予日本最后一击。

註释

註1：译者按：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八路军干部学校。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一九三六年在陕北瓦窑堡改名「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迁延安，改为此名。毛泽东任该校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共举办八期。学员第一期为红军干部，从第二期开始招收各地到延安来的知识青年。一九三九年迁校至敌后太行山区，并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

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分校。抗战八年间，先后培养二十多万军政干部。

註2：译者按：一九三八年七月，毛泽东和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曾以文化团体的资格，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可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

註3：译者按：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人、中央委员五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三十八位负责人。

註4：译者按：毛泽东分析三种国共合作的可能形式及引文，见〈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第五部分「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第⑸节「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收于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集，《毛泽东集》，第六卷延安期II（东京：北望社，一九七○年），页二二八～二二九。〈论新阶段〉原文的篇幅颇长，一九四九年以来被毛泽东和中共列为机密，未予发表。官方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仅是〈论新阶段〉其中一个小节而已。

註5：译者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以及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等二十二人。

註6：译者按：百团大战并没有经过中央军委批示，但随后得到中央军委肯定。不过，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加以严厉批判。

註7：译者按：根据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日本产经新闻编，中央日报社译，一九七四～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册，页一一七记载：

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

时，毛泽东召集该军连长以上干部讲话，指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毛泽东并在当时表明了对于国民党阴谋的策略，分为（一）妥协、（二）竞争、（三）反攻三个阶段，以期逐渐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註8：译者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至十五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到会代表人数，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大事记」所载资料，应是一四九人。〔见网页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4/4415987.html〕

註9：译者按：参看〈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第二节「政权建设」，收于《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页七～一七。这篇文章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四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彭真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报告要点。

註10：译者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三（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页二八○～二八一。

註11：译者按：《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原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林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而作的一篇文章，后来才以单行本出版。一九六七年又由北京的外文出版社编译出版英文的*Chairman Mao Tse-Tung on People's War*，唐先生说一九六七年出版的*The People’s War*可能就是这本书。最近有资料称，《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是罗瑞卿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写的，用林彪名义发表。

註12：译者按：唐先生的引文，也见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香港：自由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九篇〈记「民主政团同盟」与延安之游〉，页九○。一九四五年七月，左和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往延安，与若干中共首脑人物会见。左舜生在这篇文章记述说：

在我们离开延安的前一天——七月四日，毛泽东特别要周恩来通知我和章伯钧，说他要邀我和伯钧到他私人住的地方吃午饭，并且可作竟日之谈……谈到时局问题，毛很激越的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

註13：译者按：英语本无Pekingologists一字。冷战时期，有人称

美国许多研究北京一举一动的专家为Pekingologists。唐先生在这里挖苦这些专家。

註14：译者按：这三篇文章的早期版本，原是毛在延安共产党学院授课的讲义。〈矛盾论〉和〈实践论〉如唐先生所说的，经修订后收入《毛泽东选集》。至于〈辩证唯物主义〉，毛似乎不以为是他的作品。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美国名记者史诺受邀和毛泽东吃晚饭，席间有一段谈话：

我问：「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把一篇没有收入《选集》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说成是你的着作。【见伦敦英文的《中国季刊》，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七至九月。—原注】你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吗？」毛要我把问题重复一遍。他回答说，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如果写过，他是会记得的。（见裘克安编集，《斯诺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页二八三～二八四。）

【第20章】

珍珠港事变后的中国与同盟国：史迪威事件

1

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一年多，中日战争几乎相持不下。国军在沿海各省节节败退，现在利用内陆的高山，可以坚守阵地。中共游击队也学会了躲避日军的攻击，把队伍分散到敌后农村，展开「地下」活动。（註1）只要日军没有发动攻势，国、共双方也没有认真计划向共同的敌人反攻。

日本人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佔领武汉后，确曾企图突破国民政府的防线以及扫荡佔领区的中共游击队，却未能得逞。在珍珠港事变期间，国民政府甚至能震惊世界，在保卫歷史名城长沙的战役中取得辉煌的胜利。而就在这个时候，日军正以秋风落叶之势横扫在东南亚的盟军。此后约两年，日军在太平洋的战况逆转，中日战事因此更趋缓和。

珍珠港事变虽然对中国战场的影响不大，却把中日战争带入一个新时代，尤其是在外交方面。珍珠港事变后两天，中国向日本及所有轴心国宣战。一九四二年初，同盟国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也包括泰国和印度支那半岛在内）的最高统帅。同时，华府派陆军中将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的确为这个饱经战祸的国家带来战胜日本的第一个真实希望。

但由于盟军在缅甸惨败，这种希望不久便转为极大的失望。盟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抵抗崩溃后，蒋介石判断日军将入侵缅甸，向英国建议共同防守仰光。这时，中国已组织远征军准备进入缅甸。远征军拥有中国最精良的三个预备军，包括中国唯一的装甲部队—戴安澜将军指挥的第二○○师。远征军本来可以像保卫长沙那样守住仰光，因为来犯的日本步兵要穿过高山密林，人数不多，又缺乏重武器。不幸的是，英国高层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因为「大英帝国的属国应由帝国的军队防守，不必劳动外人」。（註2）

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底，仰光失守已迫在眉睫，英国高层才对中国提供的协助表示「有条件的接受」，要点是中国的军队要接受英国指挥。委员长立刻答允。因此中国远征军由史迪威指挥，而他又同意受英国在缅甸的司令亚歷山大将军（General Sir Harold R. L. G.

Alexander）指挥。亚歷山大直接听命英国在印度的最高司令韦维尔（Sir Archilbald P. Wavell）。

中国的军队来得太迟了！日军在三月六日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仰光。他们的战利品包括等待运去中国的美援物资。通过仰光的港口，日本人现在可以有效地增援缅甸，包括两个师和两个坦克团，全是参加过新加坡战役的老兵。

为了阻止日军北进，中国的军队沿缅甸中部的同古–曼德勒线（Toungoo-Mandalay line）英勇作战，但英国防守伊洛瓦底江流域（Irrawaddy Valley）的殖民地军队不堪一击。四月中旬，亚歷山大和溃败的军队在战略城镇仁安羌（Yenangyaung）之南被日本追兵拦截包围。远征军总算将亚歷山大救离险境，但英军之败却暴露了中国军队的右翼，使得缅甸北部无法防守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人佔领滇缅公路的终点腊戍（Lashio）。远征军向云南省撤退，沿途遭到日军截击，伤亡惨重，戴安澜将军因此殉国，但日军东进的势头最后在怒江畔受阻。

在西边战线，日人于五月八日佔领缅甸西北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ktyina）。史迪威、杜聿明和孙立人带领五个师退入印度。炎夏在高山密林内行军，三万人中陈尸路上的有七千人，重装备都丢弃道旁。「多个月后，」一个美国歷史学家报告说，「许多地方的小径几乎被白骨覆盖。」（註3）

盟军兵败缅甸给予中国致命的一击。不仅三分之一中国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部队消耗殆尽，（註4）从此切断了中国与外界唯一的陆上通道，而且由此产生未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死结。从那时起，史迪威就决心收復缅北，而蒋介石则坚决反对。史迪威殚精竭虑，将大量中国精锐部队绑死在滇缅公路，这些部队原可以在其他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许多歷史学家认为，盟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最终崩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註5）

2

除了军事失败，英、美的先欧后亚战略使得中国更为沮丧。同盟国战略家希望在击败德国前让中国单独作战。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兵败缅甸后，美国给予中国的战略物资远远低于珍珠港事变前的数额。

应该指出，在中日战争的前几年，美国没有给予中国任何物资援

助。到了一九三九年，欧战即将爆发，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才首次给中国两个小额借款，总值四千五百万美元，而且限用于购买民生物品。

中国需要更多的借款，一九四○年六月派宋子文前往华府。同年九月，日军佔领印支半岛的北部，华府确知日人将入侵东南亚（美国情报机构破译了日本的密码），联邦政府同意借给中国另一笔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款项。（註6）

新借款虽然仍限于购买民生物品，重庆却因此感到鼓舞，派出另一团由毛邦初和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率领的人员到华府。陈纳德是美国空军的退役上尉，在中国空军却升任上校。他们计划组织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招募飞行员驾驶在美国为中国购买的飞机。

美国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实施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註7），使中国多了一个获得美国援助的机会。为此，重庆拟订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方案，提出要建立一支拥有千架飞机的现代空军，重新装备及训练陆军三十个师，建筑从昆明到腊戌的铁路（补充现有的滇缅公路）和另一条从缅甸北部到印度的公路。中国的建议在华府获得良好反应，罗斯福总统派遣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到重庆考察。

上述中美协定进行顺利，尽管在一九四○年英国为安抚日本曾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又称为飞虎队）有飞行员一百人，在仰光北面小镇同古的英国皇家空军机场受训。租借法案的物资也正式移交，并经过缅甸的港口运往中国。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美国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港（Newport News, Virginia）囤积了十四万九千吨物资，准备用来重新装备中国的军队。

珍珠港事变一爆发，罗斯福总统及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为过去四年半（一段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长的时间）「中国创造了经济和军事奇迹」（註8）折服，积极地要给中国巨额贷款。在参、众两院的一致支持下，总统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中旬授权贷款中国五亿美元，这是一笔用不完的巨款。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也同意谈判给中国五千万到一亿英镑的贷款，不过要拖到两年后才落实。

盟军在缅甸战败后，对中国的所有国际援助大受影响。仰光失陷后，在纽波特纽斯港的库存就因运输困难而由美国军火分配委员会（U.S. Munitions Assignment Board）重新安排。虽然租借法案的物资继续从印度阿萨姆（Assam）飞越驼峰，空运到昆明，纪录显示，一九四二

年五月只运到八十吨，六月一百零六吨，七月七十三吨，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在华人员的日常用品。

与此同时，日军为了报復美国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上校一九四二年四月率领机队轰炸东京，在蒋委员长的家乡浙江省重新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此危急期间，中国没有得到美国任何援助。反而是因为英军在北非亦遭重创，布里尔顿（Lewis H. Brereton）少将率领的美国第十航空队原定派往中国战区，却突然从印度调往埃及。根据租借法案经埃及运往中国的有限美援物资也转移给英国使用。

中国最感到失望的，莫过于同盟国拒绝中国加入美英联合参谋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简称CCS）。中国也不像英国和俄国那样，可以自行支配租借法案的物资。蒋委员长对这些公开的歧视十分不满，他向外交部长宋子文埋怨说：「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像矣。」（註9）蒋介石从此改变外交策略，不再一味乞求，转而讨价还价。一九四二年六月，受美国教育的蒋夫人坦白暗示中、日可以单独议和，蒋向美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三师（后减为一师）美军到中国战区作战；经常保持飞机五百架在前线作战；每月空运增加到五千吨。华府措手不及，但决定答应蒋的要求，除了蒋并未坚持的第一项外，其余全部接受。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同盟国三巨头—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召开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向美国要求的援助达到了另一高度。开罗会议同意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战后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他们在会议上也计划了在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的两栖登陆行动（代号海盗行动〔Operation Buccaneer〕），企图打开从印度到中国的陆上通道。然而在其后的德黑兰会议，史达林取代了蒋介石，海盗行动给取消了。蒋介石愤怒异常，又向美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包括贷款十亿美元。中国这样的要求显然是因为对随意取消海盗行动表示不满；根据中国的估计，海盗行动如按计划执行，同盟国的花费不止此数。华府对这些要求断然拒绝。

这段小插曲不幸给中美战时合作关系造成几乎不可弥补的损害。一方面这使蒋委员长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非常坏的印象，另一方面同盟国改变海盗行动的决定亦同样造成政策死结，助长后来悲剧性的史迪威事件发酵。

3

史迪威事件是战时最有争议性的一个问题，歷史学家们为此辩论不休。在所有形成这一事件的因素中，性格的确应佔首位。中美战时的合作是团队合作，但两个团队的领导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性格，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的话来说，「根本就格格不入」。（註10）两人都是意志坚强、骄傲自负、毫不妥协。蒋集旧中国精明统治者的优点缺点于一身，认为他的美国参谋长不过是个宫廷的侍从。史迪威充满殖民统治者的优越感，基本上是个顽固执着的美国西部牛仔，一意孤行，毫不尊重他的亚洲上司，不屑一顾地称之为「花生米（peanut）」。（註11）因此，光是性格冲突就使得团队合作一开始就行不通。所有美国政府的文职大员，如居里、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和罗斯福总统派遣访问重庆的华莱士（Henry A. Wallace），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都建议召回史迪威。当史迪威在一九四三年底担任盟军东南亚统帅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简称SEAC）的最高副司令时，他的英国上司海军上将蒙巴顿（Lord Louis Mountbatten）也十分希望把他调去别处。史迪威太自以为是和太讲究效率，在那里也当不好第二把手。

史迪威依照原来获得的指令，是要「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这个计划在战时中国本来就窒碍难行，况且在政治上也不能为蒋介石接受。史迪威首先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其后又在翌年九月提出三点建议：（一）整编合併中国的三百多个师，使之人员、装备完整，每次三十个师，直到完成六十甚至九十个师为止；（二）严格淘汰无能的高级将领；（三）把全国军队改编和前敌指挥的重任赋予「一人」，任何人不得干涉。显然，史迪威所说的「一人」就是他自己。（註12）

从技术上看，史迪威的计划了无新意。一九三○年代中期，蒋的德国顾问所拟订的方案里也包括这些要点。（註13）但两个计划的政治后果却有所不同。德国人的计划目标是整编中央军，是「建议」委员长亲自执行。美国人的计划涵盖全国，要求委员长袖手旁观，任由一个外国军人为他整编全国的军队。从蒋的眼里看来，这样的计划政治上不可行。

委员长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国民党政权从广州的时候开始就是个军事联盟。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的主要工作是「合併」和「清洗」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因而引起了一连串内战，几乎使政权垮台。如果蒋在和平时期急忙清洗的工作都失败了，在战时成功的机会更是渺茫。这个工作需要极大的耐性、手腕和相当长的时间。委员长显然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不幸的是，碍于面子与名声，他不能更

坦诚地向美国同仁说明，而含混其词的「政治考虑」说法在当时很难说服任何一个外来者。

然而，如果史迪威具有足够的政治洞察力，就不难看到委员长的难处，然后用适当的方法与蒋合作。但是这个美国大兵太专注于军事了。他认为委员长很自私；这只对了一部分。后来史迪威同别的派系领袖及共产党来往，似乎相信这些人比委员长更诚恳、爱国和值得尊重；这就完全错了。史迪威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就用交换条件的方式使委员长屈服。他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向华府建议说：「我们为他（蒋）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从他那里换得承诺。」（註14）这种等价交换的方式，虽然最初为罗斯福拒绝，却得到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全力贊同，一直维持到史迪威在中国的任务结束为止。

史迪威的确拥有足以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权力。他那时在中国担任四个重要职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参谋长；美军中缅印战区美国特遣队的指挥官；驻重庆同盟国军事委员会（Allied Military Council）的美国代表；美国总统执行租借法案事务的代表。仅是最后一项就产生无限的权力，史迪威深知如何加以有效运用。未经他签署，任何租借法案的物资就不能运到中国的仓库。事实上，他在中国任内，除了直接监督在缅北作战的中国部队外，史迪威拒绝签署任何大量物资给中国其他部队。有一次，甚至因等待中国为他做一件事，故意延误中国军校学生赴美受训。（註15）

4

为了对付史迪威，蒋委员长开始支持陈纳德。陈纳德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改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其后又在一九四三年三月扩展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恢復美国空军现役军人的身分，仍任第十四航空队司令，晋升为少将。他建议美国在改编中国军队前，先建立同盟国在中国的空中力量。

陈纳德提出这个建议有他的理由。重庆那时是全世界遭受最惨烈轰炸的城市；前线的中国军队亟需空军掩护；敌人漫长的补给线是最好的空袭目标；而最有说服力的，是他的飞行员的传奇事迹，足以让他大事宣称，只要给予他的空军足够的支持，就能令日本屈膝投降。

一九四三年四月，委员长派陈纳德前往华府，直接向罗斯福陈述他的提议。总统完全被说服了，但陈纳德在美国的军事系统中却是个孤家

寡人。除了在五角大厦缺乏人脉外，陈纳德对后勤支援的处理方式也引起美国同僚的严厉批评。他没有赢得马歇尔的赞同，马歇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史迪威的计划。因此，陈纳德的华府之行，只在美国的中国作战计划中制造分歧，总统和陈纳德在一边，马歇尔和史迪威在另一边。虽然总统有最后决定的权力，但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才是作战行动真正的执行者。总统喜欢的计划，如果得不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真正支持，无法维持长久。直至一九四三年底，罗斯福仍然希望给予陈纳德支持，但承诺的供应物资并没有及时运到。罗斯福随即在次年改变了主意。

蒋怀疑史迪威在华府和中国两地耍了手段，开始设法解除史迪威的职务。他发现美国政府的许多文官都是他的支持者，包括很有影响力的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因此，一九四三年十月，罗斯福和马歇尔二人都在认真考虑同样的问题时，蒋介石计划正式要求华府召回史迪威。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委员长发现史迪威问题引起家庭里的内讧。宋子文和何应钦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站在他的一边，夫人宋美龄和她有影响力的姊姊宋霭龄却要史迪威留下来。两位女士害怕史迪威去职会妨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她们似乎也另有个人的理由。蒋夫人从西安事变开始就与何应钦不睦，因为何在事变期间一度藐视第一夫人，说不应让「妇道人家」来干预国家大事。蒋夫人对此很难忘怀。（註16）史迪威曾公开建议解除何的参谋长职务，所以赢得女士们的支持。这样史迪威暂时成了宫廷政治的足球，也是第一家庭议论的话题。闺房终究压倒内阁，蒋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从重庆到华府就半途而废了。

不过，一九四四年初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蒋旧事重提。副总统完全同意史迪威并不适任，向罗斯福建议召回史迪威。不幸的是，华莱士低估了军方对本国政治施加的压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予副总统「最有效的回答」，推荐晋升史迪威中将为上将。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这个在缅甸取得胜利的英雄正式晋升上将。史迪威于是与马歇尔、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及阿诺德（Henry Arnold）等几个上将不相上下，得到华盛顿当局前所未有的高度信赖。

5

为了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美国将军，蒋介石也试过别的办法。委员长投史迪威所好，任命他为缅印前线特别战区的指挥官，相当于中国一

个战区的总司令，没有让他像参谋长那样留在总部的办公室运筹帷幄。委员长显然希望这样的安排会尽量使得这个将军少干预中国内政。

一九四二年的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蒋原则上同意再度出兵。当时蒋调动精锐部队三万人到印度蓝姆伽（Ramgarh）的训练中心接受美国教官的训练，后来称为X部队（X-Force，或称雷多部队〔the Ledo Force〕）。在史迪威的要求下，委员长又集中十五师大军（最终目标是三十五万人）在云南省，称为Y部队（Y-Force，Y或作Yoke）。这些部队构成了史迪威计划整编的头三十个师的一部分，用租借法案的物资来装备和训练，并由史迪威全权指挥。

然而在海盗行动取消后，委员长不愿意全力支持第二次缅甸战役，而史迪威却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执行。蒋指出，没有孟加拉湾的两栖登陆，只由中国在缅北单独发动攻击的代价太大，尤其日军是精兵良将，在疟疾横行的高山密林里严阵以待。修筑从雷多到昆明的滇缅公路工程艰巨而不切实际，对中国抵抗日本的战争帮助不大。

蒋委员长和他的作战参谋因此都认为在缅甸要么全面行动，要么取消行动。中国最多只能单独从蓝姆伽派遣X部队进攻缅甸北部，Y部队要留在云南应付华南的紧急情况，或沿着南方海岸发动夺取海港的新攻势，与来自太平洋的麦克阿瑟部队会师。（註17）

不幸的是，中国并非美英联合参谋会议的成员，不能参加制订缅甸作战计划，只能听命行事，否则租借法案的物资就会削减。一九四四年初，当X部队已从印度进攻时，史迪威对蒋迟迟不派Y部队渡过怒江十分愤慨。他的愤怒影响了美国陆军部（註18），陆军部很快就说服美国总统，认为是蒋在拖后腿。罗斯福渐渐从支持陈纳德改为支持史迪威，重庆开始感到压力。当租借法案的物资即将停止运送到Y部队时，蒋屈服了。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四日，部分Y部队约五万人在卫立煌率领下横渡怒江，缅北作战行动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全面展开。

6

更不幸的是，在中国军队渡过怒江的同一时刻，日军在华南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一号作战计划」是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最后一次攻势，它的双重目的是：攻佔长沙、衡阳、桂林和南宁等战略城市，打开从中国东北到印支半岛的大陆交通线；佔领沿线的同盟国空军基地。

在烟俊六的指挥下，日军动员十五个完整的师和五个独立混成旅，还有飞机二百三十架，总兵力超过五十万。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开始，日军向南推进，除了六月底在衡阳长达七週的血战外，没有遭遇多少抵抗。在年终前，桂林和南宁二地及附近的机场都陷落在日军手中。

华南的溃败导致蒋介石和史迪威互相推诿责任。在蒋的眼里，史迪威的行为跟中国战区的一些指挥官一样恶劣，只关心自己的战区，拒绝在别人危急时伸出援手。史迪威控制着租借法案的物资，除了参与缅北作战行动的X部队和Y部队外，拒绝给予其他中国部队任何援助。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后，他才同意给予其他华南防卫部队少量美国武器，但援助来得太迟，数量太少，已经无补于事。蒋抱怨说，华南地区面对的敌人六倍于史迪威在缅北的敌人，却由于缅甸战役，得不到具有充分训练和装备的部队增援。宋子文指出：「华南战败在中国造成的后果，肯定不是缅北作战行动的所有胜利能够抵偿的。」（註19）

事实上，委员长大部分的见解都证明是对的。但是，无可否认，故意任命这位美国将军担任一个半独立战区的指挥官，没有让他做参谋长，难道不是委员长自己的决定吗？蒋只是自食其果而已。

然而在美国人眼里，华南战败再一次证明国民党将领的无能以及委员长自私自利。美国人怀疑蒋与敌人祕密交易，要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军队，例如那些在第九战区由薛岳指挥的部队。愤怒的美国将领们要求和委员长摊牌。在其后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对决中，充分显示了军事机器在美国政治体系的分量。现在拟订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指导方针的是五角大厦而不是白宫。

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总统说：「在这场战争中，只有一个人能够使中国军队有效地与日本人作战，这个人就是史迪威。」（註20）罗斯福被彻底说服。从一九四四年五月开始，整个夏天罗斯福给蒋介石送去一连串由五角大厦起草、由他签署的信件，要求蒋介石放弃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

美国总统的信件在关键时刻抵达重庆。日本军队正横扫华南，盟军的缅北作战行动在云南龙陵同样失利。云南的军阀省主席龙云正和进逼的日军最高指挥官烟俊六密通消息。在中国西北，苏联策划新疆省的部族起义，有俄国与外蒙古的部队参与。最严重的是委员长所说的心腹之患：国民党将领的背叛和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调动。

李济深那时在国民党南方派系的决策中心桂林，利用日军进攻华南

的机会，密谋脱离中央。从一九二○年代起，南方的将领形成一个地方集团，在国民党内与蒋委员长的派系抗衡。中国战时有十二个战区，五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属于南方集团：张发奎（第四战区）、李宗仁（第五战区）、余汉谋（第七战区）、薛岳（第九战区）、李品仙（第十战区）。李济深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后来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与邻近桂林的张、余、薛等人都有私交，对他们有直接的影响。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管辖好几个战区。

李济深是一九三三年闽变的策划者、现在在南方集团卓有声望，特别野心勃勃。他一直在计划祕密脱离中央，同时与共产党及日本两方面接触，现在又要求美国人支持。经过一些间接的试探后，李亲自同美军准将廷伯曼（Thomas S. Timberman）和领事林华德（Arthur R. Ringwalt）会面。廷伯曼是陆军部作战处东亚组组长（Chief of East Asiatic Section of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of the War Department），衔史迪威之命到了桂林，唯一任务就是注意政变的进展情况。林华德是美国驻桂林的领事。

李济深首先希望成立西南联合国防政府，然后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虽然史迪威对这个密谋的态度是「静观其变」，但接到消息后十分高兴，宣称他「几个月前就准备好了」。（註21）

虽然李济深的密谋因为缺乏军事力量和桂系的合作，没有实现，却的确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之患。

更引起重庆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华北的调动。日本人与中共军队祕密接触过。史迪威与中共军队接触已有两年了，现在计划从成都正式把租借法案的物资拨给他们。蒋介石害怕共产党会利用日军在华南的攻势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经外蒙古或新疆与苏俄直接联繫；而且新疆已经出现了莫斯科与延安联手的密谋。

使蒋介石尤感恐惧的是，在史迪威手下的工作人员中红色热病流行，他们出于许多可以理解的理由，喜欢延安而不喜欢重庆。从一九四四年年中起，美军观察组（註22）由延安发出许多报告，其中包括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谢伟思（John S. Service）的报告，都建议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谈判，并提出撤回对重庆政府承认的可能性。谢伟思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加入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的意见不仅在政治和军事圈内得到尊重，也是美国新闻界争相採访的对象。

史迪威另一个像谢伟思一样很有才干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Davies），甚至建议美军与中国共产党祕密合作，佔领上海地区，用缴获的德国武器供应他们，然后视「中共政权如主权国家，完全排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註23）

虽然这些「计划」都没有制订成为蓝图，但这些人的活动毫无疑问都在蒋委员长的情报人员掌握之中。上述各种因素合在一起，使得委员长不得不解决史迪威问题，要么安抚他，要么撤换他。

蒋委员长已失去对美国总统说不的勇气，起初似乎要选择前一个办法。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致信罗斯福，原则上完全承诺让史迪威「拥有顺利地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註24）

委员长还要求美国总统如邱吉尔一样，派遣「一位有影响力的私人代表」与他合作，帮忙调处他与史迪威的关系。总统欣然同意，指派赫尔利担任此职。赫尔利在九月六日抵达重庆，立刻参与使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中美谈判。

委员长和赫尔利在重庆的谈判进行顺利，史迪威却愈来愈不耐烦。他有一次和宋子文闲谈，得到的印象是「花生米」只要他「充当下手」，于是决定不接受任何职责，除非蒋同意「决不插手」。（註25）与此同时，蒋考虑调回Y部队防守昆明，对抗从华南进逼的日军（也可能是要监视云南意图背叛的军阀省主席），令史迪威更加愤怒。

史迪威像以前那样把他的不快和愤怒传回华盛顿；他的报告也像以前那样得到军部上司毫无保留的认可。军部很快起草一封给蒋介石的信，送给总统签名。罗斯福刚从魁北克会议回来，筋疲力竭，签了名之后就送去重庆，完全没有考虑可能的后果。

信里的措辞异常严厉，指责蒋委员长没有支持缅北作战行动，警告蒋要准备「接受一切后果和承担个人责任」。然后美国总统要求委员长立刻派遣增援部队到缅甸，并马上让「史迪威将军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你的军队」。信件的结语说：「我现在要求你採取的行动，将会坚定我们既有的决定，以及美国准备继续努力，维持并增加对你的援助。」（註26）

史迪威决定由他亲自递送信件的方式更是令人反感。过程如下：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他带着信件抵达委员长官邸，蒋正在开会，在座的有赫尔利和一些中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何应钦和白崇禧。史迪威

示意赫尔利到走廊，出示信件。赫尔利认为这是给蒋的最后通牒，希望只简单说明要点，并告诉史迪威，蒋已经对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让步。赫尔利说：「他已准备採取行动，从北方调兵增援怒江前线；他正要委任你为总司令。」（註27）文件就放在会议桌上，只等委员长盖印。

然而史迪威坚持要亲自递送信件。他进入会议室，说明来意，将信件交给一个能说英语的中国军官翻译。赫尔利迅速起身取回原件，把中文译本交给委员长，说是为了节省时间。蒋读后不动声色，只说：「我知道了。」然后他把茶杯的盖子翻过来盖在杯上，示意会议结束。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盛气凌人态度怒不可遏，决心把他赶出中国。蒋给美国总统的信在九月下旬送达华府，信中保证，对赫尔利作出的所有承诺不变。赫尔利也报告说，美国总统与蒋委员长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赫尔利说：「除了史迪威的任命问题，蒋介石同意了你的每一项要求，每一项建议。」（註28）但是，蒋已不必再履行他的承诺了。马歇尔觉得没有必要委任另一个美国将领来指挥中国军队，因为任何人在中国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支持。此外，按照美国的战略计划，中国大陆的基地本来是为最后的退路而设，一旦中太平洋的作战行动不利才会使用。现在麦克阿瑟进展顺利，中国的形势就听其自然了。

罗斯福对蒋介石和对自己的军事人员似乎都有意见。此前，马歇尔准备好给蒋的信件，总统毫不犹豫就签名；现在总统要仔细考虑两週，马歇尔的回信常常数易其稿。最后罗斯福任命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取代史迪威，做蒋委员长的参谋长，但没有像以前同意的那样，让魏德迈指挥中国的军队。史迪威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底离开中国。

这就形成了虎头蛇尾的结局。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再也不是美国主要关注的问题。中国只需要耐心等待日本投降的好消息。一九四五年初，缅北作战行动胜利结束，从雷多到昆明的新滇缅公路完成后投入使用，还铺设了输油管道。蒋委员长建议把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但就像史迪威的整个中国任务一样，史迪威公路对盟军与日本的战争贡献不大，几个月后就废弃不用了。

罗斯福和邱吉尔、史达林在雅尔达（Yalta）再次会议。他显然对中国的局势失望，把希望放在俄国人身上，以为史达林是战胜日本和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关键人物。他希望让俄国人取得一些好处后出兵相助，于是放弃了美国多年来的门户开放原则，中美关系也因此翻开新的一页。

註释

註1：中共游击队这时在华北对日军进行地道战，村村地道连接，越共后来在越战时使用了类似的办法。

註2：见Dispatch on Operations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Jan. 15 to Feb. 25, 1942. Supplement to *London Gazette*, January, 1948，转引自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5。其时美国的外交界亦观察到，英国拒绝中国的协助是因为他们的「不愿意接受东方人出手相助，以免有损英国在亚洲的威信」。见*Foreign Relations: China, 1942* (the White Paper), p. 7。

註3：引文见Charles F. Romanus &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53, p. 141。

译者按：根据现有资料，中方指控史迪威弃军先行。孙立人是率军入印，杜聿明则是翻野人山回国，三人并未同行。

註4：引文见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tion, 1956, p. 213。

註5：引文见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44。

註6：见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hapter VIII。

译者按：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对华借款计有：中美桐油借款（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订约），二千五百万美元；中美滇锡借款（一九四○年四月二十日订约），二千万美元；中美钨砂借款（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订约），二千五百万美元；中美金属借款（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订约），五千万美元；中美外匯平准基金（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订约），五千万美元。

註7：译者按：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通过租借法案，其目的是在美国不捲入战争的同时，为同盟国提供战略物资。法案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开始实施，接受战略物资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和自由法国。

註8：引文见Morgenthau *Diaries*, Vol. 494, pp. 1-22, February 9, 1942，转引自*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 224。

註9：引文见Telegraph, Chiang to Soong, April 19, 1942, *Book VI, Hopkins Papers*，转引自*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58。

译者按：另可参看杨天石，〈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一〉，第二节「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等向美国提出史迪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谘询委员会集刊》，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七年），页三八七～三八九。

註10：引文见*Book I, Hurley Papers*，转引自Charles F. Romanus &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56, p. 450。

註11：译者按：peanut在美国俚语中有小人物的意思。Peanut head是美语「光头」的意思。

註12：参看*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art II。

註13：见Stilwell Diary, June 4, 1942, Chungking:"Left the paper with Madam (Chiang). She took a quick look and said, 'Why, that's what the German adviser told him.'"，转引自Theodore H. White,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1948, p. 113。

註14：见Memo, Marshall for President, 18 Feb 43. WDCSA 381 China (2-18-43), A46-523，转引自*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278。

註15：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p. 159。

註16：笔者访问一个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他是西安事变时南京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曾目睹该次的辩论。

註17：李宗仁在笔者访问时，由于不知道委员长是被迫发动缅北战役，批评蒋在缅北打仗毫无必要，忽略了华南的战略重要性。邱吉尔亦作如是观，他在战时回忆录《合围》（*Closing the Ring*, London, 1952, pp. 494-495）中写道：「我非常厌恶在缅北的大型军事行动，这是与日本人作战最坏的地方。修筑从雷多到中国的公路工程庞大而艰巨，可能到修筑完毕时已经不需要了……。」

註18：译者按：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是美国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的前身，成立于一七八九年。到了一七九八年，附属于陆军部的海军另立海军部（Department of the Navy）。其后的空军原亦附属陆军部，称为陆军航空队（Army Air Forces）。一九四七年的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重整美国的军事部门，陆军部改为DA（Department of the Army），陆军航空队改称美国空军（United States Air Force）。又成立国防部，总管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

註19：引文见Memo, Soong for Hurley, 9 Oct 44. Item 43, Bk 1, *Hurley Papers*，转引自*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61。

註20：引文见*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382。

註21：参看*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08-413；Graham Peck,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1950, pp. 578-580。

註22：译者按：美军观察组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派赴延安观察组的简称。又称迪克西使团（the Dixie Missions）。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美国政府在同国民政府反覆交涉后派出，隶属于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后属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主要任务是了解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训练状况、战斗意志和作战行动，观察日军在华北的军事实力及作战行动，掌握华北的经济情况与气候，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所作贡献及潜在作用等。包瑞德上校（David Dean Barrett）、迪巴斯上校、叶顿上校（Ivan O. Yeaton）先后任该组组长。一九四六年四月结束工作。

註23：引文见Davies to Stilwell, 2 Oct. 44, Stilwell Numbered File 115，转引自*Stilwell Command Problems*, p. 458。

註24：引文见Chiang to Roosevelt, 8 July 44，转引自*Stilwell Command Problems*, pp. 385-386。

註25：引文见Stilwell Undated Paper 37，转引自*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37。

註26：引文见Rad WH 64,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16 Sep 44. Item 11, OKLAHOMA File, JWS Personal File，转引自*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45-446。

註27：引文见*Joint Committee on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p. 2868，转引自The China Tangle, p. 190。

註28：引文见*Stilwell Command Problems*, p. 463。